

[法] G·勒图拉尔 著

法国历史轶闻

第三卷

北京出版社

法国历史轶闻

第三卷

〔法〕G·勒诺特尔 著
王殿忠 丁斌 译
王殿忠 校



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6579

1096579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法国历史学家 G·勒诺特尔写的《法国历史轶闻》一书的第三卷。每卷都由一个个意趣横生、自成一统的小故事组成。本书虽为稗官野史，但非完全杜撰，各种故事都有所依据。书中内容丰富，既有宫廷生活，又有名人逸事；既有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又有当时社会的习俗风尚。本卷讲述了十九世纪的珍闻和巴黎的历史遗迹。

TROIS SIECLES D'HISTOIRE DE FRANCE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G·LENOTRE

Librairie Académique Perrin

(根据1977年版译出)

法 国 历 史 轶 闻

第 三 卷

[法] G·勒诺特尔 著

王殿忠 丁斌 译

王殿忠 校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21·000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800

书号：11071·474 定价：1.65元

目 录

十九世纪纪事

1. 《妇女时装报》..... 3
2. 芒松夫人的昏厥..... 9
3. 贝利公爵遇刺..... 16
4. 康斯坦斯·梅耶小姐..... 21
5. 最后的宠妃..... 27
6. 一个大臣的梦想..... 33
7. 阿雷尔..... 38
8. 女诗人德尔菲娜·盖..... 45
9. 在开明君主的宫廷里..... 50
10. 霍乱来到上流社会..... 57
11. 路易一菲利浦被刺..... 63
12. 画家拉费的日记..... 70
13. 巴尔扎克的空想..... 78
14. 名喜剧演员艾丽赛特..... 85
15. 茶花女的秘密..... 93
16. 浪漫派作家旅行记..... 99
17. 普拉斯兰公爵夫人之死..... 103
18. 不眠之夜..... 107
19. 基度山宫..... 112
20. 两位挚友..... 119
21. 拿破仑三世的绰号..... 125

7/25/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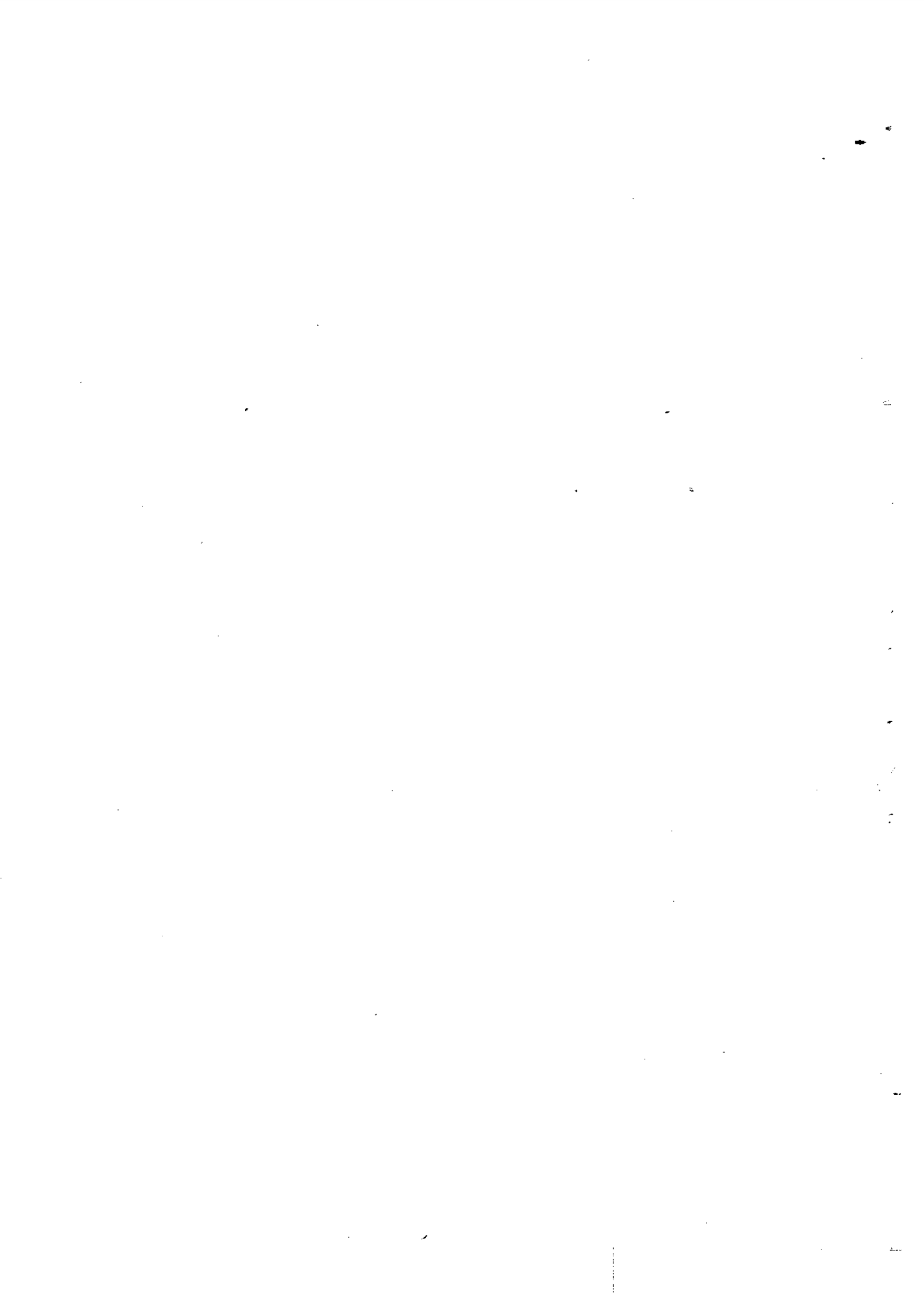
22.	大学生酒馆	131
23.	维克多·雨果的招魂术	139
24.	皇帝举办的盛会	145
25.	皇后的灾难	150
26.	法兰西学院院士米歇尔·夏斯勒	156
27.	“女大公”	163
28.	一个反战者的战斗	168
29.	福楼拜轶事	174
30.	末日	180

巴 黎 掠 影

31.	《旅游指南》	189
32.	献给巴黎第一圣人——卡米洛热纳	194
33.	文人野游场	200
34.	在我们脚下	206
35.	地下公墓	210
36.	《新建桥》的健康状况	216
37.	圣—多米尼克大街	223
38.	狄德罗的住室	228
39.	莫扎特在巴黎	235
40.	喜剧大师博马舍的两处住宅	242
41.	二十一次搬迁	249
42.	在丹东家里	261
43.	在杜伊勒丽宫漫步	267
44.	云雀园的英国修女	272
45.	卢浮宫的房客	277
46.	爱丽舍宫的舞会	284

47. 维克多·雨果的婚事·····	290
48. 外交大臣塔列兰·····	297
49. 国王路易一菲力普的纳伊宫·····	303
50. 地下隧道·····	309

十九世纪纪事



1. 《妇女时装报》

这是讲究衣着的人向那些讲究打扮的太太小姐们介绍的一种办法，即“要多准备几双鞋，鞋帮要一双比一双高”。其理由是：头一天穿矮帮鞋，白袜露在外边，晚上，踝骨处就会出现一条黑印；第二天，便可换一双帮子再高一点的鞋子把黑印遮住；第三天再换更高帮的，照此行事，一直到您想换袜子时为止。

这是1815年9月《妇女时装报》为使工于打扮的读者们保持体面而提出的一个很讲究实际的绝妙建议。这是一个小插曲，但可以相当确切地表明这份小小的刊物具有直言不讳的特点。这份报纸曾被两代的小姐太太和少爷公子们视为必读刊物。那原因便是它创刊于共和历五年，其时正是奇装异服和假发当令的年代，一直继续到1839年，那时衣着打扮正在大行其道。该杂志的创办人，据说曾经是个神甫，为人灵活干练，名叫皮埃尔·德拉梅桑热尔。他曾在拉弗莱什神学院讲授教义，大革命把他从神学院赶了出来。于是他就来到巴黎谋生。此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放弃了自己的神学专业，办起了报纸来指导当时的时装业务。这个意外的行业使他出了名，发了财。

《妇女时装报》共有三千六百幅彩色插图，由德布古尔·荷拉斯·凡尔耐等画家绘制。今天这份报纸在图书馆的目录中被列入稀有报刊栏目。据我所知，只剩下一份合订本

了。翻阅这张报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生活的哲理。首先令人惊异的是，尽管发生了一系列最重大的政治灾难，但这位沉着的编辑先生却无动于衷，而埋头于他的事业。法兰西第一帝国垮台了，旧的君主制从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起来，随后又崩溃了，接着又第二次重建；贝利公爵被刺，“奇异的遗腹子”诞生了^①；查理十世被赶走，路易·菲力普夺得王位……，这些“区区小事”没有一件能干扰德拉梅桑热尔和他那一伙不知名的同事们的宁静生活。他们有更加严肃的事情要考虑，因而对政治事件非常之蔑视。在隆隆的炮声中，他们没有忘记未来：“苏格兰帽子已不太流行了；白草帽还能站住脚；衣裙下摆上的装饰不宜太花哨；有的装饰要高于膝盖；绣球花、牡丹花、忍冬花近日来十分流行……”这些才是真正有兴味的改革，只有这样的改革才值得认真对待。

另外，使人不胜惊讶的是，这个拉弗莱什神学院的前教师竟完完全全地控制了同时代的人。当时的公安委员会也不如他有权威；对拿破仑可以不那么虔诚，而对他则必须服从；在遥远的年代里，法国人奋起反抗的专制暴君，哪一个也没有他那么严厉和无情。想不到在1812—1815年之间，崇尚打扮，喜欢出头露面的人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早晨一起床，就要把两条腿染成粉红色，这样，当他穿上那双“黑色长筒透明丝袜”时，便可以衬托出上面编织出的暗花。衬衫要穿“英国式”的，钮扣在背后，这种衬衫比一本正经的法国衬衫更不容易打皱；克什米尔呢裤上一定要有两条闪光的开司米白背带，背带上用金线绣着棕榈叶的图案。然后，他必须把胸前的花边卷成筒形；领带要用细麻布的，打领结时一定

^① 贝利公爵是王位的继承人，于1820年2月惨遭暗杀。他的遗腹子，有权代其父继承王位，致使谋害公爵的阴谋破产。——译者

先在脖上绕三圈，胸前还要挂上一条细长的金链，上面一定要拴着一件什么小巧的玩艺儿。最后一道工序才是白色凸纹背心和燕尾服，再在头上加一顶圆帽，帽里是用白色或蓝色的摩洛哥皮革制造，再戴上一副天蓝色的手套。经过这番装束打扮，这位绅士才可以出入社交场所。当然，也有那么些不合时宜的人不听这一套，对此《妇女时装报》表示说，这无关紧要，“因为大家注意的、研究的和欣赏的对象并不是这些人。”

如果这些风度翩翩的绅士要骑马，他必须戴上一只大小符合规定的英国戒指，手里拿根葡萄藤，充作马鞭。如果他想驾一辆轻便马车出游，那么他就得穿一件暗绿色的大礼服，颜色就象隆尚修女院里的青苔。礼服的丝绒大领几乎达到腰间。如果在座位上再垫上一件红夹里的苏格兰格花呢斗篷，斗篷上的三个小领圈耷拉在马车的椅背上，那就真是气派十足了。尤其要注意的是，裤子的颜色要能充分衬托出斗篷的红色夹里，最好是兔子或灰鼠的皮色。

对妇女来说，折磨更是无穷无尽。帽子是十分重要的，款式、质料和装饰每五天就要来一次花样翻新。德拉梅桑热尔在这方面清规戒律之严，花样之多到了有点近于荒唐的地步。例如1812年5月10日规定，草帽必须是白色的，上面装饰的翎毛是五至六根，“象垂柳似的倒挂下来”，但绝不能再多。到了15日，一切全变了，草帽变成黄色，上面还要配上五、六种颜色的苏格兰塔夫绸和“一束五至六朵的玫瑰花”。20日又变样了，苏格兰的塔夫绸没有了。25日又爆出绿衬里的白色帽子。6月5日，发出号召，让人们头戴三团绣球花。10日号召帽子上要系纱的或那不勒斯出产的宽绸带。20日，绣花球、绸带又不流行了，代之以雏菊和黄色或

红色的矢车菊，要找到这种颜色的矢车菊并非易事。25日，什么鲜花、绸带、羽毛，一下子全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缀满星星的双翼形的女帽，维也纳一位航空驾驶员的大胆试验促使人们采取这种新的式样。30日，这位航空驾驶员又销声匿迹了。小姐太太们头上必须戴上一顶打褶的草帽或者还可在上面插几朵丽春花。

爱俏的太太小姐们的服色变化无常，可是这位奥地利飞行员竟能很荣幸地使她们的花样保持三天不变，而且还能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种帽子的式样，这就是“德让式”。这位飞行员制定了一个飞行计划，想借助于自己发明的一套装置做一飞越巴黎之行。他从蒂沃利上天，用一根钢丝把自己挂在一个气球上，背上安上两个翅膀，想用这种办法在空中飞行。全城的人都来到街上或广场上观看。但这次飞行试验成绩不佳。风把他吹到了沃吉拉尔^①，并降落在一个公园里。这位维也纳的勇士终于象寓言中的蝙蝠一样，遭到大家的非议与责难。机械师们对他的那个气球横加挑剔；物理学家则对他搞的两只翅膀大加攻击。大家七嘴八舌都认为此举毫无意义。再说如果德让跌断了腰……请放心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这只不过是一个可笑的插曲而已。

德拉梅桑热尔还记载了不少趣闻琐事，这些记事对了解巴黎内幕和从前人们的私生活是十分珍贵的。我就是从中了解到今天我们咖啡馆设“露天”座位的来历。这事可以追溯到1815年6月，游人们大批大批地来到科布朗兹大道，也就是从塞鲁蒂街至佩莱蒂埃街的那一街段。以其冷饭著名的托尔托尼咖啡馆坐满了顾客，于是便把一部分凳子搬到门外边来。还有些人干脆在这条大道的泰布街至海德尔街之间的这一路

^① 旧时巴黎郊区的一个市镇。——译者

段的路边沙道上放些椅子，那时还没有人行道，并在树上挂上灯笼，这一创举非常成功。高雅的先生和漂亮的女士们象巴纽尔热^①的羊群纷纷涌向这里。因此，曾有那么一段时期这一地段的名称就叫巴纽尔热大道。在佩莱蒂埃和蒙马尔特十字路口之间也摆有椅子，但没有灯笼，这就是专供那些“闲逛的人”们在这里散步的“昏暗的街道”。这条路的对面便是一般市民、商人、退伍的老兵和女工的天地。德拉梅桑热尔很轻蔑地写道：“在那里，孩子们在椅子周围玩耍；披肩是兰斯产品；帽子也没有羽毛装饰；袜子也不是透明编花袜。这里是老实人约会的场所。名叫‘幽静的街道’”。

翻阅这份精美的报纸，还可以发现，今天我们称之为新奇的娱乐已经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们常可以看到人们带着赞赏的目光围观着一个硬纸做的小人，它随着人发出的命令，时而站起，时而躺下，时而跳舞，时而坐下，时而又起立，但并没有人去触动它——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大街上闲逛的人无不为之着迷。其实这种能活动的玩意儿早在1812年底就十分流行了。那时，法军在俄国惨败的消息，法军渡过别列津那河^②以及这支“伟大的军队”可歌可泣的史诗般的事迹接二连三地传到了巴黎，当时巴黎是那么震动，那么哀伤，又那么烦恼！你能想象到那种令人窒息的撕心裂肺的痛苦吗？那就请看一看1812年12月20日德拉梅桑热尔的记事吧，他写道：“我走

① 巴纽尔热是作家拉门莱塑造的一个人物。他足智多谋。有一天在船上他遭到一羊群商人的奚落。为了报复，他用重金买下了头羊，并把它扔进大海。羊群也随之纷纷投身入海。羊主死死拖住羊群，也随羊葬身大海。“巴纽尔热的羊群”比喻盲目随从的意思。——译者

② 第聂伯河的支流，位于白俄罗斯，因法军渡河而出名。1812年11月26日至29日法国渡河后更是溃不成军。——译者

进一所大厅，大厅里围着一圈人，我只听到从四面八方都向我发出了‘嘘’声，‘请别讲话，找个位子坐下……’‘出什么事了？’我低声问道，‘是不是有人在讲述什么有趣的事情？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件？还是在读一部新出版的名著？’”

“‘唔！’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太太说，‘我们才不会为这些事烦神呢！你一会儿就会看到新鲜玩意儿了。瞧壁炉那边！你看见那个盘腿在地上坐着的人了吗？你再看看这个木偶……’”

“这个人怎么了？”

“‘不是谈这个人，是这个木偶，我告诉你，是纸做的木偶，他会随着别人的指挥玩耍 跳高跳舞。你瞧，这简直象魔术，神极了；人一点也不去碰木偶，而木偶却会按人的意愿活动！你看见过还有比这更奇妙的玩意儿吗？’”

“‘亲爱的太太，我看这很简单，这是一种物理作用，只不过给它加了点磁性而已……对吗？’”

“‘别讲了，我不想听你说了……’”

务必请你相信这个德拉梅桑热尔是精通哲理的。他的思想是在学习严格的神学教义中形成的，一直到后来还留有这种烙印。他专横地左右着巴黎妇女的时装，但同时对崇拜他的信徒们又表现出一种傲慢、蔑视和嘲笑的态度。他便是阿尔塞斯特^①，只是因为时运不济而沦为时装商人罢了。

^① 莫里哀的“厌世人”中的主要人物，他有许多美德，但由于表现过分，而为社会所不容。他高傲而且鄙视周围的人们，和他们格格不入。——译者

2. 芒松夫人的昏厥

对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出席重罪法庭的那些仕女们，都应该提出善意的警告，尽管她们长得美貌动人，但她们在绞弄着手帕时，随便讲出的一句话，便可导致对你立案审查的后果。而在这方面，她们当中却没有一位能够达到她们那位杰出的前人克拉丽斯·芒松夫人所创造出的非凡业绩的地步。在整整的两年中，她竟然能够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她之所以能够十分圆满地取得这些成就，其秘诀就在于她能够不知疲倦地反复在公堂之上昏厥过去，此外无它。

为了使事情容易理解一些，有必要先讲一讲菲亚尔代斯事件。这个事件曾在1817年到1819年期间轰动了法国、欧洲、南北美洲及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请放心，我决不喋喋不休地去讲述事情的经过，在这里我只想提一下发生过的事情就够了。在1817年3月19日到20日的夜里，罗德兹城的前任检察官菲亚尔代斯先生被诱到该城埃布多马蒂埃大街邦加尔夫妇开的一个下流的酒吧间里并被杀死在一张餐桌上，然后又把尸体投进河里。当局盲目地逮捕了一位名叫巴斯蒂德的乡绅，此人是菲亚代斯的妹夫。还逮捕了银行家若吉翁，他是巴斯蒂德的妹夫，此外还逮捕了若吉翁的一个妹妹加尔蒂埃太太和邦加尔夫妇，还有洗衣女工安娜·伯努瓦和她的情人科拉尔、搬运夫布斯基埃，以及全罗德兹城人人都认识的

一个傻里傻气的乞丐，名叫米索尼埃。所有这些人从头到尾一直都否认他们参与了这件恐怖的罪恶活动。所有这些人都声称，菲亚尔代斯年高德劭，作风正派，嗜欲淡泊，乐善好施，堪称克守文职，克尽夫责，为官清正，这样一个人死去，对他们没有任何直接的和间接的好处。

这时，克拉丽斯·芒松登场了。从她《回忆录》上登出的照片看，她并不漂亮，但却显得轻浮、妖艳、浪漫。当时她已三十二岁了。她离开了丈夫独自带着七、八岁的儿子爱德华住在罗德兹市。她的父亲昂雅尔朗先生是一位已退休的法官，曾任罗德兹市重罪法庭庭长等要职。在克拉丽斯人数众多的追求者中，有一位年轻军官克莱芒多。他是沃特雷将军的副官。此人求爱心切，追之甚急。她向他表示，不希望他这样做。而且她这位情人死磨硬缠的劲头也很使她反感，但她还是做了让步，并同意他陪伴自己去福拉尔散步——因为她还要消磨她那无聊的时间。而这位副官又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有一天晚上（即在罪行发生四个月以后，预审还没有什么进展之际）克拉丽斯从戏院回来的路上克莱芒多便跟上了她。等她回到家中，他也跟在后面溜了进去，并强行闯进了她的房间。当时他已十分困倦，不住地打着呵欠。尽管芒松夫人一再地提出抗议，他还是赖在一只安乐椅上睡了一觉。这是一个多么古怪的情人啊！当他醒来时，便对克拉丽斯说：“您知道吗？现在城里有谣传说，当有人杀害菲亚尔代斯先生的时候，正有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在。有好几个人说这个人就是您……呃，您就承认了吧！”克拉丽斯感到十分厌烦，便回答说：“噢，一点不假！我当时正在那儿，我什么都看见了！”军官同情地说：“真是可怜！这么一来，您可就太使我感兴趣了！有人说巴斯蒂德当时想把您杀掉，是

若吉翁救了您的性命……”芒松太太想，这个人大概是喝醉了，最后，她好不容易才使他离开。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说的。

第三天，她便被召到王家检察官那里，对她进行了审问。她声明，她一生中从来没有跨进过埃布多马蒂埃大街那个小酒馆的门槛，3月19日那天夜里，她根本就没出过家门。说完这些，她就离开了。当时她对克莱芒多干的蠢事与其说感到气愤，不如说感到惊讶，他竟然把几句开玩笑的反话信以为真。又过了一天，省长戴斯都迈尔伯爵向她发出了邀请。克拉丽斯有点激动，打扮了一番，就应邀前往了。省长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她，并特别审慎地问了她一些情况。这与其说是一次审讯，倒不如说是一次谈话。不管省长怎样反来复去地问她，芒松太太还是矢口否认。她说，她从来没有去过邦加尔酒馆，她对这件罪行一无所知，报纸上有关这一罪行的报导她也才刚刚读过，因为她对于这类社会新闻根本不感兴趣。她回到家里经过反复思考以后觉得，她这种否认一切的回答，可能会使那位善良仁慈的戴斯都迈尔伯爵感到伤心，而且，这些谈话也使克拉丽斯自己感到十分烦恼，于是她给省长写信说，她撒了谎，现在她准备揭发这个“难以揭破的秘密”，她不幸对这一事件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很了解。当天晚上，她便当着她父亲和克莱芒多的面，向省长讲了全部事实。确实，当时她是在那个发生谋杀案的酒馆里，她看到了发生的一切，她将把这一切都说出来……。夜晚，人们把她带到埃布多马蒂埃大街那间酒店里，她要在这个发生悲剧的不祥的现场作证。但是她刚一进门，就晕倒了。等她刚一恢复知觉，就勉强地用微弱的“是的”来回答一切问题，问她什么，她都回答“是的”。甚至就在这同一天晚上，她便对她父亲正直的昂维尔朗先生郑重地宣称，她说的那些话

都是撒谎，对于这一悲剧，她一无所知。尽管她如此郑重地声明，但在几天之后，她却当着戴斯都迈尔伯爵和一些法官的面推翻了自己的声明，重申了她以前的证词。不过，随后她又向这些人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信中对天发誓，说她欺骗了他们，她所承认的那些全是假的……就象读一部情节曲折的长篇连载小说一样。整个法国的注意力都随着这一令人恼火的出尔反尔的证词在波动，人们对菲亚尔代斯谋杀案的兴趣，都集中在芒松太太身上了；大家都急不可待地等待着在重罪法庭上能听到一些芒松太太不能自圆其说的关键性的新闻。

诉讼案件的审理终于在8月18日开始了；进行了二十次审讯，三百二十个人出庭作证。尽管有十个被告，但是法庭却始终闹不清到底是谁，又是为什么要杀害菲亚尔代斯。但是，这关系不大，大家关心的是，令人迷惑不解的芒松太太会不会再出来讲话？这是许许多多焦躁不安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全欧洲都关心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一著名的案件已经建立了专门的报导。连官方的《箴言报》也不惜辟了专栏，而且对于克拉丽斯那种出尔反尔的行状特别“关心”，对于她，这家一向很严厉的报纸却表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偏爱。她终于出庭了，她神情有些痴呆，仔细地打量着到庭的人们；她开始周身发抖……随之便昏倒了。法庭上的人全都站了起来，人群骚动了。芒松太太苏醒过来，在许多急忙跑去救护她的人中，她第一个注意的便是德斯贝利埃将军，她用疯子一般的动作指了一下将军身上的佩剑便又跌倒在地昏了过去。然后，她又恢复了神智；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她抬到主审官面前，主审官非常温和地开始问她：

“太太……”克拉丽斯又昏厥过去了。当她第三次被救

醒时，她发现了身材魁梧的巴斯蒂德坐在被告席上，突然，她站立起来喊道、甚至可以说嚎叫着：“你招供吧！可恶的家伙！”接着便是第四次的昏厥，当她苏醒过来时，却低声地嘟哝着：“不，我从来没有去过邦加尔酒馆……”

这就是当时的全部情况。如果不是出现了下述场面，我们便几乎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在庭审快要结束时，其实，她听着巴斯蒂德的律师在进行辩护，大概觉得她这位风头人物已不受注意而感到十分恼火吧，她于是打断了律师的辩护，大声地说了一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并不是所有的罪犯都抓进来了！”这次审判，五个被告中，巴斯蒂德、若吉翁和邦加尔太太被判处死刑；两天以后，芒松太太也被捕了。

她被送进了单身牢房。但是，看起来法庭也是个故弄玄虚的地方。因为这个“单身牢房”不但不妨碍这位被监禁的女犯接见来宾，而且还可以在这里举行音乐会，会见来访人员，发表她的《回忆录》，并且还写了一些蹩脚的诗作，而手稿收集爱好者们居然奉为至宝为此争夺不休。人们也许会说，政府当局是存心想加剧人们的好奇心吧，因为，罗德兹市的判决被上司否决了，审判将在阿尔比法庭重新进行。被告们是关在铁笼子里运到那里的，而芒松太太却是骑着马去的，廊由七个宪兵和三个军官护送；当时有一幅画描绘这位太太有如凯旋而归的“英雄”进入了阿尔比。在阿尔比她仍然住在监狱里，在这里，她吸引了一群名副其实的崇拜者，其中有作家、画家还有一些因为慕名专程远道而来向她致敬的人，甚至还有一些法官也常来看她，其中有一位是将要主持这次审判的，他表现得非常之殷勤，因而别人竟说他爱上了克拉丽斯。她甚至可以从监狱出来，到公安部长的兄弟，省长德加兹先生家参加晚会。

在1818年4月3日开庭的那天，她一出庭就受到可以说是热烈的欢呼。她只讲了几个字，但那效果却异乎寻常的强烈。她两眼盯着巴斯蒂德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向他喊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卑鄙家伙！你不是曾经想要杀死我吗！”说完，就倒了下去——她又晕过去了。人们把她弄醒过来，法官恳求她；菲亚尔代斯的儿子也在场。也以上帝的名义苦苦地哀求她；听众们甚至以热烈的掌声鼓励她继续讲下去……。她终于张开嘴，要讲话了……。然而，她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脸色变白，她又失去了知觉，法庭只好把她抬走。

巴斯蒂德、若吉翁和科拉尔被处决了，直到行刑之前，他们一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是，这篇关于这件案子的连载小说实在是太吸引人了，人们不愿意事情就此了结。报纸的老板们便在“明日待续”的题目下安排了新的情节。在1819年初，罗德兹重罪法庭又审判了三个被告。这三个人很早就已被捕，但当局为了维持公众的兴趣，便把他们作为后备人员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在这个很棘手的案子里一切工作都搞得支离破碎，所以一直没有审判他们。这些被告中有一个名叫贝西尔—韦纳克，此人二十六岁，颇有财产，人也长得很漂亮，是被处决的巴斯蒂德的侄子。另一个是公证人伊恩斯，第三个便是警察局长康斯坦，最初逮捕巴斯蒂德、若吉翁和其他人的就是他。这一次芒松太太的话却多了起来。她说，在事件发生的那天晚上，她由于“偶然的”机会正在邦加尔酒馆，她目击了杀人的暴行。在杀人凶手中，她看见有贝西尔—韦纳克和伊恩斯。支持她这些揭发的证据竟有一百五十件之多。尽管如此，陪审团还是宣判被告无罪。因而使得那些严肃认真的人们从此再也无意于去弄懂法庭上演出的

类似这样离奇古怪的把戏了。

很明显，这里存在着至今没有被识破的秘密。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可能在事件的背后，有一桩见不得人的政治阴谋。但是，奇怪的是，一个世纪过去了，没有透进一丝光明将笼罩在上面的迷雾驱散。甚至，直到这出悲剧中的那些幸存的演员一个个死去，人们仍未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得以澄清事件的真相。邦加尔太太声明她的那些揭露都是伪造的，之后不久，她便死在苦役犯监狱里；布斯基埃也是同样的口气；贝西尔—韦纳克年事很高了仍然健在，在本世纪初仍然在世的认识他的人，还能记起他来，但却始终未能搞清他的真正身份，因为他离开了原来的住地，很成功地摆脱掉了那些好奇的人们。那么我们也把这件事忘了吧！……至于芒松太太，她对这样的事可并不那么谨慎。1819年春，有一位投机家经过周密盘算后，愿出一笔巨款把她弄到蒂沃利^①去露露面，她拒绝了。可能她还指望她的名声会给她带来“一桩美满的婚姻”。然而上门求婚的却不那么踊跃。不久，她便接受交易所附近的一座大咖啡店的雇佣掌管柜台。亨利·德·拉图什帮她撰写回忆录，她拿到家里出售，为了招揽生意，她答应与前来买书的每个人都谈一次话……这种古怪的交易方式颇时髦了一阵，便消沉下去了。很有那么一段时间，有人又看到这位罗德兹市的女英雄在植物园后面考博大街上的一个小咖啡馆里工作，随后也就销声匿迹了。据说，她到凡尔赛去了，在那里，她靠着大臣德卡兹^②同意给

^① 蒂沃利，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在爱马附近，以风景秀丽闻名，有瀑布、寺庙等名胜。——译者

^② 艾黎·德卡兹公爵（1780—1860），路易十八时大臣，以自由主义者著称，他的儿子路易—查理—阿马迪尤在1873到1877年间曾当过外交大臣。——译者

她的一笔抚恤金生活。据认为她死于1835年，这一点是否属实，至少还存在着疑问。这个问题并不难办，只要在凡尔赛户籍登记处的死亡记录簿上一查，马上就能得到解决。

3. 贝利公爵遇刺

大家都知道，关于贝利公爵一案现在还争论不休。他在1820年2月13日夜里从大剧院出来的时候被卢韦尔刺了一刀。是否伤着了右心房，迪皮特伦冒着使伤者流血更多和破坏胸腔保护膜的危险来测试伤情是否做得对。这些问题，时至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显然对死者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但是，它除了引起专家们的兴趣之外，还提供了进行一次调查的机会。这种调查，对于一般好奇心很强的人是大有好处的。我自己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重新读了一篇叙述这场悲剧的文章，这篇文章经常被调查人员所引证和使用。它确实是历来描述历史事件描述得最好的作品。该文是一个名叫鲁莱的人写的。1820年，此人在巴黎歌剧院的门厅经营一个小书店，该剧院坐落在黎塞留大街，即现在的鲁瓦广场。

鲁莱有一位“夫人”（他一直是这样称呼她），她担任国王包厢的引座员。夫妇俩住在巴图瓦大街，每天，鲁莱自己驾着一辆破车去歌剧院上班。到剧院后，他就把马车停在科尔贝尔拱廊下，把马拴在墙上的一个大铁环上；戏演完之后，他又套上车，把他的夫人“慢慢地”送回巴图瓦大街。

前不久，鲁莱夫人摔了一跤，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走路要靠拐杖，后来虽已痊愈，但行走起来仍有点跛，“总是不那么利索”。除此之外，她仍然是一位高贵的女人，对于这一点，她丈夫是十分明白的。

由于职务的关系，他们两个就成了2月13日惨案的最先目击者和最了解情况的人。鲁莱把它写成文章，于1820年拿到迪多出版社付印。但是，出版的书几乎全部被一个人买去了并把它们毁掉了。其原因何在？是文字的俗浅，内容的庸俗，甚至某些细节的无聊而使得上层人物感到不悦吗？人们不得而知。这本小册子在坊间几乎绝迹了。1862年，布来一马拉西将它重新印刷出版，使得这本杰作得以永存。所以称它为杰作，因为它叙事准确，描写细致，同时文字朴实。

鲁莱具有一副照相机般的眼睛：他什么都看在眼里；但是，由于他不懂比例的艺术，他把眼睛摄下的一切都置于同一平面上。例如歌剧院门口有一座小亭子（指开在拉莫大街上剧院出纳处旁边的那个门，王室一家就是从这个门进入他们的包厢的），请看他是如何描绘这个亭子的：

“在亭子左侧板壁的小圆窗上方，用白灰写着两个‘女王’的字样，在右边的支柱上用刀子刻着‘维亚那·布朗麦尔·居伊恩’。亭子离出纳处有三法尺六法寸^①，从亭子到剧院门口距离为八法尺。”

对王室包厢客厅的描绘，其细致程度也不比上面的更差：

^① 一法尺相当于三百二十五毫米与中国市尺差不多，是法国古代长度单位，一法寸相当于十二分之一法尺。——者

“在入口处的右边，是一只箱子，里面装着木材；对面是候见厅的大门，左边是一个已薰黑了的黄泥火炬；最里面，是一扇灰色的门；门对面，靠窗放着一张铺有绿色桌布的长桌；靠右边窗户的窗洞与另一个办公室的门相通；再向右，是一张安乐椅，椅子的后边是一扇玻璃门，门的一侧窗户对面靠隔板放着一张不大的黑色木制长桌，在它右边是一个八角形的写字台；旁边是通向公务人员办公处的大门；再右边，是一座格雷特里的雕像，他是一位描绘大自然的真正的画家；壁炉里生着火；壁炉上放着一面镜子和国王的肖像；在角落里是一架隔热屏”。

贝利公爵和公爵夫人是将近十点时，在演出中间到达剧院并来到这间客厅里的。夫妇二人各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休息。亲王夫人直打呵欠，亲王问她：“想回去吗？”她回答说：“不，我想看看芭蕾舞。”于是，公爵便问鲁莱夫人：“鲁莱夫人，芭蕾舞开始了吗？”她回答说：“亲王殿下，还没有开始。”接着便是开演的三声锣响，她说：“殿下，开始了。”公爵谢过她，就和他的夫人进包厢去了。

第二幕刚开始，他们便从包厢里出来，贝利公爵把疲惫不堪的公爵夫人一直送到车上。鲁莱夫人以为他们俩都要回去了，正在为自己也可以回去休息而高兴时，突然听到街上传来了几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她先跑向门口，什么也看不见，接着就跑下楼去……发现亲王已经躺在值勤士兵的长凳上，亲王夫人跪在他的身边；他们两人的衣服都沾满了鲜血……

这时，鲁莱正准备结帐，从书店的小窗子里，他看到一

些人在跑动，剧院门前聚集着一大堆人，有人在叫：“抓贼呀！抓贼！”在人群中，他认出了亲王的仆人；他跌跌撞撞地“爬”上通往头等包厢的楼梯，正碰上了他的夫人，她惊慌失措地向他喊道：“鲁莱，快去叫人，亲王遇害了！”

这位老实人急忙跑向包厢的走廊，两个值班医生一个也不在；于是，“他一边嘟哝着埋怨这些人失职”，一边急急忙忙地回到了客厅。

“亲王被他的几个跟班抬进了客厅，我的夫人帮着抬一条腿。他们把他放在壁炉前，让他坐在一只安乐椅里。亲王声音低沉、短促地说：‘神甫！……去请位神甫！’亲王夫人便传话说：‘去找一位神甫！’我抓起我的小药箱，把它放在壁炉的一个角上，从里面取出一小瓶醋，用于蘸着它搓亲王的太阳穴。第一个走进客厅的是一位叫德罗加尔的年轻人，在场的人纷纷问他是不是外科医生。他说，他是戴斯居拉普的孩子。我连剪带撕地将他的衣服——受伤者的衣服——敞开，使他的伤口露出来……我拿了一瓶收敛性的醋，倒在手帕上让亲王捂住手帕呼吸，我用这个办法来给他止血。因为我站在亲王和夫人之间，我便转过身来擦亲王夫人裙上的血迹，这样一来，她的伴妇德·贝蒂西夫人便说：‘放下吧！放下吧！让我来擦吧！’警察局长费里泰先生踮着脚尖，伸着脑袋来到了客厅的门口。我让人把一小块糖和一些桔花放在一个小杯子里化开，然后我便让亲王喝了下去。拉克鲁瓦（外科医生）把杀害亲王的凶器交给我并告诉我，如有人问我要时要我一定藏好，不要交出来。于是，我把它藏在只剩下一小块白糖的瓶子里……”

过了一会，人们把濒死的亲王抬到公务人员办公室，在那里支起了一张行军床，给亲王第二次放血。因为没有往外倒血的器皿，鲁莱端着脸盆往外倒，他打开窗子叫道：“让开！小心水！”停在门前的公爵的车子退开了，车夫身上还是溅了一些血。鲁莱请法瓦尔以剧院监察的身分下去招呼人们把窗下停的车子都整顿好，“以便让水流起来方便些。”但是，法瓦尔什么也没干：他躲到了格吕克^①“这位堪配全世界人民景仰的勇敢的天才”的半身像后面，象瘫痪了一样一直在那里呆到第二天早上。

鲁莱则相反，他继续忙碌着，他无处不在，无事不参预。他在一把椅子上设了一个简易的祭坛，圣一罗克神甫就用它来为公爵做临终圣事；他点上火，热了水，给死者脱下衣服，点燃了蜡烛，给房间通了通空气。奇怪的是，当在场的人都惶惶不知所措的时候，唯独他却保持着惊人的冷静，所以，那个悲惨的夜晚发生的每一件细小的事，都象用雕刻刀刻在他的脑子里一样。他还能记得，德南图依埃伯爵看见他把蜡烛放得离窗帘太近，曾说过：“请您小心不要着火！”他还能回忆起国王的手杖放在哪里，“药罐”放在哪里，以及灵台照明用的六支蜡烛每一支放在哪里。他还记得，有人从爱丽舍宫拿来了一个桔子，将它剥开用来湿润临终者的嘴唇，然后，就把“这一块块的桔子瓣往床脚下扔，它们碰到墙上，然后便落在壁炉右边角落里那件准备替换的衬衫上”。

最后，当2月14日早上，当他看到尸体裹在一条毛毯里并用一条大浴巾十字交叉地缠上，由一群跟班和看门人布松以

^① 克里斯朵夫·韦力巴尔德·格吕克（1714—1787）法国歌剧作曲家，他曾把许多歌剧大胆地加以改造带上他自己的风格。曾在巴黎住过多年。——译者

及办公室杂使阿鲁齐等人抬走，并看着人们把尸体安放在那辆在外边等了一夜的车上时，他还不认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在他的故事里，又加上了公爵临终时在场的人员名单。其记忆力之强，竟连他们穿的是什么服饰都一毫不差：“两位伴妇衣着华丽、没戴帽子，头上各戴一个玫瑰花环（奥尔良公爵夫人戴的是一顶上面插着白翎毛的帽子）。外科医生杜布瓦穿着褐色的毛皮大衣，戴着一顶黑色便帽，这顶便帽只有国王来的时候他才肯摘下来。”就精确度而论，鲁莱胜过了电影放映机。

由于他对事情的真实性和特别重视，所以他并没有忘记把3月20日德·梅纳尔伯爵派了一个仆人去巴图瓦大街强令鲁莱夫人到爱丽舍宫去这件事写进书里。是鲁莱陪同他的“夫人”一起去的。接见他们时，德·梅纳尔伯爵通知他们说，公爵夫人“非常满意”，他代表她交给他们一块二十法郎的金币。

二十个法郎！……很可能由于忠实地披露了当时的情况，因而促使某一位虔诚的保皇党人充做买主，把鲁莱的著作全部购下，并加以销毁，从而把这一精心设计的悲惨故事从人们的头脑中抹掉。

4. 康斯坦斯·梅耶小姐

世事真是无奇不有。在画家中，至少有那么两位，最钟爱，也最能体谅自己的夫人。他们把自己太太的情影付之丹

青，每个部位都描绘得尽善尽美，形象楚楚动人；然而，他们却都是不幸的丈夫。可怜的画家克罗兹为夫人画像，把自己的妻子“幸福地置身于儿女们中间”，而他的太太却“把丈夫的画具周围搞得乱七八糟”。该作品在展览馆大厅展出时，冠以这样动人的题目：《可爱的母亲》。这一标题只能理解成是为了迎合绘画爱好者的兴趣，此外便无法解释。因为谁都知道，克罗兹太太是位凶悍的女人，她对这位文质彬彬的艺术家极尽虐待之能事。她生活放荡而丝毫不把自己的丈夫放在眼里。画家普律东的情形甚至更糟。他是石匠的儿子，在艰辛中成长起来。他为人腼腆而内向，一直梦寐以求地向往着创造一个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薰风和煦，溪流边有出浴的少女，密林中有婷婷的丽人；她们体态轻盈，婀娜多姿；她们仿佛处在轻纱般的缥缈而朦胧的画面里，在黄昏的暝色中飘忽、浮动。“每当他接近一位身材匀称或是面似桃花的女性时，一种既崇敬又爱慕的心情便油然而生。在普律东的心头回荡着那么多的维纳斯，那么多的普赛克，那么多的丘比特和阿多尼斯，但为什么他在选择自己的伴侣时却那么不如意呢？这实在是令人难解。他所选中的对象与他头脑中经常萦绕的那些轻柔而朦胧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

“真是下笔如有神，只要他的画笔一触及画面，这些形象便马上在他的笔下生发出来。”让娜·勃奈成了普律东的夫人。她是一位泼妇，从未见她有过心平气和的日子。在巴黎大学，政府拨给这位不幸的画家一间画室，他在那里辛勤地索居作画；而太太那永不平息的怒火竟然燃烧到他的画室里来，以致他不得不求救于展览馆的馆长维旺·德农，以平息这种由于太太撒泼而使静室沸腾的令人难堪的场面。一位艺术家，要顶住这样的搅闹，非具有超人的韧劲不可；而普律

东却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力求感化甚而至于爱抚这位雌虎般的妻子。那结果，便是她给他生了一女四男；男孩只活下来三个，他们分别是：约翰、厄达米达斯和费罗包曼。女孩取名艾米丽。从这些名字中可以看出他们诞生的年代。古文明还是时髦的；如果说，普律东为长子取名没被这种时髦的风气所薰染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是降生在大卫和他的门徒们尚未把他们对大逆不道的罗马和希腊的崇拜强加于当时那些赶时髦的人们的缘故。然而不久，这种尚古习俗便蔚然成风。人们把从德维里斯或是格则诺风那儿弄来的名字给自己的幼儿命名已成为一种通例，此风在画界尤为盛行。

如果温和的普律东崇拜古代英雄人物已到了用他们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的地步的话，那么，他从这些英雄们所奉行的禁欲主义那里却毫无所得，他夫人每生育一次，其暴躁脾气便有增无减。这使他对夫妻生活感到厌倦。他的朋友们发现他变得一天天消沉起来了，其中一位写道：“在他的脸上从未见过一丝笑容……”然而，作为一个补偿，一次机缘终于来到这位受人赞赏的《罪恶过去便是神圣的正义》作者面前。那是在1803年的某一天早上，她以一位二十八岁姑娘的形象出现在他的画室。她那高雅的风度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以致“只要你见到她一面，便不可能忘却她的风采”。她叫康斯坦斯·梅耶，先后作过苏威和克罗兹的学生，她已因几幅颇受称道的作品而在画界崭露头角。

康斯坦斯是一位海关官员的女儿，因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所以她颇具风度，其谈吐之不俗，显示出一个上流社会人所具有的大家风范。她漂亮吗？初看上去很难这样说，但却富有“诱惑力”深褐色的秀发蓬松着，有一张挑逗人的，常带笑意的嘴巴，两排整齐的玉齿，一副琥珀色的面颊，一

双敏利的眼睛时而含情脉脉，时而发出嘲弄的光芒。她对艺术的感受性非常之强烈；每当谈起她所喜爱的诗歌、音乐或者绘画时，情绪便非常激动，被泪水湿润的双眼便闪耀着热情的光辉。现在卢浮宫里珍藏着的这位引人注目的女性的肖像，其传神之处，你便是用尽天下最精确的语言也难以表达，它堪称普律东的杰作。形象栩栩如生，富有魅力并充满生机，以致凡是了解故事结局的人看后无不为之动容。那原因，便是康斯坦斯这幅肖像画是普律东所作。她后来作了普律东的学生，不久便成为他的合作者。至于这位可爱的姑娘长期留在画家的身边，如何使得这位忧郁的画家改变了性情，又是如何经过许多周折使他变成一位最亲切、最温和而又最多情的为女性作画的艺术家，以及又是如何使得一大批直到当时仍然禁锢在他头脑中的迷人的形象得以升华发挥；此外，这位老师是如何努力使自己的学生在绘画才能上成为自己的劲敌，又是如何使她这种才能体现到她的作品中去，从而使得最有鉴别力的行家里手们在确定哪幅作品是老师的大作，哪幅作品是学生的手笔时都颇费踌躇；这一切的一切，想要了解它们，只能有待于几位熟知内情的人去做，因为如果你不能象皮隆先生那样，深入了解两位艺术家的私生活并能不事先通知便可登门造访的话，那么冒然涉足这一领域，那将是轻率的。

因此，人们会自然想到，康斯坦斯成了她老师的情妇，或者不如说是寄居的伴侣，他心里的妻子，他的宠妾。她获准在巴黎大学居住，他们生活在一起，却煞费苦心地在表面上维持其师生关系；就是在最知己的朋友面前，他们的言行也从不越轨。康斯坦斯称普律东为“先生”，而普律东则尊她为“小姐”。在共同工作的画室里，出于尊敬，她习惯于

在她老师后面保持几步距离的地方作画。他们的卧室是分开的；她自己有一间狭窄但却舒适的房间，普律东则只有一间画室和一间书房兼卧室。主持家务的却是梅耶小姐，她并照顾着艾米丽、约翰、厄达米达斯和费罗包曼。因为他们已经摆脱了粗暴的普律东太太。这位夫人也确实太过于放肆了。她丈夫曾被皇帝亲封，荣任皇后玛丽·路易斯的绘画教授；有一天，他正在给这位尊严的学生上课，他的太太竟然气急败坏地闯入杜伊勒丽宫，并在皇后面前大泼其醋，而这也不过是她精于表演的惯技之一罢了。她于是便被警察领走，并关进了一所疗养院，在那里她可以有充裕的时间从容地反省她粗暴对待人间伟人的毛病。

康斯坦斯充当了四个孩子的母亲。每当她带着艾米丽去参加舞会时，普律东便兴致勃勃地把她俩打扮得花枝招展。他有一幅画，就是写梅耶小姐当镜理妆的情景：她站在穿衣镜前正在仪态万方地摆正自己的一个耳环。他不知疲倦地一幅又一幅地为自己的女友画像；而她也一样，经过十五年美满的同居生活，仍然一如既往，努力博取他的欢心。岁月的流逝在她那张俏脸上留下的痕迹使她十分不安，有时她便在梳妆台前对镜长叹：“我的韶华已逝，已经人老珠黄了。”直到那时普律东才发现她时时流露出忧郁的神色，并有时还表现出令人莫名其妙的猜疑心。有一次普律东接受了一位姿色出众的夫人的访问，并为她的肖像打了草稿，于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妒火便在康斯坦斯的胸中燃烧起来。她抓起这张草稿把它撕了个粉碎。还有一次，她在极度忧伤中向她崇敬的老师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您失去妻子，您还打算重新结婚吗？”因为夫妻生活从未给普律东留下过愉快的回忆，他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啊，永远也不！”由于康

斯坦斯一直为她这种不正常的处境苦恼着，所以当她一听到这句如此粗暴而又如此坦白的由衷之言，便决定结束这一切。1821年5月26日（那年她四十六岁，而普律东仍然和他们初次结合时一样那么挚爱着她），她用普律东的刮脸刀，先在自己手上试了试其锋利程度，然后便在穿衣镜前割断了自己的喉管。其动作有力而准确，几乎把颈项割断。她倒了下去。邻人们闻声而至，其时普律东正在画室里工作，听到外面这种异常的骚乱和喊叫，便放下画笔来到她的房间……德拉克鲁瓦在描写当时的情形时说，他一下子便扑向康斯坦斯的尸体，并努力想把可怕的伤口合拢来……人们从血泊中把她抬走。

他感到一切都完了，留给他的只有颓唐。昔日意气风发时萦回在脑际的富有诱惑力的溪边少女，山中丽人，以及司爱的女神和她们那嫣然一笑的媚态，都如过眼云烟，一去不复返了。他作了一幅巨画，现由谢弗里埃收藏，题为《灵魂摧毁了联接尘寰的链条》，他还画了一幅哀怨动人的耶稣像，现藏卢浮宫内。爱德蒙·皮隆评价此画为“继维拉斯盖兹之后，是人类所有此类画卷中最感人的一幅”。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又拿起画笔来完成其爱徒未竟的遗作，龚古尔曾向我们指出，这位不幸的大师，只要照明度允许，他便从早到晚地忙于修饰梅耶小姐生前所设计的色调，运起他的画笔，沿着死者的思路画下去，从中寻求出一种刺激性的欢悦，一种既痛苦又亲切的精神慰藉，以使自己更靠近逝者的亡灵。

在她死后不到两年，他也与世长辞，遗体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他忠实的学生旁边。

5. 最后的宠妃

法弗拉侯爵于1790年在沙滩广场被绞死一事，良久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今依据一般传说，这个可怜人原是路易十六之弟普罗旺斯伯爵的政治掮客。普罗旺斯伯爵梦想将国王幽禁于佩龙而自立为摄政王。为达此目的，野心勃勃的亲王告贷了两百万法郎的巨款。法弗拉在负责筹集款项时，被人告发并遭逮捕和审判。在法庭上，他本可将此阴谋原原本本全盘托出；但他却忠心耿耿，守口如瓶。直到临刑前，夏特莱刑事法庭法官奥梅尔·塔隆在绞刑架下最后问他有何话要说时，他才把秘密全部讲出。对于这一令人可怕的信赖，法官一直秘而不宣，并把犯人的交待材料精心地保存起来。

奥梅尔·塔隆有一位小姐，名叫佐艾。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一珍贵资料。佐艾·塔隆曾就学于圣日尔曼康庞女士的寄宿学校。1802年，她年方十七便与凯拉伯爵结婚。她资质艳丽，娇小玲珑，聪敏机智，胸怀大志，并且对任何事物都非常关心。她的丈夫和她一样也很想保持优越的社会地位；为此曾试图动用她的陪嫁财产，遭到拒绝，因而打了一场官司，导致夫妻分离。凯拉伯爵夫人年收入甚少，但她却广有门路。那些对朝廷不满的贵族，因念及她父亲曾为保全普罗旺斯伯爵的荣誉而将法弗拉的临终自白巧妙地隐瞒起来的功劳，对佐艾都另眼相看。此外，奥梅尔·塔隆的女儿手

中还有一笔财富，那便是法弗尔的一件遗嘱。拿破仑曾想以巨款把它弄到手，因为一旦把这个遗嘱的内容透露出去，那就会使这位以法兰西王位合法继承者自居的普罗旺斯伯爵的声誉在所有欧洲君主心目中受到损害。

凯拉伯爵夫人并非不知道这份资料的价值。也许是出于她真诚的保皇党的信念，也许准备将来遇到更好的机会再向外抛出，故而拒绝将它交给皇帝。当时任治安大臣的罗维戈公爵向这位漂亮的伯爵夫人大献殷勤，其目的是否想得到这个文件？这是可能的。然而，尽管他的殷勤对她颇起作用（她付予他不少的东西，其中就有一个儿子，长得和这位厚颜无耻的大臣令人难堪的相象），但她仍不肯将死者的遗书拿出来给他。在她的心目中，这封遗书甚至比她的贞操还重要。

王朝复辟初期的混乱时期已经过去了，终于登上国王宝座的前普罗旺斯伯爵，似乎对她并无戒备。不过，她还是把这份能使奇迹般地登上宝座的国王身败名裂性命悠关的笔供藏在自己保险箱内最秘密的屉子里。此外，国王手中最有效的一张王牌，便是那位死在断头台上的先驱者感人的传说。如果人们得知目前在位的路易十八从前曾象一个粗野的民主党人那样企图谋害善良的路易十六，那将会引起一场怎样的轩然大波！由于伯爵夫人长期保密有功，她便得以依附于孔代亲王门下。她得到的报酬便是迁居尚蒂伊。在尚蒂伊，她厌烦得要死，每天都是老一套的程序：先同这位年老的亲王一起乘车出游，然后玩两小时的“罗多”^①，有时玩“鸽子飞”游戏，再做做针线活，九点钟就寝。这时，佐艾·凯拉年仅三十；倘不是她每天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用以教育她的

^① 一种抹子填格游戏。——译者

两个孩子瓦朗蒂纳和于戈兰的话，她恐怕会因此烦闷而死。她小心翼翼地保守着一项如此令人心惊胆战的 国家 机密，换来的却是这种枯燥无味、默默无闻的生活，真是不值得。因此，她向一位律师和两位主教诉说了自己的苦衷，他们则劝她不妨去走走国王的门路。

路易十八这时已变成一个大腹便便的老人，加上患了痛风症，已经变成终身瘫痪。他那些风流艳事，即使在他年轻时也从来没有成为街谈巷议的丑闻。在这一点上，他总是能十分克制自己，所以终能不为妖艳女人所能施展的任何诱惑所动。如今，他气喘吁吁，身体瘫痪，膝盖以下业已失去知觉，整个身子几乎不能活动，就是最谄谀、最风骚的女人恐怕亦不可能使这个患了肥胖病加关节僵硬的身体产生激情了。可是凯拉伯爵夫人却要试一试，如果吉尔贝特·斯坦热先生在所编的王朝复辟史略可信的话，那么，她是成功了！由于她机敏狡猾，善于曲意逢承，有耐心，也有胆量，她终于能够在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大革命二十五年之后，在一位恶病缠身、曾以不为“女性”所动而闻名的国王在位时期成为这位国王的最后一名宠妃，使很久前的蒙德斯潘和蓬巴杜尔时代^①又复活起来。便是在正史上，这一手段也堪称伟大的壮举从而使最沉着、冷静的人也为之目瞪口呆。

她究竟是如何动作，如何得逞的呢？佐艾·凯拉十分明白，她在国王那里只能呆上有限的时间，也就是只有行三屈膝礼、呈交法弗拉的遗书；作为交换条件，便是要求国王提供保护、也许还可提供养老金，并给她儿子于戈兰安排一个差事，如此而已。这就需要充分利用这次短暂的交谈时间。

^① 蒙德斯潘曾为路易十四的宠妃，蓬巴杜尔曾为路易十五的宠妃。——译者

倘是另外某一个女人，必定要准备采取一种必恭必敬的态度，说上一句必恭必敬的符合自己身分的话。狡猾的伯爵夫人却自有其与众不同的本领。她怯生生地走进王宫，模仿着入选美女以斯帖在波斯王亚哈随鲁^①面前时那种羞怯中又带点悲切的神态；脚刚一迈进屋内，就弄倒了一个独脚圆桌，把桌上的文件撒满一地。她做出惶恐不安的样子，优雅地弯下身去对自己的鲁莽表示歉意，并用颤抖的手一页一页地整理着已经散乱的文件，并且大声念着上一页的最后几行和下一页的头几行字以看看上下页之间是否连续。这一切都做得毛手毛脚而又天真幼稚，手忙脚乱之状可爱而娇憨之态可掬致使这位老而且病的国王竟看得出了神。他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生怕打断了这赏心悦目的精采场面。待这一切表演完毕之后，他极力称赞伯爵夫人的声音动听，并请她接着往下读；她带着一种非常优美的局促不安的神态遵命照办，向这位心醉神迷的国王送来秋波时，她的眼光才离开所读的文件。最后国王答应对她给予保护，并向她保证，他的大门将永远对她开放之后，便让她告退了。

傍晚，国王在德卡兹^②面前提到她，并急不可待地盼着他漂亮的女客人再次来见。但直到一个月以后，她才托言引儿子于戈兰谒见国王而再次出现。之后，每逢礼拜一，她都进宫觐见，而为之倾倒的国王则要她每周来同他叙谈三次。在规定的约会时间，只要她一进入王宫，王宫大门便马上封锁，不准任何人入内，包括各部大臣在内。

这些神秘的晤谈都是些什么内容呢？大概不会老是谈被

① 《圣经》故事，波斯王亚哈随鲁对选进的美女以斯帖特别喜欢，随册封她为王后。——译者

② 见本书第二篇《芒松夫人的昏厥》里关于德卡兹的注。——译者

绞死的法弗拉及其遗书，这是可以肯定的。整个宫廷对这种幽会都非常感兴趣，太太们眉开眼笑，男人们则感到愤慨。国王这时仿佛已返老还童。这位从未爱过别人的可怜的胖国王，这时却有了谢律班^①那样的赤子之心，而且不向左右掩饰这种突然产生的惊人的精力，因为他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见不到他亲爱的伯爵夫人的时候，他一早起来就给她写信，晚上还要再写，写好了，便马上让人送去，并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回音。一天早上，当卫队长按照规定，前来要送给军区司令的口令时，不禁使他大吃一惊。他听到国王充满柔情蜜意地称他为“佐艾”。从他健康角度考虑，侍从们常用一辆轮椅把他推上华丽的四轮马车，让他坐着马车出去兜兜风，他就让马夫把他拉到他的情妇家的门口。当她在窗口出现时，他便把他肥大的脑袋伸出车门，温情脉脉地向她微笑致意。

而她却表现得比较谨慎小心。国王慷慨赠送给她的礼物如珠宝、装璜精美的书籍、名贵的画卷之类，她一概不要；如果她愿意接受的话，也许卢浮宫里的文物和王家图书馆里的图书都会全部送给她的。但她却表示只要国王的信任和友谊，此外别无所图。可是她每次来到杜伊勒丽宫时，手里都拿着一个小绒布袋，进来的时候，袋子里空空如也，而当她登车离去时，袋子却鼓鼓囊囊地装满了金路易。路易十八对她绝不仅仅停留在这些庸俗的馈赠上，他还要仿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做法，公开承认她是自己的宠妃，并下令在圣乌昂宫殿里为她造一座漂亮的楼阁。在他登基时，曾在这个

^① 谢律班是法国十八世纪作家博马舍的讽刺喜剧《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一个角色，是初次感受到爱情的青少年的典型。——译者

宫殿里签署了他的第一个宪章。从磨光大理石砌的厨房洗碗槽到有桃花心木雕刻栏杆的顶楼楼梯，这里的一切都表明赠与者对楼阁女主人的一片钟情。曾在这里举行过一次华宴，除几位顽固不化，一本正经的人以外，所有的朝臣都争先恐后地前来参加。在花园的每条小径上，几乎都有国王沉重的四轮马车压过的痕迹，虽经几次平整过，但其车辙仍然依稀可见。对此，来宾们都相视而笑。

那一天，这位老人这种感人的恋情达到了顶点，这种激情既幼稚天真，又使他痛苦，就象一位轻佻的女人动了情一般。于是医生们出来干预了。他们责备这种频繁的幽会，把国王弄得极度兴奋和疲惫不堪。凯拉夫人便不再到杜伊勒丽宫来了。可怜的国王就给她写信，一封接着一封，而且是用拉丁文写的！他因见不到她而陷入忧苦之中，气力一天不如一天。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中，他又见到了她。她是应王族的请求而来，目的是让她的年老的朋友下决心以基督教徒的方式去见上帝。在她和他谈到他将晏驾时，他两眼不停地望着她，最后一次陶醉于她那散发着青春活力的软玉般的体态，和那张清秀而娇艳的俏脸。

“我还有幸能见到你！”他万分激动地低声说。

此外，他答应了她的一切要求。他向她伸过手去，她的眼泪簌簌地掉在他的手上。当她戴着面纱，走出去的时候，几乎支持不住了……有些恶毒的诽谤说，她最后这次觐见捞走了八十万法郎；而且就在当天便用这些钱在巴黎买了一所公馆。

路易十八驾崩了。人们立即让掌玺大臣将已故国王的办公室贴上封条。大家都知道，里面不但有那位住在圣乌昂的

美丽的夫人写来的全部书信，而且还有国王写给她的全部书信，此外还有国王让她发家致富的那一份遗嘱。为了使已故国王昔日生活中唯一的美好时光和他自己同时离去，便将书信、文件、遗嘱等全部销毁了。他平生全部野心在于夺取王位，他自信他已经神奇般地成为命运的宠儿；可是当他发现幸福恰恰是在他不曾找到幸福的地方时，已经为时太晚了！

6. 一个大臣的梦想

第一帝国时期的国家参事，桥梁公路工程总局局长，大法官；复辟王朝的贵族院议员，海军大臣；路易—菲力普时期的外交大臣，内阁总理；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如今他就带着这些显赫的头衔，象站在他同时代人面前那样站在我们这些后人的面前。正是这些头衔把他永远归入了那些严肃庄重不苟言笑的人之列。如果需要补充的话，那就是出身于旧时最高法院派一个名门世家之后。此人便是莫莱伯爵。他是上述那些显赫的头衔的据有者；他引以为荣的是，他的祖先中曾有一位清廉的总检察官，在投石党运动时期以普通百姓而敢作敢为闻名；他父亲在恐怖时期被送上断头台，他本人在二十六岁那年写了一篇题为《论道德风尚与政治》的论文，和其人一样，全是板着面孔的说教。我们作了这个补充，大家就能看到他的完整形象了，而且马上会想到，他一定是位特别严肃、很有头脑、除了国家重大利益而不知有他的人物。

莫莱伯爵写了《回忆录》，大家一定会以为，一支这样严肃的笔下出来的作品大抵是冷漠的说教，里面绝不会有开朗欢快的读者所喜欢的东西；大家一定会以为，一位如此正经的说教家的回忆，同《马农·莱斯科》中的爱情故事和《新爱洛绮斯》中的热恋情书^①，必定大相径庭。然而有一件出乎我们意外而又有趣的事情，可能我们是破天荒头一次见到这样一位大政治家，他绝不只夸耀自己的高贵品德，也绝不专讲其对手的缺点毛病。更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向我们透露了那个时代的高官显贵，有如那些俗不可耐的庸人一般，他们浸沉于声色犬马之中，而很少关心各自负责的公共事业；其真诚率直在回忆录作家中实属少见。下面这件事情是饶有兴味的。这事发生在路易十八当政时期，莫莱伯爵当时担任和一个部差不多的庞大的桥梁公路工程总局局长，其时他已年近四十了。然而使他心醉神迷的，则是他对于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性产生了炽烈的爱情。这位女性的娘家和夫家都是高门大户属于巴黎上流社会中人。此外，我们也还知道，莫莱为人气度不凡，举止高雅，又因为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因而在这种雍容华贵的派头中，却有一种不易被人察觉出来的高傲劲头。他向我们承认，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漂亮的太太们，面对象他这样一位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人并不是无动于衷的；然而，他所钟情的，却只有一位，这便是那位温情脉脉的A。他这位漂亮的情妇名字开头的第一个字母便是A。

对于一位惹人注目的显要人物来说，经常感到伤脑筋的一个问题，就是随着你的权力一起给你带来的一些“好

^① 《马农·莱斯科》是法国作家普雷沃写的爱情小说。《新爱洛绮斯》是卢梭以书信体写的爱情小说。——译者

处”，从而使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疏于检点。这些事情，很难瞒过随时都在窥伺着的、你的周围人的那双带有恶意的敏锐的眼睛。莫莱的家是在维尔—莱维克广场，做为一个父亲，他不能在自己家里接待他的女友，他在桥梁公路工程总局办公大楼里面有一间办公室，当时办公大楼的地址是在旺多姆广场。每天下午五点钟职员下班后，楼里就没有人了，而只剩下一个看门人。因此，他的恋人A在各办公室都关门后来到这里是绝不会有危险的。而且，这个办法可一举数得，其中之一就是可为各级官员树立一个光辉榜样。当他们知道局长先生在其他人家下班回家后一个人还在机关里工作，还在“加班加点”时，一定会受到感化。对于那些约会的情况，《论道德风尚与政治》的作者丝毫不加掩饰：他等着她的到来，这时他“心跳加快，心神不定，急不可待。这时，哪怕是一点点声响，都会引起很大的注意”；一听见院子开门的声音，他“就飞快地跑去迎接A，为她在前面引路，然后两人双双在黑暗中登上楼梯”。于是她便在这里逗留几个小时，他承认这是他“平生最令人沉醉的”时刻。随后，他便不满足于晚上在他的办公室里呆得很晚，而且所有星期日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度过。自然只有看门人知道这个秘密。此外，所有人员都交口称赞，桥梁公路工程总局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勤勉、这样热心的领导。A太太在中午十二点整来到，手里拿着一大束玫瑰花，“她打扮得光彩照人，其用心之工，可以说极尽一个女性在梳妆台前之所能”。这样一直到五点钟才肯离去。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他觉得老关在那个墙上贴着绿色纸板，屋里放着圆皮垫椅子的办公室里太单调无味了，想带她换个地方去玩玩，于是就悄悄地把她带到尚普拉特罗。你要充分评价这一爱情的壮举，就先要对莫

莱家族的这座古老的大城堡有所了解。从外表上看，没有哪座别墅有它这样朴素、庄严。它是从前最高法院法官的典型住宅，他们坚决摒弃一切形式的华丽装饰，很注意即使从住宅的外表上也要表现出他们世代相传的那种严厉作风。如今这一对情侣在里边肆无忌惮地一整天都沉浸在爱情之中，云雨之情和欢声笑语把这个沉睡的城堡惊醒了。现在这对情侣正相对而坐，在那些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会有这种生活的严肃的法官塑像下用午餐。正门上边人字墙上的挂钟打点的声音，今天下午也好像特别的异样。

莫莱当了海军大臣以后，王家大街上的那座大厦便成了接待这位戴面纱的漂亮太太秘密来访的场所，宽敞的大臣办公室则是他们这些极其痛苦的会面的悲剧舞台。因为毫无疑问，其结局对于莫莱和A太太都是非常不幸的。这便是爱的苦痛！俩人都感到无比痛苦，而我们今天看到诉说他们这种痛苦的记叙时，便禁不住莞尔一笑。这就使这位温情的政界要人的《回忆录》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写了他的生平、他的青年时期、他颇为浪漫的爱情，以及读者在这类著作中通常见不到的一切东西。《安东尼》正在这位伦理学家身上萌芽^①。再者，他善于观察与长于叙述；他对内阁会议的描绘也相当生动。大臣们都到了；大家都在等德卡兹，每次内阁会议他都要迟到一两个小时；这时大家便聊闲天和讲些“轶闻趣事”来消磨时间。黎塞留公爵等得不耐烦了，就突然转过他的座椅，宣布开会；照例每个人都轮流发表一通无人听的演说。某甲在写信，某乙在散步，某丙在壁炉前烤火，陆军大臣入了梦乡，莫莱则在想着他的心上人……这时，既可解除你的忧虑，又不使你过度疲劳，真是难得的幸福时刻！

① 《安东尼》是法国作家大仲马写的悲剧，歌颂伤感的情怀。——译者

再看杜伊勒丽宫星期日接见王室成员和各部大员，即他们进入“大内”的情景。国王坐在他的轮椅上。他和朝见者谈话，总是那几个人，按同样的顺序，使用同样的措辞，光是叫“我的兄弟！”“兄弟”便俯身躬背地走过去，国王低声向他说几句话。接着叫：“我的侄女！”“侄女”赶忙走到他身边，向他行屈膝礼；同样是“细声细语”地。再接着叫“我的侄儿！”然后叫“我的贝利侄女！”——仅此一句话而已。然后便是诸位大臣，都是直呼其名。但国王同他们谈话的声音比同王室成员谈话时要高些，好让那些离他椅子最近的人能够听见。宠臣被召见两次。然后，国王突然大声斥责高级将领、军机大臣和其他几位侍臣：“你们是从军队来吗？——他们士气怎样？”回答时不能离开自己的座位。最大的冷遇便是目不转睛地看你半天，一句话也不问你。

让我们还是回到漂亮的A太太这里吧。一场悲剧把这对情侣拆开了。一天，莫莱心里特别高兴，在他的大臣办公室等着她的到来，不料接到她一封字迹潦草的绝交书，信中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戒指……除了痛苦的回忆和永恒的内疚之外，我不保留你任何东西。不要再做徒劳的努力了，一切都将无济于事。请你永远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们不要再徒然去触犯上帝……永别了！”看了这封信，这位可怜人就昏倒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他都沉默不语、没有活力，昼夜不眠、无精打彩。她态度的变化来得如此突然，如此不可理解，原因究竟何在？他绞尽脑汁，努力寻找仍然不得要领。他为此搞得昏头胀脑。他仍然处于狂热之中。什么国王的桥梁、公路、军舰，统统抛到脑后去了！朋友们都以为他完了，当知道女友跟自己一样不幸、一样无计可施时，他就尤其感到痛苦。

不过要指出的是，莫莱并未因心灵上的这种极大痛苦而死去，虽然他思想上有过这种准备，甚至可能也希望这样死去。或者说，至少是拖了很长时间，因为所有的人名词典上都说他一直活到1865年。

7. 阿 雷 尔

他还在非常年轻时便养成一种严肃的个性，渴望到政府部门工作；也很少有人一开始便和他那样那么一帆风顺。1809年他才十九岁，便已是最高行政法院的助理办案员，并由于他办事的干练和手腕的灵活而颇受称道。康巴塞雷斯录用他当自己的秘书，他和这位国务大臣相处得十分投机。阿雷尔灵敏的思路和善于思考的头脑，使他对这个帝国社会的认识十分深刻，似乎是他自雾月18日政变以来便经常出入于这个帝国宫廷一样。为了进一步搜集资料并立志学习，他极想在治安大臣辖下为皇帝效劳。他于是上书恳请一个侦探长的职务，但却高出己愿：被任命为警察分局局长。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打断了他飞黄腾达之路，作为一个波拿巴分子，阿雷尔毫不掩饰他的感情色彩，他拒绝为波旁王朝服务，而波旁王朝也无意起用他。

那么 是否如保皇党人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他曾替奥尔坦斯王后给那位在厄尔巴岛上的君主拿破仑送过一封信呢？这似乎很有可能，因为当拿破仑卷土重来时，作为对他忠诚的报酬，立即任命他为朗德省省长，那时他年仅

二十五岁。

不难预料，他马上就会在巴黎政坛上重新露面，并将获得极高的地位。比如，当一位大臣或者大使之类，甚至还有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被恩赐以伯爵、公爵，甚至亲王等爵位。这样，他便可以胸前挂满荣誉勋章，以政界重臣的身分，拿着元老院议员丰厚的年俸而终其天年，并且堪和波塔利斯家族、梅兰家族或者塔列兰家族媲美。

然而命运之神却作了相反的安排。他在朗德省省会蒙德马尔桑担任省长的三个月里，是个狂热的拿破仑拥护者。甚至在滑铁卢战役以后，他还企图把这个省份作为通向恢复帝国的最后一条大路。他把手伸向省府财政总监的银柜，并用强制手段从那里搞到一笔足够维持一支部队的经费，企图凭借这支部队把战败的拿破仑重新扶上皇帝的宝座。只要能够成功，他便可一举被任命为由他一手辛勤扶植起来的帝国首席财务官或者选帝侯。但在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他因牵连太深而不得不逃亡出走（这次出走得到了崇拜他的宪兵部队的帮助），但在法国和西班牙国境线上被捕并被拘留；在欧克赛尔被严加看管，以等待政府对其发落的命令。他的罪状足以枪决，但由于行刑队的任务特别繁重，结果阿雷尔被草草地判决为流放，并接到离开法国的命令。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那些才气横溢的人，才有这些极富刺激性的遭遇。使得这位前朗德省省长几乎一命呜呼的这一遭遇，却给他带来了难以表述的欢乐，并使他亲眼目睹了这个王国的一切行政机构陷入一团混乱的情况。例如：作为那个科西嘉岛上吃人魔王^①的帮凶，他被逐出王国，而离开这个国家却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但鉴于他又是一位危险的谋反

^① 指拿破仑。——译者

者，有关部门拒绝签发护照，又使他不能成行。然而最高警察当局却又警告他，如果不服从驱逐令，就将对他实行监禁，可欧克赛尔省长又对他严加看管以防他逃避监视而离开他被迫居留的该省。于是阿雷尔不得不亲自出面，以尽力使这个威逼他的政府摆脱这一尴尬局面。然而，他已没有任何靠山了。但他在巴黎却有一位女友，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喜剧演员乔治小姐。他们于1813年相识于汉堡或是布鲁赛尔。因为曾有过几个星期的同居生活，于是便山盟海誓，永远相爱。由于尽人皆知，乔治小姐和拿破仑关系较为密切，所以她也是个非常可疑的人物。她只好又出面活动迪歇纳小姐，通过此人的影响，阿雷尔终于得到准予出境的优待。他于是便动身去布鲁赛尔，并在那里定居下来。

档案材料向我们揭示，被驱逐的阿雷尔在国外写了一本题为《大蠢材》的小册子。而始终不渝地忠于第一执政拿破仑的乔治小姐，又在法兰西喜剧院的舞台上成了自由党人崇拜的偶像，这一切都使路易十八政府深感不安。而那些极端保皇党人又对乔治小姐发出一片嘘声。乔治在剧院的那些优秀同行们对于和这样一个拿破仑分子同台演出又怨不绝口，于是她不得不离开巴黎前往英国。拿破仑在位时，以及其后的执政者们，无不为乔治小姐的绝色而倾倒。这一切，在英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由于大家的好奇心理，使她在英国的演出获得了成功。但政治色彩又随她出现在伦敦的舞台上，于是她不得不又重返法国。法国大剧院拒绝接纳她，她哀叹，气愤，辩解，都无用，便只好到外省作巡回演出。她所到之处，每个城市的警方当局，就象对待那些至死不悟的阴谋者一样，提醒大家加以注意。这种使她感到蒙受羞耻的生涯持续到1819年，这年阿雷尔获准返回巴黎。在这以前的四年时

间内，阿雷尔和她一直天各一方。

被放逐后的阿雷尔和当年那个曾是帝国官员的阿雷尔已判若两人；他似乎是在逆着生活之路向后走。昔日里那个年仅二十便在最高行政法院兢兢业业任职的阿雷尔，那个以思考周密、行事审慎而声誉卓著的官员，那个曾经雄心勃勃、一心要在官场青云直上的年轻人，当他现在已进入老成持重的成熟期时，却过着一种费加罗式的流浪生涯，一个反对党人和怀疑论者。从此他便只周旋于戏剧界，生活于喜剧演员之中；并负责经营乔治小姐巡回演出的剧团。社会的变革带来的结果竟如此出人意料！这位女艺术家和她的班主，在警方当局那里遇到不少麻烦。在上演之前，他们的剧目便被怀疑是替“自由党”作宣传，甚至连一个安静的演出环境也得不到；各省省长在批准他们演出时，又总是推三阻四，犹豫不决，以致使得这位前皇室的国务参议为争取演出而疲于奔命，刚刚和这些人谈妥，又要去做另一些人的工作。演出时，刚刚使后排闹事的观众安静下来，又得赶快去安抚那些提抗议的正厅前排大人物。干这些事需要有足够的机智，耐心，灵活而又坚定。因此，尽管一直为当局所怀疑，他还是在1829年成了奥德翁剧院的领导人。毫无疑问，拿破仑是“知人善任”的。他发现的这个“小阿雷尔”尽管已经走上了歧途，并受到过流放，监视，追捕，并被搞得名誉扫地，可是不久将由他来进行一次另一种性质的革命和政变。就是这个阿雷尔，他借助于苏利埃和维尼的诗剧《克里斯蒂娜》和《元帅夫人安克尔》，随后不久，在波尔特·圣马马丁又以大仲马的《奈斯尔塔》、《理查德·达尔兰东》以及《吕可莱斯·波尔加》点燃起浪漫主义的烽火，从而使1789年以前旧王朝遗留下的一切都化为灰烬。

完全可以想象得出，阿雷尔和乔治的家庭绝非传统式的。他们在圣母大街有一幢房子，因为有一个门通向卢森堡公园，所以特准他们有一把该门的钥匙。阿雷尔住在顶层的三楼，一楼和二楼留给乔治和她的妹妹贝拜尔和两个孩子波波尔和道姆居住。孩子们称阿雷尔为姨夫，而实际上，他就是他们的父亲，但却被当成贝拜尔的生子，这问题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道姆享年八十岁，于1902年去世。波波尔则是个异样的孩子，一颗硕大的头颅，一副短小的身材，聪明异常又调皮出众，自私而又贪吃。七岁那年便登台表演喜剧，只要他演的角色有点什么好吃的，他就同意整个晚上都留在台上。他想了个办法，在沃日拉尔大街拐角的咖啡馆里开了个信贷户头，用的是他姨母的名义。仅三个月的时间，他竟偷偷地吃去了三百个法郎的奶油甜点和加奶米饭，这些东西都是赊来后在走廊里或是在楼梯上吃掉的。

波波尔已经很懂事了，但却从来不愿读任何经书，这使得那位伏尔泰式的阿雷尔非常之高兴。但当1832年突然发生的霍乱大流行时期，人们却发现这个离经叛道的小波波尔居然早晚都作起祷告来，这显然是当时那种悲惨的环境对他有所启示的结果。乔治有意地偷听了这个孩子和上帝交谈的内容，下面便是她所听到的全文：“救世主，我的上帝，把我姨母乔治带走吧，把我姨夫阿雷尔带走吧，把我弟弟道姆带走吧，把我妈妈贝拜尔带走吧，……请您只留下小波波尔和那个女厨师！”尽管他的祷告如此虔诚，这一请求仍未得到满足，几天以后波波尔便死于非命，他得了当时流行的霍乱。

乔治尽管已是四十岁的半老徐娘，但仍然是一位风韵犹存的可人。大仲马在他那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中说，这位艺术家的两臂、双手、双肩和胸脯的丰满仍然令人“叹为观

止”。她身材修长而端庄，尽管身体很健壮，她仍然每天要花上几个小时沐浴薰香，着意保养着自己的身体，此外便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考虑自己的衣着，或是穿皮衣披着印度开司米大披肩，或则穿着细麻布或细平布的晨衣。手指上，耳朵上，脖子上，头发上，乃至手腕上都戴满了名贵的首饰，其中有两颗特别令人眩目的钻石曾经丢失，但有一天早晨却在圣母大街路旁的阴沟内发现了，那是当年拿破仑的恩赐。每晚演出之后，大家便在乔治家里吃夜宵。围桌而坐的有大仲马、洛克罗瓦、阿雷尔、贝开特，还有一位青年作家；因为他住在这幢房子屋顶的牛眼房里，所以也把他请来，他名叫于勒·雅南。在这里人们过得颇不寂寞。

阿雷尔的邈邈和乔治的工于打扮，堪称势均力敌，但他却颇以此为骄傲。乔治豢养着一群出类拔萃的猎兔狗，她待它们如同对待她自己，每天都水洗香薰。阿雷尔是个爱唱反调的人，他偏要想养一头小猪。大仲马使他如愿以偿。一天晚上，他走进他们家的饭厅，怀里抱着一头约有三、四个月的漂亮小猪，它身上披着彩带，四只脚上都戴着大戒指。阿雷尔激动异常，飞快地向它奔去，把这头小猪搂在怀里，并让它坐在自己的身边，用大量的甜点心装满了它的肚子。他替这位新朋友起了个名字，叫“踢蹬——踢蹬”。当他和这位新朋友回到三楼卧室去的时候，顺手拿走了一件搭在靠背椅上的天鹅绒长裙，给“踢蹬——踢蹬”当垫被。

阿雷尔喜欢“踢蹬——踢蹬”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大概谁都知道有一次在排练《克里斯蒂娜》时大仲马讲的那句解颐妙语，当时阿雷尔对他说：

“亲爱的，您知道，我爱这口猪已经到了和它睡在一起的地步了。”

“啊哈，”大仲马回答说，“我刚刚碰到您那口猪，它和我讲的也正是您这句话……”

他们的精力是如此充沛，思维是如此敏捷，性格是如此诙谐，对待战斗是那么热情，对待未来又是那么充满信心；这些1830年的浪漫主义者们，他们非常热爱生活并善于支配生活，以致二十几年以后，当人们再见到他们时，已是老态龙钟并变得不合时宜了，这不禁使人喟叹不已。我们总觉得，他们似乎是青春永驻，而岁月的流逝也似乎与他们无关。阿雷尔于1847年在巴黎郊区逝世。生前他挣下万贯家产，但身后却没为自己留下一个铜板。

而乔治呢，尽管他一直是她的“所爱”，但和他却是天各一方了。由于脂肪的不断增厚，使她变成了一个“畸形怪物”，在舞台上，她颀硕而笨重，不得不重操巡回演出的旧业（因为还要生存）。她在安德黎斯，在智浓，在阿札依的那些只有二千人的小镇上，甚至还在村庄里演出，那些戴着帽子的农民尽情地嘲笑她那肥胖的身躯。在索密尔演出《梅洛普》时，剧场里不到四十个观众，而这几个观众还因震慑于这位可怜的大艺术家破锣般的嗓子，鼻孔里的粗气，喉管里的锣音，嘴里的饱嗝和蹒跚的动作而不到演出结束便逃之夭夭了。拿破仑三世对她发了恻隐之心。为纪念首席执政拿破仑，当时他和乔治都曾恩膺殊荣，他因此特准给予这位年老的悲剧人物以庇护。因此，到1855年国际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期间，有人说，这位肥胖的“古斯巴达女王”曾争取到所有公共厕所的经营权。

8. 女诗人德尔菲娜·盖

距蒙雷里不远的奥日山谷里，有一个具有浓郁的田园诗风味的村庄，名叫维里尔。村口矗立着一座路易十四时期的城堡，粉红色的砖墙掩映在一片翠绿中，显得格外妩媚。三个世纪以来，大家都称它为“红堡”。如同伊尔德—法朗斯省所有古老的住房一样，它也有过自己不平凡的历史。起初，这座“红堡”属阿历克尔侯爵家族，随后便转到财政官比弗手里；路易十五晏驾以后，巴里夫人放逐到距此八公里的圣·弗兰城堡，她便买下维里尔村的这座“红堡”以安置她的母亲、当女厨师的安娜·贝古和她的丈夫前皇家侍从朗宋，两人改名换姓，竟以蒙贝拉子爵和夫人的身份住在这里。1820年前后，又有两位女人占据了这座漂亮的庭园，这便是盖夫人和她的女儿。母亲仍然很年轻并且很有姿色，她丈夫是一位银行家，其业务范围主要在国外。女儿年方十六，才貌出众，一头金发，全身线条清晰，如雕塑的一般。总之，她美貌绝伦有如天使，名字叫德尔菲娜。

盖夫人曾是上帝的宠儿，自1795到1799年督政府时期就受到古老的巴黎社会的宠幸，被认为是一颗明珠。她不但才气横溢，并且非常之“放肆”。她写了许多诗歌、剧本和小说，其中的《阿纳道尔》曾成功地解除了拿破仑在马尔买松度过最后一夜时的阴暗心理。其女德尔菲娜也同样醉心于文学。她在十二岁那年就能记住拉辛和布瓦洛的全部作品；

十五岁就能写诗。她所居住的“红堡”和那无边无垠的田园风光是她灵感的温床。母亲对女儿表现出的这种爱好有点担心，但也不去阻挠。她积累了许多田园诗式的哀歌，具有奥西昂风格的史诗，并于1821年参加了法兰西科学院倡办的诗歌奖竞赛。次年，她的诗歌在一次集会上由一位院士当众朗读：群众轰动了，他们鼓掌，喝彩，顿足欢呼，如醉如痴，甚至还有为之泪下。为向这位年轻的诗神缪斯欢呼致意，听众甚至挤破了会场的大门。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赞扬文章，宣扬她的天才，描述她的美貌，她因之便一举成名。在那个幸运的年代，科学院的决定就有如此强大的法律作用，并且在弹指间便可给原是无名之辈的小人物以如此巨大的荣誉！然而这一切总使我产生这样的想法，即在特殊情况下，一位女诗人出众的容貌所起的作用，如果不是超过科学院四十人委员会的决定的话，起码也会旗鼓相当。这是一种时髦的风气，一种难以解释的热情。夏多勃里昂从伦敦发来了贺词，奥尔坦斯王后在阿尔囊拜格极力怂恿为其中的一首诗谱曲。所有的文学沙龙都向德尔菲娜敞开了大门。雷卡米尔夫人在阿拜欧布瓦向她索要诗作，诺地埃在阿尔斯纳尔向她发出了邀请，安斯罗特家里那些传奇式的人物也约邀她参加他们的文学晚会。晚会上，诗人巴斯瓦尔·德格朗买松为表示对她特别优待，特别为她朗诵了一首菲力普·奥古斯特的二万四千行诗，当这首长诗朗诵完毕，他向大家宣布，他还为她准备了同样长的关于大查理一世的诗和同样长的关于拿破仑的诗。这一宣布使在座的人惊恐万分，从此便无人再敢去安斯罗特家里问津。当报纸上宣布了这位令人毛骨悚然的诗歌朗诵家已经去世并被埋葬的消息后，他们家的常客们才敢于冒险重新聚会。

德尔菲娜所到之处，都被奉为皇后。她的魅力，她的娴雅，她的谦虚，甚至她衣着的朴素，都被众人交口称赞。她那一头秀发，从未见插过一朵鲜花。她通常穿一件纯白的细布长裙，披一条蓝得象她那双美丽的眼睛一般的细纱披巾。当她应人之请朗诵她的诗歌时，她绝不矫揉造作，当然也绝不羞涩腼腆。她总是态度自然、落落大方。她那张清秀漂亮的面孔始终保持冷静，绝不为别人的推崇所陶醉。她最强烈的愿望便是能重返“红堡”，因为她喜欢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喜欢草原上那一朵朵散发着清香的麦草。她喜欢那里的大森林，喜欢田野上流着的淙淙清泉，喜欢在葱郁的垂柳掩映下那美丽清幽的林间小路。她喜欢在这小路上尽情地遐想。星期日，她便去古老的隆蓬教堂作祷告。这座有七百余年的历史的教堂，今天它的大门仍然和德尔菲娜在世时一样，处于斑驳倾斜、摇摇欲坠的状态，虽然距今又是一个世纪了。这位诗神缪斯生活在这种与世隔绝的恬静环境之中，但她在外的名声仍然十分煊赫。劳姆瓦斯城堡和马耶的主人们都盛情地欢迎她。在他们的花园里有专为她建造的乡间别墅。他们在他们的沙龙里背诵自己的哀诗，并一起演出他们即席创作的喜剧。你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复辟时期这个光灿灿的社会，它十分醉心于文学，而诗人便是这个社会上的国王。这样，你便会很清楚地了解，所有这些戏剧性的事件和政治上的突变，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到头来，只不过是整个法兰西历史上微不足道的一个附笔！经过一个世纪的倒退以后，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艺术、诗歌和美女。比如，有人对我们提起在雨果的《海尔娜妮》首次上演时，执政的大臣们是谁时，我们不会蒙有一丝的感化；而当我们听到在演出的那天晚上，待到大幕拉开时，那

些年轻的浪漫主义者的汹涌人流用革命的呼声震荡着法兰西剧院大厅时，我们却感到兴奋异常。突然间，喧闹声静下来了，原来是德尔菲娜姗姗地走进雨果专为她准备的包厢，于是加倍热烈的掌声响满四座，新流派的诗人们认出了他们的缪斯，认出了她那美冠群芳的姿容，认出了她那令人心醉神迷的臂膀和那金色的环形髻发，于是喝彩之声震动了大厅。

她所到之处，都是清一色的谄媚和奉承，清一色的赞扬和喝彩，然而德尔菲娜的私生活并不幸福。她爱恋着阿尔弗雷德·维尼，但却毫无实现的可能。这位皇家卫队的中尉军官，身穿漂亮的军服，是那么英俊可爱。他对她的评价是：极富肉感。也可能他同样爱她。但她却没有家产，又非出身于仕宦名门。维尼夫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这一婚事。她极力鼓励她儿子娶一位英国小姐，有人说这位小姐在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群岛拥有巨大的财产。联姻成功了，他却发现这一大笔财产纯系子虚乌有。事情是可笑的，许多人都深为惋惜。可怜的德尔菲娜把痛苦埋在内心深处。有谁人能运用自己的荣誉来使她忘却这一苦痛呢？再没有别人了吗？巴尔扎克不也是由于被她高雅的谈吐所吸引而常到她那儿去吗？有些人替她想得更妙，甚至预言她将是法兰西的皇后。因为查理十世还在阿特瓦斯当伯爵的时候，曾在杜伊勒丽宫一位宫廷女官家里听过她背诵自己的诗，她给他留下的印象极其鲜明。于是马上便有人在这方面打主意，那些附炎趋势的廷臣便想把她以一个平民女子的身份嫁给这位皇太子。直至这位皇太子登基以后，他对德尔菲娜仍有极其明显的好感，并给她以特别召见的荣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1825年美术展览馆开幕那天，展品中有画家埃尔桑为盖小姐的画像，当时查理十世分开众人，径向这位年轻的姑娘走来，他以惯常

的既礼貌又亲切的声调说：“小姐，您的肖像真是太美了，而它又酷似您本人的面貌。您也会作画吗？”她诚惶诚恐地回答道：“不，陛下，我无此天才。”国王接着说：“但是，您写诗却非常有天才！”对这一插曲，人们估计整个宫廷都会震动并可能引起各种荒唐的猜测。但查理十世却在他爱妃包拉斯特隆的灵床前许下了终生不娶的心愿，于是那个想把这位被誉为“天国之诗神”的人给他作皇后的荒谬计划也随之告吹。

尽管她有如此卓越的天才，超群的美色和非常的荣誉，但求婚者却寥寥无几。毫无疑问，大部分人都在担心，即婚后是否能保证一位在社会上如此受宠的姑娘的幸福？在这种风险面前，人们便望尘而却步了。她一直等到1831年才遇到一位勇敢的，不怕担此风险的年轻人，他漂亮，有着超人的智慧，好强争胜，由于其母亲被诱，他是个私生子。在那个怪事丛生的浪漫时代，这些都是被人称道的品质。他叫埃米尔·吉拉尔丹。

德尔菲娜在向她的崇拜者拉马丁征询对这位无畏的青年未婚夫的意见时，拉马丁这样表达他的想法：“他的仪表足以刺穿黑暗并能征服艰险。”有这样一句评语，德尔菲娜已不容再犹豫了，于是婚礼便于1831年6月1日在圣·罗什举行。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仪式草草结束，随后，这对新人便驱车直奔“红堡”而去。

阿历克尔侯爵的这座小城堡一直矗立在那儿，由于它带点古色古香的雅趣，特别是那由于年代已久而斑驳了的院墙给人们留下了诸多的回忆，所以这座城堡便格外的有吸引力。大厅仍然保留着细木护板的古老墙壁，以及门上带有朗克雷式的清一色的蓝漆，还有那个富丽堂皇的路易十五式的大

托架。这座“红堡”里往昔的幽灵真是太多了！特别是在那些镜子里曾映出过多少逝者的身影，它们曾照过那位国王的宠妃在哭她母亲的亡灵时悲哀的面庞，她母亲在饱经沧桑、历尽变故后于1788年死去。漂亮的德尔菲娜曾在那儿不止一次地对镜理妆。这些镜子，为什么它们不把那些曾盘桓在其周围的那些名人显贵的尊容保留下来呢？比如，从瓦洛卢来的夏多勃里昂，身着威武军服的漂亮的维尼，殷勤的雨果，笑容可掬的巴尔扎克，狡黠的诺弟尔……此外，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夏日之夜，那位多情的埃米尔·吉拉尔丹，带着他被征服的局促不安的年轻妻子，也曾在它们前面顾盼。

9. 在开明君主的宫廷里

对于头脑冷静的观察家来说，很少有象这种政治把戏那样，使他们兴趣盎然。这种政治戏法使得1814年和1815年两年间的风云变幻给那些只关心自己饭碗的要人们以诸多的优惠。头一天晚上热心的保皇党们便向那位篡权者拿破仑表示了忠心，第二天早晨，他们便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高呼“皇帝万岁”！而仅仅在几小时之前，他们曾用同样洪亮的声音向波旁王朝欢呼。对观众来说，这恰是一个杂技演员在表演连续的“云里翻”，这种表演是颇使人提神的；而当你看到这些蹩脚的杂技演员连续向前翻过以后，在喘息未定时又不得不过来个大翻转而向后翻起来，这时你的兴味更浓了。我认为，没有一个时代出现过比这次更加普遍，更加全面的

“瞬息万变”的场面了。如果以上的事实是我搞错了的话，那么，生活在1830年的人们对此会看得更加清楚。

在路易一菲力普取代其表兄查理十世而称王登基的最初日子里，事情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而宫廷大臣们的换马则更为棘手。这说明，每当一次革命把一位新人推上政坛执掌权柄时，政府的官员们刹那间便面临着大换班的局面。旧政权的支持者们纷纷引退，一个新的内阁便取而代之。这恰似一艘大船，老船员被换掉了，由一直处于旁观地位的、以前未被重用的、更加有活力的水手们来代替。

但在七月革命那“光荣的三天”以后，结果却与此完全不同。这次冲突的受益者是个王族，是位亲王殿下；而在一个星期以前，最纯粹的保皇党分子还对他推崇备至。他便是圣·路易的孙子，同被放逐的国王一样，是“法兰西的儿子”，这就使得当时的局势变得十分微妙了。这是一次革命吗？那么革命属于哪一派呢？革命的政治主张又是什么呢？除了几个死硬派以外，前王朝的大部分亲信们，除了恰如其分地为已失势的旧主人们流了几滴眼泪外，都不愿过于公开地得罪这些新人；并且，经过一阵犹豫以后，便毅然决然地进入新朝廷的“王家宫殿”，就象两天之前进入杜伊勒丽宫一样。既然太阳已经升起，而又不甘心于摆脱利禄，那么，为重新进入“那个地方”也便少不了有一番故作姿态，少不了讲几句诋毁新政权的话以显出自己似乎是很不合时宜的样子。然而在忠于过去的人们中，谨慎地私下议论，对这位开明君主悄悄地说些俏皮话和诋毁他的也不乏其人。把这种精神状态描绘得淋漓尽致的，便是罗得尔夫·阿波尼的日记。他当时是奥匈帝国驻巴黎使馆的随员，大使的表弟。是巴黎上流社会不可缺少的人物，是位不知疲倦的舞迷。他仪表非

凡，有一种尽善尽美的绅士风度。罗得尔夫伯爵直到1830年7月仍然是个出色的沙龙舞的领舞，他在博得查理十世全家的欢心上，比起别人来，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如果这位讨人欢心的年轻人不在的话，贝利公爵夫人就绝不举行舞会。而一向庄重、严肃的王太子的妃子，路易十六的女儿对他更是格外垂青，她竟肯以她那极不轻易施舍，对别人十分吝啬的嫣然一笑向这位伯爵表示她的友好。这位伟大的梅特涅的崇拜者，漂亮的罗德尔夫伯爵，公开表示他对七月革命的憎恨。查理十世的失败，对他有如世界末日的到来。当他经过协和广场（他自然仍然把它称为路易十六广场）第一次看到三色国旗时，他便感到万分恐怖。他认为这是一个屈辱的标记，他见到它就想到大恐怖时代血迹斑斑的断头台。

查理十世被废黜了，可世界的末日也竟没有到来，甚至几乎就在与此同时，这位国王便开始跳起舞来。这给这位风度翩翩的公子一些鼓舞。再说，他那位当大使的表兄也没有被本国政府召回。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君主政体的欧洲，可能会承认这位新君主。果然，尽管事情拖延得使人觉得有点不耐烦，但还是见了分晓：革命后三个月，即10月25日，奥皇陛下的大使向路易一菲力普一世陛下递交了国书。作为外交官的罗得尔夫伯爵也只好在既成事实面前屈服。尽管他个人感情绝非如此，但也已准备好到这位篡权者的宫里去跳舞了。

他对新政体一点也看不上眼。他写道：“我们前进了一个世纪。几个星期以来所发生的丑恶事件和冒犯尊严的行动，由于无边的容让，竟变成了刺激性的、爱国的和神圣的了。而这种容让的内容便造成了对神甫的侮辱和下流的辱骂。”使他感到万分沮丧的是，“美好的世界”已然藏匿，

自革命的第一声警报响过以后，它便准备离开法兰西这块土地了。大街上不再有华丽的轿车，大家都是徒步而行，顶多是坐上廉价的出租马车，还得小心翼翼以免冒犯了那些平民百姓，为了一扫从前那种车水马龙的阔气场面，他前往拜访的公馆也不准他的马车等在门前了。在大地上，从七月革命所造成的疮痍满目的可怖场面上，老百姓闹事的征兆随处可见。而路易一菲力普的家室，甚至这位国王本人，在这一片乱嘈嘈的喧嚣声中却表现得镇定自若，怡然自得。王公大臣们也和一些“叛乱者们”相处得亲如手足。每天清晨七点，奥尔良公爵便来到卢浮宫前和国民自卫军的普通炮手们一起操练。他穿着国民自卫军的军服走大街逛商店，国民自卫军把他当成同志，把他看作一个和蔼可亲的小伙子。堕落到了何种程度！……带着以上的偏见，罗得尔夫伯爵自七月革命以来第一次跨进王家宫殿的大门去参加一次正式的宴会。

新朝廷在杜伊勒丽宫前贵族家庭里声名狼藉，因为三教九流各种人物都是这个宫廷的座上宾。首次社交，这位漂亮的阿波尼人就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他被安排在王后的首席伴妇多洛米厄夫人旁边。这位夫人竟然放肆到以极其坦然的神色煽动着她那把硕大的三色扇子！……伯爵被这一放肆的举动吓得目瞪口呆，噤若寒蝉。而第二次宴会甚至更加糟糕，当他看到阿梅丽王后象一般的资产者惯做的那样站在大厅门口接待客人时，他都替这些尊贵的主人们感到脸上发烧。等所有的“贵宾”们都到齐以后，王后竟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当时正等待演奏的乐队席里去落坐，并在她旁边为迟迟不到的厄尔省的杜邦夫人留了一张椅子。这是多么可耻和丢脸的事！更有甚者，当这位夫人姗姗来迟时，王后竟因舞会在她到来之前便已开始而向她致歉。她甚至还向在音乐声

中大大咧咧地走进来的拉斐特先生致意并站起来向他迎去。在那个十分讲究礼节的时代里，只有各王国的大使们才能享受到这种荣誉。

然而，礼仪已然丧失殆尽！“光荣的三天”把它们全部扼杀了。在这位开明君主的宴会上很少看到几个穿礼服的命官，满眼都是国民自卫军的军服。他们是些什么人？缝衣匠还是小工场主？在舞会上竟见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奥尔良公爵，尽管他不无轻蔑地，但仍然是愉快地参加了这个十分民主的，鱼龙混杂的集会，并恳求罗得尔夫伯爵不要把他一个人丢在这一群其貌不扬的陌生人中间。“拿出我们的勇气来。”他说。“把这帮东西都赶走。”王后竭尽全力帮助她的丈夫，但她对把她丈夫扶上王位的这一革命并不放心，勉强忍住了眼里的泪水。似乎被这一切惊呆了的国王悄无声息地独处一隅，无人注意他，没有人去找他也没有人向他致意。阿代拉伊德夫人则恰恰相反，她是王族内一位雄心勃勃的人，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不管她做出什么悲伤的模样来也总掩饰不住当别人称她为“王姊夫人”时的那种高兴神态。就是侍从们也完全民主化了，他们似乎也把从前那种优美的举止丢尽。有一天，当王后为孩子们举行舞会时（必须让这些平民革命者们尽情地跳舞），一位饭店里的大厨师，以为招待的客人一定是七月革命的英雄，便愚蠢地把冰镇潘趣酒端了上来，结果使这群吵吵嚷嚷的孩子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一些人伤心地哭了，另一些人便不停地欢呼雀跃，更有一些人则在地毯上打滚翻筋斗。母亲们不知道孩子们吃了什么东西，这种场面在大厅里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她们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次可怕的混乱局面，六神无主的妈妈们埋怨声，小病号的叫唤声，再加上侍从们的忙

乱，把大厅完全搅乱，宫廷夫人们则到处寻找自己的香袋、香盒。反路易一菲力普的一首小调可能就始于那天，这支歌子在圣·日尔曼郊区广为流传：“大国王……众国王……大众国王……”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觉得应该庆幸，因为举行这些宴会和舞会时没有出现过聚众闹事的人们包围王宫的事件。阿波尼伯爵的日记里就曾有过王宫里举行音乐会时的一个悲剧性的记载，那是1831年3月2日：王宫的卫队不得不刺刀上枪、子弹上膛地戒备着，为国王客人们的车马打开一条进入王宫的通路。“叫贵族老爷们见鬼去吧！”的喊声从外面一直传到内宫的大柱廊上。路易一菲力普和王后同平时一样，神态安详地接待着客人，但警卫副官们却如临大敌，保持着战斗序列往来穿梭。艺术家们面色苍白，惊惶失措，哆哆嗦嗦地唱着莫名其妙的歌词。这歌声又被已经进占了长廊和花园的群众的叫喊声给盖了下去。当时的情景的确令人感到害怕。直到这时国王仍然若无其事，泰然自若，他走向窗口，向外望了望，然后迅速地出了大厅。喊叫声传遍整个宫掖，有人喊道：“动手抢了！动手抢了！”“闹事的人已经进了御膳房了！”人们预料，事情必然要搞个一团糟，并且会造成普遍的恐怖。半小时以后，路易一菲力普容光焕发地走了进来，对大家说：“一切都平安无事了，查尔特勒的轻骑兵把滋事者冲散了。”乐队继续演奏；自然，调子有些不太准确，但这时却特别受人欢迎。人们还是相信自己的耳朵；冲突十分激烈，二十多个闹事者的尸体留在现场。

关于我国这一阶段的社会状况和巴黎政坛的记录，我不相信有哪一家的正史能比这位当时奥国使馆随员的记实更生动，在细节的描述和内幕披露方面更引人入胜、更准确和更

丰富的了。

例如，罗得尔夫伯爵作为当时最平常和最自然的事件记录下来的一件史实，曾使我真正惊得目瞪口呆并且在头脑里产生了无穷的问号。因为这仅只是一件小事，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我谨在此披露于众，希望不致因此而受到责难。那是发生在路易一菲力普举行的一次晚宴上的事。那晚有五十位宾客（请记住这个数字）。这位奥国使馆的随员就坐在挥舞三色折扇的那位夫人旁边。因为一时找不到谈话的对象，他正出神地注视着坐在对面的买松元帅夫人。这位夫人似乎正在全神贯注地欣赏着什么精采的表演，只见她带着无限羡慕的神情抬起头来说：“啊，欣赏国王的刀叉技术真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的享受！”当时国王正在用刀切一只配着佐料的肥母鸡。其动作之敏捷，仪态之优美，可以说就是著名的司厨掌案见了也要甘拜下风。当时伯爵十分谨慎而漂亮地回答了国王的一次询问。国王问他：“罗得尔夫伯爵，您喜欢鸡翅，鸡腿，还是鸡胸？”“如蒙陛下不弃，下赐一只翅膀，我将惶恐地愧领于陛下脚前。”“喏，这是给罗得尔夫·阿波尼伯爵的。”国王一面说一面把一只鸡翅膀放在盘子里。其时王后正在向客人分敬大虾。

路易一菲力普便这样“切割”着烤鸡，并亲自动手把它们一份份送给客人。这便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大众方式。但在这样一个正式宴会上，在有着五十位客人的宴会上，担任这一职务似乎难以令人置信。这最少要一只接一只地切八只鸡，还不算与此同时他还要询问每个人的口味所花的时间，还不算倾听答话者那种出于尊敬而字斟句酌的回话时间，还不算他根据每个人的要求把切好的食物送到每人面前并很仔细地鸡内膛里挟上一块或者两块香菇，并在每一份上浇上

一匙酱汁的时间。顺便说一下，当时大厅里一片寂静，大家都屏声静息，聚精会神地看着国王做这一切。那么，这一顿饭要花多长时间？而且，国王是否要亲自动手给每人分送一块牛里脊或每人一只麋子腿呢？那么，他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呢？宴会结束后，他肯定会累得筋疲力尽。但，尽管他在这方面表现得才能出众，但是切一只鸡，又是坐在那里，终究称不上什么繁重的劳动，它既不会弄得满身斑斑点点，更不会搞得满身泥泞。你能想象得出胸前围着大餐巾的路易一菲力普是个什么形象吗？一位国王佩着他那宽大的绶带和全部的勋章在衣饰讲究的外交使团面前一刻不停地接二连三地给大家切烤鸡，这情景你见到过吗？然而，当你看到这些时，也丝毫不会损及国王陛下的尊严。一位国王日理万机，有时还要为之烦恼不堪，但在宴会上却能够把这样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既不笨手笨脚，又不显得滑稽可笑，而表现得那么有耐心，并且还得随时想出新的话题，随时都要向自己邻座的女伴表现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一个能把这一切做得非常出色的国王，而当聚众闹事的人在他王宫周围叫喊时，又表现得那么镇定沉着，绝不象其他人那样惊慌失措。那么，在今天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一个人来愿意从事这一职业。

10. 霍乱来到上流社会

霍乱在恒河两岸猖獗了几百年之后，于1817年开始向其他地区蔓延。它经过马来半岛，进入塔瓦。所经之处，居民

九死一生。接着，它又肆虐于孟加拉。1819年它又在中国蔓延开来。随后瘟疫漂洋过海，窜入法兰西岛和波旁岛^①。于是便直接威胁北方诸国，波斯、阿拉伯、巴格达相继出现疫情……。它便这样慢慢地扩散开来。1826年，霍乱传到黑海沿岸，四年之后，推进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这些地方滞留了几个月后，它又继续前进，侵入波兰、匈牙利、德意志，没有经过法兰西国土便直接越过英吉利海峡，在英伦三岛登陆。

我们的父辈曾安闲地注视着霍乱的行踪！巴黎曾经认为，中世纪瘟疫大流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据医生说，灾难是不会降临到我们国家的，而且，即使真的来了，他们也有把握“象治疗卡他性鼻炎”一样把它治愈。1832年元月，当人们得知瘟疫侵入伦敦时，巴黎人虽然开始有所议论，但并不惊恐。一般老百姓得不到任何有关情报，而那些有教养的人士却仍然与英国上流社会保持着经常的通讯联系。传来的消息并不怎么可怕：根据当时一位年轻的“公子哥儿”粗略地估计，三个星期内，霍乱在整个英国所造成的死亡仅一千四百五十四人，而且这些人又都属于“下等”阶层。确实，这类瘟疫哪里敢于袭击那些住在高堂华屋、锦衣玉食。精于保养，而又注重清洁卫生的上流人物呢？因此，人们认为根本不必担惊受怕，只有下等人才会受到威胁。因此，在狂欢节^②前中止或放慢舞会和晚会上舞蹈的“旋律”，停止演出和中止各种娱乐活动都是毫无道理的。人们甚至认为一位名叫科文的医生的做法很不合适，因为一天晚上，在杜伊勒丽宫，王

① 即现在的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岛。——译者

② 封斋前的宗教节日。这一天，人们身穿滑稽可笑的服装，跳舞狂欢或演出滑稽木偶戏。——译者

后正和她的女儿们围着一张家庭圆桌刺绣，这位医生竟走过去和她们谈起了霍乱来。他给她们讲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外界的故事，公主们感到非常恐惧。他的做法天真到了“有失礼仪”的地步，但人们又不好就此怪他，只有惊讶而已。大家一致认为，这位预言灾祸的人根本不懂得处世之道，因为，按照常规，对“大人物”应该永远只谈愉快的事，讲一些奉承的话。

一个月以后，这位不懂世故的科文的预言竟成了事实。霍乱在巴黎出现了。它虽然来自亚洲，但似乎很懂得我们这边的情形，即要很快地在这里站稳脚跟，必须大张旗鼓地开进，一开始就要来个下马威。3月26日，它袭击的第一个对象便是住在马萨林大街六十八号的浴博元帅的厨师。四天以后，每天死亡人数达到三百个；4月8日，这天死亡人数达到八百一十四个……。十八天内，受瘟疫传染的有两万人，其中一万五千人发病后仅几个小时便死去了。

然而，这并没有引起丝毫的恐慌。因为人们非常肯定，霍乱只传染给“小人物”。阿波尼伯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晚宴、集会、戏剧、舞会、音乐会，一切都没有影响，照常进行。”人们所采取的唯一措施，便是在身上带上几片樟脑。这种东西原是漂亮的仕女们在跳舞时送给年轻的男舞伴的。再就是随身带个小香盒，里边装着些薄荷和洋甘菊香锭。在西装背心口袋里装上这么一个小盒子，不时地拿出来闻一闻，那是很有派头的（一时间，这种做法竟形成了一种时髦的风气）。至于医生们，在瘟疫尚未发生时，他们信心十足地宣称可以控制其流行，而现在却被搞得晕头转向，只有低声下气地说“他们对此种瘟疫病一点也不了解”。其中一位，一天晚上在市里吃晚饭时说，他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对十个霍乱病人的

尸体进行解剖，没有找到内部被破坏的任何痕迹，也没有发现那一个内脏器官受到损害。这种病真是一个谜。另一些学者对空气进行分析研究，这一努力同样一无所获。就是那些最精明的人对此也是越研究越糊涂。在治疗方面，也是五花八门：俄国大使一天喝了四大碗氯化物，结果是痛风病急剧发作；圣一莫里斯伯爵夫人吃的是炭粉；鲁尔夫人得病后，据她自己说，由于她全身出了一次大汗，已经十六个小时了，便夸口说，已经不再有危险；科蒙拉福尔斯伯爵觉得自己似乎得了病，就让人从头到脚使劲地搓他的皮肤直到伤痕遍体，差一点被这种恶性疗法给搞死。此外诸如水蛭疗法、薄荷疗法、烟草疗法、酒精疗法、热水浴疗法、牛奶疗法、胡椒疗法、葡萄酒疗法……等等都试过了，但这些无关痛痒的疗法对于霍乱则毫无作用。它大肆泛滥，无情无义，不管你是上等人还是下等人。蒙卡尔侯爵夫人下午四点感到不适，晚上十点就一命呜呼。尚普拉特夫人还不到二十岁，当时感到有点疲乏，便让她的祖母拉布雷希夫人一人去参加沃戴蒙公主家的晚会，她自己则在九点钟便上床休息了。可是当祖母午夜归来时，这位美丽的少妇已然成了一具面孔扭曲了的尸体。八天之内，就有八个法兰西贵族院议员、五个众议院议员死于非命。人们见面就谈论因传染病而死的事，对此，除了哀叹之外，一筹莫展。各教堂都挂起了黑色幕布；每条街道，每幢房子里，都停有灵车和棺木；而送葬的行列，带孝的男女，更是巴黎呈现出凄凉景象。入夜，在寂寥的街道上，随时可以看到一队队身着黑衣、手执火把的人，远远地拉着装满尸体的大车缓慢地走了过来。在每个区却有一个门前挂着红灯的救护站，门前总是围着焦虑的人群。尽管如此，那些高门大户，显宦之家并未因此而停止娱乐，罗辛夫人家里有

晚会；德尔玛男爵家里正在演出阿依登的《天工开物》^①，由拉布拉希清唱，乐队指挥是罗西尼；诺阿耶夫人并没有中止她例行的周末舞会；贝利桑夫人家里也还是依然开着晚会。每个晚会参加者的神态表情都很符合时宜，并且每人都能带来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内容越可怕越受欢迎。甚至在宫廷里各种招待会也照常举行，当然，谈的也还是“这些事”，虽然有失礼仪，但这已经成了当时唯一的话题。在杜伊勒丽宫，一上那个大台阶，人们的话题就是这些。前面提到的阿波尼伯爵，在那里遇到了两位大臣阿尔古先生和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他们神情沮丧，不再讳言病人数量剧增并且几乎无一治愈这一事实。三个星期后，他们俩也都死于霍乱。在迪阿纳画廊，在客厅里，来宾们都在小声地谈论着前一天还看到他们身体健壮而现在却已亡故的人的名字。温柔的阿梅丽王后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显得忧郁、痛苦甚至有些易怒。她和她丈夫的妹妹阿代拉伊德夫人在一起，象往常一样坐在壁炉旁边。大家走来向她致敬，然后再走开。如果王后陛下示意请坐，那就停下来和她聊天，谈的还是霍乱，以及饮食起居方面的琐事。国王、王后以及王室的所有成员仍然保持着他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在进餐时和两餐之间，照样饮用冰水。在宫廷的内侍中有六个人得了病，却只有两个人死亡。但是，路易—菲力普和阿梅丽王后感到万分难过的是，有人竟利用这次灾难来反对朝廷。他们说，这次疾病大传播，国王便是罪魁祸首。

当巴黎市民看到连最高深的学者也不知其来历的疾病大量地夺去自己同胞的生命时，他们便天真地以为，这是王国

^① 《天工开物》是奥地利作曲家弗朗兹·约瑟夫·阿依登（1732—1809）创作的清唱剧。——译者

政府由于没有别的办法公开处死它的反对者，便采取这种手段，把他们大批地毒死。这种可怕的谣传不胫而走，首先是大街上捡破烂的人非常气愤，因为按照上司的命令要清扫街道，这样他们就不能再在垃圾堆里到处翻捡了。于是便提出抗议，说是政府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他们聚集起来袭击政府清除垃圾的载重车辆并把它们扔到河里。由于塞纳河几乎是巴黎各水库的总干道，向里面倒垃圾正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当然不会使水质得到改善。于是便谣言四起，说是塞纳河水被毒化了。这种谣传甚至迅速变成了无可争议的事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一切，即何以神秘瘟疫会洗劫全城，药物何以会失灵，何以当权者的态度会如此消极，等等。然而，最使人感到震惊的是有一批无耻之徒，他们为了煽动起下层人民起来推翻王朝，故意装做向各水源里扔进一些可疑的粉末。如果把阿波尼的日记和当时巴黎警察局局长吉司盖的密报进行对照，人们就不能不相信这些可卑的事实。有一个人在“新建桥”上和一个孩子攀谈，交给他一个装满液体的瓶子，且拿出二十个苏给他，要他把瓶子里的液体倒进学院广场的水池里，还千叮咛万嘱咐要这个孩子谨慎小心。这个孩子没有倒，却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母亲。母亲被吓得叫了起来，这一地区便因此骚动起来。人们把瓶子送到警察局，经过检验，里面装的是密里萨药酒^①。在圣维克多镇，有一个人在那里转来转去，逢人就说他看见两个警察把毒粉撒在一个小女孩正在吃的面包上。在圣·雅克镇，另有一些人装做把一些什么东西投到水井里，然后混到人群中去，他们的同伙们随即给他换上别的服装。在唐普尔镇和圣—安托尼镇，有一

^① 密里萨是一种蜜蜂花属植物。这种药酒对身体无害，并能治病。——译者

些人在晚间向孩子们散发糖块。在贝西港，有人发现三大桶酒，酒桶上覆盖着一层粉红色的粉末，经确认，都是些肥皂粉……。对这些可怕的神秘的事件，各个党派相互推诿责任，共和派和正统派指责当权派。当权派指责正统派和共和派。老百姓则为此简直象发了疯。他们到处追逐“投毒的人”，撕碎他们的衣服，杀死他们然后扔到塞纳河里……。而水，虽然没有想到去指控它，却是瘟疫真正的传播渠道，而且也绝不会因此变得更为洁净。但是，这场灾难的原因至少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巴黎的老实人，直到瘟疫终于过去以后，还深信，是路易一菲力普一摩比，他发明了一种比断头台更干净而又更简便的方法来消灭善良的百姓！……

阿波尼伯爵肯定是对霍乱不再流行最感到高兴的人士之一，这倒不是因为他也害怕，而是因为他要在卡尔贝公爵夫人家筹备一场盛大的舞会。尽管他不遗余力，他还是感到很难使人们快活起来。舞会虽在进行，但却笼罩着忧伤的阴影。阿波尼愤慨地写到，来宾们，即使他们是年轻人，“也都个个面带愁容”。

愿圣母保佑！

11. 路易一菲力浦被刺

阿利博很早就被一种疾患所烦扰。十七岁那年，他还在纳尔波呢绒商店当店员时，就非常喜欢幻想。有一次，一个星期天，老板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花园的条凳上，臂肘支在膝

盖上，用手托着下巴，目光凝视着宽阔的远方，这引起了老板的担心。这位呢绒商为人正直，他对自己的这位雇员不去找和自己年龄相同的人一起度假而在这里呆坐感到十分纳闷。他为什么如此忧郁？对处境不满吗？那么他生活中缺少什么呢？阿利博回答说，他“要得到荣誉”。于是他打算到军队服务。但那时已是1829年，已经天下太平了，没有人再谈论往日的战争。在战争年代，就是最普通的大兵也有机会当上法兰西元帅。但这位可怜的店员自结束了他在神学院的学习后，便读了大量歌颂帝国业绩的故事和充满了入侵者获胜之类的惊险小说，其中的英雄人物大抵都是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和他们相比，他为自己的生不逢时感到伤心。他的父母谈不上富有，在城里经营一个十分简陋的小客店。他急不可待地要求帮助他们，于是便应征入伍并到了巴黎。他被编在步兵第十五团，该团不久便被派驻斯特拉斯堡。阿利博能写一手漂亮的好字，被任命为下士，不久便提升为司务长。但是，他的“疾患”总使他郁郁不乐。发作起来时，他就变得少言寡语，面色阴沉，有时竟好几个小时一个人在军营的宿舍里往返踱步。同事们问起他来他只简单地回答说：“我曾受到过几个人的痛苦折磨……”这时他便目光直射，似乎对着正在向他窥伺的几个敌人示威。

他要求提前退役并得到批准，遂于1834年离开该步兵团。他又回到纳尔波，并在电报局里谋到一个差事。但是那几个看不见的追逼者仍然紧随着他，四个月他便被婉言辞退了。他当了小学教员，并努力想干好这一工作，但很快他又放弃了这一职业前往佩皮尼扬，在那里一个批发商店里当上了会计，但他仍然没干长。到底什么原因呢？其实，他颇有文化教养，并出落得成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举止文雅

并带点女性的特点，他极善表达自己的感情并且态度从容。但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总是被大家拒之门外呢？没有一个人了解他的长处，他自己对此也深感遗憾。使他在人生的旅途上豁然开朗的，是1835年的某一天，在佩皮尼扬，大家听说有个名叫菲埃什的科西嘉人，刚刚向国王路易—菲力普开了一枪，但这位国王并没被击中。阿利博这时终于明白了他不幸的遭遇来自何方，原来阻碍他飞黄腾达的敌人就是国王。如果消灭了这个暴君，那么黄金时代就会重返法兰西。与此同时，他一腔复仇的欲望也找到了发泄的对象。一种憎恨，强烈的憎恨，便在他狭隘的头脑里扎了根。他向父母宣称，自己“将去从事一种足以保证二老安度晚年的工作”，并向他们借了二百五十个法郎，便动身前往巴黎；途中在夏戴莱罗尔特稍事停留，买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到达首都后，在杜伊勒丽宫旁边，他找了一个门面破旧、五方杂居的旅店住下，以监视那个迫害他的人。

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他都为自己的这一决策而奔忙。在德维斯摩斯军火商那里，他冒充一个旅行推销员，要求店主赊给他一支手杖式火枪。得力于他那副漂亮的外表，他如愿以偿，他将用这一武器去刺杀国王。此举如能成功，不但法兰西能够得到幸福，他个人也可流芳百世，并且还一举向“那个使他不能谋生的人”雪了个人仇恨，他将因此而鹏程万里。事情一旦决定，他便从容不迫地围着杜伊勒丽宫闲逛，以熟悉那个“迫害他的人”的活动规律。

他那点微薄的积蓄很快使用光了。恰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位“同乡”。这位同乡留他住了一些时候，又替他在蒙托格依大街一个名叫巴提札的酒商那里谋到一个记帐员的差事。他仍然没有干长。当巴提札责备他“没把心思用到工作上

去”时，他就小声嘀咕着：“当我专心致志的时候，想的可不是干这玩艺儿。”的确，他想的是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如何到咖啡馆里一坐，嘴上叼着他那只烟斗（是一只短短的奶油色的陶瓷烟斗，装饰着螺旋形的流苏），一边浏览着各种报纸，从中找寻国王的动向以及阅读朝廷的新闻。酒商把他解雇了，他便有了充裕的时间。索性不把时间浪费在到处找工作上面。那时正是五月份，1836年这个东风沉醉的春天，巴黎简直令人陶醉。这位候补弑君犯无论如何也不想远离杜伊勒丽宫，他又在河左岸一个狭窄阴暗而又肮脏不堪的小巷子里找到一个满意的住处。这个旅店叫蓬得札尔，地点在马莱街即现在的维斯康抵街。那所房子至今仍在，显得阴森恐怖。阿利博在这个旅店租了一间客房，或者准确一点说，是租了一间破房，只有楼梯上才有点光亮。每月租金是十法郎，他拿不出这笔钱，预付了两法郎，便把箱子搬来，在这儿住下了。

他从来也没有象搬进这间阴暗的小屋子里以后那样高兴过，因为阴暗的房间和他阴暗的心理十分协调。由于无所事事，他每天都起得非常之迟。旅店的老板很注意这个古怪的房客，并听到他在自己的小破屋里以忧伤的调子唱《小乞丐》那首歌：

……我年方十岁，
便失去了母亲……

或者唱着被富人们所深恶痛绝的某些歌曲片断：

我已饿得发昏，
请您发发善心！……

花天酒地的大人，
请看好你们的黄金……

他喜欢这些歌，原因是歌词写的这些窘迫情况，正是他自己称之为“他的才华”的温床。

6月15日，阿利博在塞纳河畔的马拉盖码头卖给一个旧书商一本西班牙字典，随后便买了些烟丝，装上烟斗，走进坐落在加考大街上的阿尔曼咖啡馆，读着报纸上有关国王的消息。又因为“一点也无须着急”，便去打了一场台球。在近四点钟时，他衣袋里藏着匕首，手里提着手杖式火枪，便直奔卡卢赛尔而去。宫廷的车驾停在那里，一俟路易一菲力普开完内阁大臣会议便前往纳伊。当时一点出发的迹象也没有。阿利博在现场遛来逛去，仔细地打量着华丽的佩尔西尔凯旋门，并认真地研究着上面的浮雕，还不时和在附近担任警卫的国民自卫军值勤的哨兵交换着看法。这是个善良的资产者，他对他“很有好感”。当看到车夫们纷纷登上坐鞍时，这位刺客便不慌不忙地向那条带拱顶的长廊走去。当时这条路连接着卡卢赛尔和杜伊勒丽宫，是一条十分狭窄的通道，并且也没有卫兵把守。为更清楚地观看国王在这里路过，几个好奇的人就拥到这儿来。阿利博混在人群里，并把他的大礼帽放在两个廊柱的柱脚之间。他感到一阵自己无法克制的战栗，便哆嗦起来。他旁边的一个马夫看到这种情景，心想：“这个古怪的家伙可能在打摆子吧？”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个直哆嗦的人已把手杖挟在两膝之间，背靠着一个石柱。国王的车驾过来了，大家高呼着“国王万岁”。国王的车子车窗开着，路易一菲力普伸出头来向人群打招呼。突然一声响亮，就象玩

具枪一样，声音并不大，一股硝烟散向天空。随之便是一片叫喊，一场扭斗，一场互相间的厮打。在混乱中，国王伸出头来高声喊道：“朋友们，我没有受伤！”坐在车里的王后看到丈夫的头发里有点什么东西，拿下来一看，是个粉红色的纸团，原来是火枪发射出来的弹皮。子弹打进篷车右边的护板里面，距国王头顶不到五法寸^①。这时车子已经向右转，并一溜烟似地向纳伊奔去。十五天后的清晨，天刚放亮，阿利博头蒙弑君犯人的黑纱，被送上圣·雅克广场的断头台。在离开监狱时双手已被捆住，他对狱卒讲：“于贝尔，我的伙计，请你把我的烟斗装上烟，然后替我把它带到‘那个地方’……”随后他又转向陪同他的神甫说：“神甫先生，如果烟草味不使您过于不舒服的话。”神甫格力赛尔替他作了祷告并准备陪他起身了。当阿利博明白了他必须离开这儿时，他做了一个很不耐烦的手势。于贝尔也并没有把他的烟斗给带上，他耸了耸肩小声叨咕道：“这还不是白说？”

这只烟斗如今尚在，原存在监狱保管室里，后来连同有关的诉讼案卷以及在蓬得札尔旅馆起出来的箱子及里面的旧衣物，一起转移到国家档案馆。箱子是一只不大的木箱，外包黑色牛皮，毛朝外。里面糊着印有蓝色和黄色花朵的纸。箱子里有一条黑色领带，几只不成双的袜子，一副有带子的衬领，几枝野山菊，无疑这是从菲埃什墓上拿回来的。此外还有他的帽子、贴身背心，还有行刑的那天早上因需穿死囚犯的号衣而换下来的那件外衣。在一个盒子里装的是他几个月来爱如珍宝的那支手杖式火枪。和公众的意见相反，我们的档案馆只保留文字资料。苏比斯宫堪称法兰西历史文物的宝库，保留有那么多的历史遗物并能以此向最著名的历史博物

^① 法国长度单位。一法寸约合 27.07 毫米。——译者

馆自豪，它现在已扩大成差不多是一个真正的博物馆了。如果把把这些历史文物陈列出来，那将是一个多么好的陈列室！

我这样说，并非专就阿利博的烟斗而言。在那里还有另外许多见之于正史的悲剧性的实物。这些实物要比最娓娓动听的叙述更能引起人们的联想。比如，刺杀贝利公爵的暗杀犯卢外尔用的匕首；菲埃什用的火枪；被判处杀头的山岳派议员们集体自杀时在手上传来递去共同使用的那把刀；路易十八的办公桌；资产阶级革命时濒死的罗伯斯庇尔曾躺在上面的公安委员会里的那张大桌子；想过皇帝瘾的那位路易·拿破仑在向帝国迈进的最初日子里手里摇晃着的那面旗子；制宪会议在1790年开会时，为确定法兰西各省的行政划分时使用的长大而笨重的桌子；在凡尔赛的马尔布勒大殿上曾砍了路易十五一水果刀的达米尔穿的衣服；被征服的城市的钥匙；还有那著名的不朽的宪法，原本要传之万代，但却在刚一出世，便成了废纸一堆。这些被封存在库房里的实物，排列起来可以长达几十公里！如果有人浏览其间，该有多少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事件拨动着他的心弦！欧内斯特·都德曾经翻检过这些遗物。例如他曾说过，有一天他在翻阅流亡贵族的档案时，发现过一只绿色山羊皮公文包，上面的钢扣已经失去光泽，没有名字，也没有任何足以表证此包是属于何许人的痕迹。但在其中的一个夹层里有一瓣玫瑰花，在另一夹层里有几封情书，最后还有一个长方形的小包，用一张薄纸包着，里面是一条很长的棕色发辫，头发已变得十分松脆，只要用手一触便纷纷脆断。这一切就是一部难以捉摸的小说，谁也不知道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谁，更不知道故事的结局如何。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曾发现过一个很粗糙的纸袋，封皮上写道：“内有搜集到青年罗伯斯庇尔的遗物。”

共和历11年热月9日自杀。”我看到这些时，心情万分激动。里面有几张很脏的通货券，一封或两封从阿腊斯来的信，还有一把钥匙——他房间的钥匙，就是那位“廉洁的人”^①的弟弟放在他衣袋里的。早晨他把房门锁上出去以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一条无名氏的发辫，一把生了锈的钥匙，一只旧公文包，可能有人会说，何以竟把这些东西摆在橱窗里呢？是的，就这些东西本身而论，它没有任何可珍贵之处，但它们却给人留下了无法表述的感受，这些遗物中蕴藏着多少悲剧性的故事！只要你平心静气地观察一下这些东西，你便会对这些故事的体会更加深刻。这些破旧的东西是毫无经济价值的，但唯其如此，它们才更加吸引人并给人们以启示。这些历史人物，他们那么不守本分，那么富有传奇性，那么热烈和富有激情，他们犯下了那么多的弥天大罪，或者说那么样的不幸，但他们今天所留给我们的，就只有这些少得可怜的残简碎片！

12. 画家拉费的日记

我认识一位军官，在1815年他还几乎是个孩子时，曾被拿破仑召去问话。这位军官在皇帝面前诚惶诚恐，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当他刚刚离开皇宫，由于过度紧张的神经得到松弛，竟哭了起来。亲眼瞻仰这位皇帝的仪容，即使远远地看着他面带沉思地走过去，看看他那个驼背和那身灰色大礼

^① 指罗伯斯庇尔。——译者

服，这本身就是一件足以轰动一时的大事。就是名家如维克多·雨果，也未能免俗。“有一天”，他写道：

有一天在潘屯，
那时我才六岁，
就看见过
在我面前经过的拿破仑。

对于这一往事，五十年后他仍然念念不忘。

我们在本篇将要叙述的，远比这件事有意义。那是在1813年，巴黎正等待着前方军队的消息，大批人群焦虑不安地聚集在各个主要的街头。突然发生了一阵可怕的骚动，人们争先恐后地向前拥去，大家相互拥挤，相互碰撞，并拼命地高呼：“皇帝万岁！皇帝万岁！”当时在人群里有一个年方九岁的孩子，他对当时的事态和政治形势可以说一无所知，只是偶然赶上了这种场面。当时人海如潮，大家都脱帽致敬。他透过万头攒动的人群，突然看见了这位英雄的身影，只见他头戴小帽，面无表情，目光冷淡，面色苍白……。拿破仑身边没有随行人员，因为拥挤的人群把他和警卫挤散了。他不故作姿态，也不讲什么排场，但这也只不过是闪电般的一瞬间的印象而已。因为激动的人群象潮涌一样很快地便把这个孩子给推到一条横向马路上来。

这闪电般的一瞬间便注定了这个孩子今后的命运……。这位失败的英雄面容疲惫，脸色阴沉以及战败归来的沮丧表情，这一切在一瞬间便在他脑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图象。它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自那以后不断进入这个画面的便是这位英雄的形象，便是跟随这位英雄打遍欧洲的士兵们颇具

神秘性的传奇故事，便是在秋收季节满载辎重的骑兵和车队和那些弹痕累累、被硝烟薰黑了的军旗……。那么他自己的前途如何呢？对此他一无所知。毫不迟疑地去当兵吗？他所感到的，就是 he 已确定了他的人生之路，就是他已被英雄的旋风般的吸力所卷走，从此以后他将沿着这位伟大人物的轨迹前进，一条割不断的纽带把他和拿破仑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但是，请看命运之神的威力吧，皇帝跌下了宝座并且死在一个距法国本土有四千公里的岛子上。停战协定签字后士兵们都复员回家了。拿破仑的老部下，负重的骑兵，被子弹打烂的军旗……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此外，这个孩子又出身贫寒，靠劳动维持生计，他甚至曾在一个木器工人家里靠打木椅过活。这种职业与戎马生涯相去十万八千里。他父亲在邮政局工作，是个安分守己的职员，但在四年以前却在布罗尼森林中被人杀死，因之母亲也便失去了生活来源。有人曾说，在路易十四全盛时期，对这位伟大的国王的一瞥，诞生了高乃依，对战败归来的拿破仑的一瞥，诞生了拉费。

因为这个孩子就叫拉费，他祖居洛林，移居巴黎已有半个世纪。那时候谁能向他预言，他将在这位英雄，这位他曾如醉如痴的人流中瞥过一眼的英雄的业绩上再增添某些东西呢？由于他艺术家的天性所使，他不再和椅子腿打交道了，他来到一个陶瓷制造商那里当装饰工。1824年他每晚都去听夏莱的课，随后他又经常到格罗男爵的画坊去实习。在这两位大师的薰陶下，经常萦回在脑际的那位英雄的伟大业绩又在他内心里复活了。他想象中的作品已不再是用拘谨的线条描绘出来的战斗画面。在这些画面上，那些士兵们总是衣着鲜明，这种装腔作势，矫揉做作的老式传统画法，把他

们画得面目全非。他头脑里的作品，士兵们应该是身着褴褛的军衣，一群衣不蔽体、营养不良的彪形大汉。他们由于波拿巴的声明而怒火填膺。拉费意在复活整个的帝国时代，表现的不是金光灿灿凯旋而归的凯撒大帝，而是1814年的拿破仑，他应该是面带沉思，带着他疲惫不堪的残兵败将在泥泞的平原上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跋涉。他便以这样的构思创作出一大批杰出的版画和战争速写。它们似乎是一幅幅的写生画，但却蕴含着那么多扣人心弦的真实场景，那么多为我们所熟知的事物。在这些作品中，他表现了一种亲密无间的感情，一种集体的力量 and 把这一集体力量纳入一个共同目标中去的精神。在这方面的成功，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相比。在作家兼画家的泰奥菲尔·戈蒂埃之前很久，他就在画面上把在耶拿大战和滑铁卢大战中倔强的英雄们复活了。他看到了他们，并用画笔把他们再现出来，就象诗人雨果对这些英雄所描写的那样：

褐色的高顶军帽上，
稀疏的翎毛在瑟瑟抖动。
弹痕累累的军服上，
何时又添了虫蛀的破洞？

肥大臃肿的军裤上，
褶皱已揉出千条万条，
越来越沉重的双腿，
几乎已拖不动生锈的战刀。

如果他们在沙场上僵卧不起，
军旗便是他们唯一的被褥。
如果他们袖筒里飘忽无物，
那是炮弹夺走了他们的胳膊。

这是另一些阿喀琉斯^①，
另一部《伊利亚特》的英雄，
因为即使荷马再世，
也难以把他们形容。

战友们！
请不要把他们嘲弄！
我们要做是应是——
向他们脱帽致敬！

说来可能会使读者惊异，拉费把这些老战士们写得如此真实生动，但他却从未见过他们。当这支伟大的军队在滑铁卢大平原上纷纷倒下，黄沙盖脸，并从此一蹶不振时，拉费还只不过是孩子。但为了作画，他却访问了当时的目击者和拿破仑时代的老兵；他甚至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战争的细枝末节。因为这些勇敢的老兵一提起他们参加的战便兴味无穷，津津乐道；又因为这个“年轻人”要把他们的伟大业绩付之丹青，传之后世，所以他们对他也非常欢迎。

拉费以他一生很大一部分时间把他的研究和日记。这是一些很平常的记事本，是日积月累的简洁记录。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却通过这些记录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和思想见解；口气谦和平易绝无矫饰之词，甚至对他自己

^①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的英雄。——译者

的价值也似毫无所知。在这些简略的记载中，人们经常可以从简单的一句话或者一行字中看到对当时的事件、事物和人物的真实情况。虽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却充满了激情并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在这部日记中有许多极其珍贵的材料，记载了许多从1833年到1859年间有关艺术和艺术家们的事件。这些记载使我们看了都大出意料，还是由读者自己来评价罢。

1835年——去格拉协尔附近画磨房。应佩丹先生之请为贝朗瑞的歌词作画五帧，得一百七十法郎。为麦拉克先生作版画一幅，六十法郎。为吉欧作《安特卫普之包围战》画册，一千五百法郎。成四帧木版画，九十五法郎。应请画一图案（可能用于维利证券）得五百法郎。

1836年5月——完成舍菲尔的《到边境去》的修改工作。完成约哈诺的《夏莱特之被捕》的修改。完成舍菲尔的《夏洛特·科尔第》的修改。完成约哈诺的《卡里埃在南特》的修改……

1840年7月——28日上午8时，参加七月革命死者遗体迁往巴士底纪念圆柱的仪式，下午近5时方回。事毕，为观摩壁饰曾稍事停留。发生了一次小骚乱。

1840年10月——为马蒂尔德·波拿巴公主用水彩作画，充诺万尔所著《拿破仑的故事》一本的首页；此书是诺万尔送给她的礼物。路易·拿破仑亲王被判处终身监禁，拘留在汉姆城堡。前往观看麦克道纳尔元帅的车队。晚6时去法兰西歌剧院，有几个人要求唱《马赛曲》。从储蓄银行提款一百九十万法郎。15日下午5时半，有人企图在协和广场刺杀国王。刺客是马赛人，名叫马利尤斯·麦达斯，四十三岁。16日，前往协和广场观看刺客向国王射击的现场。在蒙特巴

纳斯公墓观察植物生长特点。

1840年12月——构思并着手准备关于拿破仑的第一个虚构的主题（无疑，这里指的是《夜间检阅》）。15日，参加拿破仑遗体迁葬式守护工作。参观巴黎残老军人院停尸室并作拿破仑棺木速写。去凡尔赛博物馆，观摩皇帝的一幅画像。参加为马蒂尔德公主的送葬。迪普雷前来拿取为他所作《第一共和国的轻骑兵》一画，六十法郎。

1841年9月——国王遣人来，命为第十七轻骑兵团作一幅画；前往科具依参观驻该地骑兵团，晚上参加在纳伊花园里为国王举行的宴会。同奥尔良公爵交谈。一人向奥马尔公爵开枪，此人名叫盖尼赛，是锯木工人，已被捕。

1842年2月——5日晚，参加奥尔良公爵举行的化装舞会。路易·布朗热身穿亨利三世时代的服装，奥尔良公爵夫人化装成奥地利的安娜，克莱芒蒂娜公主穿上路易十五时代的服装，奥马尔公爵穿的是查理九世时的服装，儒安维尔和蒙庞西埃两位王子也穿同一时代的服装，内穆尔公爵则化装成洛兹恩轻骑兵，奥拉斯·韦尔内化装成阿拉伯人，比阿尔化装成拉普兰人，多札特和居维埃·弗勒里化装成阿尔巴尼亚人，居丹是高加索人，我则是切尔克斯人。

1842年5月——8日下午5时40分，塞纳河左岸发生了一次可怕的交通事故。10日下午2时去蒙巴尔纳斯公墓，并前往停尸房观看枯尸陈列，共三十二具，其中包括海军上将迪蒙·于尔维尔和他夫人及儿子的尸体。作尸体素描。

1842年7月——13日，奥尔良公爵不幸去世的消息，使大家悲痛而吃惊。第二天，一位出版商前来索公爵画像。前往圣·苏尔皮斯听候亲王殿下吩咐，随后同鲁塞先生一起前往殡仪馆作灵柩速写。随送葬人群列队前往巴黎圣母院参观。

1844年1月——一天晚上朱利安先生把本·阿拉罕、本·沙拉姆和考迪亚·德西迪一昂巴尔克的儿子等阿拉伯人带到欧尔纳先生家里，最令这些人惊奇的是太太们穿的紧身服装：“她们难道不感到憋气吗？”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作沃迪蒙公主墓上洛莱纳十字架速写。

1847年1月——去马尔尚先生家，他穿上拿破仑皇帝的军服，摆好姿势令我画像。为寻找丹东的头模像，去模塑工厂，无结果。

1847年5月——把桑泰尔、迪穆尔埃、菲力普·埃加里德等人的肖像携往菲尔纳先生处，共得三百法郎，和他同往参观卡尔莫斯修道院。

还可以继续摘录，但仅以上这些，就足以展示拉费的生活情形。以现在的眼光看，当然这位艺术家已经不朽了。那三百法郎的三幅肖像，六十法郎的《第一共和国的轻骑兵》，一百七十法郎的贝郎瑞的五幅歌曲画，以及他给约哈诺和舍菲尔修改的版画，岂不和路易·拿破仑亲王被判处终身监禁而结果只有五年同样令人感兴趣吗？通过对这位大师生活片断的了解，我们对一直萦回在他脑际的主导思想和贯彻他始终的思想脉络摸得又是何等清楚：“为拿破仑的棺木作画”，“前往观看皇帝的肖像”，“为身穿拿破仑军服的马尔尚先生作画”……他孩提时代在人群中看到对那位英雄的欢呼场面似乎成了他以后命运的主宰。

对于当时那个帝国时代的悲剧性和人情味，没有人比他理解得更为透澈了。请看一看《1807年下定决心的拿破仑在涅曼河畔》那幅画吧：躬腰弯背的拿破仑独处在昏暗的、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驻马沉思，心事重重，似乎在预卜着前途的吉凶。再看看他的《骑兵纵队》、《重骑兵在战斗中》。

《皇帝在瓦格拉姆》，特别是那幅《拿破仑在律茨》，一群参谋人员护拥下的拿破仑在战场上纵马疾驰，受伤的士兵们纷纷起立向他欢呼致意；或者是在倾盆大雨下，穿着他那件传奇式的大礼服，头垂得很低，纵马前行，“他的精锐们”默不作声地、顺从地尾随着他。画面的说明是：“他们在低声埋怨，但却一直跟随着他。”

还有一幅是《愤怒的骑兵最后一次冲击》，骑兵部队踏着麦田，潮涌般地向前冲去，密集的队形消失在敌人的炮火硝烟中。特别是《夜间检阅》那一幅，别出心裁，颇有德国叙事诗的风格。繁星闪烁的天空把大平原映得一片灰白，在平原的正中，皇帝驻马伫立，参谋人员在阴影中若隐若现，皇帝的亲兵列成浅灰色的方阵，武器在月光下闪着寒光，露影中，重骑兵正在全速前进，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司号员，他吹着送葬般的阅兵号，正象一个天使在作最后的判决，

被拉斐所神化了的捐躯者们，

走过来了，并且高呼着：“拿破仑！”

13. 巴尔扎克的空想

维斯贡蒂伯爵夫人姿色迷人、身段优美，一张俏脸艳若桃花，一头灰色的亮发秀丽异常，嫣然一笑足可销魂，但她的名声却绝非无可指摘。1834年她刚刚三十岁，可有关她本人的和她的家庭命运的离奇传闻已经满城风雨。她出生在英国，年幼丧母，其母因感到自己老而无用，遂自溺身死。她

有三个兄弟，老大曾和一个地位高贵的英国贵族的女儿相爱，待把她骗到手后便沉于酒色之中；老二悬梁自缢；老三自刎身亡。她的两个姐妹，一个自甘堕落，因纵酒过度而死于非命；另一个由于虔诚信教，精神失常，被人看成是十足的白痴。而她的丈夫维斯贡蒂伯爵却对这些沉重的遗传因素不加理会，他对不属自己夫妻生活范围内的妻子家里的这些荒诞不经的事情充耳不闻。他原出身于隆巴底一家名门望族，实际上只对两件事最感兴趣：第一件是他喜欢摆弄乐器，如果他能到当地某一家小剧院的乐队里去参加哪怕是一两天的义务演出，就足以使他兴高采烈；另一件是相信自己能晋升为助理药剂师，因此，他带着满腔为自己祝福的热情，每天都忙于把数不尽的药瓶又洗又擦，然后往里面装上药，盖好瓶塞，再用折好的纸象帽子一样给每个瓶口扣上，然后又兴致勃勃地给它们贴上标签。

在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所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巴尔扎克经人介绍认识了维斯贡蒂伯爵夫人。她很讨他的欢心，而巴尔扎克也觉得自己并不使对方讨厌。那时巴尔扎克已初露头角，也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了，所以这位大使的各种沙龙的门都向他开着。在这些沙龙里，这位神圣帝国的代表专门接待当时最高阶层的贵族和显要。波旁王朝长系的那些最纯粹的正统派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地用最优美漂亮的语言来攻击当时的在位国王那位篡权的路易一菲力普。至于巴尔扎克以及其他几个作家也能成为座上宾，那是因为他们是以文人的特殊身分参加的。那些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们对这些“舞文弄墨”的文人是不屑一顾的，偶尔出于好奇，顺便看他们一眼，就已感到这些人在这个高雅之堂出现是多么的不协调。特别是巴尔扎克，为了夸耀自己，他的衣着打扮特别豪华，

因而也就格外引人注目：白色的领带，黑色的手套，蓝色的大礼服上钉有二十四颗金光闪闪的纽扣，里面是一件黑缎背心，下穿一条克什米尔短绒呢裤。他的头发高高竖起，就象潘趣酒燃烧时冒出的火苗，显得无拘无束。此外，他穿上这身别出心裁的服装，再加上他兴高采烈、过分热情的表情，便很容易使人觉得他是个小丑。就这样，他引起了维斯贡蒂夫人的注意。当他觉得对方有意时，他的想象力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曾幻想过要得到一位“贵妇人”的爱情，他的这一宏愿却残酷地化成了泡影。这一次，他又盲目地投身于这个危险之地。他在行动中表现得大胆放肆，甚至非常冒失。对上流社会所讲究的含蓄、婉转等他全然不顾。有如一个不能自控的男人向对方猛烈进攻。他离开使馆时，确信自己已经征服了对方。

当时他住在卡西尼大街紧挨着气象台的一套房子里，房租每季高达二百二十法郎。那时他的手头十分拮据。不久前，他不得不向父亲的一位女朋友借了一万零八百法郎。此外，他还欠纳卡尔大夫的债，欠画家波尔热的债，欠另外二十个人的债。这些债主经常上门讨债，可他依然过着百万富翁的生活。寄住在他家里从贝里来的一位名叫儒尔·桑多的二十三岁的年轻人给他写了一部轰动一时的五幕喜剧《贵小姐》，如果上演这部喜剧，难道不能赚一大笔钱吗？而他本人也正在酝酿着写一本“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这部作品肯定将成为他“艺术王冠上的一颗明珠”，这也可以使他获得一大笔财富。在等待这本书的出版和这部戏剧上演的同时，还要努力想办法能够体面地接待自己所钟爱的伯爵夫人。一定要“使她感到惊异”。于是，巴尔扎克购买了（当然是赊购）华贵的地毯、一些艺术品和青铜器皿。一台当时很

时髦的座钟，全是镂金制成，摆在白色大理石底座上。如果适逢伯爵夫人想用点点心，那么在餐厅的食具架上便摆着一套精美的银餐具，它们是五只银盘、四只银盐盅、一个镀金的银芥茉瓶、十二把银勺和三十六把银叉。所有这些餐具都刻上了巴尔扎克·德·昂特拉格的标记。他在法国歌剧院定了一个包厢，在“意大利人”歌剧院也定了一个包厢，还搞到一辆双座四轮轿式马车，雇了一名穿号衣的车夫。他还买了一支十分名贵的手杖，上面有一个硕大的纯金柱头，柱头上布满了松绿宝石。肯定，他一拿出来便会引起轰动。这支手杖就花了七百法郎。为了试验一下这些精美的陈设会产生什么效果，巴尔扎克便邀请了一些客人来赴晚宴。来宾中除了“住在地狱似的破房子里的几只饿狼”之外，还有维克多·博昂、查理·诺迪埃和罗西尼。罗西尼是位酒肉皇帝，他断言就是在王公贵族家里也从未见到过这样的稀世花卉，没有品尝过如此精美的佳肴、如此香醇的美酒。那么可以恭候伯爵夫人的大驾光临了。

然而光临的却是那些债主。他们来得那样多，提出的要求又是那样无礼，使得他简直无法在这里再住下去。为了逃避这些麻烦事，巴尔扎克只好隐姓埋名，换了职业，成为J-B·梅热职业医生，在夏约的一条僻静的街道上，在一幢无人居住的楼房的三层楼上，租了一间寓所。房租每季一百七十五法郎。这是一处名副其实的“老鼠窝”：房间里没有家具，墙壁也破败不堪，地板踩上去就会晃动不止。但是，作为一间卧室，巴尔扎克完全可以在弯弯曲曲的走廊尽头架上一张铁床就可以了。然而，这样做尽管对他本人来说无关紧要，可这位假医生梅热出于接待伯爵夫人的需要，还是去找了一位并不相识的地毯商，张罗着把一间原是顶楼的大房间

改成了接待这位贵妇人的客厅：四面墙壁上有玫瑰色的贝克林纱，外面加上一层搞成褶裥状的薄花布。在房间里那块环形的凹进去的地方正好摆上一张很大的白色长沙发，上面放着十二块缀有红、黑色丝穗的小靠垫。至于座椅，则有一张“写作时用的安乐椅”和一把罩着白色美利奴绒的中世纪的扶手椅。这位冒牌医生就在这种戏剧式的布置中，在一盏吊灯和两盏烛台灯的映照下，神气活现地踱来踱去。他穿着一件闪光缎作衬里的白色开司米长睡衣，腰间系着一根丝带，睡衣脱下来正好盖在也是白色开司米的睡裤上。巴尔扎克对此深为自豪。他说：“我的白睡衣只有在我的玫瑰色的客厅里才显出它的全部价值。在这间客厅里摆着我出色的白沙发。它是我为接待一位上流社会的贵夫人而特意定做的。应当为她准备一件称心的家具，而她对它并没有感到不满意……。”

他之所以这样说，因为维斯贡蒂夫人到底还是来了，不过她的光临竟晚了十个月。这十个月正是她的这位求爱者省吃俭用靠着赊购来把一间破屋子改造成豪华客厅的时间。和伯爵夫人进行交往的这段浪漫史，并非是这位小说家传奇般的生涯中最不惹人注目的一章。对他经历的各种事件以及这一桩风流公案的经过，今天大家了解得已经非常之清楚了，那是得力于洛文儒尔先生收藏的浩瀚的资料，又由阿里贡先生非常生动地形诸笔墨才能如此。阿里贡先生在书中对巴尔扎克私生活的描写，即使是巴尔扎克先生，看了都可能为之惊愕。因为关于他自己的某些情况，就是他本人也从未了解得这样清楚。从这些书里，我们可以窥见这位生活没有条理、挥霍浪费无度的大人物，是如何同时又和社会灾难进行着不懈的斗争的内情。奇怪的是，在暗礁密布中航行的竟是伟大的巴尔扎克。在长期的颠沛流离的苦痛之中，使他没有

片刻安静的时间和思考的余地，但他都构思并写出了象《幽谷百合》、《幻灭》、《老姑娘》、《高老头》……等不朽名著。写作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件附带的工作，他把最宝贵的时间和心思都用在如何摆脱那些逼债者上去。由于他手腕灵活，再加上四处搬家，居然躲过了这些人的追逼。因此，他便真的自以为是个百万富翁了。更有甚者，正是他，竟能让自己的朋友维斯贡蒂一家人对此深信不疑。伯爵夫人已完全倾心于他；而她的丈夫，这个整天只知道对付药瓶子的怪人，也为自己有这么一个机灵人作朋友而感到荣幸，并且委托他到意大利的都灵去处理一桩从前遗留下的有争议的遗产继承权问题。巴尔扎克十分自信地动身了，可是他既不懂意大利语、也不懂这个国家的司法惯例。一位漂亮的太太（并不是伯爵夫人）女扮男装，当他的伙计，和他一起前往。他无所顾忌地带着她周旋于意大利的上流社会。在旅行期间，他的身份是巴尔扎克伯爵或巴尔扎克侯爵。他的行李都打上了王冠的印记。如果他那些出身于小市民的祖先能亲眼看到这一切，一定会大吃一惊。他成功地完成了这次使命并返回巴黎。他在巴黎仍然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他身上虽然不名一文，可仍然花天酒地。他买下了一家杂志，亲自出马担任主编，指望能和布洛兹争个高下，结果负债累累而倒闭。由于走投无路，并受到同业公会约束的威胁，他终于撒手不干，成了一个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他这种贫困潦倒的处境使全巴黎议论纷纷。然而他依然坚信，自己不久将会发财！在意大利时，他就听说过在撒丁岛^①有一处自普尼战争^②以

① 属意大利。——译者

② 指公元前三世纪至二世纪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发生的三次战争。
——译者

后一直被人遗忘了的银矿。他一直准备将来经营这一未开采的财富，这样便可以奠定他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他还渴望进入官场，雄心勃勃地梦想参与国家的财政管理，这样一来他就会成为议员了。因为有人警告他，如果选举事宜一旦公诸于世，那么他的债主们便会重新找上门来。于是巴尔扎克便不得不放弃谋求同胞们对自己的支持。不过这倒是成全了他，因为他后来发表了许多杰作，从而使他在法国文坛上得以和雨果及其他名家并驾齐驱。但目前无论如何，他必须有处住所：几个月来，他一直躲在香榭丽舍大街维斯贡蒂的公寓中。他向往住到乡下去，并在维尔—达弗雷镇的森林边上买了一块地皮，盖了一幢房子，住下来了。可他的行踪还是很快被人发现了。于是，在得知那些人要登门索债的时候，他便让人匆匆忙忙地把家具搬进旁边的小屋里堆放起来。债主们来到时，在这间屋子里所见的只有一张寒酸的行军床和几把草垫椅子。在这里是无法安生的。幸好撒丁岛的丰富的银矿还在吸引着他。巴尔扎克眼前似乎已经看到一支船队从遥远的大海的彼岸给他载来了不计其数的百万财宝。于是向“在他身边所有的人”借够了钱之后，他便于1838年春出发了。他坐在驿车的顶层赶到了马赛，并且从那里启程到达科西嘉，然后又坐上一条渔船走了五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那里他租了一匹马，在撒丁岛上的丛林里漫无目的地游荡，最后总算发现了“他的”那处矿藏……不过，它的开采权已在不久前由意大利政府卖给一位热那亚的工程师了。其实，这件事巴尔扎克从巴黎通过信函本来就可以知道这一切的，但他竟没想到这一层。

可能某些头脑冷静的读者，在阅读《人间喜剧》时，会察觉到作者这种庸俗思想。尽管巴尔扎克有着各种不切实际

的空想，但他这种天真而稚气的思想却得到了人们的谅解，因而他仍然不失为一位受到大家热烈欢迎的作家。这种情况也只能是一种例外吧！在当时社会上有许多阻碍，这些阻碍压抑了许多优秀作品，独有巴尔扎克给我们留下的浩瀚的名篇巨著却得到赞扬，并达到惊人的程度。在这位伟人身上我们看到他以怎样超人的勇气创造了奇迹，他的才华又是怎样的使人惊奇！他同时周旋于三个情妇（远方的未婚妻还不在于其内）之间。他在被债主们逼得无地容身的情况下，为筹措去撒丁岛的长途旅费，仅用了三个星期就写出了《恺撒·彼罗多》，然后又重新修改了十七次，才得到两千法郎，可这么一点钱还是立即被一个狠心的债主给夺走了。

14. 名喜剧演员艾丽赛特

她于1820年8月6日诞生于巴黎，名叫玛丽·朱斯蒂娜，父母皮洛依先生和太太在圣·德尼大街经营一家首饰店。

皮洛依太太是拿破仑一世时唱经班指挥的女儿，这位指挥名叫艾蒂安·奥基，当时人称“巴松管皇帝”。（多么出色的家谱！）他与葡萄牙王后的一位陪妇结婚，该王后即摄政王唐·拜得罗的妻子。这位陪妇的名字十分简单，就叫杜邦小姐。但她和莫普家族和蒙莫朗西家族又联了姻。由于这一层关系，小朱斯蒂娜就上不得“正史”，但这对她来说是无所谓的。

十二岁上，她就已出落得如花似玉。由于她的天生丽

质，在刺绣厂当学徒时，老板就对她格外的青眼相加；但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对此并不蒙有丝毫的感化，于是她被认为薄情寡义，不知报答，便被粗暴地辞退了。她到里昂的一个商店当店员，从此这个商店便门庭若市，生意特别兴隆。每天都是顾客盈门，有些人竟向她送鲜花和糖果。便是在店前来往的行人也被她的绝色吸引得踟蹰不前，留连忘返。她生了病，一位医生给她治愈以后，向她提出结婚要求，但她不愿生活在外地，便又回到巴黎，在一个旅馆里当女工，住在贝尔维尔区小山岗上的一间顶楼里。这时她已十八岁。不久便成了这一地区的名人，凡是碰到她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被她的花容月貌搞得神魂颠倒。只要她一出门，人们便如众星捧月般跟随左右，使她往往不得不躲进店铺里去以摆脱那些使她疲于应付的恭维。一位大学生向她求婚了，而她也确乎觉得一个人生活过于孤单，便答应了他。但这位青年的父母不同意他们结合，并把她的恋人召回外省。这时玛丽·朱斯蒂娜明白了，光凭容貌是不行的，尽管她“娇艳如此”，也还是无济于事。同时也明白了，她目前这种刻板的、平民式的生活也并不是她最后的归宿。于是她开始放任自己，以等待奇遇的到来。

第一次艳史中的男主角是和她邂逅相遇的一位喜剧演员，名叫布兰多。玛丽对他一见钟情，于是两人便山盟海誓永远相爱，海枯石烂永不分离。布兰多教给她一点演戏的常识，她又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在十九岁那年她便登上尚特莱纳大厅的舞台。为不使“皮洛依”这个名字受到牵连，她在海报上取名艾丽斯·奥基。她的先人当年吹巴松管时就是这个名字并且颇享盛誉。而如今，一颗同名的新星又在戏剧界上空升起。六个月后，这位喜剧新手便加入了杂耍剧院，

月薪一千二百法郎。对她可谓时来运转，人财两全了。

不久，观众们便迷上了这位脂粉娇娃。她“台词”念得很好，唱起歌来诙谐幽默。但这仅是她身价大隆的最小因素，其真价值则在于，她身材修长，苗条动人，体态优美：在一头浓密的秀发下，一张俏脸眉目传情，并且憨态可掬，黛色的双眸晶莹透彻，一张嘴巴艳若桃花，回眸一笑千娇百媚，浑圆的双臂充满活力，一双玉手秀美异常。这就是1840年出现在“狂热的崇拜者”们中间的艾丽斯·奥基。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连当时《箴言报》最严厉的批评家索瓦热先生也变得很有人情味了，他预言，这位年轻的演员如果在喜剧中扮演侍女，必将前程万里。

唯独那些演技高超的女同事们时有贬词，她们无法否认这位新手的美丽和天才，便好心地说她太蠢。据可以随便出入于后台并了解个中复杂权术的阔人说，这是嫉妒别人的人惯用的手法，这种战术今天仍在通用。就这样，人们笑容满面地讲述着艾丽斯·奥基的蠢事。当她从一位善开玩笑的人那里得知，政府刚刚在蒙马尔特发现了一个矿，对这个矿的开采，不但可以保证土地所有者发大财，而且还能解决穷人的生计问题。她听到后马上便向大家声明，要求优先认购这个矿的股票！……还有人说，一天下午这位天真的喜剧演员来到排演场时，发现维叶诺大街上铺满了麦秸。她感到十分奇怪，便问是怎么回事。一个女同事向她解释说：“那是为了在排练时不使来往的车辆声影响我们。”艾丽斯对此十分感动，她于是便找到舞台监督，对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示感谢，从而弄得这位监督目瞪口呆。

新鲜玩艺儿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向年轻的姑娘们脑子里跑。有一天，大家不再开玩笑了，“这个小家伙，亲爱的，你

能相信吗？”她们互相耳语并且暗中传播着艾丽斯新交上的那位男朋友的名字。这个名字金光灿烂，比所有的名字都漂亮……

一点不假，艾丽斯·奥基果真随着杂耍剧院的演出团到杜伊勒丽宫演喜剧去了。有一位王子，他是国王的亲儿子，被她那翩翩的情影所打动，很有说服力地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情”。这位王子便是奥马尔公爵，十九岁的老兵，他刚从非洲凯旋归来，并为此而踌躇满志……艾丽斯是他的第一个情人。他向她讲述自己所参加的战斗，谈论他的士兵，谈论他们如何英勇善战，也谈论他们如何疲惫不堪。他对她讲比若将军，讲阿拉伯人，讲军营生活，讲战斗故事，讲非洲战鼓，也讲阿卜杜勒—卡德尔。他给她唱《克拉杜加》歌，同时也温情脉脉地开导她：“你要知道，我的小艾丽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对宗教的虔诚以外便是个人的贞操，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艾丽斯当时住在拉斐特大街的“黄金旅馆”，有人经常看到她在暮色苍茫中同她的“王子”在大街上漫步。她身穿男式服装，那些本份的普通居民看到她手挽着当时已很有名气的奥马尔公爵的手臂，都把她当成年轻的蒙庞西埃公爵，并对那位开明君主路易—菲力普的儿子能够相处得如此亲密无间投以羡慕的目光。

在她的男友奥马尔心目中，艾丽斯有一个情敌，这便是他所率领的第十七轻骑兵团。该团驻防在库博瓦。奥马尔公爵把这位漂亮的姑娘带到军营内部并让她乔装改扮以后，藏在四轮轿车里边和他一起巡视部队或参加阅兵式——就象从前曼特努太太藏在他轿车的后窗下那样。有一件事却使这位年轻的上校百思而不得其解，这就是他的艾丽赛特^①竟能眼

① 艾丽斯的爱称。——译者

看着军旗在她面前走过而无动于衷……

这并不是他们甜蜜生活中的唯一阴影。奥马尔公爵家资巨富，但由于国王是“在艰辛中”长大的，他要把收入积蓄下来用以维修他的宫掖，因此王族子女每月只有三千法郎的私人用度。这点钱只够这位皓齿红颜的前刺绣女工一次简单的旅行费用。温顺善良的艾梅丽王后只有私下里叹息着儿子的这一艳遇，雨担心怕因此引起轩然大波。果然，他和艾丽斯的私通让王族人们知道了，这就引起各位王子的极大的快意；他们给这位王兄起了个绰号，叫“雷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雷波是《魔鬼罗伯特》中的一个角色，其中主要歌曲的歌词有这样的句子：“艾丽斯，艾丽斯，我的情人……”

俗话说，人往哪边歪便往哪边倒。从这一意义上讲，小奥基的贞操便有点风雨飘摇的危险了，因为她同时向好几个方面歪。有一天晚上，在剧院散场时，在演员室的门口她看见一辆华丽的四轮大马车，车辕上两匹价值两万法郎的骏马昂首蹬蹄。她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这辆华车，当时该车的跟班象一位外交官一样彬彬有礼、必恭必敬地走到她面前深施一礼，并非常礼貌地为她打开车门。处于万分惊讶状态的艾丽斯以为自己是在作梦，如同贝洛小说中描写的桑德利荣登上神话中的华丽马车一样，她也不由自主地登上这驾马车。这就是富可敌国的路易—菲力普的银行老板的儿子佩雷格为向艾丽斯求爱所演出的一幕风流喜剧。

时代确实变了。一个王子，尽管他非常英俊并且一往情深，在情场上也不足以和一位亿万富翁一较短长。奥马尔公爵为自己所钟爱的艾丽赛特的不忠而伤心落泪。国王却借此机会提升他为旅长并把他派到他那些可爱的在非洲的年轻士

兵中去。这位青年军人很快便摆脱了这一苦恼。四年以后，当他结婚时并没有邀请奥基参加，但她却主动地把他写的所有情书都退还给他。王子当时手头已颇充裕，觉得对她这一正直之举应当表示谢意，便送给她一笔款子。略带忧伤的艾丽赛特拒绝接受，把钱全部退回，只写了一句话：“我更珍惜的是对往昔的回忆。”

很显然，就是在今天，这种满篇温情脉脉的艳史仍然不断地对历史学家和艺术家有着可以宽容的影响，更何况在这篇略嫌轻浮的专栏史料中牵连着多少哀怨动人的柏拉图式的，或者其他类型的求爱者呢！他们当中就有泰奥菲尔·戈蒂埃·夏斯里奥，亚历山大·仲马，男高音歌唱家盖依马尔，雕刻家普雷奥特，还有维克多·雨果和他的儿子查理。但父亲却是被儿子战败的情敌，因为和这位伟大诗人的荣誉相比，艾丽赛特却更喜欢那位年方二十的大学生。

查理·雨果并不富有，他只能向他的所爱奉献他的情诗。对这种连篇的空话，他表现得格外慷慨。但这些诗作的某些篇章，也不无精采之处。

手 套

当你的纤手伸向其中，
它便深感受宠若惊：
“这不是自我陶醉，
在小物件中，
我可称得上得意春风。”

尽管它说得不确，
但还是值得同情。
因为它孤陋无知，
不知道除它以外，
还有你那双红绫。

闭月羞花的艾丽斯，有时也颇为这位恋人感到脸红，因为他写了大量的诗作而较为出色的却少得可怜。特别是他头上老是戴着一顶老式的棕色破帽，这令她十分难堪。她把这桩心事告诉了戈蒂埃。戈蒂埃决心帮她摆脱这种尴尬局面。他们事先商议好，在某一天晚上，待她在客厅里接待那些成群结队慕名而来的拜访者时，把那顶帽子事先放在准备好的一张椅子上，让这位高度近视的《景泰蓝和雕玉》^①诗集的作者戈蒂埃假作不小心坐在上面，那时便可借此机会叫人马上到附近的鞋帽商店去买一顶新的。到了约定的时间，戈蒂埃进来了，他看准了放在一张靠背椅上的帽子，便十分认真地坐了下去。他感到十分不对劲！原来这是一顶全新的高顶大礼帽，是一位傲慢的英国绅士放在那儿的，此人脾气暴躁，并为此颇有愠色。不消说，查理·雨果依旧戴着他那顶破帽子。

可能就因为这顶旧式礼帽使他们的关系破裂了。他们共同在这种温柔恬静的爱情中过了三个月或者四个月，艾丽斯变得十分爱生气了。有一天，她向查理表示，他给她精神上带来了烦恼。对此他提出异议，她便更进一步说，他是在纠缠她。于是查理便愤然出走，但随后他又写了一封词恳情切的请求宽恕的信，但却毫无反响，在失望之余，他终于离开

^① 一译作《珺琅和雕玉》。——译者

了她。而她也没有再请他回来。天下的美人都有一颗冷酷的心。因此，第一个称她们是“可爱的老虎”的人确实找到了一个十分贴切的字眼，尽管是说笑话。幸而她们的“虎爪”造成的不是肉体上真正的创伤，而查理·雨果也便很快地摆脱了这一苦恼。此后，艾丽赛特也便开始急流勇退，因为她已到了应该退步抽身的年龄，那种恣睢浪漫、见异思迁的爱情生涯，对于三十五岁的人来说，已经稍嫌过老了。彬彬有礼，眉目传情，热烈的亲吻，这便是她爱情的三部曲。现在，一切风流韵事均已成为过去。

为什么当她过着舒适而平静的生活，结束了往昔的那种生活方式却被认为是凄凉呢？渐渐地，一种恬静安适的生活在她周围形成了。夏季她住在昂伊安湖畔漂亮的别墅里，冬天她则住进巴黎乌斯曼大街上的一套宽敞的住宅里。她又重新使用原来的真名，于是又成了皮洛依太太。她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流连于往昔的纪念品中。她沉思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那架大时钟上，时钟面上的装饰画是居斯塔夫·多雷画的，他是她最后的一个情人。因之，这幅画作为苦痛的象征，代表了热恋时代的破灭。1870年战争以后，奥马尔公爵回到法国，仍然忠于他二十岁时所崇拜的名星，经常来看望年老的皮洛依太太。一天，她接到一封短笺，上面写道：“星期一下午四至六时，昔日的‘雷波’将前往问候昔日的艾丽赛特。”他们手捧一杯清茶谈论着往事。在元旦那天，公爵向这位年老的女友祝贺，并送她一篮桔可酒。

艾丽赛特为修改她财产分配的遗嘱花去大量的时间，意在给热恋过她的人每人都留下一份纪念。但她得到的却是一个个相继去世的噩耗。几乎每个月她都不得不把已封好的信封重新拆开，以便另行分配每人应得的一份，因为这些人已

经作古了。她在写完最后一封遗书后，于1893年3月4日离世。

15. 茶花女的秘密

自人类进入文明世界以来，沦落在花街柳巷的青楼美女比比皆是。然而，当你打开这一部风流史册来看看时，你便会发现，茶花女阿尔芳西娜·普莱西在其中占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地位。她那温柔而忧郁的回眸一笑，使得诗人们为之倾倒的美女尼农·德·朗克洛和马里翁·德洛尔姆，使得后来由一个客店女佣变成了利什唐斯坦^①王妃的罗萨利·莱昂，使得几乎成为女皇的玛格丽特·贝朗热，使得曾统治过巴伐利亚的洛拉·孟泰斯，使得无耻而放荡的拉·帕瓦和科拉·佩尔，莫加多尔，帕马雷，克拉拉·封丹，以及宫廷舞会上所有的脂粉娇娃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并因此而使得整个巴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竟达四、五年之久。也许只有多情而又放荡的玛依可以和她争个一日之长。然而，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她的出名得力于普雷沃教士^②的小说，更靠了马斯内^③

① 利什唐斯坦：1719年建立起来的中欧一个独立小公国，位于瑞士和奥地利之间——译者

② 普雷沃教士：全名普雷沃·德克西尔（1697—1763），法国作家。写过很多描写道德的小说和惊险小说。《玛依·莱斯科》是他们写的心理分析小说的杰作之一。——译者

③ 马斯内：全名于勒·马斯内（1842—1912），法国作曲家，歌剧《玛依》的乐曲就是他谱写的。——译者

的歌剧。不错，亚历山大·仲马对阿尔芳西娜·普莱西的成名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早在她成为一部著名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和一出经久上演而盛况不衰的戏剧里的女主角之前，就以其非凡的美貌而名噪一时了。这种神奇的力量，不借助于文学手段，也自己显露了出来，并且还将长久存在下去，而茶花女也仍将有自己的情人。若阿纳·格罗写的关于她的那本专著，内容翔实，丰富而生动，有如一只百宝箱，应有尽有。

这本书所写的，是根据真实的资料所披露的关于这位迷人的姑娘所经历的曲折离奇的故事。父亲马兰·普莱西是诺曼府的一个农民。他一贫如洗，性格古怪，脾气暴躁，心肠狠毒，生活放荡。他除了有时干干流动贩货的小贩以外，没有任何正式职业，而当小贩也只不过是因可以有机会到乡下去寻花问柳和宿小酒馆。他住在诺南村，那一带人都称他为“能钻营的马兰”。母亲原是一位正直而又美丽的姑娘，她被马兰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便和他结了婚，可是，几年之后，她便不得不离开这个粗暴的丈夫。她来到一个有钱的旅法英国女人家里当女仆。临行前，她把两个小女儿委托给亲戚抚养。阿尔芳西娜便这样整日在田野上，没有人管教和拘束，在一群农庄的野小伙子们中间长大了。后来，她便跟上了一伙到处作流浪演出的艺人，这些人把她带到巴黎，随后便不要她了，当时她年仅十四。

德·埃居大街的一个蔬菜商人收留她当了打杂女工。她当时简直就是一个未开化的野人；穿一身破衣，蹬一双木屐，胆小如鼠，温驯如羊。她怕鬼魂，怕妖怪，怕传说中的狼人，她是个完全的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但是，三年之后，每当剧院上演新剧，她总是坐在出身

法兰西名门望族的一位年轻公爵的包厢里。她成了巴黎最受人称赞最漂亮而又最精明的女性。巴黎的贵妇人们对她仪态气度的高雅，衣着款式的人时，贵妇名媛的风度，以及她的举止得当，进退有节，无不啧啧称羨。巴黎社交界名声最隆，自然也是头衔最高，堪称巴黎人表率的那些名人显贵们，都以能到她家作客为荣，著名的艺术家唯她的兴趣是从，著名的作家则以听她的谈话为享受。她不仅博览群书，而且还懂音乐。她写的书信，无论就拼写和文体方面，都无可指责。人们常常在布瓦或圣·日尔曼^①看见她象一个大无畏的骑士率领着一群崇拜者。是什么奇迹使她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三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此人们很少知情。内斯托·罗克普朗说：“不久以前，他曾在新建桥上见过这位光彩照人的美女，然而那时的她还非常不幸，饿得几乎要死，出于怜悯，他还给她买了一小袋油炸土豆。”于勒·雅南只知道说：“她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难解之谜。”确实，人们宁愿不知道这一切为好，因为他们深深地被她超群的美色，优美的仪态和受人称赞的性格所迷住了。阿尔芳西娜改换了姓氏，改为玛丽—迪普莱西。这位玛丽—迪普莱西没有一个敌人。她受到大家一致的喜爱。她永远不会让人破产、丢丑、赌博、负债或决斗，而这些正是许多别的女人做出来借以赶时髦的事。在她身上，有的是乐善好施、友谊亲善和大公无私。传说她有很多（可以说是一大批）情人……。但这些人都是她的朋友并以此而自豪。

她绝不贪图金钱，但她奢侈的生活和豪华的陈设却引起了物议。在此，我们必须抛开那些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先人们喜欢炫耀的一大堆数字，以免把现代人的头脑

^① 布瓦和圣·日尔曼：巴黎附近的两个地名。——译者

搅昏。想象一下吧，据说，玛丽·迪普莱西每年花六万法郎，这一不确实的数字令人难以置信。她住在拉·玛德莱娜大道十一号（即今天的十五号）的一幢房子里。这幢房子，自那时以来，一直没有改变（当然，毫无疑问，这不包括租金在内的）。她住的是租金为三千二百法郎的中二楼，五个窗子朝着大街。这里被人们说得天花乱坠：宽敞的前厅，挂着带框子的壁毯，框子上插着白色的茶花，还有餐厅、大客厅、小客厅和一间大的卧室，卧室凹间的床前挂着玫瑰色的丝绒幔帐，另外还有一些房间，陈列着艺术品和珍贵的小摆设。在这个布置得十分和谐的小天地里，那位“能钻营的马兰”的女儿几乎每天晚上看完剧后都在这里招待客人吃夜宵。她总是那样迷人，面带笑容，和蔼可亲，俏丽无比，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灵活而温柔，惊异中几乎还带点惶恐的眼神里“时而充满了天真和稚气，时而充满了使人难以捉摸的寻求”，两道娥眉，奇美异常，“宛如画在额上一般”一头浓密、乌黑的长发上饰着许多钻石并插着鲜花。珠光宝气的首饰下面，便是那张娇小妖嬈的俏脸。鼻子的“轮廓清晰、明快、纤巧玲珑”。体态娇小，婀娜多姿，其“高雅的举止和体形充分显示出她是一位贵妇人”……于勒·雅南（他是位行家）非常欣赏这位天仙的谈话，曾说：“她的语言把悦耳的声音、娴熟的辞令和丰富的想象溶于一体。”下面便是他在和她会见后对自己印象的概括：“她举止与谈吐十分协调，流盼的目光和迷人的嫣笑配合得非常得体，她的打扮和自己的身分又极为相称，象这样一位把打扮、衣着和举止谈吐处理得如此和谐而又如此美观的女人，便是在上流社会的名媛淑女中也难以找到。”这便是三年巴黎生活在这个无知、愚昧而笨拙的乡村小女孩身上所创造的奇迹。年方二十，她

便已进入红极一时的极盛时期，在她周围，有的是羡慕的眼光，奉承的语言，大家喜爱她，恭维她，她应该是幸福的。

然而在这些表现的后面，都掩盖着令人可怕的现实。在玛丽·迪普莱西的心灵深处，一种无法治愈的隐密的创伤在流血：亚历山大·仲马发现了这一点。英俊而又潇洒的小仲马，又加上他有一个非常显赫的爸爸，于是便也混入这样一个经常与玛丽·迪普莱西交往的社会圈子里来。这个圈子主要人物是由一些无所事事，精于挥霍的人员组成的一个名叫“街头之狮”的团体，这个团体因而一直被人们所嫉妒。小仲马的加入与其说是喜欢此道，倒不如说被好奇心所诱的成分更多。一天晚上，他被带到迪普莱西家里吃夜宵。他发现，几杯香槟下肚以后，玛丽的神态由欢快转为和她端庄、漂亮的脸庞极不相称的放纵了。正当这位年轻人在“为一个从内心到外表都完美无暇、端庄漂亮的姑娘竟会突然有如此的表现而感到痛心”时，一阵剧烈的咳嗽迫使这位楚楚动人的青楼女子不得不起身离席，走入她的盥洗室。小仲马身不由己地跟了进去。只见她歪在一个大靠背椅上，面色苍白，半张着嘴，正艰难地喘着气。桌上有一满盆水，水里布满了血丝……。仲马非常激动，一把抓住了可怜姑娘的手，这时隔壁房间里，客人们继续大声喧笑。小仲马尽管用温情的声音和尊重对方的语言来安慰并鼓励她，直到那时为止，玛丽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出自肺腑的软语温言，因而对他产生了信赖，并向这个高大的年轻人倾吐了她生活中不为人所知的悲剧，倾吐了她对自己身体日趋衰弱的不安和恐慌，倾吐了她对自己失去的贞洁的无限悔恨。谁还能不理解这两个二十岁的孩子的谈话呢？当在小说中读到或在舞台上听到这些对话时，又有谁能不因此而受感动并产生怜悯之情呢？小仲

马后来证实，他所写的故事是“绝对真实的”。

只要浪子回头，被赶出天堂的天使毕竟还是天使。这是为许多阅世未深的青年们所非常崇拜的说法。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便渐渐地对这句名言产生了怀疑，几乎不太相信这种颇带伤感和具有刺激性的反常事件能有多少实现的可能。然而，玛丽·迪普莱西的情况却恰是如此。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对她“天真无邪的目光和天使般的面庞”感到惊讶，而对她生活的放荡不羁表示难以置信。即使最看破红尘的人对她的悲剧也不能无动于衷。她“厌倦了羞辱的生活，正在用自我摧残的办法来结束它”。这便是她之所以能使其同时代人着迷的原因所在，而其魅力竟能持续得如此之长，也实在有点令人奇怪。保罗·德·圣-维克多曾看到她“在欢乐的舞会上竭力让自己力尽筋疲以加速死期的到达”。她的疯狂而又衰竭的举止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是1846年8月一个晚会上的见闻。一曲华尔兹使玛丽突然从疲惫中振奋，她从扶手椅中跳起来，挽住一个舞伴的胳膊，跳了起来。她跳了很久，激动而狂热，她拖着衰弱无力的身躯，飘飘然，昏昏然，任其所之。人们猜想，她已下定决心，“只求速死，以与这种羁绊她的欢乐场面一刀两段”。

六个月后，她死了，年仅二十三岁。生前好友无数，死后却只有两个人，不顾路人的嘲笑，护送摆满白色花圈的灵车直到拉·玛德莱娜教堂。

16. 浪漫派作家旅行记

有谁能够使我们重新领略一番从前那种富有情趣的旅店生活呢？院子里鸡鸭咯咯地叫着，草料棚里散发着麦秸的香味，厨房里的铜炊具擦得光亮耀眼，客房虽用石灰刷成，但却四白落地，干干净净。特别是好客的女主人，以她诚恳的态度和殷勤的招待，竟能使过往的客人感到，只有他自己才是受到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的唯一旅客。这正如朱贝尔讲的那句极富哲理的话：“未来的美好岁月决不同于往昔的美好岁月。”

第一个标志，便是我们的先人对旅馆招牌的爱好，他们偏爱那些最简单而又最朴实无华的招牌。最常见的，便是他们喜欢用一种禽兽来为自己的旅馆命名，诸如“鹿”，“山鸡”，“雄鹰”，“狮子”，特别是“马”；尤其奇怪的是，如果我没弄错的话，白马却不太受欢迎。也可能有一天有人会听说在某地有一个旅馆名叫“兔子”，叫“鸡”，叫“猫”或者叫“狗”（既然如此，“狗”便没有理由排斥在外）。走遍法兰西所有的城市，你也许有可能会遇到一个旅馆名叫“金狮”或者叫“白马”，甚至可能会遇到一个名叫“金苹果”的旅馆，但却从没见到有叫“梨子旅馆”的，而“葡萄旅馆”也非常罕见，这在我们这个盛产葡萄的国度里，是令人不太理解的。在德国，以“葡萄”作记的旅馆比比皆是。有相当一部分旅馆就叫“英吉利旅馆”，甚至比较讲究的旅馆则叫

“王家旅馆”，或叫“英国王后旅馆”，这些名称都是意在招徕英国顾客，因为它是世界上在外侨居最多的民族。有时你甚至还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两个大旅馆原来争强比胜，待到它们合并以后，老板竟太不敬地挂出“白马和英国王后联合旅馆”的招牌。总之这些旅馆的招牌由于地区不同，时代不同而名称各异。如果谁有志于写一本《旅馆名称录索引》的话，毫无疑问，那将是一件关于人种志的饶有趣味的工作。

读者诸君，下面便是浪漫派作家旅行记。首先要记的是行囊。大抵都是简陋的。其中最讲究的，也不过是一个白木旅行箱，外形有点鼓起，包一层猪皮，而且明显地带着没拔净的猪毛。此外还带着些有点过时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旅行袋是皮埃尔·戈迪罗所发明，时间是1826年，很流行了一阵子。它颇象今天邮局装信件的大袋子。有钱的阔佬多用这种料子作壁衣或用它铺地，这种风气当时非常时髦。这种旅行袋的口沿上有许多小洞，用绳子把这些洞穿起来，一拉就可以合拢。这些旅行家的衣着和他们的行囊一样，同样使人感到有点寒酸。他们带的仅仅是必不可少的衣物，但对此却非常知足。女旅行家们也并不工于打扮。这便是为什么第一个登上勃朗峰的女性在完成这一了不起的壮举时穿的只是一条带拖摆的长裙，一件苏格兰皮上衣，头戴一顶火枪手戴的大帽子。比阿尔夫人是画家的妻子，由于一次偶然的事件竟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以致国王路易-菲力普不得不出面干涉，以避免事态继续扩大，但却因此使她丈夫名噪一时。她一直到达了北冰洋上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仍然是她在隆香跑马场散步时的那身打扮。她就穿着这身与众不同的衣着，面带微笑，摆好姿势，坐在常年不化的雪地中的一个冰块上叫她丈夫画像。

乔治桑^①是最不拘小节的了，她“是一个动作举止都象农民模样的人，身穿一件紧腰衫，戴一顶破毡帽，穿一件半旧的长裤，一双钉着粗钉的大皮鞋，背上挎着一只白铁水壶”。试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形象？她绝不是那种忸怩作态的女人；旅店里的侍者对这个“小伙子”衣着如此破旧大为惊异，她却坐在饭桌上若无其事地吸着烟斗。至于她是不是和缪塞^②、李斯特还是和桑多在一起，傲慢的官方舆论并不因此有所改变，即认为他们都是些江湖骗子。巴尔扎克的行装在这方面也绝非不使人惊诧。从巴黎到罗班松（仅仅八公里）“在他粗大的双腿上，从双脚到膝盖都裹上鞋罩，双肩背着一个大背包，旁边挂着一件雨衣以备下雨时用，一顶漆沿军帽遮住了他的头，一件上衣掩盖着里面皮带上插着的一对手枪。外加一把小斧头，手里还拿着一根包铁手杖”。相反，在1847年他去波兰时，只带着“一个轻便的手提篮，里面装着硬饼干，一条烧牛舌，浓咖啡，一些糖和一小瓶茴香酒”。这就是他全部行程的口粮。但这完全不表明他对那些珍馐美味看不上眼，下面便是他在王家宫殿里维力咖啡馆的一顿晚餐的菜单：百十个牡蛎，十二块清炖羊排，一个乳鸭烧萝卜，一对烤鹌鹑，一条诺曼第鳎鱼，还不算其他小吃和甜食，比如十二个甜酥梨，一些名酒，再加其他饮料及咖啡等……当时他一个人不声不响狼吞虎咽地把这些东西吃了个精光。这些精美丰富的食品价格竟高达六十二法郎，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竟引起了当时人的气愤。

不错，这确是“别开生面”的一次。因为巴尔扎克很有节制又并不富裕。他的那些同行们也并不比他更有钱（少数

① 法国女作家。——译者

②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译者

几个例外)，请看看这些人吧：诗人费利克斯·阿韦尔，他善作十四行诗，1841年去意大利时，他在奥克赛尔吃午饭只花了一个法郎，在波诺吃晚饭花了一法郎五十苏，在里昂住了一夜，一间屋的房费两个法郎，第二天一顿饭是一法郎三十五个苏。还有比这更便宜的，英国诗人汤姆·康拜尔先生和一位朋友、两个仆人下榻于布罗尼·索尔迈尔的一家旅馆，他们使用两间大卧室和一个“豪华”的客厅，加上膳食费，包括日常的午餐费、点心费和夜宵费，每月的费用，包括仆人的在内，是一百一十五法郎。两位旅行家就这么阔气地住在那里，每人每天平均不到两个法郎。在法国一顿饭的价格很少有超过二十个苏的时候。托菲在格勒诺布尔的阿尔卑斯山旅行时，带着二十三名中学生，每人每顿饭就是这个数目。巴黎的饭馆每餐二十三个苏便可吃到自点的四个菜，半瓶马孔葡萄酒，饭后还加点心，面包不限。隆弗罗在王子大街包了一所公寓，住了一年，伙食加房费每天六个法郎，并且每晚还有优美动听的室内音乐。他告诉他的家人说，生活费用很昂贵，并说，他要象上流社会的人那样生活，什么也要有，要尽情地搞个花样翻新。但是，我的上帝！他只打算花相当于六百个美金的法郎。这便是一个爱讲排场的人的预算。

但还有一件事是不可思议的。某一外地来的青年人，由于无知闯进了一家旅馆，那里的饭菜十分昂贵，进进出出的都是王公贵族或是俄国的公主们。饭菜做得精美绝伦，喝的是高级的名酒，当他酒意阑珊走出座位要求算帐时，竟要一百二十五个法郎！如果这样悠然自得、舒舒服服地住上两个月……但是，谁又能够在这样的旅馆里心安理得地住下去呢？

17. 普拉斯兰公爵夫人之死

在国家档案馆一个不对外开放的大厅尽头，有一个橱窗，里面陈列着一堆小玻璃药瓶，一张发了黄的床单，上面有许多锈红色的斑点，一条拉铃绳，一把猎刀，一把土耳其弯刀，两个长颈大肚的玻璃瓶，一把钥匙，一张1847年5月印制的火车时刻表，一本标题为《有教养的人》的小册子，一件揉成团的衬衣，一顶便帽，一顶希腊无边圆帽。这些东西便是1847年8月18日在圣·奥诺雷郊区塞巴斯蒂亚尼公寓起出的物证。那一天在该公寓发现了普拉斯兰公爵夫人的尸体。她全身被捅了三十刀。

普拉斯兰事件轰动一时，任何惨剧都无法与之相比。当法官们一到达圣·奥诺雷郊区的塞巴斯蒂亚尼公寓（该公寓的房屋现已拆除，只在埃利舍大街和加布里埃尔大道交汇的地方留下几棵大树，那是原来这个公寓的花园）。当法官们一到那儿，公爵夫人的侍从们便认定，刺杀公爵夫人的凶手便是他们的主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普拉斯兰公爵。自1841年以来，在他们两夫妻之间便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在那之前他们却相敬如宾。当时公爵家里来了一位二十三岁的家庭女教师，这位小姐名叫昂里埃特·德吕兹。她美丽动人，喜欢打扮，富有活力而且聪慧过人。她是属于连载小说中被冠以“媚人的女性”那一类。

没过多久，昂里埃特·德吕兹小姐便成了普拉斯兰公馆

里的女管家。公爵想她之所想，做她之要做，对她百依百顺，唯命是从。他带着孩子们和德吕兹小姐生活在一起，他们一道吃饭，一道外出，一道旅行，看起来他们简直就是一对夫妻。而公爵夫人则被冷落在一边独守空房。被妒火折磨着的公爵夫人在一篇日记中写出了自己的心声：“德……小姐独霸家庭，从未见过有如此霸道和可恶的女管家……我痛苦极了，我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

朋友们居中进行了调解。公爵夫人的父亲赛巴斯蒂亚尼元帅严厉地责备了他的女婿；最后商定，女管家离开公寓，另行找人时必须要有普拉斯兰夫人的出面认可，此事由公爵负责办理。当时他们夫妻间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又有哪些交涉，外人不得而知。但在清晨四时左右，从公爵夫人的卧室里发出的喊声惊动了大家，门铃声大作，男女仆人们闻声赶来，但各道房门都紧紧地关着。他们敲门，无人答应，于是便来到公爵住房的走廊里，这边的房门却洞开着，公爵夫人躺在地毯上，喉管已被割断，脸上、脖子上和胸部都是刀伤。普拉斯兰公爵显得有些精神失常，他顿足捶胸，悲痛欲绝，他走向尸体，双手放在死者鲜血淋漓的双肩上大声喊道：

“啊，可怜的妻子，可怜的妻子，这是哪个残忍的家伙干的啊？”随后人们又看见他双手抱头扑倒在床上抽泣着说：“可怜的孩子，这怎么对他们讲呢？他们再也没有母亲了。可怜的元帅，这又怎么对他说呢？”

由于他对此事涉有重大嫌疑，当天便被拘禁于贵族院议员监狱。该监狱由一座老修道院修缮而成，即今天的卢森堡博物馆旧址。头几庭审问，被告冷静地但却顽固地声称自己无罪。因为他是法兰西贵族院议员，此事将由国王亲审。但在他被捕的第六天，人们便听说，他刚刚死在监狱里。——

有人说他中了霍乱。

对于公爵死于监狱的传说，很少有人相信，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是路易一菲力普把普拉斯兰公爵送到外国去了。他改名换姓在英吉利住了很久，生活费用由他的孩子们慷慨相助。有人曾举他的仆人夏庞蒂埃作证，据说此人曾在伦敦见过公爵。还有人指名道姓地说，有那么一个人，认识公爵的女婿，曾听他女婿抱怨说，不得不按时“向这位混帐岳父”提供金钱。另外，在公爵被宣称死亡六年以后，公爵夫人的一位“年轻的侍者”曾肯定地说，有一次他竟出乎意料地认出了这位死而复生的旧主人。此外，巴黎律师团的一位律师罗比奈·德克莱先生（对于他的办事谨慎和工作能力是没有人怀疑的）有“完全确凿的证据，证明普拉斯兰公爵没有死，并由其家庭成员向其提供膳宿费用”。

卡巴奈斯医生在他的一份材料中研究了普拉斯兰公爵的情况，有许多资料证明，他是服了砒霜溶液而自杀身死，并且确实死在狱中。他并公布了当时内政大臣迪夏戴尔给国王的一份奏折，该奏折向国王报告了被告普拉斯兰死亡的事；同时他还公布了掌玺大臣帕基埃向贵族院议员法庭的报告，以及由奥尔菲拉、塔迪厄、鲁热、昂德拉尔、路易、夏耶等医生签名的尸体解剖记录，还有参加埋葬尸体人员的声明。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些无隙可击的文件，似乎很难继续相信这位高贵的议员当时还继续活着的说法，那么我们只好把这作为一个悬案列入神话传说之列了。要想弄清楚，就只能等待公爵的女儿们的婚约公之于世的那一天，那时如果她们中间某一位的婚约中有一款，规定须向一位不知名的神秘人物提供赡养费用，到那时，这一切便可重新研究。但现在是要要求公布这些婚约的时候吗？

至于那位“媚人的女性”德吕兹小姐，她在惨案发生后二十四小时以内便被逮捕，但几乎立即就被释放。她的美貌足以使人销魂。维克多·雨果曾讲过，有一天他和哲学家库赞以及圣·奥莱尔伯爵一起从法兰西学院出来，库赞对他说：“您瞧瞧这位德吕兹小姐吧，她简直是个尤物。她的书信可真是表达心灵的杰作，语言美极了……如果您听到有人说过这些话，您一定为之惊叹不已。其文笔之高雅，其叙述之得体，其条理之清楚，可以说无与伦比。如果有一天她愿意写给我们的话，我们肯定会给她颁发蒙蒂翁奖金。她既独断专行，又骄横跋扈，真是个既泼辣又迷人的女人。”雨果于是便对库赞说：“啊呀！原来如此，那么您是爱上她了？”他只回答了一个字：“哦！”

昂里埃特·德吕兹离开法国前往美国定居，在那里她和一位名叫亨利·费尔德的新教牧师结婚，他们美满地共同生活了二十四年之后，德吕兹于1875年3月5日去世。亨利·费尔德不满足于仅在自己的爱妻墓前树起一块墓碑，他还出了一本书来纪念她，书中搜集了她写给他的所有信件，所有和她有来往的名人写的悼念文章，以及她生前就拟出版的关于法兰西家庭生活的探讨。

我没见过这本书。但为了对家庭生活进行探讨，却使我们这位女英雄遭遇到一场如此的悲剧，这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18. 不眠之夜

(1848年2月23日至24日记事)

从1827年到1852年这一段时期内，如果巴黎上流社会的某一名门闺秀或是贵族的命妇，准备举行一次晚宴或者舞会，列入她客人名单上的第一位，便是罗得尔夫伯爵，并且要事先得到他“届时参加”的许诺方才放心。没有罗得尔夫伯爵，舞会便黯然失色，至少他自己是这样看；但那时这一概念似乎也根深蒂固地扎在绝大部分漂亮的仕女们心中。关于罗得尔夫·阿波尼伯爵，本书前文已经提到过，他当时是奥地利驻法使馆的随员。外交工作的内容之一，在当时，毫无疑问现在仍然如此，便是参加各种欢快的交际，这一内容的含义在罗得尔夫伯爵，便是邀请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跳舞，便是对名媛淑女们大献殷勤，便是组织家庭舞会，便是充当沙龙舞的领舞。为了更加取得女士们的欢心，他特别喜欢穿上匈牙利大公国君主的漂亮军服——红色的上衣，紧身的长裤，一走路便铃声乱响的长筒军靴，熊皮高顶军帽，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種綬带，军帽上高插鹭翎，宽大的镶边肩带，靴筒里插着镶金马刺。只这身打扮就能使他博得满堂喝彩声。他在这二十五年的岁月中表现出来的毅力是值得称道的。当他每天晚上进行了各种拜访活动，或是在外面参加了一次晚宴甚至两四处舞会，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来之后，便伏案执笔记下他的这些“业绩”。他的日记便是一部王朝

复辟的最后几年到第二帝国初建时期的巴黎社会生活的颇令人提神的编年史。

罗得尔夫伯爵非常喜欢巴黎，他也同样热爱法兰西。但他却是君主政体的拥护者，而各种形式的共和政体以及这些政府的一切不符合“合法的”君主政体的东西，就特别不对他的胃口。不过，作为一个非常得体的外交官，他则把自己的好恶深藏心底而不形于色；在贝利公爵夫人家里跳过舞后，他接着又去王后阿梅丽那里跳舞。尽管他的双腿不允许他对1830年的“篡权行为”提出抗议，可他的内心深处却对法国王室的标志百合花徽保持着最崇高的敬意。当路易—菲力普的宝座在一瞬间塌垮之后，罗得尔夫伯爵把这一垮台看作上帝的意志。无疑，作为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对于老王后和那些公主们的种种不幸是感到惋惜的，他曾辛苦地向这些公主们传授过瓜德利尔舞。作为一个波旁王朝正统派的支持者，他对当局所执行的坚定不移的对外重礼遇的方针也表示了相当的满意。他怀着一种与其说是同情，倒不如说是强烈的好奇心，于1848年2月23日晚9时半左右，带着他的雨伞走上大街，他要亲眼看一看，革命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那时奥地利使馆是圣·多米尼克大街上一幢漂亮的建筑物。它便是后来的沙岗旅馆，阳台正朝着巴黎我老军人院的那一片大空地。罗得尔夫伯爵穿过已被一小队步兵占领的布尔冬大厦前面的广场，河岸边冷落无人，但在协和广场上却聚集了许多军队和国民自卫队。在各条大街上，许多人好奇地到处游荡，男女老少都有。军队正在坐落在卡普辛大街拐角处的外交部前边修筑一条路障。这样，要想去“意大利人”大道，罗得尔夫伯爵不得不绕道巴斯都—朗巴大街；再

朝下走几步，便是一个类似排水沟模样的道路了。我们今天该还有许多人知道这条道路的荒于维修和泥泞难行的状况，那是和1848年2月23日夜晚的情况相差无几的。有两位衣着华丽的少妇也被迫在这里绕路而行，并且高声抱怨着自己触了霉头。罗得尔夫伯爵在女性面前一向是殷勤的，他对她们的境遇深表同情，同她们一边谈论着，便走上了一条直通大路的小道。这时候来了一群年轻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穿着工作服，手持用长竿挑着的用红纸或是黄纸糊的灯笼，唱着“巴黎女性之歌”并高呼“打倒基佐！”的口号向前走去，气氛非常活跃。突然，一阵排枪声响了起来，军队开火了。呼啸的子弹向人群飞来，有一百多人都趴了下去，有的挤成堆，有的四散分开在地上滚动。叫喊声，呻吟声，乱成一团。第二次排枪的射击，又引起惊慌失措的人群的狂奔。罗得尔夫跌倒泥泞中，一些穿着长靴的大脚在他身上跨了过去，那两位漂亮的少妇直挺挺地躺在他旁边——她们死了。他慢慢地向前爬，然后立了起来，他满脸是血，奔跑的人群把他卷走，他不知向哪里去，只是头也不回地尽力向前飞跑。最后，他气喘吁吁地用手做成喇叭形高声召唤在混乱中的一辆马车，但他还没来得及打开车门，人们便从马车的另一个门钻了进去，马上就已挤满。并且，已经由那匹瘦马拉着跑了。

精疲力竭的罗得尔夫伯爵停了下来。这时他狼狈极了，满身泥浆，遍体伤痕，衣服撕得破烂不堪，帽子也不知去向，手里仍然拿着那把漂亮的雨伞，但却只剩了三分之一。一颗子弹打中他的面颊，一只眼睛血流如注。他辨认了一下方向，原来这里已是蒙马特郊区，不知自己怎么竟会跑到这儿来了。军队已敲起集合鼓。突然人声鼎沸，“我们要报

仇！拿起武器来！”的喊声不绝于耳。所有的人家，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到哪里去呢？向谁请求庇护，又向谁去求救呢？

他鼓起勇气，决定回圣·日尔曼去。但又必须经过那条战斗正打得激烈的大街。没关系！他动身了。不幸的是，他非常近视，而他的夹鼻眼镜又在乱中丢失。这就使他的决定大大地复杂化了。天开始下雨了，为遮挡一下他那没有帽子的头顶，他打开了那把没有柄的雨伞，用两只手擎着已经弯曲变形的伞骨，那片圆圆的伞布由于满是泥浆而变得特别沉重并不停地合起来。这就影响了他的走路，再加上近视，我们这位不幸的外交官简直成了盲人。对于这位全巴黎最出色的跳舞里手来说，这是何等狼狈的场面！就在他这样折腾时，眼睛还不停地流着血，面孔也开始肿胀起来。他暗想，要不是这个倒霉的革命，这时候他不正身穿华丽的匈牙利军服，在使馆里主持着舞会吗。这是确实的，原定就在那天晚上，使馆将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会，由于发生的事变，当天便取消了。但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完全就绪，整套餐具已经摆好，用绚丽的鲜花装饰了几座花山，展出艺术品的画廊已然在花园里造好，并用锦缎和天鹅绒装饰得花团锦簇。他一边在肮脏、昏暗的街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水洼和泥泞中艰难地前行，一边在他的头脑中（这该是多么遗憾！）闪现着肌如凝脂，珠光宝气的仕女们在华灯之下，优美的乐曲声中，兴高采烈地翩翩起舞的场面……

枪声愈响愈烈，雨也越下越大。他决定收起那把破伞，来到一个敞着门的房子前边。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再走了。眼前有一个楼梯，他拾级而上，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点着一盏油灯，借着灯光，他看见有十几个人挤在屋里，其中有好

些是青年女子，似乎没有人理会他的到来。他自我介绍说，他因遭到战士的无理行动的冲击才搞成这个模样。当大家看到他那副狼狈相时，都笑了起来。他从头到脚全是泥浆，眼上凝结着一大块血污，脸上鼓起了许多青一块紫一块的大包；手里拿着那把不听使唤的雨伞，伞面已经和伞骨分了家，怎么也张不开，就象一把巨大的破折扇。如果他那些漂亮的华尔兹舞的舞伴们瞧见他这副模样，不知她们将作何感想！尽管狼狈如此，这位外交官的脸上却竭力作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样子，并努力恢复其不可侵犯的尊严。他现在已置身于下层平民之中，他们都是革命的热诚支持者，他这种故作姿态的摆架子，并没有在他们中引起任何反响。有人给他弄了些水和盐来，清洗一下他受伤的脸。他就这样在那儿过了一夜，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以一个遇难的探索者应有的良心，把在这一群陌生的平民中遇到的事情都记了下来，这些事情充满了戏剧情节。不错，这位文质彬彬并且派头十足的贵族是第一次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它完全不同于巴黎或维也纳的贵族沙龙；他以极其愉悦的心情，认真而诚实地向我们讲述了他这次不寻常的遭遇，这在大多数的回忆录作家中是很少见的。

一直到24日的白天，他才得以在倾盆大雨中回到圣·多米尼克大街的使馆，那时人们已经为他开完追悼会了。随后他便日复一日地把他的所见所闻形诸笔墨。这位社交家文采出众，他的故事向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细致而生动的关于这个动荡时期的速写。

首先，他描写了自己觉得将要濒临世界末日的那种危机感，即对即将到来的事变的忧虑，对大屠杀，对行将破产的忧伤；他写了不可避免的战争和战争的破坏；写了在动乱

中失踪的国王和王后以及对他们吉凶未卜的命运的关心，因为他不知道当时他们处境如何。其次，他又惊奇地发现，新的共和国是一个善良的女郎，它谋求的只是生存和繁荣。于是人们安心了，感到宽慰了，不久便额手称庆，黄金时代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一切阶级之间的仇恨已然消失，在大街上看到的是互相尊重和关心，同时对没有人惋惜他们的胜利表示关切。请看：“人们希望和平，希望自由，特别是需要休养生息，人们看够了议会中那些政治家们的党同伐异和听够了他们令人厌烦的咬文嚼字，人们不再希望听到谈论这些东西了……”上面是摘录的原话，尽管写于一百年前，但并不见得已经过时……波福勒蒙公主和勒德律—罗兰一样是一个共和政体的拥护者，这便体现了上下一致的团结和一致的要求。这一形势起码在最初的日子里（因为这些幻想不久就破灭了）使阿波尼又惊又喜。

对他来说，给这幅画面罩上的唯一阴影便是人们不再跳舞了，但是且慢，请您把他的笔记向后再翻两页，上面赫然写着：“埃米尔·德·吉拉尔丹先生和夫人给我们送来了出席他们举行的晚会的请柬……”

风暴已被忘却，一切又重新开始了……

19. 基度山宫

一天，路易十四在巡幸马尔利高地时，发现该地清幽秀丽，景色宜人，便下令在那里建筑一座方形楼阁。这样，只

需几个小时便可以到此一新耳目，从而可以暂避令人生腻的凡尔赛宫过分豪华的气象。不久，一座名为“太阳宫”的行宫便拔地而起。与此同时，又按黄道十二宫的方位，在它周围建起十二座小型宫殿以供侍从人员居住。但供水困难，幸而距此四公里左右便是一条清溪，只要翻过一个山头便是。至此，问题便迎刃而解。一片树林屏蔽了视野，便把它们砍光，另从贡比涅通过河道送下百年老树，以供乘荫纳凉之用……

马尔利一直保持着初建时的布局，但两个世纪后它便变成了一个游乐场。有一天大仲马被人群从圣一日尔曼亨利四世王宫里赶出来以后（他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名著《三个火枪手》），在波尔—马尔利大路上，他走进一户农家。这家人有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和一个方形小花园。“要能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该有多好啊！”于是一个方案很快便形成了，他买了一块地皮，于是一幢简朴的房子便建了起来……然而这太小了，如果再在侧面盖一幢，然后再在上面加一层，然后再盖一间温室，然后再造两座小塔，然后……那岂不更好吗！如果能仿照鲁昂或者阿奈特市约翰·古戎的雕刻，筑成一座雕梁画栋的宫殿，岂不更妙！不消说，这一想法一旦形成，马上便付诸实现，然而最后又必须停下来。因为把一幢一般的房屋改成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谈何容易！首先这片地面便被挤得插足不下，其次，这样一座豪华的宫殿，四周能没有花园吗？于是便在树林里画样动工。花园里缺少流水……那就把泉水引来好了，但是从哪里引来呢？真是天晓得！但为要搞得别出心裁，花样翻新，那股涓涓的清溪不是开在低处，而是引上高山，清溪中还将筑起一个小岛，小岛上还将盖起一座哥特式宫殿，两座宫殿建筑风格是不同的，第一座

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

在这一带，大家把这一仙乡胜境称为“基度山宫”。

在这段时间内，大仲马离开了马尔利到西班牙，或者西西里，也许是阿尔及利亚去了。

有一天大仲马在突尼斯参观贝依宫时，看到两个阿拉伯人，他们是父子，正用一个冲子在一幢房子的墙壁上打孔。

“这是干什么呀？”他问。

“这是在搞‘阿尔杭布拉’^①的内部装璜，”有人这样告诉他，“这两位雕刻艺人是本地唯一掌握这一传统工艺的人。”

的确，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些孔洞颇似一幅神奇的图案，再现了摩尔式的绚采，堪可与《天方夜谭》中的豪华宫殿媲美。“如果弄到基度山宫的墙壁上，该是多好的装璜啊！”当天晚上这两位阿拉伯人便坐上维罗斯号航船前往法国，条件是每天七个法郎的工钱。两个月后，他们便在波尔—马尔利弃舟登陆，从袋子里取出烟斗和工具，先点上一个烟斗，然后再同另一个接上火，便开始在他们称之为“仲马斯”^②先生的墙上打孔。这一工作一直干了好几年。

我们在1846年的一家日报上得知以下细节，该日报称：

“他们每天都在那里工作，并还将工作很长的时间，这是一件典型的能表现穆斯林人毅力的工作，没有测径规，没有尺子也没有量具，完全依靠自己的眼和手的功力。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父亲带着不满十五岁的儿子，凭借手中的一把铁凿，不断地丰富着神奇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只装在他们的头脑中。”

① 是一座阿拉伯式古老的摩尔王宫名。——译者

② 仲马 (Dumas) 字尾有一个“s”，阿拉伯人往往把“s”发音，便成了“仲马斯”。——译者

在大仲马被迫出卖了这座“基度山宫”以后的很长时间内，这里都无人居住，几乎成了一片颓壁断墙。但那些漂亮的钟楼却一直矗立小尖塔的顶端俯瞰着周围高大的树木。那幢漂亮的小巧玲珑的摩尔式的“阿尔杭布拉”宫也一直保留着。人们可以直接进入工作室，那是一间相当低矮的有棱角的屋子；一个高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炉装饰着大理石浮雕，炉台上也雕出各式花样。天花板装饰着镀金的画梁。在一面哥特式大窗下，原有一张活动小桌，上面墨迹斑斑，就在这张小桌上产生出多少鸿篇巨著！这位大师在这儿伏案写作，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他不知什么叫疲劳。这位文学巨匠有一次对勒维烈说：“您认识天文台的那些先生们，那就拜托您，一定请他们一天给我四十八个小时，那我会感到十分高兴。”

“基度山宫”从来没围墙，也没有壕沟，既没插篱笆也没设栅栏，人畜都可以随意进入并在里边悠然自得地散步。在那里摘果子而不必担心被控为“越墙而入从事盗窃”的罪名。

除此以外，大仲马还真正地生活在动物世界之中。他同时养有五只狗，其中叫普利查尔的那一只并且大享盛名，欲知详情，还是请教那些读过《我的动物传》的人吧。

他养了一只秃鹫，开始名叫于古尔塔^①。由于介绍背景太麻烦，便改名迪奥杰纳^②，为了使它真正的象一个犬儒学

① 古罗马人，作过奴米迪国王，生于公元前160年死于公元前104年。曾进行过有名的于古尔塔战争，最后饿死在狱中。——译者

② 迪奥杰纳（前413—前327），古希腊哲学家，其父是造假币的银行家。他自称是其父的同谋者。他还是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底斯太诺的得意门生。他的理论是：品德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财富，而知识、荣誉、金钱等都是虚假的财富，应予鄙视。这与大仲马的人生观是对立的，故仲马对他加以嘲弄。——译者

者，就把它养在大桶里，摆在阳台上。

他还养了三只猴子，其中一个以一位著名翻译家的名字命名，另一个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的名字，第三个是只雌猴，便以一位出色的女演员的名字称呼之。

一只绿羽红颈的鸚鵡，名叫布瓦，是《阿芒塔尔骑士》中的英雄。

一只猫，名叫咪苏夫。

一只金羽毛的锦鸡，名叫吕库吕斯^①。

一只公鸡，名叫凯撒。

一对孔雀，十几只母鸡，两只珠鸡；这些动物只是在大仲马的动物传上提到过的。还没算逗留在圣一日尔曼的布基瓦尔大道上的那些狗。它们顺路便可回到普力查尔^②那里进行拜访，在那里它们过得很好并安居下来。

“饶了它们吧，”好心的大仲马对他的黑奴奥得本若说，“这些牲畜不会使我倾家荡产的！”因为奥得本若要把这些牲畜统统赶走。

对于大仲马的缺点，如对他的别出心裁搞排场，对他的挥霍浪费，对他的自高自大，对他顽固的自信以及对他孩子般的虚荣心，人们常常是谈论得太多了；但对于他的美德，那种不见得每人都有美德，却只字不提，而这种美德在他身上却体现得十分突出，即：以恩报德，忠于友谊。在1848年革命期间，他曾在报纸上撰文一版之多。在此有必要引用其原文，因为它描绘了一个人的完整形象：

① 吕库吕斯（前106—前57），古罗马政治家。他非常富有，以生活豪华和喜食美味闻名。——译者

② 普力查尔是英国耶稣教传教士，同时又是当时驻塔依迪的领事。——译者

“有一个人，我爱他有如人们之爱其父兄，爱其挚友，这便是奥尔良公爵。又是什么人告知我他已不在人世了呢？此人便是拿破仑·波拿巴亲王，他是热罗姆·拿破仑之子。我对亲王几乎和对公爵一样地爱。

“我不知道7月13日发生的意外事件。我当时来到景色如画的卡尔托花园。被废黜的前国王韦斯特法里当时住在那里，并等待着他隐退生活的中止。拿破仑·波拿巴向我走来，他用双手抓住我的双手说：

“我要告知您一件使您万分痛苦的消息，奥尔良公爵死了！”

“我木然不动，噤若寒蝉，心里万分痛苦，热泪满面。

“殿下，我回答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便是您，现在，除了您外我已一无所爱。’

“我曾在奥尔良公爵的怀抱中痛哭过我的母亲，现在，我又在拿破仑·波拿巴的怀抱中痛哭奥尔良公爵。”

顺便说一句，大仲马就是和这位热罗姆·拿破仑亲王，在意大利的里窝那到波多—费拉约的旅途中，一同生活在一条破平底船上，被迫在地中海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避过难。这个小岛就是基度山岛，当时只有走私贩才知道这个地方，可是，自那以后！……

10月10日，尽管已是共和政体了，但大仲马却公开宣布，他要投路易亲王的票。请看这位作家的心灵是何等高尚！他曾是那位被流放到阿尔纳贝尔^①的前国王为数极少的几个朝臣之一。他在卡尔托花园里成了被流放的波拿巴家族的朋友。但在他们执政以后，却丝毫也没有想到有求于他们。

^① 瑞士的一座古堡名，位于康斯坦斯湖畔，当时路易·拿破仑即后来的拿破仑三世和他的母后在那里住。——译者

恰恰相反！这里只举一件事：如果共和国总统有最大的勇气向那些被放逐的人们敞开大门的话，他将请求亲自向他热爱的兄弟蒙庞西埃公爵宣布这一好消息。这位公爵尽管远在西班牙，但他并没有忘记法国，他正在塞维利亚遥望着巴黎垂泪。

大仲马声称，如果在法兰西看不见这些亲王们的年轻眷属，那么法兰西对他来说将是一片空地。他曾看着他们长大，看着他们被放逐，对于他们，如同对于那位死者一样，他倾注了全部的爱。

正因为如此，这位大仲马在1848年2月24日的几天以后，他在给蒙庞西公爵的信中写道：

“殿下，对于‘朋友’这一称号，在您还在杜伊勒丽宫时我引为自豪，而现在，我迫切地需要它！”

这位大仲马，对于拿走卢浮宫廷院里的奥尔良公爵雕像，感到气愤万分！

这位大仲马，参观监狱要比参观宫殿多得多，在汉姆^①他参观了三次监狱，只参观过一次爱丽舍宫，杜伊勒丽宫却一次也未去过。

我们无意在这里对这位真正的，胸怀宽厚的文学巨子的才能作一估价，但阅者诸君是否想知道他本人对此是如何想的呢？下面几段坦率而真挚的比喻，便是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我想，此文从未发表过，转录如下：

“拉马丁是一个空想家，雨果他是一个思想家，我则是一个普及家。好空想则难免朦胧，善思索则过于深邃；深邃

^① 法国索姆省的一个城市，在那里的城堡里曾关押了许多旧王朝的大臣和将军，路易·拿破仑也曾在那里关押过。——译者

则有时会妨碍别人对他的理解；我则把二者溶于一体，致力于普及。我给空想者的朦胧赋以可触及的实体，给思想家的深邃投以洞照一切的闪光。我奉献于读者面前的便是这两样菜肴。这两样菜肴，如果单纯出自拉马丁之手，便嫌过于清淡，读者便会营养不良，如果单纯出自雨果之手，便嫌过于厚腻，读者就会消化不良；而经过我的烹调复制，由我呈献给读者的，差不多就可调和众口，老少咸宜了……

“他们俩，一个在地里收割，一个把收割物运到场上，但还需要一个人来打场和筛净。我就是那个打场者和筛谷人。此外，筛剩下的糠粃我还用来喂鸡。所以那些鸡一听到我说：‘过来，小家伙！来，来，来！’时便向我跑来，而它们却听不懂我那两位同行的话语，尽管他们在农场的地位比我高。

“那么好吧！我就作个心灵的打场人，智慧的筛谷者，而‘来，来，来！’这便是我随风扬起的大小小能与大众交谈的谷粒。”

20. 两位挚友

年轻的费亚兰·德·佩西尼在王朝复辟的末期，曾在驻蓬提维的皇家骑兵团里当一名军官，由于他不愿效忠于那个暴君（“暴君”是指路易—菲力普）遂于1830年辞职来到巴黎，并在报界谋到一个差使。是因为他忠于波旁家族的长系才拒绝在军界服务吗？他后来的经历使人对此颇为怀疑。不

错，他确实有一个“强硬的脑袋”^①，喜欢冒险，热爱生活。谈到他的政治见解，则是摇摆不定，可以随风转向的。

在巴黎干了几个月之后，他又想到德国的一个种马场去搞研究工作；同时还想参加巴伐利亚州的骑兵部队。在出发的途中他又忽然改变了主意，开始搜罗有关他的家族史的旧文章，并接受了别人的建议开始搜集奥格斯堡^②的其它档案材料了。在抵达奥格斯堡后，由于迷上了一位漂亮的太太，他又改变了研究的内容。他在这个中世纪的古城逗留期间早已把家族史和巴伐利亚骑兵抛到九霄云外并和那位太太旷日持久地同居下去。当他们分手时，双双发誓赌咒要再次相聚，相会的地点便定在路德维西堡，当时是维尔坦贝尔省的一个小巧玲珑的城市，是恋人们名副其实的安乐窝。于是佩西尼便日夜兼程地赶往那个仙乡福地。

在旅途中，迎面驶来一辆敞篷的四轮马车。他自己的马车和这驾车子越来越近，这时载着这位年轻的法国人的车夫便激动起来。当对面那辆敞篷车驶近时，这个粗鲁的德国人从他座位上跳起来摇晃着帽子大声喊道：“拿破仑万岁！”原来车上坐着法国皇族的一位流放亲王，即热罗姆·波拿巴的长子，皇帝的兄长，前国王韦斯特里。这一偶然的机遇使这位车夫激动得气喘吁吁。

由于这一事件，使得佩西尼一直摇摆不定的政治信仰坚定了。拿破仑这个神奇的名字在距离法兰西如此遥远的地方，被一个乡野村人如此热情地呼喊。很显然，这个车夫对我国历史的其它方面一无所知，然而这个在法国各地被严厉禁止出现的名字，在这里却具有如此深重的威望，它恰似一

① 指很倔强。——译者

② 在西德的巴伐利亚州，那里有许多古代历史的遗迹。——译者

声号角，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抵敌得住。于是我们这位旅行家，便不顾那位漂亮的太太在路德维西堡等得如何心急火燎，他却转道返回法国了。回国后他四处寻找拿破仑王朝的遗老，并又开始研究“拿破仑思想”了。为觐见拿破仑的另一位兄弟、前国王约塞夫，他到了英国。约塞夫又把他推荐给侨居在瑞士的路易·波拿巴亲王。这位亲王热情地招待了他。他们俩同年出生，当时都是二十七岁，而且又都极富冒险精神。于是便双双陶醉在未来的神奇冒险计划中；当时正是1835年，须要耐心以免受到牵连。从此之后，佩西尼便和这位帝国传人的命运连在一起。他带着他们机密的宏图大志回到英国，并在伦敦定居下来——他需要等待。

在伦敦，他租了一套带家具的沙龙住下。不久便和一位法国同胞建立了友谊，此人比他小三岁，和他同样过着游荡生涯，是一个朱安党的保皇派，名叫阿尔弗雷德·法卢。他和佩西尼一样，对这个大众化的君主政体深恶痛绝，拒绝为它服务。为了搜集情况，他正在周游欧洲，是从布拉格来到伦敦的。在布拉格，波旁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老国王查理十世和他那位只当了半刻钟国王的儿子路易十九，以及当时只有十五岁的亨利第五等，都隐居在一个阴暗的宫殿里伺机而动。法卢向他们表示了不可动摇的忠心。因为他是“正统派”保皇党人，他坚信，法兰西对那些骗人的妥协已然厌倦，必将把这些正统的亲王们召回，而他又从这些人和他们周围的人那里得悉，波拿巴家族死灰复燃的运气，是彻头彻尾的无望了。

就这样，两位年轻的法国人，便在他们伦敦的高所越来越接近，越来越亲密，彼此交换着各自的抱负和各自的宏图大志。第一位热切地希望着那些才智出众的雄鹰们能重返法

兰西，第二位则希望能重新看到象征王室的百合花徽^①。不过，不要紧，他们的政见尽管如此不同，但他们两人都十分欣赏和钦佩对方信念之虔诚和态度之热忱。他们这种同志式的开诚布公成了他们坚实的、永恒的友谊基础。（无疑，在法国政治纠纷的历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他们将沿着各自的道路前进。不管斗争给他们带来的意见分歧和对立是如何强烈，他们都一直保持着互相尊敬和互相爱慕的友情。

如果命运给他们安排了一种与世无争的安静生活，这种意见上的绝对分歧对他们便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妨碍，不幸的是并非如此。1836年春天，佩西尼告诉他的朋友说，他将不得不离开伦敦前往瑞士去晋见“正在从事某种计划”的路易·波拿巴，并说：“你和我一起去吧，亲王会赏识你的。”法卢打断了他的话，他对前国王的忠诚是坚定不移的。但佩西尼坚持说：“在你眼前将会展现一个全新的生活，路易亲王将重新执政，那时你就会成为他政权的第一批大臣。”这位正统派的波旁王朝的支持者忍不住笑了，说道：“那么你答应给我一个大臣的公文包夹，那就这么说定了。”佩西尼的钱不够，法卢借给他旅费。这次前往瑞士的目的是安排把一位波拿巴家族的成员扶上原是亨利五世要求登基的王位。此事正如大家所知，未能成功。路易亲王就在他鼓动斯特拉斯堡驻军时被捕并发配到美洲。佩西尼是这一莽撞行动的主要人物，他把下莱茵省省长在床上抓住当作人质逃往国外。只要他在国外，便和法卢保持着亲密的通信关系。四年以后，路易·波拿巴再次举事。这次是在布罗尼—索尔·迈尔省，他和他所有的同伙都被逮捕，其中的首要分子当然是佩

^① 雄鹰是拿破仑权力的象征，在他的宝座和许多地方都有这种图案，百合花则是法国旧王朝的象征。——译者

西尼。这批人犯被押送到巴黎，等待贵族院开庭审讯。

佩西尼被关在单人牢房里，十分烦闷。“失败者无亲朋”，大家都指责他竟然参与这样荒唐的冒险行动，甚至他的家庭也与他断绝了关系……但法卢没有抛弃他，他跑到狱中争取到与佩西尼相见的机会，通过双重铁栅栏，再加上狱卒的监视，两人的手紧紧握住并且泪流满面。这位保皇党人在握手时，微微感到那位波拿巴分子悄悄地塞在他手中一张纸条。出了监狱，法卢便打开来看，佩西尼告诉他，在某一间房子里，地址已写在条子上，藏着一些军服，乃是准备路易·波拿巴胜利后重返巴黎时用的，必须立即销毁这一谋反的证据。政府所有的警察部队都进入戒备状态，但法卢素以正统派保皇党人著称，所以当一大批巴黎人士由于被怀疑与帝国复辟行动有牵连而受到严密监视时，他却轻而易举地把那些使他的朋友受牵连的物证处理掉了。当时法官们根本就没有怀疑到有这些东西存在。法卢出席旁听了贵族院的庭审，他的朋友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我们还是快点结束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吧。下面讲1848年的事。路易亲王是巴黎国民议会议员，10月10日他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法卢是曼恩—卢瓦尔省的议员，他没投这位皇帝的侄子的票，在爱丽舍宫，总统并没有对他的弃权而耿耿于怀，并有意组织一个包括各派人士的混合内阁。由于佩西尼从中出力，他被任命为国民教育部长。他拒绝任职，他的政界同仁对此也颇有怨言。亲王甚至威胁说，如果右派拒绝合作，那么他将全力依靠左派。在杜旁卢神甫的鼓动下，法卢终于被说服，于12月12日接受部长职务，几天以后他便走马上任。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发现了一只摩洛哥山羊皮的非常精致的红色公文包，上有一行小字：“1835年伦敦生活纪

念，佩西尼谨赠。”

一种真挚的友情把两个政见完全不同的对手联接在一起，超然于各种冲突之上而不被政治乌云所左右，亲密无间地相处了几乎半个世纪之久。如此使人感动并令人深思的故事，在我的经历中是少见的。佩西尼成了公爵并成为夏马朗德领地的领主，任内政部长，同时任拿破仑三世私人顾问团顾问。这时，他向法卢打开了心扉，但法卢是被流放的弗鲁道夫忠实的信徒和热情的保卫者，他对皇帝的朋友佩西尼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和希望。这样的互相信赖是值得称颂的。人们写过不可胜数的爱情小说，难道这里所讲的不是一部真正表现友情的小说吗？难道这不是一部事出意外，情节横生，引人入胜的小说吗？但“小说”这一概念对它尚不确切，它应该称为一部历史，最好的历史。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正大光明，正直不阿的人，可以维护自己与别人的事业，完全不同的事业，而无须互相辱骂和互相仇视。这种友谊又必须经过严峻的考验以使其经得起各种冲击。法卢在任部长八个月后，于1851年12月2日，便与一群市民代表在巴黎第八区区政府开会，要求废黜路易·波拿巴。在受到士兵的包围和无理的对待后，便被带到蒙瓦雷里安监禁起来。第二天，由于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这批在押者便抱怨亲王背弃诺言。但就在这时，他们颇为惊讶地看到亲王那位最活跃的顾问走进牢房，并走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面前，双臂紧紧地拥抱着此人，一边抽泣一边说：“你难道永远也不原谅我吗？……”十一年前，法卢在贵族院监狱探望佩西尼，而今天，佩西尼又到监狱来探望他。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考验等待着这两位真正的朋友：两人的理想丧失了，但人都还活着。尽管他们对各自的主人十分忠诚并一心不贰地为他

们效劳，但他们在自己主人面前都处于半失宠的地位。于是，两人最终都厌倦了政治生涯——但他们的友谊却一直保持到最后。

21. 拿破仑三世的绰号

尽人皆知，拿破仑三世的绰号叫“巴丁盖”。于是便有一位学者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对这一普及而又著名的绰号进行研究。此人便是保罗·芒图先生，他要弄个水落石出，真正的巴丁盖本人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初看起来似乎很简单，最普遍的传统看法，巴丁盖是汉姆要塞工程中的一个泥瓦匠。当那位未来的皇帝在布罗尼举事未遂，被判处终身监禁后，越狱而逃。当他化装成一个工人逃出城堡时，肩上抗着一块木板以挡住他的面孔。为了掩护他，泥瓦匠巴丁盖把自己的裤子、工作服和护胸围裙都借给了他。凭着这一身打扮，路易·拿破仑在岗哨和门卫面前大摇大摆地从自己的住处走了出来。当时门卫向他喊道：

“向外走的是谁？”

这位逃跑者十分镇定地回答：

“巴丁盖！”

于是看守便信以为真，没有再问下去。

这种传说十分流行并为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甚至还引证了许多详细的旁证材料。比如，据与杜伊勒丽宫里的内戚

过从甚密的卡莱特夫人讲，拿破仑三世对这一绰号并非不知，他甚至还开玩笑地说：“别人这样叫我，我并不生气，当然这不是一个皇族的名字，但却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帮了我一个大忙。”甚至还有更精采的说法：一位名叫达喀兰的殖民地官员，于1884年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遇到一位老人，此人因在帝国倒台后，曾因某一严重事件受到牵连，被遣往新喀里多尼亚，他的名字就叫巴丁盖。于是这位达喀兰便问道：

“你就是帮助路易·拿破仑亲王越狱的那位汉姆的泥瓦工吗？”

“正是我，先生。”

这样，事情似乎很清楚了，难道还有怀疑的余地吗？保罗·芒图先生的调查也同样有其坚实的基础，他以极大的兴趣在许多原始资料中搜寻有关巴丁盖的线索。他翻检了佩龙法庭档案室里保存的所有有关的档案材料；因为越狱事件发生以后，路易·拿破仑所有的朋友如泰兰、科诺以及他过去的同谋者们都曾在佩龙法庭上受审。奇怪的是，在所有的诉讼档案中没有一个叫巴丁盖的人，此外也没发现有任何一个泥瓦工曾把自己的工作服借给过路易·拿破仑。他逃跑时的衣服是科诺医生自己买的。他花了二十五个法郎二十五个苏买了一条围巾，一件罩衫，一件工作服上衣，一条裤子，一件衬衣和一件护胸围裙。他买这些是预备一旦他自己穿的衣服弄脏或是磨坏时替换用的，因为在这里要整天搬石头。结果便作了路易·拿破仑外逃的衣物。至于门卫问他的那句话，没有一个人能够证实。当时的门卫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供称，他没有向任何人问过类似的话。此外，这位未来的皇帝刚一脱险便给《加莱海峡进步报》的总编写过一份详尽的说

明，说明写道：“站在监狱边门上的战士们似乎对我这一身打扮很为奇怪，特别是鼓手，回头看了我好几次，而值班的勤务兵打开了大门，我就来到城堡外边了。这时我遇到两个工人向我走来，并且很注意地打量着我，我便把木板放在他们旁边。他们的神情那么奇怪，我想这可逃不掉了，当时我听他们喊道：‘啊呀！这儿是贝尔杜！’”

以上便是全部事实。原来的传说完全解体，因为没有一个是泥瓦匠，叫巴丁盖也好或者别的名字也好，了解这一越狱事件，更没有人参与这一行动。卡莱特夫人是搞错了，而达喀兰先生更是上了一位骗子的大当。那么帝国的反对者们为什么要把拿破仑三世叫巴丁盖呢？

芒图先生继续从这方面进行研究。许多另外的说法引起他研究的兴趣并着手探索。一种说法是，这位亲王在汉姆时，当地有一位叫巴丁盖的姑娘是他的情妇，于是就有人把这一名字加给这位被监禁者以影射这一段风流韵事。核实的结果是，在经常到城堡去的来客登记册上从未见有一个名叫这个名字的女人，而且那一带居民中也没有一个叫巴丁盖的。另一种说法是，在帝国初期有一位陶瓷制造商，他“抛出”了一种陶土烟斗，这种烟斗上画有一幅这位12月10日当选者的漫画像，突出的尖鼻子，浓密的大胡子，头戴军帽。这位陶瓷商就在这种烟斗上为这幅头像打上印记，名字就是巴丁盖。所以当人们吸烟斗时便说：“吸一斗巴丁盖烟斗”，以后就只说“吸一斗巴丁盖”了。正象后来人们叫“雅各布”^①一样，久而久之，这一称呼的含义就是用人名直接代替东西

^① 名乔治·雅各布（1739—1814）是出名的细木工，他制造的家具，后来都叫“雅各布”，在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以致到拿破仑帝国时都非常出名。
——译者

了。不幸的是，已无从查找这位陶瓷商人，更找不到一只这种烟斗了。这一说法只是一种开玩笑的无稽之谈，不足为凭的。

那时在世的还有当年《小弗朗什—孔泰人》报的一位编辑，他提议查一查词源。这一建议简直具有拉伯雷^①味道。但他却说：“1848年左右，在贝藏松有一个承包清除粪便的公司，该公司名叫巴丁·盖和西，生意非常兴隆。当拿破仑三世来到这个城市时，上述公司的粪车队正走在巴当大街上，当时便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大家高喊：‘瞧，这就是朝廷的车驾，皇帝万岁！’巴丁·盖这个外号便传出来，并传遍全国。”芒图先生对这一令人恶心的设想，用历史的眼光勇敢地作了详细的分析，他的结论是，在1850年，当这位亲王总统前往弗朗什—孔泰旅行时，据《贸易年鉴》记载，贝藏松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公司。那么问题又回来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绰号是怎么来的呢？

这时语法学家也出面参加这一讨论了。他们说，专门喜欢搞点小花样玩玩的汉姆城堡的士兵们，看着这样一位无所事事的犯人，难道他们不会用庇卡底^②方言给他起个外号吗？按庇卡底方言，“巴丁盖”是从动词“巴丁基”派生而来，而“巴丁基”又和古语“拜尔罗得”和“拜尔罗得尔”同义，即指那些整日游手好闲，办事犹豫，毫无目的，游来逛去，闲得发慌的人。于是我们这位有耐心的学者又查了《词源学和庇卡底方言土语今昔对比汇编》，上面根本没有“巴丁基”这个动词。他便转而埋头于戏剧研究，或者巴丁盖也许是某一喜剧里的人物也未可知。在这个领域里他比较幸

① 拉伯雷，法国十六世纪讽刺作家。——译者

② 庇卡底，法国北部旧省名。——译者

运。在1848年上演的一出名叫《罗西纳的家具》戏剧中，他发现有一个人物叫“拉丁盖”，这与原名不太相符。但他在翻阅另一本名叫《混沌岛》的“文字拙劣，语言晦涩并附有歌曲的三幕歌剧剧本……”时，他激动万分，因为这本歌剧里的主角就叫巴丁盖！该剧曾于1848年10月31日在波尔特·圣一马尔丁上演。此人是一个地主，头脑简单，是卡贝^①的忠实信徒。他卖掉自己所有的家产前往伊卡里亚，以这一情节为主线，制造了许多关于共管财产，取消家庭，台球手执政等许多笑料。剧本结尾是，巴丁盖的希望破灭了，于是他也回心转意，离开混沌岛，又成了一个规矩的绅士，成了对传统道德和现有制度的心悦诚服的卫护者。这岂不是这一疑团的谜底吗？只要在这个已然觉悟了的伊卡里亚人和那位前不久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亲王之间作一比较，便十分清楚了，那是十分相象的。还有比给当代的一位名人加上一个在非常流行的讽刺喜剧里的人物的名字更加时髦的事吗？

但是且慢！问题还没有完。自1848年这一出“拙劣的闹剧”上演的日子，直到1853年（就是说在五年当中）从未见过（请注意“从未”二字）巴丁盖这个绰号用在亲王—总统身上，也未用在皇帝身上，不论是在小册子里还是在讽刺报上，或者在任何一个被控为侮辱拿破仑三世本人的任何一个剧本上，都没见过这个绰号。那么这个神秘的绰号不是来自《混沌岛》是显而易见的了。保罗·芒图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他为解决这个历史上的小插曲之前的认真调查的情况和他一个接一个的碰壁。如果没有他的顽强努力，那么我们后人可

^① 艾蒂安·卡贝(1788—1856)，法国社会主义者，曾当过教师和律师，曾参加过法国1830年革命，但他又归附七月王朝，主要作品有《伊卡里亚游记》——译者

能将永远不会澄清这一误解。可以想到，这样一位锲而不舍的研究者不达目的是不会半途而废的。由于不断地对照材料，比较日期，他认为“巴丁盖”一名只能是在1853年初才开始传播开来，亦即皇帝结婚的那年。那么皇帝结婚和这个绰号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奥秘似乎是难以解破的。但发表于1840年《嘲声报》上的加瓦尔尼的一幅画，拨开了人们眼前的迷雾。这幅画上画的是一个医科学生的房间，墙上挂着一副人体骨架。一位灰衣女郎正从那位医科学生的肩后略带害怕的神气瞧着这副骨架。那位大学生身穿宽大的晨衣，向后半转着身躯。画家的说明是：“你认不出她来吗？她叫欧仁妮，是巴丁盖原来的情妇，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她特别喜欢奶油夹心烤蛋白……于是巴丁盖就使这种点心涨到三十六个法郎。难道这是真的吗？不管它，由它去吧！这是一副国民自卫军鼓手的骨架……真蠢！你竟看不出来，他是个男的！”

当画家加瓦尔尼写这一段开玩笑的说明文字时，可以肯定，他根本没有想到拿破仑三世或者欧仁妮皇后。在1840年谁又能料到又是共和国又是第二帝国呢？如果他给这个大学生起名叫巴丁盖，那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名字挺有意思而已。再说，这类名字在市井小民中间传播也十分广泛，属于那些极通俗又令人发笑的名字中的一个，就象“法朗宾”和“加里诺”这些讽刺喜剧中的人物一样，报纸上经常提到它们，专门用以代表“某些人”而已。此外，在1853年，当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蒙蒂若结婚时，有人便想到了加瓦尔尼的这幅画：“她叫欧仁妮，是巴丁盖原来的情妇……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这幅画已然问世十三年了，它才在当时刚刚出版的一本画册中占了一席位置，这无疑是不够礼貌的。但

在巴黎，当时政界的反对派并不为此而恼火，只要这幅画随便摆在一个什么咖啡馆的桌子上，以再让某一个爱开玩笑的家伙了解到这一巧合（欧仁妮—巴丁盖），再把它变成针对皇帝和皇后的插科打诨的笑料，也就行了。

对以下事实人们仍有猜测：这一绰号是在没有人得知其意义和出处的情況下被广为传播的，这就未免有点离奇。但却也足以说明一切，即下面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它们从画室里走出，来到通衢大道，随之又传播到外省，进而传遍全国，而在传播者中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了解这些事的意义何在。

22. 大学生酒馆

洛蒙大街（一直到1867年大家都把这条街叫邮局大街）二号，是一幢资产阶级式的房子。1845年它是一所私立走读学校，学生们在那里上亨利四世的中学课程。在三十多年以前^①，有一次移动学校大门上的盖顶时，发现半个多世纪以前用油漆写在石头板上的一行字：萨尔杜中学毕业会考筹备纪念。

莱昂德尔·萨尔杜先生是这个中学的校长，办事勤恳，学识渊博，是个十分称职的教育家。他律己很严，也严格要求别人，从不允许搞别出心裁的花样。1850年，他儿子维克多里安已经十九岁，对他这种做法十分不满。这个年轻人相

^① 作者原注：本文写于1934年。

当聪明，在其严父的管教之下，完成了十分艰巨的古典文学的学业。他对文学有自己某些独特的见解，这使他那位正统派的严父深感不安。他原本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报考综合工科学校的，但这位青年学生宣称和数学誓不两立。萨尔杜先生不得已而求其次，便试图把他限制在构词学及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方面他本人就有很深的造诣。这门艰深而枯燥的学科对这个年轻的学生没有丝毫吸引力。有一天他父亲又强迫他学会计学和帐目管理，他压抑了好几个星期的情绪便一举爆发了：维克多里安宣称，他生下来就是干伟大而高尚的事业的人。对此，他父亲说他是爱虚荣，说大话，不服管教，不学无术。这个青年人觉得自己羽翼已然丰满，便不顾一切地飞出了这个压抑他自由发展的樊笼并决心一去不返。他闯入了巴黎，在那里寻求成功之路。他当时年龄不满二十岁，作为食宿及交通费用手头只有十七个法郎，此外，就只有他还在中学时便开始动笔，尚未完稿的一部名叫《奥东》的剧本。

他除了和他的“亨利四世同班”的同学联系以外，一无门路；而这些同学和他一样年轻，一样没有处世经验，一样的身无分文。他原以为很容易地会在某个图书馆找个馆员当当的，但事实使他明白了，这种想法简直是一种异想天开的野心。他又想办法给人上拉丁语课，但找不到学生。他向中学理事会的理事们投书，要求当一名学监，但由于他年龄太轻而遭到拒绝。当然这与他生性傲慢，不肯人前折腰也不无关系。他于是便毫无把握地四处奔走，晚上便在本子上记下他四处活动的结果。他写道：“我渴望自由，并有强烈的自尊心，如果有某一位权威者强迫我做一件哪怕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我都会立即拒绝。”和有些人一样，他甚至幻想到加利福尼亚

去淘金，在那里干上几年，搞些积蓄，然后再回到法国，按自己的意愿过活，“因为我并不想当第二个基度山。”在等待工作的同时，他欠了债，积压了许多借据；他一边努力工作，同时下定决心要在戏剧上取得成就以待出头之日。他放弃了《奥东》的写作，完成了一本新剧《马斯·韦曼》。不久他又放弃了这个剧本，写了一部具有科兰·达尔勒维尔风格的喜剧《假想的友人》。与此同时，他还搜集资料准备写一个关于马丁路德的剧本和一个瑞典悲剧《于尔芙拉女王》，准备送给拉舍尔排演。这时是他光辉的写作生涯的极盛时期。这个剧本构思新颖，别具一格，其中人物的语言都用合于本人社会地位的长诗来表达。女王的话是亚历山大体诗^①，大臣讲话用八音步^②诗，一般居民讲话则用自由体诗。除此之外，这位满腔热情投入工作的年轻人又开始了一系列创作活动：一本关于贝尔纳·巴利西的历史剧；一部小说《藤萝花》，这本书他打算和保罗·弗瓦尔合作；一本滑稽歌剧《昂里奥上尉》，由音乐家热瓦艾尔配曲；最后，他还准备了一部诗歌体喜剧《小酒馆》，打算送到奥德翁剧院上演。

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一个顶楼的小房间里写出的（“一间灰尘满壁，空气污浊的小屋子”）。只有当他去拜访那些慷于张口许诺却吝于信守诺言的剧院经理们，或者去向那些管事老爷们暂缓扣押他的家具时才离开那间小屋。他焦急万分，但热瓦艾尔正全力以赴地为一部大歌剧配曲。弗瓦尔对《藤萝花》也不再感兴趣，因他得了肝病，心情十分不好。《于尔芙拉女王》通过拉舍尔的医生梅纳尔博士给博舍尔送了去（这位医生为了劫持在圣赫拉拿岛上的拿破仑，曾制造过

① 该诗的特点是，每行都有十二个音节，又称十二音节诗。——译者

② 一音步为两个音节。——译者

潜水艇)。但拉舍尔只接受描写热带地区的剧本。当她一听说这个剧本是描写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一位女王时，就已然觉得冷入骨髓，哪里还能演它！《假想的友人》被安斯罗夫人（她是众所周知的才女）给挂起来了。她自称是这个青年诗人的保护人，她可能根本没读过这个剧本就宣称，该剧是她著名的文学沙龙里客人的著作中无可争辩的杰作。只有那部《小酒馆》的手稿，年轻的萨尔杜很腼腆地把它交给奥德翁剧院的门房，它排在第2240号儿！）但它竟奇迹般地在一大堆文稿中被发现，这人是个天真的女演员，和剧院老板关系十分密切。剧本中有一个讨人喜欢的女扮男装的角色，穿着长筒靴和紧身裤。她看中了这个角色，认为这是个机会，于是剧本被采用并开始了排练。但当海报贴出去时，名字被改为很不合时宜的《大学生酒馆》。这是1856年的事。马上拉丁区便出现了骚动，谣言不胫而走，说这部新作对学校的年轻人讽刺太过，有强烈的反帝国政府倾向，作者是杜伊勒丽宫的亲信，被大量的秘密经费所收买云云。演出的大幕拉开了，从第一句台词起，预谋的行动便疯狂地爆发：刺耳的尖叫声，野蛮的叫骂声，手杖咚咚的敲打地板声，坐的椅子不断地、有节奏地摇晃声乱成一团。台上的演员几乎喊破了嗓子使尽了力气也压不住台下的喧嚣。正当遇到一个表现爱情的场面，瓦斯灯突然灭了，这些人便跺着脚纵声狂笑，用野兽般的叫喊声来欢迎这一意外事故。当灯光复明时，戏剧也便毫无生气，它被这野蛮的叫嚣无情地扼杀了。他们胜利了，“给了这个巴丁盖的奉承者一次教训。”……

一出马便受到这样一个轩然大波的冲击，作者的处境不折不扣的有如一个遇难的船员被抛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本来各方面的大门已经向他半开，现

在由于他轻易地受到牵连，这些大门又在他面前关上了。他等待着以后的成功。他欠下了更多的债务。他唯一的经济来源便是给一个埃及学生上课，每上一堂课，这个学生便给他五法郎的一枚金币，并请他喝一杯上等的木哈咖啡。他的借条一张接一张地增加着，他不断地推迟付款期限。为了借钱，他跑遍了巴黎，甚至那些专门放高利贷的人对他的要求也充耳不闻。维克多里安试图通过一位被称作普兰大妈的老妇人从中斡旋以求得那些铁石心肠的守财奴们一点点的怜悯。因为普兰大妈和全巴黎的放债人都相识。他实在走投无路了：

“我还没有想过我试图弄到明天就要还清的一千法郎。我只有依靠普兰大妈，她跑遍了全城。那天早晨，我希望至少可以从她那里得到三十法郎以救燃眉之急，结果是一分钱也没搞到。”“我是在两场赛跑比赛的间隙里匆忙地写这些东西的，这边的刚刚跑完就要开始下一个冲程。我的小屋阴冷，凄凉，寂寥，只有埋头工作才能聊以自慰，但我却得不到这种权利。晚间要做的大量工作使我疲惫不堪。”就这样，每天晚上他便把白天遇到的不快，忧郁，仔细记录下来。一切都可证明，他自认是个强者，因为一个心灰意懒的人决不会在日记中记录这种种悲惨的不幸遭遇。要不惮于记录这些，就必需建立不久将会取得辉煌成就的信心，并确信当他将来重读这些粗糙的习作时会感到喜悦。他对此坚信不移，因此，对他所遭遇的不幸从不隐瞒半点。他写道：“不这样的话，一百年后写我的传记时，就不全面。”

这一次他是说对了。现在，他诞生已经一个多世纪，这位著名的辛苦忙碌而又收益甚少的人，其信念已经变为现实。在翻检这位《祖国》的作者遗留下来的文稿时，穆里先生发现了 he 写的大量笔记和书信。诚然，这些东西在形式上

还称不上《回忆录》，但它却具有更高的价值，因为写这些东西时，其意不在发表出去公诸于世，因此也就绝无雕琢矫饰之弊而真光照人。这是一部值得称道的历史，它记载了一个年轻的无名小辈初次上阵便被击垮。他被编辑和剧院老板们拒之门外，被那些卫道者们逼得走投无路。经受了极端贫困和各种折磨，受尽了凌辱，但他对自己的才华却从未失去信心，并且坚信他终究会有出头之日。作为他私人生活的记录，这本集子不但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普通读物，而且对任何时代阅世不深的青年人来说，都不失为一本极富说服力的、生动活泼的典型教育课本。

在这本平淡无奇的书中所体现的，是一股多么顽强的豪气和多么巨大的痛苦：“现在对我最直接的威胁，便是如何度过年关。反正我至少还有二十五个法郎可以用。因此我做了一件外套，但现在它也已进了当铺。……”应该说，萨杜尔穿的衣服也靠赊欠来维持了。一位曾经到他那个小阁楼上来过几次的正直裁缝，抱着将来能在他那儿得点好处的荒唐念头，自动提出要帮他一把。“您将来事业成功以后再付我钱。”“如果我不能成功呢？”“您肯定会成功的。”“您怎么会知道？”“每次我来向您送帐单时，您都不客气地把我推出门外，因为那时您正在专心致志地写东西，我可从未见过这种事情，这件事就可以证明我的看法正确。”但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具有这种眼光。在1856年12月6日的日记里，萨尔杜写道：“我现在欠债越来越多了，洗衣服，买东西，喝酒，……都需要钱。我除了这双四面都透水的旧鞋以外，脚上再也没有穿的了，而这双旧鞋又把我的脚磨破。三天来，不管有多么泥泞也不管下多大雨，我一直穿着这双破鞋在大街上走路，回来时袜子全部湿透并沾满泥浆……。”但

他就是这么一副狼狈相在大街上走时，他却要不时地在珠宝商店和古董商行前面逗留，用眼睛仔细打量着橱窗里的商品，以寻找一旦厄运过去，他要买的东西。“我走进一家珠宝商店，和老板议论一副金项链的价钱（当时我身上只有十二个苏），以便了解一下，当我有钱买它时的行情。”另一次，他发现了克劳德·洛兰的一幅画，“比卢浮宫里的还好，它只卖三十法郎，但其价值至少要有八万法郎！”

三十法郎！到哪里搞这一笔钱呢！当时他甚至连帽子都买不起，竟因此影响了他去音乐家加瓦艾尔家里动员他为自己的作品谱曲。书也没有了，能卖的都卖光了。尽管心情不好，他还是不得不把他姐姐留下来的那架风琴卖掉，他姐姐因得伤寒刚刚死去。……奥德翁剧院的领导们迟迟下不了决心审阅他的剧本《贝尔纳·巴利西》，弗瓦尔的肝病已无治愈之望，《藤萝花》被四处挡驾。面对这一切，如是另外一人，必然要意懒心灰，但萨尔杜却不然，他以从未见过的热情，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他是否明确地要专写小说，专写戏剧、诗歌或者是传记呢？不，他什么都写。他以极大的热情翻译了伊拉斯谟的《秘密会谈》，并开始了《比赛特》、《捕蛇人》，准备献给比利独立的专栏小说《淘金者》，准备献给法尔格依的喜剧《保证》以及悲剧《少女埃尔维纳》等的写作。他还准备给法兰西喜剧院写一本喜剧《维龙》，并着手写一个具有拉伯雷风格的故事《卡尔兰》，准备送到《费加罗报》发表。此外，他奋笔疾书，只用了十五天的功夫便写出了五幕剧《老实人》，这一剧本很适合女演员德雅泽演出。但这一切都流产了，留给他的只是债务：“如果我能找到一个人，他只要给我三百法郎，叫我随便写点无足轻重的玩艺，我都会马上接受。”他在极端烦恼时曾这样

写过。但他却致力于撰写一篇《莫扎特在巴黎》的文章，当时为要给《唐璜》配曲，需要一个剧本，莫扎特在巴黎住了一年。为了糊口不致饿饭，他不得不去给人上音乐课，但竟没有找到一个人肯于哪怕是草率地为他写一个剧本。“看吧，他的头脑里已经有了《唐璜》的构思，尚且要经受如此多的周折和磨难！因此，一定不要气馁。我非常清楚，我受的苦痛还不算太大。我总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些平庸之辈才能很快地飞黄腾达。确实，自荷马以来，这就是一条规律，而且是千真万确的规律……今天，我对我这支笔，无论是写散文还是写诗都信心十足。对于我所要干的，必定能成功也坚定不移。无论写历史，写小说，写悲剧，写喜剧我都能成功。我工作，我搜索，我修改，甚至推翻重来；我构思，对比，研究，探讨，都不是徒劳的；在这五年中，那些傻瓜们喝苦艾酒喝得更傻了。”

在这坦率的剖白中，没有一点对比他幸运的同行的嫉妒。而我们在此对于这种坦率的剖白，对这种和厄运奋斗不息的精神，对为取得最后胜利豪不气馁的精神和这种毫不卑躬屈膝的骨气等等，只能一带而过，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经过六年的考验，1860年5月9日，《飞蝇之足》成功，终于使维克多里安·萨尔杜时来运转。他是自那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戏剧上演率最高的作者，也是受到最普遍欢迎的作者。

23. 维克多·雨果的招魂术

肖像画家和雕塑家，甚至于摄影师们，在再现维克多·雨果的形象时，大都把他表现得面带沉思，眉头紧锁，目光深邃。一只布满皱纹的手支着那硕大无朋的前额，并且还有一张严肃的，似乎是只有预言家和能够呼风唤雨、移山倒海的魔法师才有的嘴巴。从这一形象中，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这位伟大的诗人竟是一位天真善良，经常是笑容可掬，开朗乐观，谈笑风生并能妙语解颐的人。这些便是接近他的人用文字向我们描绘的形象。那些绘画艺术家们尽量夸大他的各种特点，结果却帮了倒忙。我第一次看到雨果，是在法兰西剧院排练场的门口，当时刚刚拜读过他的《惩罚集》和《悲惨世界》，印象犹深。我混在聚集的人群中，在剧院的门口向这位名声显赫的人物欢呼。由于我当时身材短小，一下子就钻到前排来了。我心情激动地等待着，同时，几乎一个世纪以来与这位伟人有关的历史事件向我的头脑纷纷涌来：亲拿破仑的西班牙，神圣的查理第十，《艾那尼》的首演，贵族院，雾月政变，自愿流放到巨浪冲击的孤岛……这些光荣的往事搞得我头脑嗡嗡作响。我做好准备，以便一睹这位奥林匹斯神的法颜。他可能头放毫光，或者起码头戴桂冠，驾着五彩氤氲的云朵飘然而至。拥挤的人群把我拥到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身上，几乎把他撞倒。此人头戴一顶礼帽，有一把蓬松杂乱的白胡须，脖子上围着一一条围巾，一只

手里拿着一卷纸，另一只手在扣大衣钮扣，却怎么也扣不上，蓝色粗羊毛衫的袖口露在大衣袖口的外边。就是他！我的一位同胞在我身子上边有如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使命一般，不停地高声呼喊：“民主和社会共和国万岁！”一辆破马车停在路上，那辆马车就是当时的那种破马车，破到无法形容，套上架着一匹无法再瘦的瘦马。雨果登上了马车，便有二十几个殷勤的崇拜者蜂涌而上替他关车门，由于过于着急了点，还得把车门打开，因为这位伟人的大衣叫车门给轧住了。拉车的那匹天马终于迈步前行，圣容也便随之不见。我不是说，当时很失望，但我却对那些叫我上当的画家很有反感。我自认，自那天始，我便对稗官野史产生了偏爱，因为它能使我们看到那些名人们的本来面目而不给这些人戴上假面、穿上马靴，也不给他们头上画上光环，它能赋予这些雕像以真实的尺寸。我这样说，也并非对那些在人前表现得懒散，不修边幅的大人物缺乏敬意。每当我拥炉读报时，我便对那些编年史作家们产生一种由衷的谢意。这些作家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画面：雨果在英属泽西岛上，在他那富有传奇性的玛丽娜—戴拉斯家里，他绝没有面对大西洋和它高谈阔论，而是在搞木雕或是给他养的那些猫调食。雨果夫人正在一边补袜子。他的儿子查理舒适地仰在长沙发上，一边悠然自得地吸着香烟，一边说着“傻话”；而另一个儿子豆豆正在和他忠实的朋友奥古斯特·瓦克里学习照像。当夜幕降临时，全家人，包括雨果本人在内，便专心致志地注意着那张招魂用的“灵动桌”，等待着神灵的降临，以便和冥间对话，这时雨果已变成一个能够请神的坛主。

维克多·雨果对设坛请神术很感兴趣，这是他从德尔菲娜·吉拉尔丹夫人那里学来的。1848年以前 她就热衷于这

种神秘的感应术，她客厅里的常客就是术士和巫婆，可以举她写给泰奥菲尔·戈蒂埃的一封信来说明。这信是邀请他参加一次这种集会的，“明天，星期六晚上，将举行一次请神降临的坛会，将有一位先生用发蜡瓶占卜未来。这次设坛不属于正式例会，系会外活动……”尽管是玩笑口吻，但她却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当1853年美国给我们送来“灵动桌”时，她是这一新鲜把戏的热情信奉者。那年9月，她出发去泽西岛，一上岸她就跑到玛丽娜—戴拉斯雨果的住处，并径直进了花圃的温室，雨果也跟进去，并且一见面就认出她来了。他们并没有过多的寒暄，雨果只说了声“啊哈！”对方也只回答了一句“是的”。其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可她却滔滔不绝地讲着神坛的事。饭后刚吃完点心，她就发现了一个短粗的独脚小圆桌。她仔细地打量着这个桌子，但它却不予理睬，顽固地一动不动。于是她便跑到城里，在商店里买了一张轻便小圆桌。这是一个独脚桌，腿上有三个支撑爪。这个桌子就会说话。果然它开口了。赴坛讲话的是在维尔齐埃省淹死的雨果的亲人莱奥波第纳^①的灵魂。这使大家非常激动，奥古斯特宣称自己心服口服。自那以后，他们每天都请死者的亡灵登坛讲话。他们召来过丹特，夏多布里昂；夏多布里昂并和雨果谈了话，他对雨果说：“大海曾向我谈到过你……”还有拉辛（那个放荡不羁的拉辛），他也同意到这个浪漫主义者的神坛上来一显身手。但他却受到很不礼貌的接待：“你承认你有些剧本是平庸之作吗？”“在当时是没有办法的。”他可怜巴巴地说。“至少你应该知罪吧？”“现在为时已晚。”“你对你的《阿塔利》有何想法？”

^① 莱奥波第纳是雨果的女儿，她和她丈夫查理·瓦克里在一次事故中双双淹死在塞纳河中，这使雨果悲痛万分，因而写出了《沉思集》。——译者

“是伟大的诗作。”“你这样说只不过说明，你用的诗体形式，是伟大的亚历山大十二音阶诗，对吗？”“是的，……”他并不自命不凡。

德尔菲娜走了，似醉如狂的雨果全家继续设坛请神。奥古斯特·瓦克里十分认真地写下了亡灵谈话录；阿戴尔·雨果还写了一本流放日记，把它称为《圣赫里埃岛回忆录》以和出名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①相对称。它很仔细地记下了那些亡灵谈话的内容。后来奥克塔夫·于札纳先生看了这一珍贵的资料，并在一本美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节录。从这篇节录中看，维克多·雨果为征询对他那本《死囚末日记》的意见，曾设坛请过二十几个被处死的名人的亡灵加以讨论。他得到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回答。他天天与亡灵交谈，甚至夜间都不睡觉，对别人讲述他的看法。这样，他便沉湎于招魂术中。有一天，我邀请了安德烈·谢尼埃的灵魂降坛，帮他完成一首诗作，亡灵顺从地答应了。还有一次，马拉的灵魂正在神坛上，当维克多·雨果来到客厅时，这个神坛却自己“剧烈地倾斜起来”。当有人问及这位《人民之友》^②是怎么回事时，他回答说，《吕依·布拉》的作者^③原先曾是一位“大革命中的人物，是他使路易十六的人头落地……”

吉拉尔丹夫人，她不仅把这个蛊惑人心的新鲜玩艺儿带到玛丽娜—戴拉斯传给雨果全家，就是她回到巴黎以后，仍

① 《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是拿破仑流放在圣赫勒拿岛时，他的秘书根据和拿破仑谈话的内容写的回忆录。——译者

② 《人民之友》是马拉办的一个报纸名，原名为《巴黎政论家报》，后于1789年9月16日改为《人民之友》。——译者

③ 这是指雨果。因为《吕依·布拉》是雨果1938年发表的五幕诗剧。——译者

然和雨果书来信往交换着情况，并对《巴黎杂志》的主编路易·于尔巴说，她要写一篇她到泽西岛去的报导文章。这一提议毫无问题地被采纳了，但她却迟不交稿，于尔巴便到她家来催促，德尔菲娜却十分激动地说：“我不能写了。”

“为什么？”“因为这可能会给雨果带来不幸。”“为什么呢？”她犹豫不决，吞吞吐吐不作回答。在于尔巴的再三追问下，她说：“好吧，我告诉您！因为我的桌子不让我写。”

“您的桌子？不就是您用它写作的那张桌子吗？”“一点不错，就是它。昨天当我向它询问关于雨果的消息时，它就开始自己动起来。它明确地告诉我，它已知道了我的打算，并禁止我动笔，因为这将可能导致很大的危险。我问它，对谁有危险，它说，对泽西岛上的人。您知道，我不会轻易违背这样的指令的。……”莫名惊诧的于尔巴只好告辞而去。

德尔菲娜为减轻乐于招魂的人的劳力，她自己设计了一个灵动桌。这种桌子上刻有钟盘，钟盘上有一个指示二十六个字母的指针，只要用手一拨指针，很容易就可和亡灵交谈。如果指针转动困难，只消向轴上擦点肥皂就行了。此外还有更离奇的东西，吉拉尔丹夫人在给雨果寄这些东西时写道：“在箱子里还有另一张配有铅笔的小桌子，它可以自动写字，还可采取另一种办法，即把铅笔拴在一条线上，它也可以写字，而且还写得非常之好。你看后会十分惊奇，因为它能写出你事先完全想象不到的东西，甚至完全不为你所知的东西来。有一天晚上帕格尼尼^①和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精采的谈话，我们问他：‘你一生中感到最后悔的是什么？’他回答说：‘给别人送免费入场券。……另外，我们还问波卡

^① 帕格尼尼，尼可罗·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

斯^①：‘世界上最有趣的是什么？’他说：‘仲夏之夜，酒杯在手，妇人在怀，……’”

维克多·雨果却不乐意试验德尔菲娜给他寄去的这些桌子。他可能对这个必须擦上肥皂才能说话的圣灵有点怀疑。此外，这位伟大的诗人也没有那种神奇的感应。再说，他本人就非常善于词令，并且妙语惊人，而从神灵那里得来的却是令人难以捉摸的、结结巴巴的不成体统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神奇的现象使他非常不安，而特别使他烦恼的是，人们可能会认为他和那些著名的前辈诗人唱和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作品，和他们合作是为了得到已故同行们的启示。1854年2月28日，在《历代传说集》的手稿上，他用红笔写道：“可以肯定，在我的诗作中，没有夹杂着一行那些神秘的故人们的诗句。我总是非常谨慎地把它们留给我所未谋一面的亡灵，因为它们才是真正的作者。出于对宗教的和文学上的良心，也出于对这一神奇现象的崇拜，我才离群索居，小心谨慎地纯化我的灵感，并极力使我的作品保持其本来面目，它绝对属于我自己的，并且是活人的。”

这些，他说得完全有道理，根据拉辛通过那张神奇的桌子对他的回答来判断，维克多·雨果并没有从那位明显地已经心灰意懒的《费德尔》^②的作者那里借鉴哪怕是任何东西。

① 波卡斯（1313—1375），意大利作家。——译者

② 是拉辛根据费德尔的故事写的一个悲剧。——译者

24. 皇帝举办的盛会

拿破仑三世当政时，每年一入秋，巴黎社会上爱看热闹的闲人们便自动形成一种非常受欢迎的不花钱的消遣活动：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巴黎北站去看“贡比涅”^①的车队。大家把历代国王和王后在瓦兹河边漂亮的行宫里分批接待的那些名人显贵们称之为“贡比涅”。“贡比涅”们在这里参加皇帝举办的盛会。这种盛会在十一月份举行，要持续整整一个月。“贡比涅”们出发的场面，搞乱了正常的秩序。这时人们不仅能荣幸地亲眼瞻仰帝国的高官显要和那些名媛命妇们的天香国色（报纸上把她们的容貌和装束写得天花乱坠）。并且能有幸一睹当时一举成名的伟大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尊颜；除此以外还可以欣赏为这些人准备的专车的华贵气派。专车都是由当时出产的最漂亮和最新式的车厢组成，为邀请出席的正式宾客准备的客厅式车厢六节，仆从们乘坐的一等车厢六节，另外还有六节车厢装行李。因为足有上千件象诺亚方舟那么大的箱子，有各式各样并且用途不一的首饰匣、珠宝箱、帽盒之类的东西。如果赶上梅特涅亲王夫人或者普塔莱斯伯爵夫人出行的话，那么光化妆品和行头就要带一车厢。三点整，火车向贡比涅开出，四点零五分到达。六辆有

^① 贡比涅是法国瓦兹省省会，位于瓦兹河上，周围有着名的贡比涅森林，并建有贡比涅宫，为历代国王巡猎的地方，到拿破仑三世，每年秋季国王都在这里召集盛大的集会。——译者

长凳的大马车等在站台上，每辆都套着四匹高头大马。副官们、内室管家们在夫人太太堆里穿梭般地往来忙碌着，把她们引到各自的马车上。车夫们身披黄绿彩带，戴着各种颜色的假发，一俟登车完毕，便立即向行宫驶去。刚达到行宫前的台阶，客人们的车辆便由伺马官接了过去，于是一群掌门官便迎了上来，然后由跟班的拥护着来到为他们准备的各自的房间里。房间的陈设十分简单：浅蓝色的带花门帘和窗帘，配以必要的衣柜和家具，一张桃花心木的床，一个盥洗间，里面有一个蓝色的塞夫勒瓷大澡盆，澡盆头上有一个大写的字母N作标记。行李分发就特别忙乱。粗使的男仆正忙得不可开交，再加上叽叽喳喳的女仆也要在卸下来的东西中理出哪些是她们主人的。因为不是拿错了箱子，就是弄错了帽盒，在这座象一个小城市一样的迷宫般的城堡内，不可避免地每次都会出些差错，于是更加乱得无法形容。一切总算安顿停当了，人们便急如星火地穿衣打扮，要在七点以前全副武装起来，因为七点钟是觐见皇帝的庄严时刻。

如果皇宫的日常内侍们也对这种盛会表现得兴致勃勃的话，我想那些第一次有幸登上朝廷的新手，对这一颇担风险的荣誉就会感到万分激动了。一个经验丰富、谦虚而又勤恳的艺术家、作家或学者，事先毫无准备地被召到这个与其说是恩赐荣耀之地，倒不如说是时刻被监视之所，他们要越过多少设在他们脚下的障碍，要费去多少心思以避免出差错，又要绕过多少暗礁啊！怎样才能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声誉，以使其不受影响，又怎样才能避免因稍有不慎引起的举措失当，从而招致全巴黎人的嘲笑！因为这些事情，第二天便会传遍整个巴黎，而那些从事切实工作的学者、艺术家们，他们从未离开过图书馆或工作室，而现在突然让他们

当作众人嘲笑的对象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扮演一个不知说什么台词才好的角色，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考验！

登台之前考验便开始了，首先必须脱去原来穿的礼服和普通外衣，换上规定的服色，黑色或天蓝色的法国式上衣，短小的紧身裤，高腰丝袜，只这一身崭新的滑稽可笑的奇装异服就剥夺了这些新来者的兴致并足以使他们无所措手足。据说为了应付这种情况，走投无路的于勒·桑多，派人找来了梅里美，向他请教该如何处置拖在他裤子上的那些长带子。当他知道了这些带子的作用在于防止他的长筒袜的袜筒不致掉到脚脖子上时，桑多于是结结实实地把袜子捆好，以免在皇帝陛下驾前，众目睽睽之下露出两条光腿。但当晚上回来时，他不得不叫来两个仆人帮他解下捆在他腿上的这些镣铐。

晚宴尚不算十分可怕，皇帝和皇后指定他们合意的客人坐在他们旁边，其他人可以随便就座，如果碰上运气好，还可以安安稳稳地吃上一顿，而不必强行摆出正襟危坐的姿势和强颜欢笑的神态。依据习惯做法，允许夫人小姐们在开宴之前，先邀请一位男宾向她伸过胳膊领她进入餐厅，这在惯行此道的里手们的行话中称之为“带领吃饭”。当圣一勃夫第一次被邀请到贡比涅来时，一位元老院议员的女儿埃克伦小姐想陪着这位著名的批评家一起吃饭，于是下午当他们在纸牌室玩牌时，这位小姐便走上前来对他说：“圣一勃夫先生，今天晚上您领我去吃饭好吗？”由于圣一勃夫对这里的习惯一无所知，感到惊惶万分。当然，他也和别人一样，曾抨击过“皇室的腐败”，但从外表上看，如此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使他十分反感。但站在她面前的，毕竟是一位可爱而漂亮的小姐，于是他便面红耳赤。

地深施一礼，尽量地掩饰着自己的局促不安，尽量做出殷勤得体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表示了同意，并马上就去寻找一个堪可藏娇的隐蔽饭店以消受这一天上掉下来的美女。由于他对本城这类事的内情很不了解，他想，还是先婉转地问一问同来者中经验丰富的人比较妥当。谜团马上便被指破（这可能也会使他感到万分失望吧），人家告诉他，这一使他颇受刺激也很令他陶醉的表达方式，在本城堡里是一种很流行的字眼。到了晚上，他便高高兴兴服服帖帖地“领”着这位美丽的天仙从纸牌室走进餐厅。

离开餐桌后，首先要在吸烟室逗留半个小时，然后宾客们便到长廊会齐；必须承认，在那里呆的那两到三个小时是“令人难耐的”。尽管皇室主人们殷勤好客，但除了爱德蒙·阿布一家，维奥莱一勒一迪克一家，梅里美一家及另外的少数几家外，其他每个人都觉得异常拘束，不敢大声言笑，生怕做出有失体面的举动，或者怕如有些人说的“出洋相”。但几位名媛其善出洋相是出名的。例如，有一位太太，她在长廊的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位皮肤棕红的夫人，这位夫人似乎十分烦恼，她于是便冒失地问鲁埃尔^①先生：“这位矮个子黑皮肤女人是谁？”这位“副皇帝”很镇定地回答说：“是我的太太”。她万分窘迫，不再问下去，并很快地跑到另一位女伴那里，说：“您能想象得到吗？我刚才问鲁埃尔先生，那位黑皮肤，短身材的太太的名字，喏，就是那边那个……”“我已经回答了您，‘是我太太’”鲁埃尔带着最高雅的微笑又这样重复了一遍。原来在不知不觉间，鲁

^① 欧仁·鲁埃尔（1814—1884），当过律师、部长、总理等，他当时有个外号，叫做“不负责任的副皇帝”。——译者

埃尔先生就跟上了这位太太并且离她只有两步远。这一小小的插曲是悄悄地在下面发生的，这给了当时瞌睡得要命的客人们一点小刺激。有时皇帝为使大家从瞌睡中振作起来，便请他身旁的某一位著名学者就自己擅长的专业知识举行一次报告会。于是有一天晚上巴斯德就充当了几位漂亮太太的老师，把自己研究的血液循环知识讲授给她们。尽管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担心出现的笑话还是出现了。因为皇后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便用针把自己的手指扎破，为显微镜提供几滴血液。但伟大的学者巴斯德对他的示范一丝不苟，竟然抗命不遵。他说，他要用“青蛙的血”！于是试验推迟到第二天，命令也已下达，整个森林的警卫人员都动员起来捉青蛙。并有人把一大口袋活青蛙放在学者的房间里，但当后来他离开这里时，早把此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下一批客人住在这个房间的是一位年轻的外国公主，她第一夜就被一种奇特的声音弄醒了，便掌灯下床。这时，她的光脚板似乎踩在了一个冰凉、粘湿的东西上，她低头一看，便失声大叫起来，把行宫的人全部吵醒……当大家跑过来时，她已吓得处于半傻状态，因为在她周围是一大群活蹦乱跳的青蛙。

晚会上，梅里美给大家做听写，成绩是：一共二十行字，皇帝四十八个错，皇后六十二个。随后便是听亚历山大·仲马说俏皮话，听爱德蒙讲诙谐幽默的笑话，听卡尔波或是库蒂尔的粗俗生硬的故事；接着便玩“摩洛哥国王”，“妇女化妆”，“面粉里摸戒指”等游戏。这些游戏是当时寄宿学生们常玩的娱乐活动，但仍有忍不住的呵欠，仍有在角落里偷看挂钟的目光。这时皇帝本人便开始摇动机械钢琴，当他看见一两对大胆的舞伴在客厅里翩翩起舞时，他演奏得更起劲了。

在国外（在国内也同样），把贡比涅的集会说成是“尽情狂欢”的日子，在座的许多人带着气愤和羞耻的表情谈论这些事。听到这些刺耳的谣传，坐在一张长沙发上正在和睡魔作斗争的梅特涅亲王夫人，不时地睁开她那双嘲弄人的眼睛，打量着这些经过挑选召来的人们。当时这些人正认真地玩着年轻孩子们玩的无伤大雅的游戏，在两个呵欠中间，她小声自语着：“真是索多姆和哥莫尔赫”。^①说完，她又闭上双目，很有礼貌地等待着祝福时刻的到来。因为到那时，皇帝和皇后将离开此地，因而也就把自由还给每个人。

25. 皇后的灾难

只要翻开现代史看一看便可知道，在所有个人悲剧中，毫无疑问，夏洛特皇后的精神失常，应该是最惨的事件。

她非常有教养，性格坚强，喜欢冒险。1863年10月，这位公主当时二十四岁，她的丈夫奥地利王子马克西米利安已经在四年前戴上墨西哥帝国的皇冠了。当时夏洛特热情地接受了这一命运的安排，但有谁知道她内心的失望呢。法国答应留在墨西哥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占领军，为期三年，以等待这个新帝国组成自己的军队。但三年过去了，马克西米利安

^① 索多姆和哥莫尔赫都是巴勒斯坦的城市。据圣经记载，由于上帝的愤怒，便把索多姆用火毁灭，因为这里的居民犯了人兽杂交的罪行。后世便称这种行为叫“索多姆”，同时把这些事件当成火山爆发一样的灾难来看。哥莫尔赫和索多姆同时被天火所毁。梅特涅亲王夫人在这里提到这两个城市的名字，意思是这些谣传能象天火烧掉索多姆和哥莫尔赫那样可怕。——译者

的军队并没有组成。

到1866年，拿破仑三世定下的契约已然期满，法军接到了回国的召令。这对这位墨西哥皇帝来说，是他幻想的破灭。他被他的姻亲遗弃在这个陌生的国土上，似乎隐约地看到了自己最终的归宿。但他以不擅离自己的职守为荣，于是夏洛特决定自己远渡重洋，恳求那位法国人的皇帝暂缓撤兵一年，起码暂缓几个月。

皇后的出访和逃跑差不多。她借口到尤卡坦半岛去旅游，但当人们在普韦布拉等待这位皇后时，她已秘密地在康拜什登舟起程了。陪同她前往的只有一位忠于她丈夫的邦拜尔伯爵，戴尔·巴利奥伯爵夫妇，和她的医生斯摩勒戴尔博士。当时巴赞^①正率领着法国占领军，当他得知皇后向法国方向航行时，他立即命令停泊在维拉克鲁斯的巡洋舰起锚追赶。但这边早已采取了防范措施，夏洛特提前了八个小时，护送她的船只时速为十五海里，而巡洋舰每小时只有十二海里。

这次的穿洋渡海进行得很顺利，并且非常迅速。年轻的皇后对这次出访的成功信心十足，并不断地谈论着她对墨西哥这个年轻的帝国光辉未来的信念。但随着距法兰西海岸越来越近，她那张开朗乐观的脸上也便笼罩了越来越多焦虑的阴影。布莱斯特停泊场到了，接着便进港。他们下了船。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欢迎客人的栏杆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拿破仑三世派来的人迎接这位女皇亲？不错，一个人也没有。夏洛特脸色变白了，这是她第一个挫折。但挫折绝不止

^① 巴赞：阿希尔·巴赞（1811—1888），法国元帅。参加过许多战争。1862年被派往墨西哥，随后他便被任命为远征军总司令，1864年晋升为法兰西元帅。——译者

此，更加严酷的打击随后便接踵而来。她一分钟也不想耽搁便动身去巴黎。坐在车厢里她第一次感到一种失败的情绪，并且失去了勇气。她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如果她有时还讲话的话，那是她对给予她的使她难堪的接待表示惊讶。随员们力图安慰她，说到达巴黎后，肯定会得到官方正式欢迎的，而且朝廷的车队也肯定会到车站上来迎接她，她会在车站上看到皇帝的内廷侍从，也可能皇帝会亲自前来接她。

“也可能不会。”她低声自语。

随后她便重新陷入令人难堪的沉思。

在巴黎和在布莱斯特一样，没有任何人前来迎接她。既没有车辆也没有人向她提供住处，没有一个人向她打招呼，没有一束鲜花，甚至在车站月台的通道上连专为迎接皇族用的传统地毯都没铺。夏洛特几乎昏厥过去。她骤然间面色绯红，就象别人给了她一记重重的耳光一样。但她还是昂起头来，努力装出笑容。但戴尔·巴利奥伯爵夫人却注意到，从这时起，皇后的表情便变了，原先那种温和、亲切的眼神黯淡下去，从此再也没有出现。

她命人送她到“皇家饭店”下榻。她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并拒绝进餐，她的随从中一个女侍对此十分不安，说道：

“皇后可能非常痛苦，自从她父亲莱奥波德曼驾以后，她可从来没这样过，他们的症状都一样：面色灰白象个死人，浑身打颤，手脚比大理石都凉，总是独自一人呆着，真叫人担心……”

拿破仑三世还在圣-克鲁未归。第二天整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从那边没有传来任何消息。直到第三天才来了一个内侍，拿着一张请柬，请她在行宫午宴。这一邀请被夏洛特高傲地拒绝了。她声称，下午才去圣-克鲁，三点左右再

动身。

比利时的一家杂志在1908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次悲剧性会谈的文章，是根据一位当时和这位墨西哥皇后非常接近的人的回忆写成的。此人的名字未被透露，但却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1866年8月的那天下午，在通往圣一克鲁的大道上，一驾双篷四轮马车，关得严严的，戴着这位年轻的皇后向皇帝的行宫驶去，凡是看见这辆马车的行人，绝不会料到，在垂下来的车帘内正演着一幕残酷的悲剧。夏洛特整个上午泪水洗面，并不断歇斯底里地发精神病。在去行宫的路上，她更加激动，情绪更加狂躁，以致使得坐在她旁边的戴尔·巴利奥夫人几乎要命令马车立刻返回住处。但车子仍然在前行，终于进入了行宫的庭院。这位年轻的皇后极力支撑着走上那巨大的台阶，她迈着坚定的步子，挺胸昂首，面色绯红，穿过了一个个的接见厅，在一个客厅内，拿破仑三世正在等她。他显得心事重重，很不高兴，正在用手“捻着他的胡须”。他旁边是皇后欧仁妮和皇太子。照例的行礼如仪，照样的官样文章的互相介绍，互相陪着笑脸，礼节是十分讲究的。随后皇帝便走进他的办公室，两位皇后尾随其后，房门便陆续地关上了。夏洛特的随行人员等候在侍从室里。

当时在场的卡莱特夫人后来追述说，这位墨西哥皇后在会谈的那天，身穿一件黑色丝绸长裙，那是在出发前匆忙从一只箱子里拿出来，还带着“褶皱”，肩披一条镶边的黑色纱巾，一顶非常合适的白色帽子，是当天上午在一家名帽庄里买到的。这位夫人还回忆说，皇后的随从只有两名伴妇，“长得奇丑，又黑又矮，法文讲得结结巴巴。”其中的一位就是戴尔·巴利奥伯爵夫人，她是夏洛特的忠实朋友，她从来想不到认真地打扮一下自己，真是可怜的女人。但

当时这位伯爵夫人的思想正随着她的女主人一起在经受严酷的考验。她知道，在紧紧关闭的皇帝办公室里，正在演着一幕恳求和苦痛的悲剧。也正是为此，马克西米利安的这位年轻的妻子才远涉大西洋来到这里。在这一庄严的时刻，一切都将作出安排。在漫长的两个小时内，在那扇顶上雄踞着几只迎风展翅的巨鹰的包金大门那边，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好心的伯爵夫人承认，她在这两个小时内心默默地乞求着上帝慈悲为怀，给予这位正在向人恳求的皇后以庇护。

这时，似乎能听到一些压低的话语声，随即声音便大起来，接着就听到了激烈的争论，随后又寂静了。在侍从室里，夏洛特的朋友们面面相觑，焦虑不安。突然，又听到了皇后的嘶哑声音，只听她嚷道：

“我怎么能够忘记我是谁，又怎能忘记您是谁呢！当我在一个波拿巴族人的面前低三下四并和一个冒险家谈话时，我应该想到，我血管里流淌的是波旁家族的血液，但我也绝不会卑躬屈膝地辱没我自己和我的家族！……”

接着，便是什么东西跌倒的声音，紧接着又是一声，然后又复归于静，此时声息皆无，静得使人难以忍受。办公室的门开了，拿破仑三世出现在门口，他面色十分苍白，用眼睛寻找着戴尔·巴利奥夫人，并对她说：

“对不起，请您来一下。”

伯爵夫人便走进皇帝的办公室，已经昏厥过去的夏洛特，四肢蜷曲着躺在一张长椅上，样子象个死人。满面泪痕的欧仁妮皇后已经把夏洛特的上衣钮扣解开，并迅速地脱下她的高筒皮靴和袜子，跪在全身冰冷的公主旁边，用香水摩擦着她的双脚。她苏醒了，一眼看见伯爵夫人，便向她伸出一只

手，浑身哆嗦着说：

“玛奴丽达^①，别离开我！”

皇帝本人也有些手足无措。他焦躁不安地在长椅周围转来转去；在屋子里大步走来走去，出去又进来，不知如何是好。他召来一位医生，命令他赶快去通知留在饭店里的斯摩勒戴尔医生。欧仁妮皇后一边抽泣一边断断续续地向巴利奥夫人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开始国王拒绝夏洛特的要求，她请求，她哀告，哭泣、威胁甚至疯狂地责备皇帝。欧仁妮皇后一边说一边准备了一杯糖水，便跪在这位仍然全身僵直的公主面前，把杯子送到她紧闭的嘴边，这时夏洛特使劲地把杯子推开，并用可怕的声音喊道：

“杀人凶手们！别管我！把你们这毒药拿走！”

说完便泪如雨下，随之又昏了过去。在这可怕的歇斯底里发作时，每讲一句话便似乎使她失去一分理智。她蜷缩在伴妇的怀里，请求她不要把她丢在“这个想抛弃她，便给她一杯毒药喝的波吉亚^②的后代人身边。……”

皇帝实在受不了这个行将死去的人的折腾，便把匆匆从巴黎赶来的斯摩勒戴尔博士领了进来。医生的第一个措施便是请皇帝和皇后陛下离开这间屋子，让他单独和病人在一起，并且必需立即把公主用马车以最快的速度送回旅馆。出发的情景是凄惨的，送行的朝臣神情沮丧，都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似的，但“每个人都流下了眼泪，戴尔·巴利奥夫人发现，皇帝的眼里也在慢慢地流着泪水”。

从那时起，夏洛特皇后便精神错乱了，并再也没有恢复

① 戴尔·巴利奥伯爵夫人的爱称。——译者

② 佛朗席斯哥·波吉亚（1582—1685），是西班牙的一位亲王，曾作过贝鲁特总督，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欧仁妮是他的后裔。——译者

过理智。长时间以来，对这位贵族的不幸一直保守着秘密。在这次决定命运的会谈第二天，所有报纸都登载了皇帝和皇后陛下在圣-克鲁行宫接见墨西哥皇后的消息。这些报纸都说：“会见持续了两个小时，是在极其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

这样报导历史事实，官方的报纸历来如此。

26. 法兰西学院院士米歇尔·夏斯勒

在第二帝国的最初年代，当米歇尔·夏斯勒六十八岁时，他的声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名字和朋松·泰拉伊或者和蒂莫泰·特里姆的名字一样广为公众所称道。其实他的工作只不过得到为数极少的几个大学者的重视。他所以声望极隆，是因为他成功地研究出“由圆到椭圆的转变”，这一成就在数学界曾引起轰动。而使他更加红极一时的，则是由于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均匀椭圆形对顶点的引力》的报告。

这位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1812届毕业生，布鲁塞尔《数学和物理通讯》的撰稿人，比利时王家学院和法兰西学院院士，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大地测量学教授，法国四级“荣誉勋位”获得者，素以头脑最敏锐，思维最严谨，最富批判精神和最有远见而著称于世。勿庸置疑，这些成就的获得是得力于他的数学实践的。但他却不把自己囿于纯科学的圈子里，他那宽阔的研究才能涉及到人类知识宝库的其它许多方面，

而且同样取得了肯定的成绩。他喜欢历史，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和名人手迹，并善于从历史中吸取丰富的经验以供当代借鉴。

1861年有一天，一个衣着寒酸的可怜人来到他的办公室，此人恳求这位著名的学者抽点时间和他谈谈。这人身材矮小，年约四十五岁左右，双目炯炯有神，脸面刮得光光的，举止彬彬有礼，对人谦恭礼貌到近于有些虚伪的程度。不过，略带点卑躬屈膝的媚态，不会损及这位地位低下的小人物的尊严，因为夏斯勒先生实在是渊博广大而这位客人又实在是胸无点墨，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他哪里来的时间受教育呢？他是住在夏托登郊区的一个短工的儿子，他只在通常那种简陋的乡村学校里学会了写几个字和念几句书，此外便一无所长。为了糊口，他便在夏托登的一个诉讼代理人那里当跑腿工，由于他办事专心和准时，便当上了法院书记室和裁决办公处的抄写员。他来巴黎已经三年了，经人推荐，他在那些专门为关心自己贵族家世的人们制造证书和印制六百年前旧家谱的家谱学者们中找了一位老板，并在他的办事处谋到一个小小的职务以糊口。

上面便是这位来访者向夏斯勒讲述的他自己的全部历史。关于那些已为大家所共知的事实，这里便予从略。他自称名叫富兰—吕卡。这个名字就有点古怪，第一个音节发音象“富利”^①，另外两个音节更可以叫人放心大胆地想起旧时戏剧舞台上那些老实巴交的赶集农民。随后他便以十分抱歉的口气谈到来这里的原因：富兰—吕卡刚刚从一个老贵族布瓦斯儒尔丹家族那里买了一大批旧资料，这批宝贵的资料

^① 富兰(vrain)和富利(vrille)在法文都只有一个音节，“富利”意思是“野猪的尾巴”。——译者

在大革命时期曾装船运往美国，在美国的巴尔的摩存放了很长时间。现在，布瓦斯儒尔丹家族的后裔想把这一批宝贵的资料收回，载运这批东西回国的船只遇险失事，大多数资料都被海水浸泡并且几乎弄得难以辨认了。因此货主便以极其便宜的价钱把这一批东西卖了出去，并希望不要公布自己的名字。简单地说，富兰一吕卡得到了这批东西，并来向这位在这方面最具权威的学者请教，在这一堆废纸中有否仍能利用的东西。作为样品，他从衣袋里拿出几张信纸，并焦虑地期待着对它们的价值作出鉴定。这些信纸因在船上长时间被海水浸蚀已经打了皱，并且字迹模糊，几乎不可辨认了。他把这些信放在夏斯勒的办公桌上等待这位学者的鉴定。

夏斯勒戴上他最好的眼镜仔细地辨认着上面的字迹，随之他惊喜得抖动着双手喊道：

“这是伟大的帕斯卡的信！是写给英国化学家罗布·波义耳的，上面讲的是有关科学的研究问题！这些信证实，有些发明被认为是牛顿的功劳，其实，荣誉应该属于我们的帕斯卡。因为，你看，我们这位《箴言集》的作者，喏，你看，在这张纸上，从1648年起就提到了地心引力规律，而牛顿的发现要比他晚二十年！”

对此一窍不通的富兰一吕卡很谦逊地听着这位学者充满激情的评论，既然这些资料使他如此感兴趣，可以把其余的那些都转给他。布瓦斯儒尔丹提供的东西中，类似的资料多得很。

“我都要！”夏斯勒喊道。

富兰一吕卡推说他不能一次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拿来，因为资料多到要装满三辆马车，这种成交的方式也似乎有点太轻率了，它可能引起商人们和其他搜集者的贪欲。富兰一吕

卡表示愿意分小批量地并且不加选择地把东西送来，因为他对这些太无知了，无法估计这些材料的重要性，将由夏斯勒来作出鉴定并负责挑选。

从此以后，这位必恭必敬的抄写员每天便把他头一天晚上整理出来的东西带到这位院士家里来。夏斯勒如获至宝。这里面有卡锡尼的，加里莱的，于克汗斯的，莱波尼茨的，安托尼的，奥皮塔尔的和贝努依等人的手稿，光这些手稿就装了好几纸箱，……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奇迹。其中有最吸引人的科学命题；有关于微分学的文章，有关于无限小分析法和圆锥曲线分析法的理论，有物体运动的理论……等等。看了这些东西，你简直觉得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必须重写。可以想象得到，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1865年7月8日，在科学院，兴冲冲的夏斯勒把帕斯卡的信件放在桌子上，这些信件已被列入法兰西学院的学术记录之中。在座的每个学者都非常激动，而夏斯勒所获得的荣誉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妒忌。不是就有那么一位善于嫉妒的同行曾含沙射影地说，文章中提出的那些公式和标准的运用，根本不可能为帕斯卡所认识吗？但夏斯勒以其充足的理由进行了驳斥。随着争论的进行，富兰一吕卡又为他找到一些新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帕斯卡本人，提前两个世纪就反驳了今天持反对意见者的论据（这个伟大人物的富有远见的才华是多么了不起）。证明是充分的。每次会议，夏斯勒都带着新的武器前来参加。持怀疑论者不得不低头认输，或者至少是被驳得哑口无言，尽管勒维烈仍然固执地说一句：“这是假的！”。而外国学者们（他们也加入了争论）则声明，这些来自法兰西的使人震惊的发现，使他们感到目瞪口呆。

其实，夏斯勒的正直坦率和他那颗善良的心则在这场争

论之外；他的学识和批判精神是不容置疑的，必须绝对相信，更何况，他现在还掌握着一个来源十分充足的武器库，可以据此来反驳那些诽谤者的大军。布瓦斯儒尔丹所提供的材料是取之不尽的，并且门类繁多，浩瀚如海。富兰一吕卡现在又在里面发现了亚历山大大帝^①给亚里士多德的信，阿基米德给尼录的信，毕达格拉斯给萨福的温言软语的信，一件复活后的拉札尔^②给圣·皮埃尔^③的请求书，还有韦森吉道里克斯^④回忆录的片断……他甚至还可能很容易地再制造一封该隐给阿贝尔的威胁信^⑤，因为这些荒诞无稽的信件都是他自己伪造出来的。这些事已为大家所熟知，成为家喻户晓的了。

是的，这个对学术一窍不通的夏托登的小职员，这个低声下气愚昧无知的富兰一吕卡，但他却轻易地欺骗了所有的人！

他的骗术被揭穿以后，首先使整个巴黎为之震惊，随后便作为笑料广为传播。富兰一吕卡事件在1870年2月交由轻罪法庭第六庭审理。这一事件是第二帝国最后六个月里大量出现并成为人们谈笑资料的“新闻”之一。在开庭审理时，夏斯勒亲自出庭，颇带伤感地陈述了他是如何发现这样一个使

① 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是当时马其顿的国王。——译者

② 拉札尔，耶稣的朋友和弟子。据《新约全书》载，耶稣曾使他死而复生，因而引起了他的敌人更加刻骨的仇恨。——译者

③ 耶稣的十二弟子之一。原名西蒙·皮埃尔，是耶稣的赐名，意为“石头”，以示他在建立圣教堂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耶稣曾对他说，“你是一块石头，在这上我将建起我的教堂。”——译者

④ 韦森吉道里克斯（前72—46年），高卢人首领，名声显赫，曾与凯撒作战，后在罗马被处死。——译者

⑤ 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他致力于农耕，而他弟弟阿贝尔则一心向往过牧主式的田园生活，因各种原因所致，两人矛盾很大，最后该隐把阿贝尔杀死。——译者

他深受其害的骗局的。原来富兰一吕卡答应给他送三千份资料，但又迟迟不肯交货，这位学者耐心地等待着，同时又怕这位供货人把这些东西转移到外国从而使法国失去这一批难以估量的巨大财富。为此，他便对此人进行监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上了当，富兰一吕卡每天都忙于伪造这些文件；因此，撰写需要时间，把编造出来的东西抄在从旧书上撕下来的空页上也需时间，同时，为了更象原物，他必须把这些东西处理成象旧纸一样发黄，象被海水泡过一样发皱，然后再把它们弄破，搞脏，烤脆，这就更需要时间。

就这样，在八年的时间里，他向夏斯勒提供了二万七千份资料，把十四万法郎装进自己的腰包，并把全世界的学者都搞得惶惶不可终日。这一切的代价是两年监禁。但受惩罚最重的，还是那位不幸的夏斯勒，他曾在这美丽的梦幻中漫步了那么多年，而今被剧烈地震醒。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富兰一吕卡的欺骗行径，更不用说他为此白白地空欢喜了一场。

有人向法庭提交了这些有意义的资料中的一部分，于是法庭便开始阅读苏格拉底，西塞罗，西罗德……等人的信件，全是用古法文写的，可试举亚历山大大帝给他“最亲爱的亚里士多德”的信件为证：“我的朋友，不要对您公诸于世的任何一本书感到满意，应该把它们捆起来藏之名山，因为一旦传世便会使它们黯然失色……至于您要求我到高卢去旅行以便学习德洛依教祭司之学，您不但允许我这样做，而且为了我子民的利益您还亲自进行了这一工作。您并非不知我对这一民族所具有的敬意，我认为他们在世界上是出类拔萃的。向您致意。奥林皮雅历55年20日——亚历山大。”

这位波斯人的胜利者对我们民族这一有利的和为时过早

的评价，确实迎合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因此，人们对这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夏斯勒要努力对此作出证明的意义便理解了；他的失误远非到了幼稚地相信拉札尔，阿基米德，克娄巴特拉，或者玛丽—玛德莱娜能用十六世纪法语写信的程度。而是富兰—吕卡事先就料到人们会对此提出疑问，因而他说：“这是学者阿尔琴^①在查理一世时便搜集并整理出这一批旧书信，把它们放在图尔的一个修道院里，七个世纪以后，由拉伯雷重新整理，对这些东西作了誊抄和翻译，这些抄件大部分都是拉伯雷自己的，后来便由布瓦斯儒尔丹收集起来。”

那么富兰—吕卡的这些贗品后来的归宿如何呢？它们被放在法庭的保管室里，毫无疑问是在1871年的大火中毁掉了。但一下子竟能毁掉二万七千件之多吗？是否可以有以下几种设想，即所有的东西全部毁于大火；或者至少有那么几件被人从档案中抽走；或者夏斯勒没有把它们全部拿出来。他能有那种勇敢精神把他花了八年的心血从事研究的这些资料一下子就判为死刑而彻底销毁吗？以当前的市价而论，一件维吉尔^②的书信手稿，尽管由拉伯雷改抄过，其价钱仍然相当可观。如果某一位收藏家在他的房间里有那么一件的话，尽管可以肯定它是来自何处，我还是怀疑，他是否有勇气在他的收藏品目录上写上这样贬低其价值的评语：“此件系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米歇尔·夏斯勒先生的收藏品。”

^① 阿尔琴（735—804），是盎格鲁—撒克逊学者，同时又是查理一世时代的柏拉图学院的会员。——译者

^② 维吉尔（前70—前19），拉丁诗人。——译者

27. “女大公”

1853年在阿让市。当时她年方二十，一头棕发，一副桀骜不驯的顽童面孔，住在一个假发店铺楼上的一小间破屋子里，每月十二法郎的房费。她午饭和晚饭都一样，就是一块面包和几个李子干；赶上加班的日子，她就在清水里放上一匙醋，这是她习惯的饮料。她是个喜剧演员，在城里贴出去的戏剧海报上，她的名字是“奥尔坦斯小姐”，月薪五十法郎。而这些钱又叫她那位总是赔钱的老板以各种形式的罚款名义重行收回。她演通俗笑剧、大型歌剧、喜剧、悲剧、滑稽歌剧；需要时还跳舞，参加合唱，充当各类群众角色。演出自下午六点开始，到半夜结束，这真是苦役犯干的职业，但她却心满意足。除了上台演戏，她从来没有妄想过有更好的运气。她原先住在波尔多，父亲名叫施奈德，第一帝国在莱茵河地区招兵时落选，是个老实巴交的裁缝。当她还是个孩子时，这个小姑娘的兴趣便显露出来，她最高兴的就是站在裁衣案上，一边表演一边背诵寓言故事，其动作表情，就是最忧愁的人见了也要破颜一笑。不久她便在一个女裁缝铺里当送货工，有时也在一个女卖花商那里做小工。随后她就混进一个业余剧团。她缠住一位老艺人，在必要时指点指点她发声和换气。因此，当她和阿让市剧团签订了苛刻的合同时，便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最理想的职业。但这不是指荣誉，她不把荣誉放在眼里，因此阿让市的那些附庸风雅的纨

袴子弟便理所当然地看上了她。他们欣赏她的也不是别的，而是她那张什么也不在乎的俏脸；是她那轻盈而略带羞怯同时又非常放肆的单腿旋转；是她在演出时，剧本上没有而由她自己加进去的那些大量的“欢乐调情”动作，而她做这些动作时又是那么泰然自若。当然，对这一点他们也很欣赏，即当某一位剧场里的常客邀请她吃夜宵时，她是那么贪婪，那么能吃。这时，她便是席上的厄芙萝西娜——大家当时就这么称呼她。这个名字是美惠三女神中的一个，在古希腊和罗马，人们想寻欢作乐时就把她的雕像摆在桌子上。这种小型的晚餐经常举行，以致阿让市的一位贵妇人不得不到剧院经理那儿告状，说他的这位女演员力量所及已经影响到本城最严肃和最古板的夫妇了。

这样过了两年。在这两年当中，她陆续演出了《奈斯尔之塔》的片断，《宠妃》中的依乃斯，俊姑姑圣—弗鲁尔。在《汤姆大叔》中演一个黑人，以及《海蒂》中的小水手。另外她还在数不清的演出中跑过“龙套”。她就带着这样一身本事于1855年的某一天来到巴黎，并拜访了歌唱家贝蒂埃。她那张十分天真而又动人的俊脸很讨这位歌唱家的欢心。她同时便开始了四处奔走活动，她鼓动剧院的经理，参加试演，强迫自己听那些花言巧语和那些彬彬有礼的回绝话：“非常遗憾，爱莫能助……”“本剧团已经满额……”“请您等一年以后再说，如何？……”。她于是来到索尼尔路口一个阴暗的屋子里，这里住着一位可怜的德国音乐家，他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租了一所原为魔术师用的木板剧场，正在筹备组织一个剧团。这位音乐家性情非常暴躁，人又长得奇瘦，瘦得就象个单簧管，其躁劲发起来就象单簧管吹出的三连音。为把这个不速之客打发走，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德国

音，半通不通地用法语说：“你先，给我唱一点，不管什么都行。”说着他便坐在钢琴前边，她便开始唱起包列罗舞曲①中的《黑色的外套》。才唱了几句，这位音乐家就把钢琴盖合上了：“你是在哪里学来的？”“在波尔多先生。”“你有教师吗？”“是的先生，老师是……”“肖（小）可怜葱（虫），你消息（学习）不好，我真香（想）在你屁股上给你一脚，我原以（愿意）你‘进笼子’②，就是说，我收你当学生，听明白了吗？每月二百法郎。”于是奥尔坦斯·施奈德和雅克·奥方巴赫这两个名字在这一天便第一次在合同上出现。

请不要搞错，那一天确实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因为她尽管带着缪司女神的羞怯感，这对她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即它是一个通俗喜剧演员诞生的证据，而这位演员将成为整个时代的特征。当时拿破仑三世统治着杜伊勒丽宫，而奥尔坦斯·施奈德正走向统治巴黎的道路。在通俗喜剧大行其道时，这位皇帝常常被这位大众化的女歌唱家远远抛在后面。

一个外省的极其普通的店铺的小杂工，一个原阿让市剧团里的未流配角演员，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竟能使整个巴黎为之倾倒。在她红极一时时，甚至当时旅居在这个大都会的所有欧洲各国的君主们都争先恐后地向她表示敬意。她垄断了整个剧坛，她的工薪高得吓人。在排练场上她专横跋扈。在对台词时，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台词，不管是谁的，都归她说，而使别人无法张口。凡是她稍感有可能成为她的对

① 一种西班牙舞曲。——译者

② 法语 engagement 是“参加”、“加入”之意，但他清、浊音不分念成 encagement，这就变成“关进笼子”的意思了。——译者

手的同行都加以排挤。1864年她演完《美丽的埃莱娜》以后，1867年又演出了《热罗尔斯坦女大公》，她得到的彩声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她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女皇。在布罗涅森林，她坐在华丽的四轮轿车上，车子周围是她豢养的八条狗，行人见了赶紧闪开并停下来，说：“大公夫人！这是大公夫人！”大家向她致敬，向她欢呼，她简直就是正式的女皇陛下。在勒絮尔大街拐角的皇后大街上有她的公寓，墙上的三角楣塑着一个漂亮的孩子，手里拿着一把竖琴，上面的题词是“我唱过了”。在这所豪华公寓的大门外停着俄国沙皇的车子。在《大游艺场》她的化妆室里，国王、大公、总督、亲王以及各部大臣们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她。可能有一天那位色情狂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泰奥多罗也许会把他的皇冠奉送给这位女演员吧？……

然而这一切，都被色当的隆隆炮声所震垮。随着拿破仑三世宝座的坍塌，这位热罗尔斯坦女大公也从宝座上跌了下来。经过几个月的动荡骚乱之后，法兰西又从死之中复苏了。万业萧条，死气沉沉的巴黎，似乎又万象更新了。但奥尔坦斯已不复存在，虽然她仍然活着，并且一直那么漂亮，而且，她的天才仍在，但她却被遗弃在历史的废墟中，已属于另一代人了。她试图重整旗鼓，再在她的成名之作中恢复往昔的声誉。观众们仍然向她鼓掌，但这掌声是出于礼貌，在观众的欢迎中，她嗅到了一种对她往昔岁月的哀悼味道。她处于极度的忧伤和不安之中，于是便动身到俄国去。在抵达沙俄国境时，一辆专列在等待着她，里面温暖如春，座位松软舒适。这是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为表示1867年他在巴黎时他们之间的友谊所赐给她的荣誉，尽管有人说未免稍嫌过份了些。在彼得堡，她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当时她相信厄运已然

过去，便又回到巴黎重操旧业，但她又遭到巨大的挫折。她在一个未流剧场的舞台上做了最后一次凄惨的尝试后，仍然没有赢得观众，于是她只好把女皇的宝座让给别人。曾是戏坛霸主时那些煊赫一时的往事也和其它方面的回忆一样，充满了苦涩。但奥尔坦斯是坚强的，她将把她忍受的痛苦永藏心底，从那以后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打动过她并使她重新出山。

就在这时，她做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件蠢事，她和一位比她小好几岁的异国绅士结了婚。蜜月尚未度完，奥尔坦斯便感到自己是太不慎重了，她们便开始分居。随后便是那次引起满城风雨的诉讼纠纷，最后终于离异。通过这一事件她终于保住了她生命中最光荣的一页，从此便孤身一人离群索居。全巴黎人都知道她住在凡尔赛大街123号离普安都儒尔不远的那所房子。这幢住宅布局十分简单，但却非常舒适。它差不多就坐落在圣—佩丽诺乔木林对面，不久前那里还是绿树成荫，幽静宜人的地区。这所房子是按照奥尔坦斯·施奈德自己的方案建造的。她后来的名字叫布里约诺伯爵夫人，仍然使用着和她蜜月未了的丈夫的姓氏。就在这所房子里，她度过了自己最后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她从事慈善事业，乐善好施，把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她任名誉院长的艺术家孤儿院。她死后把她的公寓，她在费康的别墅和所有的财产全部赠给这所孤儿院。在她的客厅里有一张富丽堂皇的女大公肖像，手持马鞭，头戴高顶长毛军帽，毛皮大衣斜披肩上，勋章、绶带配满全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年中，有人经常在《大游艺场》楼下包厢的角落里看到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妇人坐在那里。她非常健康，衣着平常，尽管她脑后束着棕色发髻，大

家还是猜得出，她就是奥尔坦斯·施奈德，前来重温她当年演出的老剧目了。在家里，她是个称职的家庭主妇，每天都和女厨师订好当天的开支，菜点是精美绝伦的。她原就喜欢珍馐美味，现在仍然如此。1920年5月6日早晨，她刚喝完作为早点的一杯巧克力，便躺在那张有天盖的大床上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七岁。

28. 一个反战者的战斗

是的，他是一个“反战者”，至少他是这样说过。当时“反战者”这个词还没有造出来，“反战”的事也几乎没有。但他却发表反战的言论，并且他从内心深处对征服者就有一种强烈的仇恨。但当1870年他得知色当战役惨败以后，他的“反战”信条并没有影响他，莫里斯·德雷夫第一批参加国民自卫军的炮兵团。并且每天早晨都到圣母院前边的公园广场上认真地学习擦炮和练习使用送弹棍。

该炮团大部分人都是由象他那样具有反战情绪的人所组成。他们从入伍的第一天起，便都服服帖帖地，专心致志地接受各级上司的训练。该团指挥官名叫维克多·舍尔歇，他在12月2日的战斗中负过伤。在整个帝国时代一直被流放在外。此人身材高大，四肢也特别长。他凹胸、驼背，歪头。头歪到几乎要触到地；一双温和而沉思的眼睛，密密麻麻的白色络腮胡子箍住那副异常苍白的面孔，一口男低音，说话缓慢而稳重。他的部下对这位弯腰驼背的“老板”十分尊

敬，他也和这些新兵们相处得很好。他经常是身上裹着一件宽大的，路易十四式的茶青色厚呢长袖外套，以抵御大雾和寒冷的侵袭，但对他虚弱的肺部和全身的各种病痛却漫不经心。这些病痛使他全身佝偻着，就象棵多年的老柳树。他所属的那些全国闻名的杰出人物，已在他的命令下集合好了，他们是奥古斯特·瓦克里，保罗·莫里斯，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弗洛盖，亨利·布里松，爱德蒙·亚当；当然，都是士兵。他们和组成这个团的主要成分的手工业工人、小店主们同志相处，亲如兄弟。其中年龄最大的，是1848年街垒战中的老战士鲁塞尔老爹。他原是个石匠，他经常这样自我介绍：“我今年五十八岁，有八个孩子都当兵，再加上我，刚好是第九个。”在鲁塞尔旁边，是一个年轻的房屋油漆粉刷工，他身边经常带着一个年龄只有十二岁的小弟弟。此外，军队里还有一些不成军人体统的人，比如，一个商店的小伙计，一个羊毛批发商，一个保险公司的经纪人，一个马车夫，等等。这些老实人同操一门炮，同样对兵器这一行一无所知，但他们在操练中却十分刻苦、认真。

通过六周的训练，经鉴定认为可以正式开始操炮了。这时征求他们有谁愿意到火线上，不到一小时，登记册便已满额。12月20日凌晨三点半，整个队伍便集合在卡鲁塞尔广场。可以相信，队伍是雄伟庄严的，但这既不是指他们的步伐整齐，也不是说他们有漂亮的军服。由于财政拮据和时间紧迫，士兵们都没有大衣。其中最阔气的，是在自己的上衣外边披上一件民用外套，把上边的钮扣改成军用的金属钮扣，这种钮扣上装饰着两门交叉的炮管。莫里斯·德雷夫二十多年前曾对此发表过回忆录，本文便是采用其中最出色的一部分。这位回忆录的作者当时穿一件叙利亚人赶骆驼的斗篷。

这种斗篷十分宽大，印着红白两种条纹。在这之前他一直用来当化装衣物，而除了在化装舞会上乐队用以外，它也实在没有别的用途。

队伍在深夜穿过巴黎，尽量使自己象个军队的样子。拂晓，部队到达罗曼维尔。当时气温低到七至八度。站在小山岗上可以鸟瞰战场上全部风光：光秃的田野上，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朵朵的硝烟在上升、扩大，晨风把硝烟吹散并送来了枪声、炮声。炮声撕人肺腑，机关枪声呼啸凄厉，但却只闻其声而不见其物。在一条漫长笔直的大道上，停着远不见头近不见尾的各式车辆，每辆车上都插着一面红十字白旗，那是战地医院的救护车在等着接收伤员。

这就是战斗吗？舍尔歇的炮手们坐在一个土岗子上，罗曼维尔堡垒的大炮就在他们头顶上开火，炮弹划破空气，尖叫着呼啸而过。大家都饿了，于是每人分到一块马肉和半份面包。到什么地方弄点菜，作个汤不好吗？有些人便分头去找，回来时每人手里便拿着一把草一样的东西，那是野蒜头。在一户农家找了个厨房便生起火来，马肉和野菜一起被扔到锅里，水开了，这时候就听到“打一粒一打一打”，“打拉打打”的号声响起，这是出发号。把锅里的东西向外一倒，便又出发了。战争可真是个害人精！军队又回到罗曼维尔。在村子里的街道上，一群国民自卫军挤在一起，紧紧地贴墙站着，以给炮兵的辎重车队让路。炮车上装着乱七八糟的炮弹，上下颠簸着以最快的速度向前飞跑。经过一个小时莫名其妙的停留以后，队伍又出发了，当天色黑下来的时候便到了罗斯尼。这时炮手们便住进一个空房子，门窗都没有了。在屋顶上，用斧头搞下一条大檩木，把它点着，每个人便轮流着充当古罗马供奉女灶神的贞女，看守着这个唯一的笨家

伙不使它熄灭。并看着它一点点进入炽热状态，随后便慢慢地烧光。

这些住在大城市里的百姓军人，平时他们大多数人都躺惯了松软的沙发床，上面盖着暖和的被子，现在大家都躺在地上，并且饥肠辘辘还被烟薰得透不过气来，居然睡得比在自己家里舒适的床上更为香甜。当他们醒来时才发现，温度已经下降了十八度，每人分到一点酒，但它们在铁杯子里便结了冰。没有一个人发一句怨言，倒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遗憾，便是在夜间的战斗中没有用上他们，只当了一个纯粹的旁观者。

自从司汤达以其众所周知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滑铁卢战役以后，读者们便不再惊奇于一个战士，对于他自己亲身参加的战役竟然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所见也甚少。那么，如果有人企图在莫里斯·德雷夫的书中寻找战略性的阐述或者整个战役的完整画面，那也是枉费心机。而其中最有味道的则是那些非常坦率的印象，非常生动的描述，一个战士，他原来的职业和战争绝无瓜葛，对他来说，战场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既新奇又陌生。倘找出比这一层更为深刻的，则是它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军队，尽管参加的人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如果是临时凑合起来的组织，那也是没有战斗力的，这一点恐怕连作者自己也没有想到吧。这些1870年由巴黎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他们具有法兰西民族所有的美德：英勇战斗，沉着冷静，富有牺牲精神，但却缺乏他们本应具有的东西：统一的行动，持久的韧力和足够的训练。这些基本因素的缺乏，就使得他们热爱祖国的献身精神变得毫无意义了。

当我们看到这些城市的有产者中的大部分人，从开始时

毫无纪律观念，并且很难于接受一种军事思想，终于改造成真正的战士时（然而已经为时太晚了！）我们该感到如何的痛苦啊！在一开始，他们根本不想丢掉对战争这一蠢事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毫无顾忌地嘲笑军官们穿得过于花哨，过于威风，披挂得过于光灿；他们并批评那种让这些军官们按兵不动却先去从容地讨论什么作战计划的做法。随后他们便不那么吹毛求疵了，不再进行无所谓的争论了，他们变得乐于服从命令了。直到战争结束，人们便把他们看成（几乎是完完全全地看成）这支伟大军队的老兵了。

在罗斯尼堡垒内过着孤军生涯时，他们和布列塔尼的水兵在一起，这些倔强的巴黎人把堡垒指挥官海军上校马莱当成偶像崇拜。他们跟随他去作战就象去参加一场游戏一样。这位身材短小，长着一个长鼻子，瘦瘦的脸上有一脸络腮胡楂子的海军上校，好象完全能使他们相信，他指挥他们去干的事，似乎是世界上最容易，最没有危险的工作。普鲁士人从加尼和兰西打来的炮弹象雨点一般向这一小股法军部队飞来，但不是落在前边便是落在后边，马莱双手插在衣袋里，愤怒地判断着弹着点：

“射程不够！……又太远了！……一群笨蛋！你们把炮打到这种程度难道不害羞吗？……还是射程不够！……”

他不停地骂着“这些愚蠢的德国人，他们甚至连一门炮都打不准”。突然，他高兴地喊起来：

“总算是命中了！”

一点不错，是命中了，而且很准确。一发三十公斤重的炮弹落在这群人中间。他的这种气愤情绪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却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所有的人，水兵们和那些“老百

姓们”，当炮弹打不中时，和他同样愤怒。当炮弹在他们中间爆炸时也和他同样高兴。那情景就象打网球一样。

“注意！……这是给我们的；……这是给你们的，……太偏右了！……又偏左了！”

当敌方的炮弹呼啸而至时，他们便趴在地上，鼻孔埋在泥沙里，双手护住脖子。等爆炸过后，大家便放声大笑，又站了起来。天黑了，指挥官马莱和大家回到掩蔽所，坐在睡觉的屋子里聊着家常，或者马莱给他们读故事听。大家都非常尊敬和喜欢他。只要他一声令下，所有的人便可冒死出击。当他被任命为海军准将时，他们充分地认识到，为此大家经受了多少考验。当看到这位指挥官用手抚摸着一条拆下来的原来老军衔的金杠，并用针把这些新发的准将金星钉在他海军上校军帽上时，大家都感动得流了泪。那位1848年就参加过起义的老兵鲁塞尔老爹，很爱惜又怜恤地和他谈着话，并且颇带民主味道地称他为“准将公民”。对此，马莱尔准将回敬他为“公民鲁塞尔老爹”。

这些巴黎来的“准炮手”们，甚至在六个月以前还喊着“和平万岁！”并且宣传着战争的恐怖。现在居然颇为自豪地回忆着他们的海军同事们以训练值勤军官的身份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水手”的日子。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把自己的炮兵军帽换成了海军贝雷帽，并勇敢地表示，自己已经可以成为正规军了。当他们得知，一切都已完结，必须投降时，指挥官马莱的部下宣称，有人曾答应他们宁可和堡垒一起炸毁在阵地上也不投降。他们要求兑现这一诺言，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反抗上命。为了表示抗议，他们把所有的武器装备都放到院子的中央，象烧柴草一样燃起一堆大火，把子弹匣等都扔进火里付之一炬，并把战刀、枪管、刺刀等不能烧毁

的东西尽行砸坏，每个人都拿出所有的力气把一切都砸毁以不给敌人留下半点完整的東西。

第二天，胜利者开进已撤空了的堡垒。只有一个仓库保管员留在营房，并打开了所有的库门。指挥这一占领军小分队的德国中尉，看到这一堆被法国人毁掉的武器残骸，便把他的部下召集起来，并下达口令，

“立正！举枪致敬！”

他指着这一堆废铁说：

“这是法国水兵留下的武器，凡在它们前边经过的人，必须敬礼致意！”

29. 福楼拜轶事

现在已没有人再写《箴言集》了，许多人对此颇感惋惜。这是一个以拉丁文结尾的词，再在前边冠以一位名人的大名，正如大家所知，便成为一本这位名人的《名言录》、《谐趣集》或《轶事集》了。坊间曾有过《斯卡里热尔箴言集》、《梅纳热轶事集》、《桑托里箴言集》、《塞格莱箴言集》、《皮隆轶事集》、《伏尔泰轶事集》、《比埃弗尔轶事集》、《尚弗尔特轶事集》、《波拿巴轶事集》……还不算普拉东写的对话录，它完全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苏格拉底箴言集》。《箴言集》是一种易于写作的文体。它无需任何叙述和媒介，对于编年史作家来说，是再方便不过了。只要允许我在这里汇集一些对这位写过《包法利夫人》和《情感

教育》的大师的回忆便可以写出他的轶事，但这绝非因此就能够把这样一位有着多方面气质的伟大人物给准确地反映出来。有一位学者，在和他的知己友人的书信往来中（他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研究了我们将在本文涉及的有关福楼拜的轶事，这位学者首先承认一个年轻、机敏和富有朝气的福楼拜。但这样的一位福楼拜由于忧郁以及精神和肉体上的苦痛，随后又因受到严格的教育，很快便消失了，而1870年的灾难便最后把他彻底摧垮。这位热情奔放、性格开朗的朋友，这位高卢人，或者说这位刚强的诺曼第人一旦被激怒他便会雷霆火爆地要荡尽一切愚昧和人间不平。但是还有一个寂寞寥落的福楼拜，这位福楼拜孑然一身，独处在克罗瓦赛的乡间别墅，过着差不多是修士般的生活。在那里，他又重新萌发了他奔放的热情和慈善的心肠，尽管他极力克制自己，但他仍然是一位幻想家，一位《萨朗波》和《圣安东的诱惑》^①式的，极富激情的艺术家。

是的，这才是他的思想变化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伪善者，我也不善装腔作势，这都没有关系！但我却总是招致别人的误解。这是谁的错呢？无疑，这是我的错，我比别人想象的要颓废得多。就因为我生就一副堂堂的近二米之躯和一张红脸膛而招致这种误解，但我却象一个少年一样那么腼腆。我甚至把一束束鲜花放进抽屉任其枯萎而不敢呈献于所爱者的面前。我仍然和年轻时那么狂热地爱，这种爱是真挚的，深沉的，沉默的。每当夜深人静，我便徘徊于疏星朗月之下，盘算着如何夺得这种爱，并准备到意大利旅行，幻想着如何为‘她’争得荣誉。

^① 《萨朗波》和《圣安东的诱惑》都是他的历史小说，分别写于1862年和1894年。——译者

我就是这样地折磨着自己的身心……某人的一瞥，便会骤然令我脸色苍白。我经受了这一切，并且感受颇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而我却在它周围筑以‘高墙’，但宫殿并没有坍塌。”随后，有一天，他终于带着斑斑的伤痕醒悟了，他大声疾呼：“墨水是可以使人沉醉的美酒，既然生活是如此的残酷，那么我们就浸沉于幻想之中吧；既然上帝不赐给我们玉液琼浆，那么我们就到墨水中去寻求醉意吧。”最后，由于对现实感到无望，并在人世间普遍存在的愚昧无知的现象刺激下，他于是决定，为自己建立一个巨大的讽刺的丰碑，这便是《布瓦尔和佩居榭》^①。整个福楼拜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诗人、小说家和嘲讽者。

大家都知道他最后一本书的故事：两个巴黎某书记室的抄写员，布瓦尔和佩居榭，在一次偶然的约会中相遇，随成莫逆之交。但他们对狭窄的生活天地深感不满，当其中的一位继承了一笔遗产后，他们便在诺曼第购置了一处田庄，因始终念念不忘创造他们的新生活，于是便双双离开首都。他们什么都研究，查阅天文年鉴，研究各类小册子，翻阅《家庭财物宝鉴》。他们又什么都想试一下，但又什么都搞不成，而又对什么都感到厌倦，于是便又象原先那样，回来重操旧业，仍然干抄写工作。

《布瓦尔和佩居榭》是一本熔各种知识于一炉的了不起的大作，是对所有相互“对立”的和相互“抵消”的科学体系的一个惊人的批判。为写这本书，福楼拜光参考书籍就读了几千本；积累了所有能为他的这两位英雄的荒唐行为所用的资料。他对与此有关的一切都进行了研究、挖掘和学习，

^① 这是福楼拜最后的一部讽刺小说，可以称为《情感教育》的姊妹篇。
——译者

人们对他的评论就象雅南对富尼埃的评论一样：“这个小伙子是个通才，又是个专才，而对其所专又颇具天才。”他花了如此大的努力，进行了如此多的工作，其成果便是写了一大堆笔记，尽管没有完全用上，但却详细地分了类。这是一部集人间蠢事之大成的资料，看后不禁令人拍案叫绝。莫泊桑曾翻阅过这些东西并做了某些摘录，其中颇多精采之处，请看：

“……莎士比亚这人，尽管他非常粗俗，但并非没有读过书，也并非没有知识。”

——拉阿尔普

“国家的富裕，得力于民族的繁荣昌盛。”

——路易·拿破仑

“当一个法国人越出国境，他立刻便置身于异国的土地上。”

——L·阿万

“一旦超越了限度，便没有了限度。”

——篷萨尔

“我发现，鱼类是一个奇异的动物，它们能在很咸的海水中生存、繁殖，而长久以来，这一种鱼类竟然没有灭绝。”

——戈姆神甫：《不屈的基督教理》

“狗，一般地说，有两种相反的色调，一种色调是明快的，另一种是阴暗，这样，它们在屋子里的无论什么地方都能被发现而不致于和家具的颜色相混淆。”

——佩尔纳丹·圣皮埃尔：《自然界的谐调》

“跳蚤在白色的褥单上到处乱跳，这种本能就使我们能够比较轻易地捕捉它。”

——同上

“西瓜天生下来就是让人切成许多瓣以供自家人享用，西葫芦则不然，它比较粗大，可以和邻居们分着吃。”

——同上

我们总觉得这些一本正经的蠢话只不过是《布瓦尔和佩居榭》的作者和我们开的玩笑。我的上帝！为了证实确有此事，那就该去读一读拉阿尔普的《文学教程》，或者《自然界的谐调》，这您是懂得的，人们会对此望而却步。无论怎么说，这种稀奇古怪的书，读来总有点使人难过的，并且有可悲的滑稽味道。我怀疑这本书的写作只不过是为了刺激一下“资产者”而已。而刺激一下资产者又是福楼拜头脑中早已有之的打算。他在这方面实在和一个留着长长的头发的《克里斯蒂娜》和《艾娜妮》时代的浪漫主义者一样。也可能是因为他出于对那种庸俗的世俗观念的厌恶，而不知不觉地影响了私生活的某些方面。

比如，他穿的裤子就非常奇特。靴子口上的那一部分特别窄小，可沿着两条裤管则越往上越肥大。他平时在家里穿

的是特制服装，上衣又宽又短，而裤子则宽大得象条裙子，腰带却只用一条细绳。要嘛就只穿一件宽大的棕色晨衣上面印有黄色棕榈叶，脚穿绣花的土耳其皮拖鞋。他喜欢在书房里工作，里面摆着摩洛哥皮的沙发，上面再配上坐垫和枕头。他烟瘾特大，放下雪茄便拿起烟斗。

他的工作方式也同样有一提的必要。他喜欢在一张特别小的书桌上写作，那桌子小到就象音乐家演奏时放乐谱的支架。许多手稿便在那上面产生。他有时写着写着便停下笔，拿起一张空白稿纸，在稿纸的正中央，用他那漂亮而豪放的字体写上一句话，只写一句。

这时他便点上烟斗，仰在椅子上对着这个句子出神。一刻钟过去了，他删去一个无用的字，再过一刻钟，又换掉一个不确切的词，又过了一刻钟，他把原句划去一半，改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这样，他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完成了一句真正满意的句子，并为此欢欣鼓舞。

他通常用下午的时间处理和回答朋友们的信件。他写信从不写年月日，而只写星期，如：“星期三晨”，“星期二晚”，“星期一深夜”……但为开玩笑也时有例外，如：“8月24日星期六，圣·巴泰勒米纪念日，每年这一天伏尔泰都发烧。”

福楼拜每年夏天都在鲁昂北面塞纳河边上的克罗瓦赛度过。那里有他母亲的庄园。秋季，他又回到巴黎。在巴黎他住着一套非常简朴的房子，地点在圣—奥诺雷区边上。在这儿的生活和在克罗瓦赛一样，除了构思便是写作。只有星期天用来接待朋友，当然，只限于文化界的同仁和要好的朋友。下午一点到七点是会客时间。对此，莫泊桑写道：“当第一位来访者的门铃响过后，他使用一块红色轻丝绸台布把

他的工作台盖上。于是那些放得乱七八糟写满字的稿纸，以及所有写作用的东西便一古脑儿地被盖在底下，因为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其神圣不可侵犯，不下于一个神甫珍视他的祭品。随后他便自己去开门，因为他的仆人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放假。”

他的朋友们把这种不拘礼节的接待方式几乎看作是慈父般的接见。因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比如龚古尔，左拉，莫泊桑，都德，保罗·亚历克赛，塞阿尔，于伊斯芒斯，屠格涅夫，马克西姆·迪康等。在法兰西历代成就最为辉煌的作家和艺术家中，这些人占据了整整一个时代。

30. 末 日

1871年11月2日，一辆从比利时开来的火车停在巴黎北站，从车上下下来三位绅士模样的人，他们在车站广场登上一辆马车，其中一个命令道：“去圣母院。”于是这辆破得叮当响的马车，特别是用杉木做的年久失修的车窗，走起来响得更加厉害，便顺着马让达大道和斯特拉斯堡大道向塞纳河跑去。

这三位“绅士”一个是蒙提·德·勒兹伯爵，第二位是德·旺塞伯爵，第三位便是尚布尔伯爵。这位亲王在1830年还是个十岁的顽童时，曾在朗布依埃宫登基加冕当过四个小时的法兰西国王，而今，经过四十一年流放岁月，他又回到巴黎来了。

他所要去的圣母院是他小时洗礼的教堂。他让车夫先把他拉到圣一路易小教堂去，这个教堂在“正义宫”的一片废墟中仍然载载孑立。随后便又去“新建桥”，在那里他凭吊了亨利四世的雕像，接着便驱车前往他的降生地杜伊勒丽宫。在这一片焦黄的残垣断壁前面，尚布尔亲王下了车，仔细地在这片残破的遗址中寻求他遥远的童年印象。他再次登车后，眼里充满了热泪，当到了最后一站的圣一罗克，要向车夫付钱时，车夫看到他的主顾哭了，觉得应该安慰他几句，便冒昧地说：“客人，请不必伤心落泪，他们吃我马的时候，那光景比这还要惨呢！”

在圣一罗克的一个阴暗的小教堂里，按原来计划做完弥撒，尚布尔伯爵便到事先安排好的河对岸维拉尔大街南特依男爵家里去住。三天以后，他便出发去尚布尔，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尚布尔，他公开发表了那篇出名的《白旗宣言》，把那些力图复辟君主政体的忠实保皇党人惊得目瞪口呆，痛苦万分。……

以上这些在“正史”中都提到过。但不管你属于哪个党派，都必须承认，我们民族的这一段史实尽管受到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的局限，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感人和最庄严的史实。一方高举着为旧王朝复辟的大旗，另一方高举着为法兰西图新的大旗，双方不断地斗争着；这两面大旗同样都是光荣的象征，而这一斗争也具有其非比寻常的庄严性。它们通过命运的选择，双方都胜利地退出了战斗，有谁能在其它的历史上找到一位亲王，由于他因为自己还是个孩子，不能完好无缺地保住在流放时期驾崩的老王留给他的江山而拒绝登基的吗？同样，又哪里能找到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认为在国家多难之秋复辟君主制是有好处的，但为了

不使这面神圣的旗帜因屡遭失败而受到玷污终于放弃了复辟君主政体的企图吗？我不知道卷入这些事件漩涡中的那些人自己是否看到了这种美德。时至今日，这些事件经过这么长的岁月以后，似乎仍如法鲁伯爵所说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在斗争着的敌对双方谈论起它的命运时，都倾注了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尊敬和那么多的忠诚。这些敌对者双方的爱国心都是同样的真诚，尽管他们的政见有高低之别。

即使人们把眼光只简单地注意于事件的堂皇的表面，那场面也仍然是感人的和壮丽的。在尚布尔发表宣言两年以后，经过公开的磋商和秘密的策划，在此不可能对其细节详加叙述。保皇党人占优势的众议院，看到局势已无法挽回，便勉强同意了实行共和制的提议，总统任期七年。当尚布尔伯爵得知这一背叛行为后，便离开奥地利，秘密返回巴黎。此行并不是出于对他长期坚韧不拔的努力的反悔，他甚至一想到这一实行共和的提议一旦被通过，那么恢复君主政体的一切希望就将永远破灭时便感到十分痛苦。他要亲临其地，就近观察事态的动向，那么，他希望的是什么呢？是局势的突然逆转吗？还是等待着上帝创造奇迹？都有可能。

11月9日，他瞒着所有的朋友，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在巴黎东站下了车，旋即乘车直奔凡尔赛。因为他是自巴黎方向来到这座伟大的君主城市的，在省长官邸，也是当时议会议长麦克·马洪元帅的官邸前面经过时，尚布尔伯爵用他的袖子擦拭了官邸门前布满白霜的大镜子。当他看见三色旗飘扬在官邸屋顶时，便激起一股无名怒火。他在远处看着这座宫殿，忧郁地影射着1789年10月的那些日子说：“就是从那儿，‘女面包商和小伙计’双双出走了。”几分钟以后，亲王来到圣一路易大街5号德·旺塞的住处。这是一所外表极

其平常的房子，座落在一向非常清静的圣一路易大街上。德·旺塞先生使用着第二层和第三层，一位名叫考尔维尔小姐的女房客和一个女仆住在第四层。但必须向这两个人讲明，当这位“国王”来到这幢房子想和他的东道主全家单独盘桓几天时，她们俩不准露面。

确实如此，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亲信人员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住在凡尔赛。就是警察机关，政府当局，甚至连议会里的保皇党人，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这儿。麦克·马洪元帅是第一批知道此事的，因为尚布尔伯爵派人向他提出，要和他会谈。这一要求被这位议长堂而皇之地拒绝了。元帅夫人和布尔巴奇将军也知道这一秘密，但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时，这位亲王便打算在这里悄悄地住下去，可能是等待着元帅改变他的决定。同时他也决心在这个国家命运被决定以前不离开法国。

德·旺塞先生的住处有一个小教堂。尚布尔伯爵每天都听做弥撒时的诵经声。有两位修士，马赛尔神甫和萨维尼安神甫，是教堂的主持。弥撒过后，他便把善男信女们留下和他们长谈。一般他是不太出门的，而他的屋子也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这就是经常给他传递消息的德·布拉卡和德勒一布雷兹。

在凡尔赛居住的十一天中，亲王只出去过两次。一次是去圣一克鲁，为避免被人发觉，是在树林里悄悄去的。他儿时每年夏天都在圣一克鲁度过。但现在已然面目全非了。在这片废墟中，哪里还有往昔的痕迹？在公园里他却看到了小时非常喜欢在下边玩耍的一棵大树。另一次，他竟跑到巴黎。因为他听说要在巴黎残老军人院为海军元帅特雷胡阿举行葬礼，他想借此机会看一看法国军队的阵容，因为他在儿

时就喜欢穿军服。但此行却成为徒劳。因为到达巴黎时已经晚了，分列式已经举行过了，他只能把头伸出车外，远远地看一眼重骑兵团在结束时的队形。这一不凑巧的出行给他留下的印象十分不佳。

就在这时，众议院议会结束了关于总统任职七年的讨论。11月19日晚，议会各小组情绪非常激动，因为君主政体在讨论中已被否定。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了消息：“陛下就在凡尔赛！”大家非常焦虑不安，便询问参加会议的德·布拉卡和德勒一布雷兹，但他们二人却无动于衷，“沉默得象座坟墓”。该怎么办呢？这时处于绝望和慌乱状态的保皇党人主张尽快投票通过此项决议，因为风声很紧，除非……除非就在大家视线集中的主席台后边那扇大门突然打开，“国王”就出现在那里，在大厅里，走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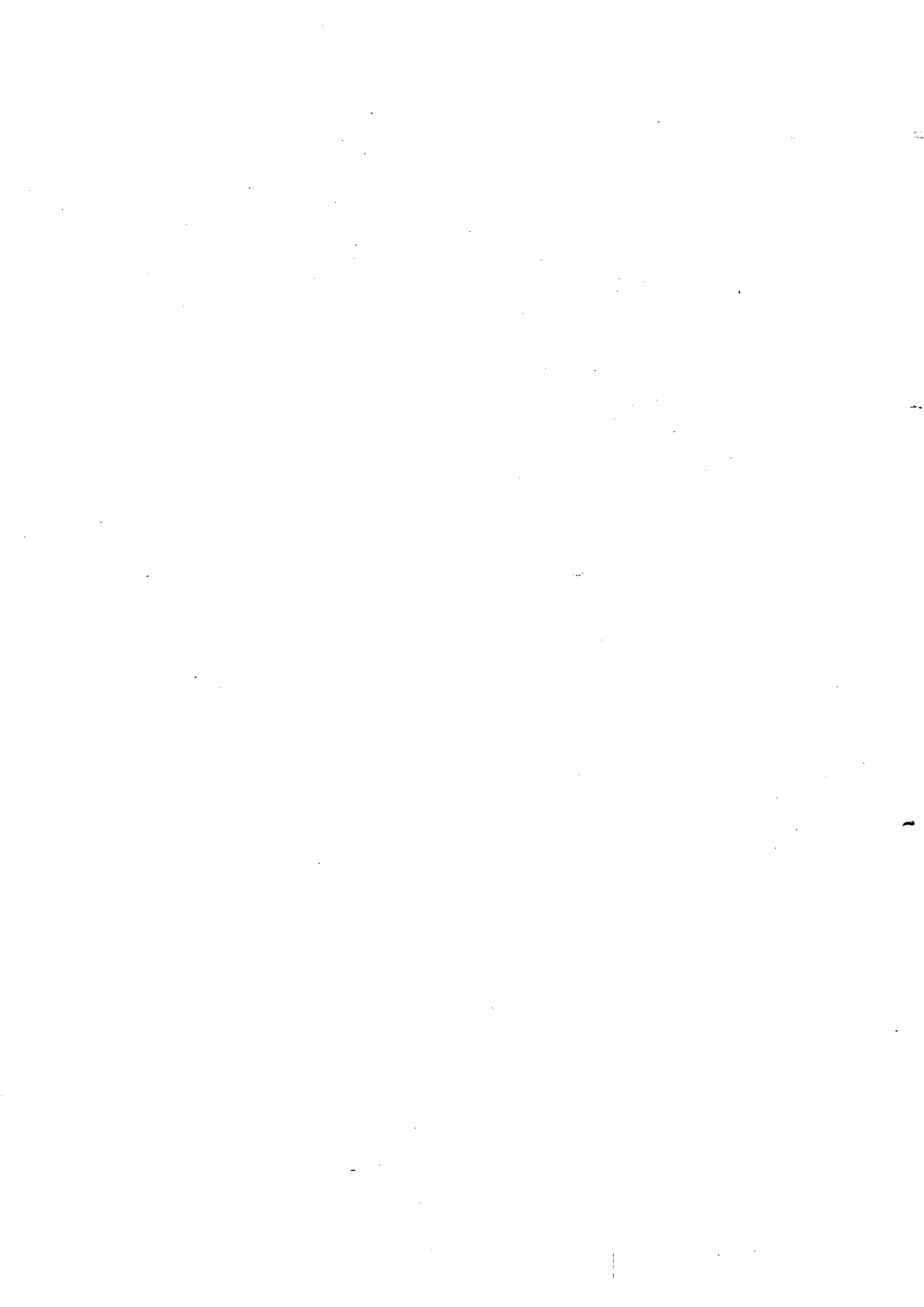
但大门却关得严严的，于是投票便开始了。

根据法鲁先生收集的一种传说，在举行投票的那天晚上，尚布尔伯爵坐卧不安，心急如焚；因为这一表决将决定延长还是拒绝麦克·马洪元帅的政权。因此他便披上一件大衣，来到议会院子里，站在路易十四的雕像下等待选举结果。但洛特先生否认这一说法。据他说，只有亲王的近侍费迪南一个人到议会门口来打听表决情况，并在水库大街上一一直等到清晨一点钟。会议还没有结束，他便回到圣一路易大街，当时他的主人已经就寝，房间里静悄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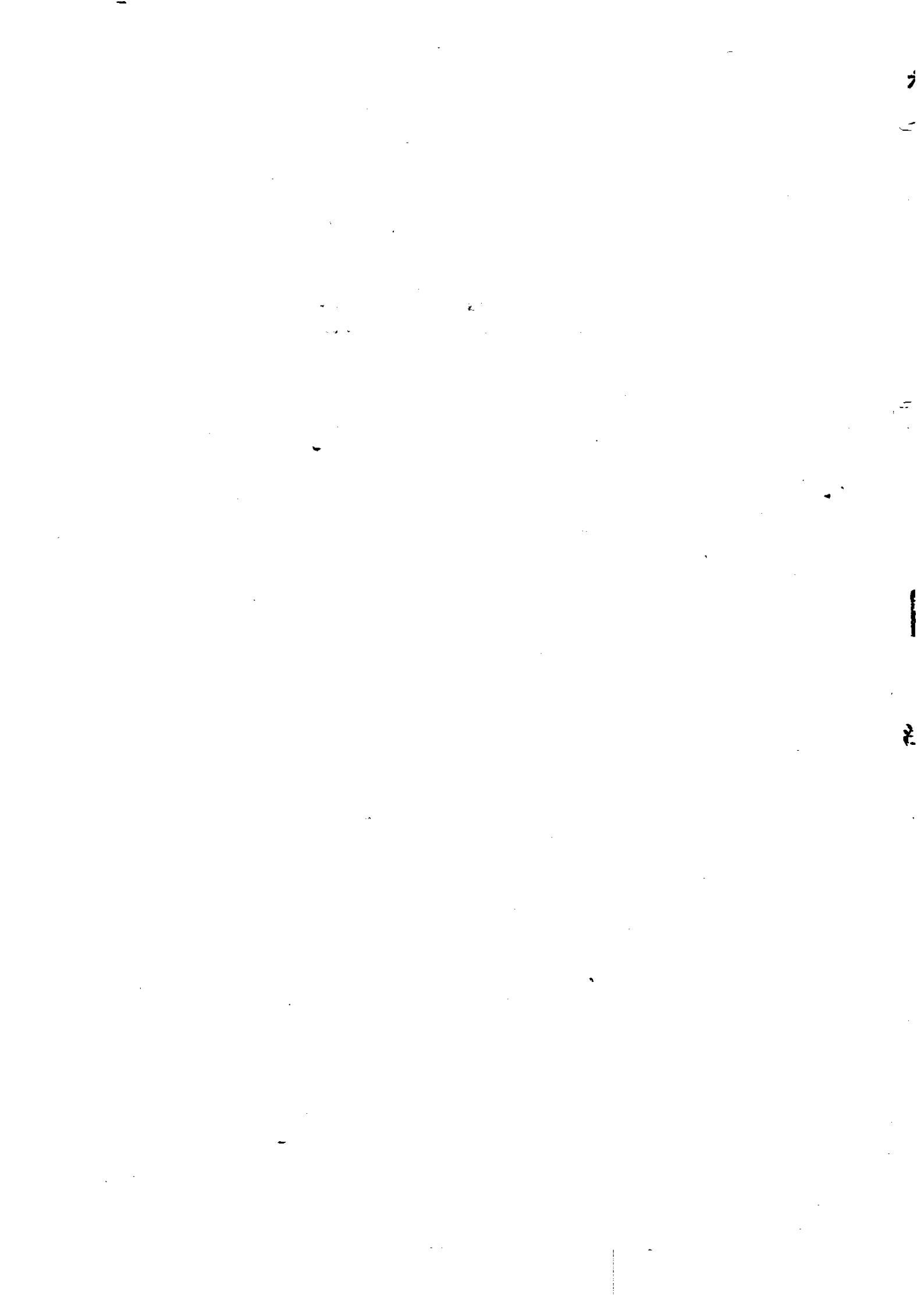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尚布尔伯爵便得知了议会的结果。他首先听完做弥撒的经声，过后便接见他的正式代表们，随后他又接见了迪克罗将军。这位将军一见面就说：“啊，陛下，您为什么不叫我们知道御驾亲临的消息呢？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决不会表决七年制的提案，您失去一个多好的机会

啊！”

的确，这位亲王是太老实了，他居住的地方也过于保密。但现在一切都完了。法兰西给了君主政体一个为期七年的长假……尚布尔伯爵离开了他曾经居住过的、与世隔绝的、也曾是充满焦虑的小屋子。而这时，年轻的共和国已在原王宫里诞生了。这位亲王从拉着他奔向最后的流放生涯的马车上，向这所他的先人们辛苦经营的宫殿看了最后一眼，从此以后便是永别。如果高高站在宽大的王宫庭院里的路易十四铜像有知并看到这一切的话，他肯定会宣布，这是一个十分妥善的办法。因为他生前从未指望过他的子孙们既能始终不渝地忠于波旁家族这面旧旗，又能够得到如此体面和高尚的结局。



巴黎掠影



31. 《旅游指南》

阅者诸君，您知道有一本书名叫《旅游爱好者及外国旅行家巴黎导游》吗？它由蒂埃里编写并于1787年出版。他堪称著名的若阿纳^①的先驱。这是一部十分有价值的著述。首先，因为它对巴黎有一个非常详尽的介绍；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它教给我们应该怎样好客。在当时，一个初来乍到的旅游者，要想在巴黎游览一番，真可说是呼唤无门。他们得不到任何有关的参考资料，也没有任何介绍性的文字，客人们只能到处乱碰乱撞。他们可以什么地方都去，什么地方都看，诸如皇宫内院、贵族府邸、特种场所、修道院、作坊，甚至监狱等地都可以参观。不管是谁，只要有哪怕是几份图表，几本画册，几部藏书，甚至于一件简单的古代家具，他们都能慷慨地拿出来供客人欣赏。旅游者可以毫不费力地进入奥尔良公爵的府第；可以去王家宫殿；可以去孔代亲王的王府；可以参观博戎的住宅，因为他的住宅以其豪华闻名于世；可以到萨尔姆亲王那里看看，因为他的官邸刚刚完工；可以到普拉兰公爵家里拜访，因为他的家具非常豪华，他收藏的艺术品非常名贵。客人们还可以挨家串户地拜访夏博、吕伊、布里萨克和沃德勒依等人的府第，因为他们那里的藏书

^① 阿道夫·若阿纳（1813—1881），法国作家、旅游家和地理学家，在游历了瑞士和德国以后，写了《若阿纳旅游指南》，包括历史、地理、考古和旅游等方面的知识。——译者

非常丰富。还可以到肖尔纳或罗什弗科尔德自然博物馆去看展品，或者去游览一番比隆先生的或者圣一雅姆先生的私人花园……游览项目不胜枚举。甚至连贝藏瓦尔旅馆的浴池和克恩斯基公爵夫人的小客厅也向旅游者开放，前者素以浴池周围塑有克罗丁^①的出浴少女群像而闻名，后者则以客厅内装饰有雕刻的栗树小丛林而颇受称道。这些树的枝条在客厅内攀缘交错，形成一个天然拱顶，而雕在大理石上的树身瘢疤陆离，颇象几束蜀葵。这些妙不可言的实物，这些动人的画册、雕像和出色的陈设，是何等丰富！这些东西大部分还应该存在着，但我们却从无福分得以一见，恐怕也将永不能见到了。因为今天这些东西的占有者比从前有这些东西的人要小气得多了！我也知道，目前的社会对“财富的外表象征”^②的夸耀已无兴趣。不管话怎么说，当代人的心理状态是希望引起别人的怜悯而不愿引起别人的羡慕。……遗憾的是，如此多的高堂华屋竟傲然拒客人于门外，那么多的堪称稀世之宝的艺术杰作竟无由得见（当然，拨门撬锁者除外）。而当我们想到这些财富的从前所有者曾和前来参观的艺术鉴赏家和历史爱好者分享其喜悦，而这一切现已成为过去时，又是多么遗憾！

这绝不是理论上的慷慨大方；这些古物鉴赏家和旅游者，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他们都可以不拘形式的从中得到收获。这里有两位南锡大学生关于1787年游览巴黎的记述。这两位同伴并不那么有钱。因为他们经常是徒步旅行，既不是贵族也没有头衔，既没有关系也没有保证人。他们在巴黎

① 克罗丁（1738—1814），是法国著名雕塑家。——译者

② 这是一句资本主义社会里税务部门的行话，据此，税务部门确定该财物的所有者应交的税款。——译者

这座大城市里无一熟人，但他们却游览了卢夫西恩，游览了王妃巴利夫人隐居的别墅，还游览了王后居住的小特丽亚男官，甚至还到过王后的寝宫。在凡尔赛宫，他们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悠然自得地散步，甚至还和国王一起做了弥撒，参加了圣灵会仪式。在“波旁宫”，他们参观了孔代亲王的居室。因为他们什么都想看一看，替他们作向导的仆人便向他们建议给国王陛下呈一份陈词以获准进入内宫的禁区。亲王批准了这一请求。由于被好奇心所驱使，这两位南锡来的大学生便进入了“硝石库”^①，在那专为关押国家女犯人的大围墙里面访问了“项链事件”^②的女英雄拉摩特，并和她进行了认真仔细的交谈。

这一非比寻常的游览，该是多么惬意和有意思啊！当然，时代是明显的不同了。今天，我们不可能要求共和国总统向旅游者打开他宫殿的大门任其参观，但按照从前的习惯，国王在宴请外国君主时，是准许闲人们在他餐桌的周围逗留观望的。

把我国历史上如此多的胜境和令人感奋的历史遗迹对公众封锁，有此必要吗？

王家宫殿前面那一片蔚为壮观的大台阶，不消说外国人，就是巴黎人亲眼见过的又有几个？但它却是我们民族最完美的装饰艺术的典范之一。法兰西银行有一个艺术长廊，它堪可与凡尔赛玻璃宫的长廊或与卢浮宫的阿波隆长廊争一

① 硝石库是巴黎医院大街上的一所医院，因在硝石库旧址改造而成，因得此名。1656年始，路易十四也在这里同时监押女国事犯。——译者

② 项链事件：发生于1785—1786年旧王朝后期，法国红衣主教路易·德·罗昂为和路易十六的王后和好，在拉摩特伯爵夫人的哄骗下买了一个价值一百六十万里弗尔的钻石项链，但却被拉摩特夫人骗去，于是引起了诉讼。当时舆论界为之大哗，此案最后交由巴黎最高法院审理，结果红衣主教无罪释放，拉摩特夫人送进硝石库监押。德国作家戈特普说：“项链事件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前奏。”——译者

日之长，对此，又有几个人知道呢？看见过国家档案馆里普赛克客厅的又有几人？这一客厅在法兰西几乎独一无二的。可以肯定，那么多的诉讼人、律师、法官，他们每天都把司法部大厅的长廊挤得满满的，但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想到，就在那座大厅下边，就有世界上最了不起和最华丽的哥特式地下建筑群。

所有这些，不应对公众保密，它们在某些时期，由于某些特准对外开放过，看守人员也对来访者给以最热情和最和蔼的接待，并出版了许多极其详尽的旅游指南。巴黎的图书馆里就有三万多册有关的非常珍贵的介绍资料，但这些资料对于一个只在巴黎逗留半月二十天的人来说，有时间读它们吗？

最好的办法是，让我们的大街本身变成一个博物馆，使那些楼、台、馆、榭本身便能向游客介绍自己的经历。巴黎文物登记委员会在增添纪念性文物标牌方面做了值得赞扬的努力，但还远远不够，大家对此寄予莫大希望！有一种议论认为，有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今天最好不要再提了，因为对某些古人是否值得纪念至今尚有争议。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们认为向公众陈列和介绍他们的事迹和遗物并不存在褒此贬彼的问题，目的是使外国人（也包括巴黎人）在对历史的回顾和参观中能享受着一种陶情冶性之乐趣。比如，当他们沿着圣—奥诺雷大街游览时，能在标牌上读到在这一街区上曾发生过的各种历史事件，不论这些事件是光荣的还是悲惨的，这难道不会使游者的游兴更加浓厚吗？

比如，这幢房子是所谓的“猿猴的房屋”，莫里哀便在这幢房子里诞生，而那幢房子曾经是拉维拉克^①的住所，而

^① 弗朗索瓦·拉维拉克（1578—1610），法国恐怖分子，曾密谋杀害过亨利四世。——译者

这边又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旧址。国民公会议员巴帕尔曾是那边那幢屋子的房客，就在这里，波拿巴本人曾指挥过葡月的炮战。象这样良莠并存，不分厚薄，不也是很好吗？又比如，这个旅馆是诺阿耶旅馆，拉斐特^①曾在这里结过婚，并且有许多次在这里接受群众对他的欢呼致意。还有若弗兰夫人的沙龙，沙布列尔的住宅，拉封登曾在那里住过很长的时间。此外还有在革命年代大享盛名的卡皮西修道院和弗扬修道院，以及细木匠迪普莱的住所，罗伯斯庇尔曾在他家躲藏到热月9日。再远一点，就是马蒙泰尔和阿尔普的住宅了……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如果游人从这里向杜伊勒丽宫方向走去，竟然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向你指出这个长期以来曾使我们国家惊心动魄的宫殿的旧址在何处，对此难道不使人感到遗憾吗？为什么不可以原国民公会大讲坛的旧址上建立起一座纪念性的建筑呢？根据施工说明书提供，这原是个“低矮的讲坛，漆上古色古香的绿色，装饰着黄色的壁柱，青铜色的柱头有三个用假斑岩做成的圆环顶”。该说明书并画有该讲坛的图形，可能这个讲坛的原物还在某个家具贮藏室里保存着。在原地重新把它复原是不太难的，可以完全按原样用有色大理石造一个，这一想法是多么令人神往！如果有人觉得复活这样一个大型纪念物不太公平从而有点危险的话，那也不妨来个对等的措施，即在花园的那边同一个对应的位置上，在已成为平地的宫殿旧址拿破仑办公的地方，也造起一个纪念性的建筑物，不就可以了么？对此谁又能会吹毛求疵横加挑剔地说，巴黎竟在石头上或者在大理石上刻写它的编年史呢？但对它的游客们来说，能够在了一本公开的导游手册

^① 法国历史上有好几个著名的拉斐特，这里可能指的是曾帮助美国进行独立战争的拉斐特。——译者

的冰冷书页上以一种更加引人入胜的方式读着这一切，又该是多么有吸引力的事！

那些功利主义者们可能会耸耸肩膀说：“这不过是为了给这样一批陈年旧货树碑立传而浪费我们的金钱罢了。”算了，由他们说去吧！这并不影响热爱历史的人们幻想着一个这样的巴黎，即他们每走出一大步便会遇到一批人的灵魂，这些人在历史上曾使巴黎声震寰宇。旷达的狄德罗曾说：“朋友们，让我们幻想吧，当我们幻想时，我们便会忘记一切，而这时，生命之花也便在不知不觉中出现。”

32. 献给巴黎第一圣人

——卡米洛热纳

我要说，在巴黎人中，名声最为显赫的 应该是卡米洛热纳。对此，希望不要引起大家的不快。至少，他是当时第一位名噪全球的人。二十个世纪以来，在巴黎出生的名人录中，即使按年代顺序排列，他的大名也一直列于群贤之冠。这绝非一种无足轻重的荣誉。

然而读者可能计不知道卡米洛热纳是何许人也，这可是未免有点数典忘祖了。当巴黎还叫吕太斯^①时，它只不过是塞纳河上的一个岛屿，上面只有一些简陋的茅屋。当凯撒的摄政官拉比努以替罗马帝国的骑兵部队征调军马为借口，前

^① 吕太斯是古高卢的一个城市，位于塞纳河的一个小岛上，即现在的巴黎市区。——译者

来攻打这个可怜的小镇时，尽管当时卡米洛热纳已是“老态龙钟”了，他还是起来号召他的过着平静生活的同胞们奋起反抗，进行一场独立战争，并且带头勇敢地在那些著名的罗马兵团所经之地进行反抗斗争，于是一场伟大的战争便爆发了。这些巴黎人很有成效地攻击了那支曾经征服过世界的部队。但他们不懂得战略战术，而罗马人却非常善战，卡米洛热纳在战斗中被俘并被处死，他的军队也随之土崩瓦解。但拉比努并没有进驻吕太斯，而是向勃艮第地区撤去。

那么这场战斗到底是在哪里打的呢？据凯撒的记录，是在莫蒂奥斯敦一带进行的。该地带过去叫“大战谷栈”，后又改称为“航运谷栈”。1424年，有个叫约翰·马莱斯特瓦的人，把这片今天估价能值几十亿法郎的地段转让给布朗—曼多修道院的修士们；其交换条件是，教徒们能够永远到该修道院去做弥撒。1431年，“航运谷栈”这片地区以每阿尔旁十四里弗尔^①的价格出租。两年以后，巴黎的刀剪商们以每年五十里弗尔的价钱买下了在那里的狩猎权。这倒不是为了在那里猎取当年的小山鹑或是打野兔，而是要在那里围捕凶兽。据一位编年史家讲，那里是恶狼经常出没的地方，它们“穷凶极恶地吞吃妇女和儿童甚至男人，1439年在蒙马特和圣—安托尼门之间就有十三个小孩和大人被吃掉”。十五世纪末叶有人估计，这片土地可值二千六百里弗尔图尔^②。1563年，巴黎新城开建，把它一分为二，城里部分地价大增。卡特琳娜·维维安的丈夫皮埃尔·费多在这里修了两条路，如今已成了闹市并仍然以这一对夫妇的名字命名。城外

① 古代法国一阿尔旁约合二十至五十公亩，一里弗尔约为古代一斤银的价格。——译者

② 法国图尔城出的一种钱币名。——译者

的那一部分也有了买主。1628年以一万二千九百十八里弗尔的价格售出四阿尔旁，且售价还在逐年上涨。到路易十四执政初期，在“航运谷栈”一幢房子加上四阿尔旁的菜地，其价格竟达七万里弗尔。1671年因巴黎城区太窄，把城墙外延了一些，并修建了林荫大道，在大道旁边，一特瓦兹^①的地皮竟高达十六到二十里弗尔（每平方米约合四、五法郎）。布朗—曼多修道院的那片地皮分成了小块。1720年昂坦河堤修建成功，这样一来，扩大后的巴黎城区又搞得拥挤不堪，于是它便跨越河堤在平原上扩展开来。承包商人便在这里盖了许多旅馆，诸如布莱特旅馆，拉勃尔德旅馆，勒诺蒙—戴蒂奥尔旅馆，格里摩德拉·雷尼尔旅馆，德拉热旅馆等都是那时建起来的。在林荫大道的北边，一条条热闹的大街便奇迹般地象雨后春笋一样相继出现。其中有一条街是在年轻的伯爵阿尔多瓦的赞助下建成的（即拉斐特大街），另一条街以当时的巴黎市长命名，叫佩尔蒂埃；还有一条，建成于1775年，以城市法院书记官的名字命名，叫泰布。许多漂亮的建筑物也一排排的拔地而起。1789年大革命时期，在林荫大道，泰布大街和一个同名的死胡同（即现在的海德尔大街）以及普鲁万斯大街之间的这一地区的建筑物已经十分拥挤了。从楼下的第一层起直到楼顶的小间都已挤得满满的，前来住房的房客太多了。洛拉盖伯爵在那儿住过，英国的侯爵夫人戴尔特弗和她的儿子西莫尔勋爵也在那儿住过。深受大众欢迎的美国外科医生丹第，拉普将军，塔列兰，泰纳尔，布干维尔，麦克多纳尔元帅，弗朗索瓦·戴·南特，内斯托·洛克普朗，帕尔尼，作家米尔热的父亲（他当时是门房兼裁缝），弗勒里

^① 一特瓦兹约合 1.949 米。——译者

厄，利韦夫人，德雅泽，特律代纳，俄国的德米道夫亲王，迪特，英国的百万富翁理查德·瓦拉斯等等，这些人都在那里住过，还不包括曾住在那里又不为人所知的被遗忘的人。

这些已然作古的人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对那些老屋是有着特殊的感情的，尽管这些旧式房屋在建筑特色上没有任何足以引人注目的奇特之处。它们之所以受到我们的特别青睐，因为它们这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它们仍为我们保留着逝者的生活痕迹，这些人对其所住的房屋是爱护备至的。在这个红尘万丈的大都会里，人们充满了七情六欲，他们互相牵制，互相依附，每一个房间至少都是一个活的戏剧舞台，和各式各样的，多到不可胜数的喜剧舞台。当建筑工人前来把这些已过了时的老房拆除并把墙壁推倒时，它们看起来就象一个个被打碎的木箱。当这些房屋被一层层地拆除时，墙上遗留下的往昔的装饰物，被烟薰得乌黑的壁炉，被打碎的带棱角的天花板等都历历在目，从前它们都该是富丽堂皇的吧？这时人们便不免带着几分淡淡的哀愁想到这些房子的旧主人。这些残垣断壁，当年它们该目睹过多少人间秘事！而那些已变得黯然无光的大穿衣镜，又映出过多少闺阁风情、人间惨剧以及多少的笑语欢颜和皱眉疾首！在这一间小小的温柔富贵之乡，谁人曾如漆似胶地爱过而如今撒手而去的又是谁人呢？这些老屋便是它们旧主人的一切隐秘的见证。但它们宁愿以无声的语言来叙述其淡淡的并带点甜蜜的哀怨而不喜欢编年史家们冗长的罗嗦的唠叨。

从林荫大道起，直插泰布大街，左边拐角上的那片房子，在路易十四时代是布朗卡—洛拉盖旅馆，西莫尔勋爵便在这个旅馆里与世长辞。三十六年之后，这幢房子的楼下已

成了巴黎咖啡馆了。这条街的五号从前是理查德·瓦拉斯爵士的财产，后来由德雅泽居住。九号住着富可敌国的布莱特，此人一生都非常爱虚荣，据戈泽兰的一篇小说上写的传说，他把绝大部分财富都用于表现其虚荣上，他招待国王路易十五的宴席，不管多么丰盛，他都从来没满意过。十一号那座房子已然拆除，在其旧址上新辟了一条意大利人大街，大街的尽头便是《时代》晚报的大厦，它正面的白墙耸立在乌弗拉尔家的花园里，而乌弗拉尔那片宅第的大门则开在泰布街上。

在这一现代化的街区，你每走一步便会有一件令人神往的历史故事引起你的遐想，乌弗拉尔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小说。他原是南特的一个小食品杂货商，在大革命前，他便已预感到将要天下大乱，于是便把当地所有证券不管是已印成的还是待加工的，统统收买下来。只这一桩囤积居奇的垄断买卖，就使他净赚三十万里弗尔。另外，他又是个正直勇敢的人。作为布瓦万将军的副官，他悄悄地销毁了下面呈送上来的一张不经审判便执行枪决的名单，从而从短命的革命委员会的威胁下救出三、四百名被捕人员。随后他又很巧妙地把赚得的三十万里弗尔作为投资支援了军队，一下子就得了四倍的利润。自那时起，乌弗拉尔便成了富家翁，他说：

“头一次的一百万是困难的，以后的金钱，只要你不阻拦它们，就会自动往你腰包里跑。”

在督政府时代，这位有钱的军火商就住在泰布街，巴黎所有的漂亮的太太们都是他的座上宾。她们中有塔莲太太，雷卡米埃太太，英格尔罗太太等。她们那双套着金环的赤足在他那名贵的硬木拼花地板上翩翩起舞。原本是南特的一名小食品商人，现在竟变成了《天方夜谭》里的大富翁。他的

同乡和友人福舍^①向他提供情报并从中保护他，无疑，此人每月都能从他那里得到补贴。可能就是因为受了他的影响，乌弗拉尔才拒绝了手头拮据的第一执政向他商借的一千二百万里弗尔。这就触怒了这位第一执政，很长时间里都对此耿耿于怀。这位百万富翁如果不是无法无天，至少也是胆大妄为，他竟到处伸手，挤进外交界，插手政界，又和警察局拉着关系。他挥霍浪费，几起几落，破了产又重新发迹，终于作为国家要犯被关进万森城堡。

直到目前，在意大利人大街的人行道下边，还留有许多地窖的残迹。这位军火商把许多金条放在一些大桶里埋藏在下边，就象杜伊勒丽宫的主人们曾经做的那样。我曾到那里去找过，但什么也未发现。这些地下室现在是一家大晚报的印刷所，干净、整齐，墙壁都上了漆。铸字机正在铸制铅板，电铃声不断地响着，电话里的声音在不断地喊着，机器在不停地轰鸣着。印出的报纸看上去就象一列特别快车前进时留在后边的道路一样，飞快地向后跑去，然后自动折叠起来，再自动堆放起来……。如果老卡米洛热纳能看到这些该有多好啊！假如有人能够起死回生，使他复活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也好，叫他看看这一片繁忙的景象，并对他说：“您还能回忆起在古老的年代里那一片荒凉的沼泽地吗？您曾率兵埋伏在那里等待着罗马大军的到来，这里就是原来那片地方，请您看看它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这多亏了您勇敢地挡住了那些要把这个小小的吕太斯扼死在摇篮里的入侵者。”他听到这些会感到多么吃惊！

^① 约瑟夫·福舍（1759—1820），南特人，曾当过国民公会议员，在拿破仑第二次逊位后，曾当过执行委员会主席，1815年以后被任命为大臣。——译者

约翰·马莱斯特瓦又是怎样呢？读者可以想见他的反应（当时的投机商们拿出几百万里弗尔为在这里夺得一小片土地而争吵不休）。如果他想起自己曾是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的所有者，尽管他的土地范围远远超过了什瓦佐大街一直延伸到法兰西歌剧院，并且一直到玛德莱娜教堂甚至旺多姆广场，而他自己却没有动用过一寸土。尽管逝者对这些尔虞我诈的伎俩不屑一顾，但无论如何，当他想起自己曾是这里的主人，特别是想到为使教徒们能有一个长期做弥撒的地方而把它无代价地让出，而对这一切，长期以来却没有一个人提及时，心里也会颇不是滋味罢。

33. 文人野游场

如果有什么仙方魔法，把尼古拉·伏克兰暂时起死回生，并把他带到波拿巴大街和教育大街十字路口的繁华地段去看看，他会惊慌失措地要求仍然回到自己安静的坟墓中去。这位尼古拉·伏克兰原是国王路易十八的宫廷教师。担任这一高尚的职务，其言谈应渊博敦厚，其举止应足供楷模，其品德尤应堪做表率。这可能不适合我们这位先生的胃口。因此他于1611年起，便辞职离任退隐田园了。为避开嘈杂的闹市，他在沼泽街买了一栋乡下房子，即今天的维斯贡蒂大街。如今这条大街上，两边的高楼已经拔地而起，几乎很难有人相信，现在这条阴暗狭窄的街道，在从前曾经有那么一个人是专为呼吸新鲜空气和享受乡间幽静的田园风光而

到此定居的。

伏克兰就在这个地方修了一座漂亮的花园并开辟了大片土地种上高大的乔木。当时这块地方荒凉而偏僻，在这个荒郊野外除了这栋房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于是便有人把他这位唯一的居民称为“世外人”，但这里却是绝对的安静！据说伏克兰便在这里过着一种纵情声色，与世无争的生活。据塔勒芒·戴雷斯的说法，差不多是生活在“姬妾如云的温柔富贵之乡”里。塔勒芒可能是有点夸大其词了，因为别人并没有看到如他所详细介绍的那样，这位隐士的生活过得那么劳累。这位老实人收养了一个穷苦的女孩子，名叫让娜·杜布瓦，她会演奏竖琴。所谓纵情声色，便是指伏克兰有时和她在花园里散散步，和她一起表演古希腊或罗马的神话剧的片段。他让她手拿一根系着血红色缎带的木棒，他本人尽管已是七十高龄，却穿上塞拉东^①式的服装，身上挎着一个干粮袋，头上戴一顶玫瑰红的缎子衬里的草帽，在他的花园小路上悠然自得地赶着他想象中的羊群，一边为它们唱着自编的小调，一边替它们防着恶狼。

就这样，这位“世外人”在这片宅第里玩着这种与世无争的世外游戏。他房子的西边是一大片空阔的平地，其中有一条林荫路，就是沼泽街。这片地方就是所谓“文人野游场”。在伏克兰活着的时候，即十世纪初期，它是塞纳河边上的一大片牧草地。有两条路和塞纳河垂直横穿牧场，一条从河边通往圣一皮埃尔小教堂或叫圣一皮尔教堂，即现在的圣一皮尔大街。另一条路则专通大车，通过轮渡往河右岸运

^① 塞拉东是法国作家奥诺雷·于尔非（1568—1625）小说《阿斯特雷》中的一个人物，这个名字已成为忠实的求爱者和柏拉图式的爱的同义语。——译者

送从沃基拉尔跑马场拉来的石头，这便是后来的轮渡大街。

在“文人野游场”上，羊群安静地啃着青草。纵横交错的沟渠，成了那些可耕田的天然保护圈。小菜园周围绕以篱笆或修着围墙，但却没有一栋房屋。离伏克兰庄园不远的地方，沿着伸向远方的科隆比埃大道（即今雅克布街），有一大堆垃圾，因为直到1633年这里还是一个垃圾场。放眼远眺，正南方便是庄严肃穆的圣一日尔曼牧场修道院，围墙内点缀着几个钟楼和尖塔。这块平原地带如何会被称为人们的“春游圣地”，它又凭借什么魅力在漫长的岁月里成为双双情侣们幽期秘会之地呢？如果你不了解巴黎人在每个朝代和各个时期对城市附近的田园风光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爱好，那么对此是无法解释的。正如我们今天到布洛内森林和万塞森林去一样，我们十七世纪的先人们则是去“文人野游场”。他们在那里欣赏塞纳河上的景色，河面上各式船只缓缓地驶向夏乐宫。极目远望，在天水相连的地方，还可以看到那个新建成的光彩夺目的长廊。那一片白石砌成的建筑，妩媚而又壮观，长长地伸展开来，有如一条白链把杜伊勒丽宫和卢浮宫连在一起。

学校的青年人 also 成群结队地前来游玩。这里正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因为该牧场归教育界所管，而从前的大学生是被视为“文人”的。再加上他们经常光顾此地，所以这里便被称为“文人野游场”。这一片旷野曾多次明令禁止开垦和种地，因为这些“学生们”要在那里搞野外游戏。据最博识多闻的城市导游者马赛尔·波埃特说，这些学生们是绝不放弃这块地方的。

在“文人野游场”上，大学生们做着各种体育活动。有赛跑训练，有各种跳跃科目。有的人在“较试臂力”，抛掷

石块。那边有人在打球。一位骑士正在拉着马蹶圈，另一个还正在“扬鞭奋蹄”。有摔跤的，有游泳的，也有划船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常有人在这里决斗。一个同时代的剧本中，曾介绍说，这些学生们的草场，就是“所有的厌世者平时约见决斗的场所”。埃图瓦尔的日记也曾记下了自1584年到1609年之间所有的决斗场面。1587年2月12日星期四，索泽男爵和贵族罗什·奥比埃骑马来到牧场，双方各有许多陪同，“以便参与解决纠纷”。国王的卫队是反对决斗的，这时候，奥比埃和索泽带来的人便和卫队开始了击剑格斗。双方各有死伤。于是这一奇特的决斗竟变成了官、私双方的对战。1602年又发生了一起出名的决斗事件，即维尔摩尔和拉封登的决斗。

并非所有的决斗都以悲剧告终，远非如此。闲散的游客几乎每周都能看到在一个篱笆后面或者在一堵墙下，那些贵族、大学生，甚至还有一般的平民百姓，排成一行，他们每人都利刃在手准备捉对厮杀。“文人野游场”就是巴黎人的决斗场。也有人在这里打猎。1608年12月31日，亨利四世风湿痛刚好，他便叫人陪他到这儿来“摸喜鹊”，结果只搞到三只。作为王家宫廷的一次狩猎，这似乎有点过于寒酸了。还是孩提时的路易十八，乘着漂亮的四轮马车来到这里，然后便骑上马去“赶乌鸦”。还有一天，他竟然在狩猎场上去追赶一只猫。狩猎时可以动用枪支。据塔勒芒记载，有些巴黎妇女竟能开枪击中天上的飞燕。这是一个游客如云，风景如画的所在，以致玛格里特王后便选中这块宝地建造她的行宫。她命人在河边上造起一幢漂亮的房子，它紧靠着奈斯勒尖塔，位置正好是现在的塞纳河大街上那个出名的拐角处，即直通法兰西研究院后边码头的那个地方。为不影响学生们的

活动，在开辟一个大公园的同时，她还下令修建数条与塞纳河平行的又宽又长的林荫大路，两旁护以篱笆并挖上壕沟。这就开辟了一个人工乘荫纳凉之所，并且一年四季向游人开放。她本人也经常有在嫔妃命妇们簇拥之下坐着马馱的轿子到这儿来消遣，于是便有人把这条林荫路称之为“玛格里特王后大路”。而经常习惯于到“文人野游场”上来散步的巴黎人也大批地到这个经过改造的大道上来浏览一番。这个地方贵族、绅士、穷大学生和一般市民，不分贵贱，摩肩接踵而至。尤其逢到节日或星期日，巴黎的下等人便“成群结队地拥到这个公园里来”，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游乐，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地调剂自己的身心”。啤酒和清凉饮料的生意特别兴隆。城里的面包商把伙计们派到这儿来，每人带着一个大筐，出卖在城里铺子里不敢出卖的小面包，因为这些小面包有一些每个都比规定的重量轻四盎司半，而另一些则经过重新回炉以旧充新向外出售。糕点商可以随意零售。有松糕，奶油水果馅饼、奶油蛋糕，以及两个里弗尔一块的普通小蛋糕。巴黎人尽管被世界公认为性格多变，摇摆不定，没有常性，但在游乐方面却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三百年前丰富多采的星期日和我们的过法非常相象。

“文人野游场”当时的盛极一时，也便是它今天消失的原因。由于这片土地位置适宜，从十七世纪起便引起了某些人的觊觎。在科隆比埃大道两旁开始出现了许多高大的建筑，“新建桥”的竣工方便了河右岸和奈斯勒地区的交通，这就加快了亨利四世驾崩以后这一新辟地区的繁华。这片牧草地便被华丽的高楼大厦所覆盖。外国人也趁机前来占据一席之地，贵族们更不甘落后，他们先后纷纷来此定居，这在当时形成了一般时髦风气。于是那些被剥夺了自己活动场地

的大学生们便不断提出抗议。他们为此曾进行过长时间的斗争。他们赶走前来居住的人，推倒刚刚建起的墙壁，用石块追打建筑工人。混乱的场面不断出现，一个同时代的人曾描写说，怒火万丈的学生们“气势汹汹地前来拆除并烧毁了”国王特别专员让·巴埃的住宅和另外一些绅士们的房屋。闹事者的首领巴迪斯特·科罗科松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他遭到逮捕，并在草地中央活活被烧死。行刑队员走后，大学生们把这位同学的枯骨从火中抽出，送到圣一皮尔小教堂，为超度亡灵做了好几天弥撒并举行了祭礼，由一名学生用帽子向所有前来参加祈祷的人募款以安葬死者。

我国素有“自由的天地”这一美称的，那么，为维护这块金字招牌不受玷污，我们不要再去自跳火坑惹火烧身了，那就只有进行那些毫无实际效果的抗议行动——但这一切同样都是徒劳的。人们总不会把象巴黎这样大的一座城市做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处理吧。在这个曾是“文人野游场”的地面上，今天已然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而且已经插足不下了，即使象床单那么大的一个花坛也几乎很难见到，这便是这个出类拔萃的大都会三百年来生命力的表现。它越过城墙，向前猛烈地冲刺，以致一发而不能自制。它的范围已经伸展到格勒努埃尔，格罗·卡约，加维尔，格勒奈尔，沃基拉尔，并越过塞纳河囊括了卡约，奥特依，帕西，和长满葡萄树的那片田野以及原是荒芜无际的那片乡间牧场。目前人们又在忙于把它的城墙范围加大三十六公里，因为它太挤了。如果仍然这样被城墙围下去，将永远会挤得水泄不通。而这些，在路易十三时代的“文人野游场”已经有过这种经历，现在我们又看到它原封不动地在战神广场重新上演。那些嫉妒心特强的人，曾不断地预言，这座了不起的城垣，由于它不断

地坍塌、破败，再加上历史上异族的摧残，它最终必将会象“尼尼微”^①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而成为考古学上的一个谜，摆在未来的、学识渊博的考古学家的面前。但是且慢，我奉劝说这话的人还应该耐心等待一下，巴黎的生命是坚强的，已经两千年过去了，它仍然处在发育之年。这便是明证。

34. 在我们脚下

如果有人敢于对巴黎市民说，有朝一日拉雪兹神父公墓、蒙马特公墓和蒙巴那斯公墓全部会被人们忘个一干二净，那将会引起巨大的公愤而被定以亵渎神明罪。而他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每天都在践踏着的中央大菜场的土地下面，就有一个有七百年历史的死人坑，近百年来已有数百万的尸体埋在下面，但今天它确确实实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如果光阴的流逝不能洗掉巴黎人头脑中对死者的深刻怀念，也不能带给他们必不可免的忘却的话，那么，这座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将是人们对死者顶礼膜拜和祭祀亡灵的圣地……

整个巴黎城，便是在无名死者的墓地上建起来的。诸如公众的散步场所，公余饭后可以到里边的长凳上去坐坐的，可供采荫纳凉的、绿树掩映的街心花园，下面都是古老的坟墓。有时候，一层薄土便是死者和活人的分界线。圣—马赛

^① 尼尼微是古代亚述帝国的首都，由于历史的演变，今已无从查找。
——译者

尔大道学校的院子便是证明，为寻找拉米波^①的棺木，曾有人在那里挖掘。在挖掘时发现，就在不到三十厘米的沙土下，覆盖着许多墓穴，里面摆满了尸体，以致使得开掘工作不得不中断下来。尽管可以肯定，继续下去是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的（此事曾使当地人士为之震惊不已）。

在圣一日尔曼大道和圣一皮尔大街交叉的拐角地带，紧靠着医学科学院的那个四周围着铁栅栏的又小又单调的花园，同样也是一个公墓。这里是官方为基督教新教徒准备的第一个大公墓。但在南特敕令^②废除之后，新教徒又被排斥于“普葬法”之外，于是便不得不在巴黎寻觅一个秘密场所，以便自己百年之后能有一个安静的长眠之地。这种埋葬工作是在夜间进行的，不知他们用什么办法逃避了监视，因为此事一旦被发现便有性命之忧，起码也要判处终身苦役。

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死去的新教徒是埋葬在普拉特港口的莫洛先生的工地上。特拉维西埃尔大街原先曾通向这里，今天也还可能找到这条大街的某些痕迹。就在这一大片空地上，埋葬着许多在我国历史上曾起过相当作用的大家族成员，比如德莱塞、沙伊、内克、苏贝朗等人。

天鹅岛也是一个墓场。在圣一巴泰勒米节第二天著名的大屠杀^③中遇难者的尸体便埋在这个岛子上。但这次的屠杀，死人太多了，以致有些尸体竟被河水冲到格勒奈尔，有人甚

① 拉米波伯爵（1749—1791），法国著名政治家，曾当过巴黎政府委员和议会议长。——译者

② 南特敕令指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城颁布的宗教宽容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原来存在的互相仇视平息下去了。——译者

③ 这是在1572年8月24日，遵照国王查理九世的命令，对在巴黎的基督教新教徒进行的一次非常著名的残酷的大屠杀。这一天正是圣一巴泰勒米节。随着巴黎这次大屠杀之后，在各省也进行了同样的对新教徒的大屠杀。——译者

至还在艾菲尔铁塔的底基上发现过几具尸体。圣一日尔曼—德普力街的街心公园下面也是坟墓，靠近马尔泽布大道的蒙索地区的一部分也是墓地。当时人们把这个今天已不复存在的地方称作艾朗西圈地，它位于“小波兰”区的尽头，市税务征收处的老墙旁边，是一块长方形地段。入口就在今天的罗什大街和蒙索大街交汇的拐角上。再往西，这片“圈地”便被公园的墙给挡住了。就在那儿，埋着第一批被杀的夏洛特·科尔戴^①的尸体。在她旁边，埋着亚当·吕科斯，他的死因，是因为对这位女英雄过分地爱而精神失常所造成。此外还有许多人，如菲力普·艾加里德，伊丽莎白夫人等。沿着原先的环形老路，现在是库尔塞尔大道的墙下边，还埋着罗伯斯庇尔，圣—朱斯特，弗勒里厄·莱斯科，帕扬等人，以及在热月被杀的那些人。那一天两辆大车拉来了二十二具无头死尸，人头单装在一个大箱子里，只有勒巴的尸体是完整的。据一些报告指出，掩埋和运送这些尸体的费用每人高达一百九十九个里弗尔，给这些挖墓人的小费每人就是七个多里弗尔。

在我们的首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每挖下一镐，就能看到先人的骨殖。在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街道曾进行过大施工。使人惊奇的是，挖出来的却是大批墓穴，便只好把下面的残骸移往西区沃基拉尔的老公墓，但这个公墓自1825年以来就已弃置不用（又是一个被遗忘的墓地）。昂菲尔区的整个平原地带就是一个大墓场，从前叫“安·罗可·西纳罗”公墓，如今比埃弗尔河岸上的“卢尔西纳”街就是从这个名

^① 夏洛特·科尔戴（1768—1793），卢梭的崇拜者，酷爱自由，具有共和思想。为此，她受人鼓动便去刺杀马拉，在1793年7月13日，她在马拉的浴室里把他刺死。因之被捕并被送上断头台。——译者

字演变而来。绿树成荫的卢森堡公园原是夏特洛家族的老坟地；“阿韦—玛丽亚”市场下面埋葬着圣—保罗和拉勃雷，拉勃雷的坟墓上面笼罩着一株特大的胡桃树；在他旁边还掩埋着一位神秘的人物，他就是被称为“铁面人”的那一位。在圣—约瑟夫大街有另一个市场，也便是另一座坟场，是莫里哀和拉封登的墓地所在。在林荫大路的一角上，沃德维尔原先的住地，是圣—罗克教区的公墓。格勒纳达大街原是公墓，维勒里大街原是公墓，卡姆斯原是公墓，卡普西纳原是公墓，普提梅松原先也是公墓。所有的修道院，所有的济贫院和收容所，原先都曾是公墓。只要有一堵墙壁坍塌，一个壕沟被冲毁，在下边便能看到尸体。

1864年10月，在为和平大街四号挖排水沟时，在地下发现一副铅制棺材，里面是吉兹公爵夫人，她于1656年亡故。而和平大街确实是作为卡普西纳修道院的附属工程而开辟的，吉兹公爵夫人也确实是在这里埋葬的。几年之前，人们清除了圣—奥诺雷教会的遗迹，当时曾仔细地寻找过杜布瓦红衣主教的墓穴，因为他死后曾在那里举行过盛大而排场的安葬式。但由于这个墓穴后来作了大便槽，便给挖掘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尽管如此，如果搞下去，还可能会发现蓬帕杜尔侯爵夫人的遗物，但挖掘工作没有继续下去，而这位美丽的“平民贵族”^①的遗体，据各种迹象表明，仍然在和平大街的路面之下。还有阿德里安纳·勒库弗勒的遗体，埋在前泰阿丹修道院的前边，伏尔泰码头的高坡上。

最后，在结束这篇简要的叙述的同时，再顺便提一下弗朗德尔大街上的犹太人公墓。1780年在维莱特大街上，有一

^① 蓬帕杜尔夫人出身于一个大银行家庭，并非贵族出身，于是便得了这个称呼。——译者

个挂着“明星客栈”招牌的小旅店。该旅店座落在一个荒废的花园里。旅居巴黎的犹太人得到旅店老板的允许，便在这个花园里埋葬他们的人。经商定，埋葬一个成年人的尸体要付五十里弗尔，一个小孩付二十里弗尔。这个公墓在1810年废弃不用，其遗址仍在这个大院的深处，当地居民对此却一无所知。

有关巴黎这方面的这些细节，其作用仅在于引起我们对往昔历史的兴趣。因为自共和历九年风月二日弗鲁克^①被捕以来，经过大革命时期，基督教新教徒和犹太人，可以享受到一种野蛮的平等权，即死后可以进入自己的公墓。在此之后，他们又争得了可以和天主教徒葬在一起的权利。

35. 地下公墓

有人讲过一件事，有一天路易十六在伏斯—勒波兹森林狩猎，正在追赶一只梅花鹿，在森林深处，他遇到了一队奇特的送葬行列，几个人十分艰难地用双手抬着一口棺木。这位国王感到困惑不解，经询问后得知，这是住在凡尔赛的犹太人，因在凡尔赛没有专为犹太教徒准备的公墓，故此来到巴黎埋葬他们的教友。这位国王颇为同情地叹道：“哦！这些人可真够可怜！”不久以后，他便签署了一项法令，在凡

^① 尼古拉·弗鲁克伯爵（1761—1828），法国政治家，当过议员、律师和古塞纳省（即巴黎地区）省长，他在1793年5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曾被捕坐牢。——译者

尔赛城边上专为定居在这个皇城的犹太教徒开辟一块墓地。这些人在皇城里为数不多，主要以小商为生，甚至有的人靠在宫殿的通道上和楼梯口作小贩以维持生计。我不知道为他们新辟的墓地在什么地方，肯定那里一向是人烟稀少的，无疑，塞纳—瓦兹省的科学和文学艺术协会里我们那些学识渊博的同行们已经发现了其位置。这个小型墓地似乎是直到1823年才弃置不用。

但是，路易十六在打猎的那天遇到的那几个人，又是把他们的教友抬往巴黎的什么地方呢？这是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一个小小的谜团。大家知道，在中世纪，犹太人曾有过相当大的公墓。1849年，当哈塞特图书馆扩建它在皮埃尔—萨拉赞大街上距卫生学校不远的那片房屋时，要挖相当深的地基，当时便在下边发现了一大批墓碑，上面都刻有希伯来文字。据最有权威的希伯来语专家确认，这些墓碑可以追溯到菲力普·奥古斯特，圣·路易，菲力普·阿尔第和菲力普·拜尔当政的年代。据此可以断定，自1190年起，这个地方便有一个重要的“犹太区”。据巴黎大学的宗教文集记载，这个犹太人公墓就位于犹太教教区附近，其长度约为一百特瓦兹，位置在阿尔普大街和奥特弗依大街之间，而奥特弗依大街至今犹在；阿尔普大街由于圣—米歇尔大道的开辟，其大部分街区便被拆毁了。这些墓碑有相当一部分保存在西奥尼博物馆。卡尔纳瓦莱保存着三块，其中一块是1235年的，另一块是1247年的。但在奥特弗依大街的殡葬地，却连一块墓碑也没发现，只有一块，已是十三世纪以后的了。因为菲力普·拜尔统治到1314年，尽管他有这么漂亮的绰号^①，

^① 从前国王一般都有绰号。这里“拜尔”一词法文意思是“漂亮的”，即“漂亮的菲力普”。——译者

但性格却极其古怪。在粗暴地对待了罗马教皇和虐待了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之后，他又大批地把犹太人赶出巴黎。因此，大家可以想象得出，在巴黎，犹太人只剩下寥寥无几了。但就是这些少数的犹太人也被迫隐瞒了自己的种族和信仰，并且还不得不为了活命而东藏西躲，一直到死也不敢讲明自己的身份。他们既然不能摆脱死神的纠缠，那么总要想找个地方埋葬，但什么地方呢？这就不为人所知了。能不能说，每当他们的人死了，死者的亲属便把他们埋在院子里，或者屋外的花园下边，或者埋在地下室里……这一假设，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巴黎从来没有墓地的地方都有时能发现一块刻有希伯来文字的墓碑。1904年，在于尔姆大街拐角处的先贤祠附近，又发现了一块这种墓碑，碑上的名字是“R·萨米埃·爱利亚克之子”，却没写日期。1912年，在韦尔里大街靠近档案馆大街的拐角处，又发现了一块，当时这里的一个大商店正在搞扩建。这块墓碑保存得十分完整（这是在塞纳河右岸发现的唯一的一块），埋在地下五米多深处，它的上部凿成一个半圆形的拱腹，上面刻有希伯来文，穆瓦兹·施奥博先生把它译成法文。译文如下：“我谨将此碑置于朱达老板的女儿，我的主人圣徒拉比·雅克布的孀妇夫罗利亚太太的头前。教历124年（1364年）。”这一发现，便是后来查理·马涅先生向“旧巴黎调查委员会”提出的非常生动的报告的内容。他指出，夫罗利亚这个名字，可能就是巴黎地区犹太教徒的名称，因为在巴黎出土的墓碑中，有三块都刻有这个名字，而在外省出土的墓碑上却从没有出现过。至于“圣徒”这个字，可能指的是在受迫害中死去的犹太教徒。因此，从它的日期看，毫无疑问，这个夫罗利亚·雅克布的简短墓志铭便是对一系列不为人所知的悲剧的概括。

再说，自1300年以后，巴黎便再也没发现过任何一个犹太教徒的墓地，可能犹太人不太多了。在路易十四治下，他们又重新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为要不露出马脚，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几乎不可能再进行宗教活动，而宗教又要求它的信徒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履行教规和保持教仪，必须按教规进餐和按教规着衣，这样，他们便只好逐步地疏散到外地去。在旧王朝末期，有人估计，他们的人数，在一个七十万或者八十万的居民点中，最多也不过占五百人。在宣布了宗教信仰自由以后，制宪会议也改变了态度，把在巴黎的犹太教徒和他们在法兰西各地的教友们同其他公民一样看待。

因为，除了个别人以外，大多数“胆怯又无知”的犹太人对此都是不相信的。强制的公民宣誓也使他们忧心忡忡，难道这不是偶像崇拜的表现吗？当人们看到那些狂热反宗教的恐怖分子们，疯狂地反对忠于自己教义的犹太教徒，同时也疯狂地反对忠于自己信仰的天主教徒时，感到莫名惊诧。犹太教堂被当地的雅各宾派分子抢掠一空并且也破坏无遗，而普通教堂也遭到同样命运。被抢走的经书和普通的祈祷书被统统付之一炬，或者封存起来留待将来用它们的羊皮纸封面做鼓皮用。“希伯来教的祭仪也和基督教仪式一样，被当成滑稽戏任意嘲笑。犹太教士也和天主教神甫一样，被强迫宣誓弃绝原来的宗教信仰。”甚至有人提出，凡是不娶一个天主教徒做老婆的犹太教徒，都将被认为是可疑分子，国民公会甚至接到禁止犹太人实行割礼仪式^①和颌下蓄须的习惯的建议。有人看见说，所有在梅斯^②的犹太人下巴都刮得光

① 犹太人给男孩实行包皮切割的教俗。——译者

② 法国摩泽尔省省会，距巴黎三百一十二公里，是一个古城，那里有许多古迹、哥特式的大教堂和寺院等。——译者

光的……只有当拿破仑运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才结束了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国家档案馆馆员罗伯特·昂舍尔先生对这一重新整顿的步骤讲得十分清楚，他写的那部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描写了这件事的全部过程。这件事是我国大革命时期编年史上最野蛮和争论得最激烈的事件之一。

我们还是回到路易十六在伏斯—勒波兹森林里发现的那几个抬尸人的事件上来吧。他们究竟要把那具尸体抬到什么地方去呢？仅就我们对一个非常小心地保守着秘密的事件所能了解到的情况看，他们还要抬很长的路。对此，人们已然看出了一些蛛丝马迹。这一事件发生的大致年代约为1775或是1776年，那时候，在巴黎或在巴黎郊区死去的犹太人都秘密地掩埋在维莱特村外的弗朗德尔公路的右边。那里有一幢农村风味的房子，大家都叫它为卡穆客店，主顾大多是往来的车夫。这个客店有一个很长的马厩，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经常放满了来往的马车，拴满了牲口并坐满了前来喝酒的人。房子后面有一个小花园，当时德国人和犹太人就埋在这里。按照警察总监的命令，埋葬工作“要在夜间进行，不许有动静，不许声张，也不许讲排场”。这种方式就如埋葬被处死的犯人，决斗中被杀死的一方或者自杀身死的人一样。被送去埋葬的人的确非常之少，因为住在巴黎地区的犹太教徒本来就很少，再加上该客店老板又兼作屠夫，他对作为他近邻的坟墓任意糟蹋，只要没人看见，他就在人家坟头上给牛马剥皮。但有一个人出面，最后终于结束了这一极端不礼貌的做法。此人是一西班牙籍犹太人，名叫雅克布·罗德里盖·波莱尔，他在巴黎颇有一点名气。因为在天主教教士艾具^①

^① 查理—米歇尔·艾贝（1712—1789），他创办了聋哑人学校，教给他们利用手势交谈。——译者

之前很久，他就向科学院介绍了两个聋哑人，这俩人经他精心训练，竟能通过手语甚至通过模拟发音来交谈了。此事得到布封、狄德罗、让·雅克等人的鼓励。波莱尔拒绝说出他的训练方法，反而得到八百里弗尔的赡养费，同时国王又为他任命了西班牙语翻译。他利用这一影响，在和卡穆客店花园相连的地方买了两小块土地，并让人修上围墙。由于这一努力，从1780年起，这里的犹太人便有了自己的墓地。自菲力普一拜尔统治以来，他们的这一权利便又被剥夺了。

波莱尔开辟的公墓一直保留了下来。如果说，在我们首都还有一处古迹不为大多数巴黎人所知的話，那么它就是这座公墓。它没有任何特点足以引起过往行人对这个普通地方的注意。不言而喻，也很少有人特请批准进入参观。通过弗朗德尔大街四十四号大楼便可进到里面去。穿过门道，便进入原先卡穆客店的大院了，如今它是这条大街的四十六号。看样子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因为那片低矮的牲口棚还依然保留着，和从前一样，院子里放着车辆和草编的家具。母鸡正在旧石路面上觅食。一间阴暗而宽大的木板货棚，大门洞开着，和从前一样，大车可以直接进去。货棚最里边有一扇小门，锁门的铁链已然锈迹斑斑，木头门板也已被虫蛀得斑驳如画。这就是原来的样子①。

① 作者原注：当这篇文章写完时，这地方已经完全变了样子，原来的小客店已为许多漂亮的大楼所代替。但公墓仍如勒诺特尔所描述的那样，依旧存在。

36. 《新建桥》的健康状况

也许是它诞生的那天，适逢太岁当值，不宜动土。也许它诞生以后没有受到必要的照料而后天失调。总之，他的发育成长一直十分不顺利。在很长的时间里，大家都认为它可能会夭折。

在给它放第一块基石的那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给新桥的命名式），巴黎城就不是那么欢快。因为正赶上国王亨利三世办丧事，因此，它必须作得愁容满面，至少表面上应该如此。就在当天上午，国王才把他十分宠幸的两位“爱卿”安葬。这两人便是死于决斗的松贝尔和莫基龙。此事自从亚历山大·仲马绘声绘色地给予传奇性的描述以后，已经家喻户晓了。有人说，国王为此悲痛欲绝，可能生了病。甚至有人怀疑，在大桥的奠基仪式上，国王不会出面了。但他还是按时出现了。由于过度悲伤而脸色发青，穿一件黑条纹的紧身上衣。肋下佩一把黑鞘剑，腰上挂着一串死人头骨做的念珠。双耳戴着两颗硕大的灰色珠子。他下令禁止娱乐，禁止跳舞和开化装舞会。他从卢浮宫里出来，登上游艇，穿过塞纳河，然后弃舟登陆，来到左岸奈斯勒塔上游的奥古斯丁博物馆旁边。“军政要员”们已经在那里恭候圣驾。城市手工艺领班向陛下敬献上一副白皮围裙，一把银制镘刀和一桶灰浆。国王戴上围裙，一面划着十字一面大声说道：“我谨以上帝、耶稣和圣灵的名义行事。”说罢他便铲起一铲灰浆，

于是便有人拿一把铸有他的头像的硬币撒在灰浆里，然后他便用戴着丝绒手套的手，把一块刻有象征他自己和巴黎市的图案的基石抹上灰浆，砌在地上。至此，新桥便算诞生了。——这是1578年5月31日晚上的事。

气氛是相当沉闷的。群众的情绪反映在给这座桥起的名字上，大家都称它为“泪桥”。同时，进行这样一个工程是基于一种什么想法，对它的建成又能抱什么希望呢？在河面最宽，又是在它的两个支流相汇合之处，建起这样一座大桥，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但目的又是什么呢？河左岸当时几乎没有人居住，而对敢于到“文人野游场”去冒险的人来说，只需一叶小舟，请艄公渡过也便够了。有一些别出心裁的人，在几年以前已经在奥古斯丁码头上修建了别墅，但要到右岸来，走圣一米歇尔大桥和尚吉桥也是极其方便的。普遍的看法则是，这一工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给卢浮宫的主人们提供一个赏心悦目的景色，并把犹太岛压在桥下。即要在这个岛上架起主桥梁的桥墩，同时也把宫殿岛西部的那个尖角给挡住，因为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前来，非常荒僻，甚至在白天也常有亡命之徒在那里杀人，然后投尸入水。

可能因为巴黎全城居民都认为这一浩大的工程实无必要因而拒绝这项开支吧，经协商，免除了巴黎的投资，全部费用均由王室支付。这似乎更进一步说明，他们修建这一大桥，并非那么理直气壮。有人说，一开始就撤了一个建筑师的职，这似乎也表明，一开始对搞这样一个建筑图纸就有异议。于是从1577年底开始，便由一个专家委员会来研究这一计划，但专家们各人都有各自的见解，谁也说服不了谁。以致到1578年4月23日工程开始招标了。到底大桥应有几孔，桥墩的准确位置都没有最后决定。经过三次招标，最后总算

决定，桥体主体工程由约翰·小弗朗索瓦和克里斯多夫·梅西埃三人承包四分之一，另外四分之三则由吉尤姆·马尔尚、皮埃尔·戴吉尔和蒂博·梅特佐承包。他们便立即在河左岸破土动工挖建桥基，接着便如前所述，由亨利三世安放了第一块基石。

工程紧接着便开始了。国王特准，可以在贡比涅森林里采伐五阿尔旁面积的百年以上的大乔木，以便提供修筑临时堤坝，铺设路床，以及这一工程所需的其它木料。支桥工程采用杜斯尔索的方案，主桥工程则采用戴吉尔的方案。这一分工形式，是因为每个人的设想和风格不同，这一点至今仍然很引人注目。两个桥体风格截然不同，因为实际上是两座桥，大家也承认，两座桥笔直地建成是不可能的。看起来，在城墙拐角的地方拐个弯是对的。如今，在从高等师范学校到孔第码头这一段路上匆匆赶路的人中间，有多少人发现过主桥和支桥之间的中心轴线有什么微小的变化吗？《新建桥》是巴黎了不起的工程之一，它如今已和塞纳河上的其它桥梁一样，变得十分平常了。市民们在它上面走过，就和在普通的沥青大道上行走一样，没有丝毫异样感觉。大约已经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人停下来欣赏一下这一宏伟的建筑（它甚至令人难以置信是那个时代的建筑物），也当然没有人会想象一下，当年那些充满豪气的建筑家们曾经遇到过多么大的困难。

各式各样的困难和障碍是很多的：开工后六个月，支桥的第一批桥墩便露出水面，这时才发现，原先设计的四个桥孔达不到犹太岛，因为要在该岛造最后一个桥墩，于是决定再增加一孔。这一修正案使工程推后了两年，直到1588年，从左岸到右岸的桥墩才全部建成出水。这时人们指望工程速度可以加快，但恰在这时，亨利三世在圣一克鲁驾崩，他被

一个名叫雅克·克雷芒的狂热的教徒所暗杀。于是建桥工程便中止了。大家估计，恐怕以后也不见得会再动工了。已然凿就的装饰石雕，在大雕刻家日尔曼·皮隆的工地上静静地躺着，已无用处。蒙田更是感到万分伤心，他觉得这座大桥的建成已然无望了，而这一伟大工程将是本世纪的奇迹。巴黎市民也死了心，许多人原来就从没指望过这样一个轻率的工程能够成功，他们感到不满的是，塞纳河的河床上插满了这么多无用的桥墩，当天旱水浅时，一个个的大圆墩子，象些大石头一样露在外边，没有人能想办法把它们搞掉，这才是件憾事。

这就是《新建桥》一开建的遭遇。自它诞生后，已经十一年过去了，似乎命中注定一样，一点没有发展。它的突然发育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奇特的、生动的，也可以说是一个颇带戏剧性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直到弗朗索瓦·布什^①进行他那件十分有益的工作之前，一直不为人所知。他第一次动用了那些有关的资料，诸如关于对承包商、建筑师、泥瓦师傅和其它一些人的记载和巴黎市政当局讨论有关大桥建筑方面的专题记录本等等。根据这些资料记载，其困难之大，局外人几乎难以想象。例如，据记载，在接近十六世纪末叶，在偌大一个宫殿岛的西部，几乎是无人开发的一片荒地，在这片荒地上居住着一些神秘的部族，难道说，从他们那里还记载了一些什么可怕的事情吗？确实，在很久以前，其年代已无从考证，那里曾居住着一批从爱尔兰移居来的无业游民，他们就住在岛上的灌木丛林之中。自从大桥工程无昼无夜地开工以来，他们便又移居到这块土地上废弃的器材堆里。他们把这些弃料经过加固和装配，搞得象个城堡。对于这些

^① 法国著名画家和雕塑家。——译者

半开化的外国人，一些最使人担心的谣言在传播着，据说，他们都十分凶残。因此，在1595年前后，那些原是看热闹的人们便都极想去看看这块陌生的土地并想见识见识这些土著的居民。最喜欢冒险的人，甚至急不可待地想要到这个岛子上来看个究竟。于是他们便在支桥的每个桥墩之间架上一块活动木板，这些木板当然很快便会被水浸泡得腐朽了，这些人便冒着被摔成重伤的危险，至少也是冒着失足落水的危险，来到岛上和这些野人交谈，友好地交谈，并向他们宣传文明社会的种种好处。第一批前往冒险的开拓者回来了（他们总算回来了），他们对自己这一热诚的使命不甚满意。因为这些野人甚为高傲，以岛上的主人自居，而且表现得不那么好客，因此，这些冒险家们也便懒于再去拜访他们了。直到1606年亨利四世决定把他们从巴黎迁走为止，此地一直无人问津。遣返时，把这些人装到船上，由警方人员驾船，一直“把他们押送到大海的对岸，他们原先从那里来的地方”。

亨利四世开始了他的统治。他征服了巴黎，而巴黎也对他十分倾心。这位国王喜欢微服出行与百姓们杂处一起。中断了的大桥工程又开工了。他把工程进度推进得很快，他总喜欢亲自到工地上去看看那日新月异工程变化。他绝不盛气凌人，却颇爱开玩笑，待人和气、热情，甚至有点爱说大话，带着点真正的加斯科尼^①人的爱吹牛皮的性格。他这种欢快爽朗的脾气，使大家热情很高。他是1603年第一个从那些摇摇晃晃的木板上穿过塞纳河的人。他的大胆使人惊叹不已。因为那天正值星期五，而星期五是黑道凶日，不宜出行的。有人提醒他，有许多莽撞行事的人，由于冒险过这种板桥而粉身碎骨了，他却说：“那是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

^① 加斯科尼 (Gascogne) 是法国南部的旧省区的省名。——译者

象我一样，是个国王。”最后，在1605年12月19日，他又一次穿过大桥，这一次是骑在马上，狩猎归来，其时大桥已经完工，只有^一些收尾工作了。因为当时对它的装璜还拿不定主意，原则上说，它应该有些亭、台、榭、馆之类的小型建筑以充作售货亭之类，另外，在正面的大路上，应该有一个纪念性的建筑物，但这个建筑物应是什么样的，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此外，这个贝亚恩省人^①，却把其它的陪衬工程搞得非常出色。他懂得，按逻辑讲，他的大桥应该通到某一个地方才对，基于这种思想，便诞生了多菲娜广场和两个紧靠着这个三角区的码头以及多菲娜大街。这条大街笔直地通往老布西城门，即菲力普·奥古斯特时的老城的旧址。就在同一时期，还开辟了奈斯勒大街（一开始这条街以亨利四世的次子命名，叫昂朱大街）和克里斯蒂娜大街，这个名字，时至今日，仍然能唤起人们对这位国王的女儿的回忆。

大桥建成以后的几年内，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倘需解释其原因的话，只要认真地想一下，今天在塞纳河上出现了多少新的桥梁便够了。它当时给市民提供了一个唯一的，宽广的市内通道。此外，它还是全巴黎市当时唯一不被住宅所包围的大桥。根据一种非常古老的世俗之见，认为只要桥身越重，它也越坚固，也越能抵住大水的冲击。因此，塞纳河上所有的老桥直到当时都有意地建造了两排房屋。而这些建筑又都是盖得尽可能地高，以便使它们的重量尽可能的大。现在很难设想，直到十八世纪初期，如果有人从圣一拉萨尔围墙边上出发直到卢森堡公园附近，作穿越巴黎市区之游而完全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过了一道河。但那时确实如此，除

^① 亨利四世原曾封在贝亚恩省作伯爵。——译者

非一些人别有所图而到河堤上逗留，否则大部分人是上不去的。更何况，那也不是正派人应去的地方。这就是说，有那么一大批巴黎人是从来也没见过塞纳河的尊容的。有时候，春水泛滥，卷走了一座桥和它上面所有的房屋，但却没有任何人记取这种教训。

但这座《新建桥》真可说奇妙极了！它两旁宽阔的人行道比中间的大路高出好几个台阶，既可作行人小憩的平台，又可从那里凭栏远眺。这时塞纳河上繁忙的景象尽收眼底，小船往来穿梭，大船装卸货物镇日不停。远处，长长的木排顺流而下，再远处，你还可以欣赏卢浮宫的长廊，那白色的雕刻在阳光下耀人眼目，而旋转的激流形成的漩涡顺流而下，把你的视线引到风景如画的天际，而那翠绿的田地，青葱的葡萄园，构成一幅名副其实的田园景色。曾几何时，这些城市居民们还居住在拥挤不堪的百年老屋里，现在，在这些老屋附近第一次有了这样一块宝地，可以在此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晴天，可以见到明媚的阳光，仲夏之夜，炎暑过后，人们也可以尽情地在这儿沐浴在习习的凉风中。大家知道，到这个地方来消遣、漫步的人比普通的过路人要多得多。为了方便游人，便出现了许多露天小摊贩，随之，走方郎中也前来设摊，接着，民间歌手，流浪艺人也应运而生，最后，连江湖骗子也在这里招摇过市。不久，这里便变成了一个永久性的集市，一个熟人约会的地点，一个闲人们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

今天，三百年来每时每刻都在增加着的桥上的过客，走在桥上时并没有想到，这一座老桥尽管是塞纳河上四十座桥梁的元老，却仍然保留着《新建桥》的名字，这在困难的时刻，可能对我们是个安慰。它结实地、完好无损地、永恒地

立在那里，似乎在告诉我们，它诞生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成长在频繁的战祸中，又被抛弃于经济拮据时，很久以来得不到很好的保养，但它仍然立起来了，并且是极富生命力和极为坚固耐用的典范。这一切又好象在告诫着我们，巴黎是人间奇迹的故乡，只要有雄心壮志，有坚持不懈的毅力，便无事而不成。

37. 圣—多米尼克大街

坐落在圣—日尔曼大道上的陆军部大楼，外表平淡无奇，没有任何可以吸引路人之处。这种建筑风格代表了第二帝国时期在巴黎大量建筑起来的那种大杂烩式的建筑格局。但圣—多米尼克大街那边的那栋古建筑物却特别引起人们的注目。因为那座曾住过王公贵族的官邸现已对外开放，并且还是一座摄政时期^①高贵而漂亮的建筑。这幢房子，在历史上曾数易其主，相继住过许多名人，其中有温文尔雅的黎塞留元帅，洛梅尼·布里埃纳，和在第一帝国时期拿破仑的母亲洛蒂夏等。喜欢恶作剧的巴黎人把这位夫人的拉丁文名字翻译出来，给她起了个绰号叫“欢乐的母亲”。这所老式房子仍然保留着这位命运奇特的老太太生前住在这里时的模样。她的会客室也仍然按原样布置着。放在大理石壁炉上金光灿灿的桂冠，座位宽大，靠背挺直的红色和金色的沙发椅，还有那幅成于1741年的十分名贵的挂毯，它是法兰西保留下

^① 指1715—1723年之间，法国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译者

来的最漂亮的挂毯之一。据诺特瓦尔的《名壁画草图集》记载，上面画的是《壮士凯旋归》，这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当时，拿破仑曾在两次战斗的间隙里跑到这里来看望自己的老母。这位老夫人对自己能培育出这样一位“超人”，并生下那么多的国王和王后感到惴惴不安，曾在此用科西嘉土语不拘礼节地当堂训子。当时，这间金壁辉煌的客厅和那幅蔚为大观的挂毯便是这一事件的旁听者。如果有哪一位魔术师能把当时的场面再现出来，使我们也能听到当时母子对话的内容，那么，我们就能知道更多当时的内幕情况，而这些内容，恐怕连最博学的历史学家也不可能知道的吧。幸运的是，这些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却一声不响，或者顶多向我们提供一点极其审慎，极其简略的迹象，而这些迹象已不会损及任何人的声誉了。

曾在陆军部身居要职的朱尔·马泽先生是一位好奇而博学的人，曾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得到一点这方面的内情。有一天，他在这栋房子的“高级卧室”里发现了一扇被帷幔挡得十分严密的小窄门，它隐蔽到你稍不注意便不能发现它的地步。应该说，这个“高级卧室”相当不高级，位置也不好，然而它却历来都被这幢房子的主人选作自己的卧室，其中包括黎塞留元帅和大主教、路易十六的大臣洛梅尼·布里埃纳。当时马泽先生对这件事脑子里常常发生问号，直到他发现了那个秘密的小门以后，这才解开了他心中的谜团。他费了很大劲才把这扇小门打开，因它非常之厚，门上的充料护皮又制作得非常精巧，这扇门一直嵌入墙内的厚厚门框里，就象一个瓶塞塞进瓶口一样。进了门，里边便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但却十分隐蔽，很明显，长久以来就无人居住了，因为天花板已经斑斑驳驳有坍塌的危险。一张破旧的大沙发象

一张床一样放在里边，还有一面大镜子。这一切表明，这个小巧玲珑的房间，原先曾是一个大家闺秀的幽雅的小客厅。布里埃纳主教曾把它称为“小礼拜堂”，对他来说，除了把它当作祈祷上帝的场所以外，绝不准许我们对此有任何其它设想。但到了黎塞留元帅，他可就对宗教不那么虔诚了，那么，这个雅静的小客厅很可能被派上对宗教大不恭的用场了。那面古老的大镜子里面映出的，大约不是蓬巴杜尔侯爵夫人的俏脸，就是波普里尼尔夫人的芳容，或者是其它许许多多的名媛淑女们的花容月貌。甚至有人曾断言，时代尽管距我们相当遥远，但洛梅尼·布里埃纳的小教堂却并不是那么默默无闻，它曾是许多人谈话的主题。而“高级卧室”真正的吸引人之处也不是它本身，而是它那个附属的、十分隐蔽的邻室……我们还是把这一段风流韵事略过不提了吧。

另外一些比较起来不那么风流的历史事件把我们唤出了大臣官邸。现在我们就到圣一多米尼克大街十号去看看，走进宽大的门道，里边便是一个大院，四周是陆军部的主体楼房，建筑得十分朴素，专供所属各部门办公之用。这就是所谓“时钟大院”，它是这个大建筑群的最古老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的房屋属圣一约瑟夫女修道院。漂亮的孟德斯潘失宠以后便隐居在这个修道院里。由于在国王的心目中已失去了分量，她便被那个寡妇斯卡隆^①挤出凡尔赛。这位寡妇的一切都得力于她，“甚至连吃的面包”都是靠她的努力。这位入院忏悔的王妃于1684年命人造起了这些朴素的楼房。从那以后二个半世纪过去了，这些建筑物的外部特征并没有多

^① “寡妇斯卡隆”原是法国作家保罗·斯卡隆（1610—1660）的妻子。保罗于1652年得了全身瘫痪症，并死于1660年，从此斯卡隆寡妇便过着一种完全放荡的生活，直到她嫁给曼特农侯爵为止。这里讲的排挤孟德斯潘的事可能发生在保罗死后她改嫁之前。——译者

大的变化。那个时钟可能就是“时代”的象征。如今，它那细长的钟声一响，便是下班的时刻，而从前，这个同样细长的钟声一响，修女们可就该起床了。那条傍院三面而建的回廊，如今只剩下一些残破的拱顶。这个老修道院的一方花园特别受到了保护，可能它下面就是个墓地，因为三十多年以前还有人在地面的浮土下看见过一块黑色大理石的墓盖，下面埋的可能就是这个修道院的某一位住持。孟德斯潘夫人常常到这个花园里来散步，独自一人在这里重温已逝去的往昔的荣华岁月。她的住所就在旁边。这所房子，由于偶然的原因，大部分保留下来了。它在二层楼上，楼梯到了二层以后又转下来和一个宽大的通道相接，这便是目前联接时钟大院和马厩大院的那条通道。上了楼梯，便是军服供给处的办公室，陆军部检查处处长的办公室就是她原先的客厅和卧室。就在这间卧室里，这位受尽凌辱，精神忧郁的可怜的贵妇人，可能经常凭窗而立，对着破败的花园，缅怀往昔住在富丽堂皇的克拉尼宫^①和特里亚诺宫^②时锦衣玉食的王家生活的罢。后来她又离开这里，到波旁—阿尔尚波去过着更其潦倒的生活，并在那里终其天年。她经常上下的楼梯，现在已经物是人非了，经常在上面走动的，是现在那些商人、勤务兵、办事员和打字员。当她最后一次走下这个楼梯时，在搀扶她的修女们的耳边叹口气道：“这次出走，我再也回不来了……”就这样，一个曾使国王言听计从的贵妇人，便在这个地方和过去永远分了手。

① 该宫殿在凡尔赛以东，旧克拉尼地区，是路易十四特为孟德斯潘夫人所建，它于1680年完工，毁于1769年。——译者

② 在凡尔赛宫花园里，有大、小特里亚诺宫之分，以其建筑风格生动别致著称。——译者

前面介绍了孟德斯潘夫人，下面再谈谈德芳夫人。她在1750年成了那位已故王妃的住室的主人。这位新房客和那位老房客完全相反，她绝不事事忏悔，也不那么多愁善感，也绝不因自己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而忧伤难过。她曾经爱过，但那仅只是为了消遣和“应酬”。因此，她对自己那种生活感到厌倦，也正因为如此，后人们只把她看成一个喜欢聊闲天的女清客。她无日无夜地邀请一些社会名流前来聚会，诸如阿朗贝尔、狄德罗、孟德斯鸠、内克尔、侯爵夫人夏特莱、莱斯皮纳斯小姐，还有一大批人，但这也只不过是为了清谈。因为十八世纪，在被目为儒雅之士的骚人墨客中，非常盛行清谈之风，而且其集会的名目也非常繁多。凡是在文学界和科学界小有名气的人，为了消愁解闷，都曾沿着孟德斯潘下来的楼梯走上去。但其中最有名气，并给到这座富有史料价值的房屋里来参观的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伏尔泰。这位已然垂垂老矣的八十老翁，在巴黎的最后几年中，有时便坐车从波诺大街来到圣一约瑟夫修道院，和这位素以健谈著称的夫人一起坐上一个小时。其时这位夫人已经双目失明，两耳也几乎听不到声音了。她由于软禁在此而名声大震，也正由于这一软禁又使她身价大跌。这位老态龙钟的长者伏尔泰，头戴一顶皮帽，身穿那件著名的外套，用瘦骨嶙峋的手扶着楼梯上的铁栏杆，一步一步地拾级而上；一大群闲人聚集在圣一多米尼克大街修道院的门口，等他走过时向他欢呼致意。这是他临终前最后几次公开露面中的一次。

这个古老的楼梯，倘论其意义，能够经历如此多的人和事，其价值远比在它上面刻上一个法文字母或者编上号要大得多。为什么不可以给它起上一个纪念性的名字呢？这样便可使人顾其名便能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日子，比如说，“孟德

斯潘楼梯”或者“伏尔泰楼梯”等。这样便可能使这些伟大的历史文物得到拯救，免受可能遇到的破坏从而使它们得以永存。

38. 狄德罗的住室

在富尔大街和公主大街交汇的拐角处，1740年还是一个木匠作坊。原先是一个大院子，曾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很长时间。这个木匠作坊的主人有个儿子是个画家，他有一个朋友，此人游手好闲，整天东游西逛，但画家却很乐于和此人交往。因为这个不守本份的家伙头脑里荒诞离奇的玩艺儿特别多，他能把这些东西兴高采烈地讲给你听。两个伙伴都喜欢一起在河左岸狭窄的道路上闲逛，特别留意观察街头风光和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景。晚上，这位画家便回到他父亲的作坊，借着案板上的灯光，顺手画几幅市民们生活场景的素描画，而他的朋友则大声朗读着为写《功勋和道德》而搜集来的素材笔记。这位画家就是夏尔丹，朗诵的那位就是狄德罗。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房屋如今已不复存在了，这实在是最令人遗憾的事。这两位《沙龙》和《餐前祈祷》^①的作者，曾肩并肩地走在这所房子的墙下，并在那里一起纵情地幻想过。

但是且慢遗憾吧！时至今日，我们在为旧巴黎城的破坏而伤心落泪是无用的，也是幼稚可笑的。巴黎也和别的首都

^① 有人译为《午餐前的祈祷》。——译者

一样，是不能用人力使其永远保持老样而一成不变的。人类必须进步，房屋也必须倒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使人惊异的是，从开始拆除这些老房子的那天起，巴黎的考古学家们，每天都有新发现，每天都有大量的，令人惊奇的遗迹被发掘，并且还将不断地发掘。这座城市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代遗迹，十六个世纪以前，这里便有了居民，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地生殖繁衍，不断地斗争，以取得为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财富并谋求新的发展。

在十八世纪末期，正掀起一股拆房热。如果某一位专横的君主宣称，巴黎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绝对禁止改变它的面貌，那么，谁能想象巴黎将是个什么样子呢？那时人们将被迫在郊区大兴土木，因为那里是不乏空地的。而我们也便有一个世界上最大、最了不起的历史陈列馆了。每栋房子里都会有死去的亡灵在游荡。人们在大街上漫步就象是在翻阅一本史书，每一家房子的门前都有历史的遗迹可考，挤满了朝圣者的巴士底监狱，克朗一夏特莱监狱，圣殿骑士团寺院的钟楼等，便成了本区的圣地。而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每走一步便会由几千栋石砌的多年老屋以见证人的身份向我们讲述着巴黎城的历代英雄业绩，这些老屋自然仍然保持着其棕红色的屋顶，东倒西歪的门面，围有铁栏杆的精巧的阳台，又由于它们阅尽沧桑而向我们摆出一副沉思的和神秘的面孔，小心翼翼地保守着其中一些不可告人的秘事。但我们却很难相信，我们这些如此冷静，或者说如此自负的现代化大建筑，有朝一日也会有和这些老屋同样的气度。

鉴于这些想法，我便阅读了爱德蒙·博勒佩尔出版的有关考查狄德罗所有住宅的一本书。博勒佩尔先生试图沿着这位《拉莫的侄子》一书的作者自1727年来到首都以后直到他

去世的五十七年内的足迹遍访巴黎。由于进行了这样一次调查，我们才得以估计到，为使“城市美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有多大。狄德罗毕业的阿尔古尔中学，除了现在已被圣一路易中学所占的那片地皮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法院检查员克里曼—德利的事务所至今也连影子也没有了。这位检查员是狄德罗父母的同乡，都是朗格勒人，因此他答应向这个年轻人提供食宿，并向他讲授有关诉讼程序的知识。这个事务所原在富尔—圣—奥诺雷大街，如今这里已是宽大而现代化的沃维里埃大街了，那个事务所自然也就踪影皆无了。然而这一段历史——在我们这位未来的哲学家惊险离奇的经历中也并不值得大书一笔，因为他在处理诉讼事宜和承办委托案件中所表现的才干实在很平常。克里曼—德利曾就此事提醒过狄德罗的父亲。父亲于是严肃地向儿子指出，他必须选择一个职业，狄德罗要求给他三个月时间的考虑。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他对父亲说，他不想当医生，因为怕自己医术不高会害死人，同样也不想当律师，理由是，律师这一职业完全是替别人办事，而别人的事他是不感兴趣的。他最理想的职业，便是是什么职业也没有。他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他喜欢看书，喜欢闲逛，他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随心所欲”这件事，就是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他父亲便断绝了对他生活上的资助。

从此狄德罗便开始了一种浪漫式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但应该相信——这种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学校，因为这种生活造就出来的著名艺术家和大作家比世界上所有的高等学府和什么学院造就的都要多。而巴黎就是这种生活的温床，其它地方是无法和它相比的。在这里，命运从不小看任何人，在这里，你周围的人们那种乐天的情绪，人和人的平等

关系，意外的收获、偶然的机遇，都可以把一个饥肠辘辘的汉子变成一位“马路国王”。只要有机会，狄德罗便什么都干。他当过数学教员，搞过英文翻译，干过家庭教师，当无人聘请他时，他就替蹩脚的传教师们胡编乱写一些教义来换钱餬口。而当时也确实确实有那么一些善男信女们对宗教十分虔诚。这位无神论者编写出来的教义，他们听起来不但必恭必敬，而且还深受其感化。我们这位无神论者一直奉行的原则便是，不信神佛的本身，便是聪明的开端。

狄德罗当时的处境很惨，他形容狼狈，有人在卢森堡公园的“苏比尔林间小道”上看见过他。当时他身穿一件灰色长毛绒上衣，“腰上因绽线而开了一个大口子，一只袖口撕裂了，一双黑色的呢袜后边用白线缝了一大片”。但他也并非一点钱也弄不到，他母亲有时从朗格勒偷偷地接济他几个路易^①，不是通过邮局寄来，而是打发她的一个女佣人步行二百四十公里，把这几个钱交到这个浪荡儿子手里。此外，这位好心的女佣人还不声不响地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一点积蓄也加进去。为节省几个钱的路费，她再步行走回朗格勒。

正如大家所猜想的那样，这位浪荡公子经常搬家。1740年，他住在奥博赛旺斯大街（即今安托万—杜布瓦大街），随后又搬到“双桥”大街，住在一栋老房子里，这些老房今天当然早已拆除。在这儿居住时，他认识了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姑娘，名叫安娜·图瓦奈特·尚皮雍，她住在布贝街（这条街由于圣—米歇尔大道的开辟，也没有了），狄德罗对她一见钟情。她究竟有哪些迷人之处使他如此倾心呢？别人可能很难说清楚。卢梭曾肯定地说，安娜·图瓦奈特是“一个得理不让人的泼妇，她粗俗泼辣，结婚后也并没有摆脱从前

^① 法国旧金币，一路易相当于二十法郎。——译者

的坏习气”。她父亲惨死在皇宫的医院里，这个可怜的姑娘便靠自己的双手活命。不管怎么说，狄德罗还是离开了“双桥”街，搬到这个姑娘的住处来了。他从此便体面起来：那件灰色长毛绒的上衣有人给缝了，那双黑袜子也不再用白线补了，狄德罗便决定和她结婚。他把这一打算告知父母，家里反对俯就这门不般配的婚事，但他不听劝告，随于1743年11月6日在一个名叫圣一皮埃尔—奥博的古老小教堂里和安娜·图瓦奈特结了婚。这个小教堂后来因修建阿尔科尔大街而拆毁。他们既没有打扮，也没乘马车，更没请宾客，一清早就双双来到这个小教堂悄悄地接受了神甫的祝福。由于某些原因，也或者是因为家庭的反对，这一对新人对他们的结合，一直都没做任何声张。

这对年轻的夫妻便在圣—维克多大街上建立了一个小家庭……图瓦奈特在这里给狄德罗生了一个小女孩，但七周以后便夭折了。已经成了狄德罗先生和狄德罗太太的两个年轻人又搬了家。这次搬到夏洛诺区^①的特拉维西尔大街上。这条街当时只是一条乡间土路。不久他们又搬回巴黎市内，1746年住在穆夫塔尔大街，在这里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取名雅克—德尼兹，但不到四岁又死去了。他们一生只有一个女儿，这便是后来的旺德依夫人，她对其生父极其崇拜。

狄德罗在一个书店里当雇员时，为补充家庭经济，曾翻译了一本英国出版的医学词典。编辑者布雷东向他建议，为适应法国人的口味，再把尚贝尔的《大英百科全书》翻译出来，这一工作每年可以赚到一千二百里弗尔（这是一笔相当

^① 夏洛诺区是巴黎“下等人”居住的地方。那里大部分居民都是工人，北边便是拉雪兹神父公墓。——译者

大的数目)。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便是在翻译的同时，也便研究了各种学科。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在于仅仅是一种单纯翻译了，他可以据此写出一本新书，狄德罗马上便感到了这本书的重要性，它可以说是一本“书中之书”，于是便十分热情地答应了布雷东。1746年1月21日，新《百科全书》的版权证明书上便盖上了国王的图章。是的，这个1月21日是决定他命运的日子。这一天，由于书店的一般性生意交涉，却诞生了这部著名的大作。按照约瑟夫·雷纳克的说法，法国大革命的火花，“就象河流从山川上一泻而下”般地从这本书中迸发出来。雷纳克并补充说：“这条河流的流程并没有完结，它离着大海还有很远很远的路程，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汇入大海……”

上面这一段解释性的回忆文字，并没有转移我们对这位哲学家住房问题的话题。因为爱德蒙·博勒佩尔先生还向我们指出，他当时从事这一鸿篇巨著的地方，正是今天的老吊刑街三号，当时这栋房子只有四层，而不是现在的六层。狄德罗当时住在三楼上。楼梯看起来似乎还是老样子，是向右开的，上面有拱顶，大门能进车辆，上面也搭着扁圆形的拱顶，无疑仍然是“当时”的老样子。……就在这所房子里，警察局长罗克吕布诺带着他的警察们于1749年7月24日清晨逮捕了这位编纂颠覆性词典的人，并把他投入万森监狱……。

这位到处搬迁的哲学家又从老吊刑大街移居到塔拉诺大街，住在埃古大街拐角的那栋房子的五楼上（即雷诺大街和圣一日尔曼大街拐角的地方，亦即圣一勃诺瓦大街的对面），这里原先曾有过他的一尊雕像。因为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堆满了书，他又在自己小屋的上面租了一间阳光充足的顶楼以存

放书籍，后来在他女儿结婚时，因为没有钱用，便不得不忍痛把这些书出卖。此事被女皇卡特琳娜二世^①知道以后，便命人把所有的书籍全部购下，并规定，这些书的保存者必须妥为管理，以备女皇陛下高兴时听候调用。这位慷慨而正直的女皇为保护这些藏书甚至每年提供一笔年金，第一笔款子并提前交付，从那时起，狄德罗才解除了缺乏资料的烦恼。

他的家庭经济的确并不富裕。他那位可怜的太太，在他们困难的岁月里，常常是每顿饭只吃一块面包，这样，每餐可以节约七个苏，以让她的丈夫能到雷让斯咖啡馆喝上半杯咖啡，并去看看下棋，以资消遣。这位可怜的安娜·图瓦奈特，她那位见异思迁的丈夫老早就把她抛弃了，她因之性情变得十分忧郁，落寞寡欢，爱发脾气。这间屋子里搞得杂乱无章，和它的外表一样，看着令人十分不快，这使前来拜访这位哲学家的热奥芙兰太太心中老大的不忍。这位“矮小的好心女人”便利用他不在的机会（他经常不在家，他现在已是时髦的女士们和文人、学会的主持人等家里的颇受欢迎的座上宾了），把他在塔拉诺大街上的陋室里破旧的家具全部换成了新的。狄德罗回来时，发现他的房间已经焕然一新，丝绸的窗帘，厚厚的地毯，当代大师的名画，……这一番变化仅只使他高兴了一半。作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更喜欢“他的那些破烂”，因此，他的思想上总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他因之竟写了一篇文章以寄托对他“那件旧晨衣的无限惋惜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任这些使他讨厌的精致家具摆在那里，因为他还要住在里边不能离开。到了晚年，当俄国女皇闻知他竟达到如此狼狈的境地时，便命人给他在黎塞留大街的贝松旅馆安排了一套房间（即今天的三十九号），

^① 指当时的俄国女皇。——译者

他才离开了塔拉诺大街上的老房。这套新住房，与他五十年来所住的那些房子相比，简直就是座宫殿。他于1784年7月30日在这里与世长辞。

他的遗体被移往圣一罗克，并安葬在圣母玛丽亚教堂。他在世时，一生动荡不安，四处搬迁，这次魂归西天，我们可以确信，他的遗体将得以永远在此安息了。然而不然。作为他最后的安息之地，也和他的前人一样，并没有逃脱拆房工人之手。据有人考证，狄德罗的骨殖，以及高乃依、勒诺特尔、爱贝神甫，还有其他一些人的骨殖，确实是被从墓穴里清除出去了，原因也很简单，那是因为要在教堂地下安装现代化的暖气设备的缘故。

39. 莫扎特在巴黎

在弗朗索瓦一米隆大街六十八号，老博韦公寓那栋房子依然还在，并且还保留着一部分往昔那种富丽堂皇的气派。这座建筑使人联想到一位面目可憎的女人，她只有一只眼睛，生活放荡异常，此人名叫卡特琳娜·贝利埃，别人都叫她“一只眼的卡通”^①，这座公寓便是她出资建造。她曾嫁给一位名叫博韦的参议员，并且是路易十四的第一个情妇，这使路易十四得到一个教训，即以后找情妇时要认真选择一下了。这栋老房子到处装饰着大量的“公羊头”的雕刻，便也恰好是

^① “卡通”（caton）是法国民间词汇，意为一大团没和好的面粉，这里意思是说，贝利埃长得奇丑，脸面就象团没和好的面粉一样。——译者

这个不怎么值得称道的女人性格的绝妙写照。

“一只眼的卡通”死去一百年后，有一位名叫伊克的伯爵住了进来，他是巴伐利亚州的一位大使。1763年11月份，这里又来了一位德国籍的奥地利人，携带着妻子和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及一个刚七岁半的小男孩。就是这个小男孩，在经济上供养着全家。这的确是一件千古奇闻。这个小男孩演奏的羽管琴，美妙动听，有如仙乐一般。他能综合各种乐曲，即兴创作和谱写小咏叹调和优美的奏鸣曲。他爸爸经常在人前炫耀这个孩子的天才，他拿一条毛巾把琴键上的曲谱盖住，这个小魔术师仅凭记忆便能把最复杂的曲谱一个音符也不差地背出或者用钢琴演奏出来。他就是沃尔弗冈·莫扎特。这也就说明了一切。另外，大家都知道，本文的主旨不在于重复这位被冠以“神童”称号的小音乐家那些广为人所传诵的故事，如果再把以下几件事稍微一提，大约关于他这方面的传说，也基本上补全了。比如他在宫廷里为国王演出和在凡尔赛为法兰西贵夫人们演出所取得的成功；在王家小教堂里，当大家做午夜弥撒时，他听到国王陛下乐队的双簧管和小提琴演奏法国古老的圣诞歌时那种陶醉的表情；在大餐桌前，当王后分给他甜食时，他那种放肆的表情；在蓬巴杜尔夫人家里举行演出时，夫人让他站在桌子上，以便能更清楚地看他的演奏，当演奏完毕时，他把自己的小脸凑上去，满以为她能在他上面亲个吻，然而这位王妃对这一表示竟不肯惠顾，这时我们这位小音乐家想起了他在维也纳演出时，受到大玛丽—泰雷兹^①接待的情景，便气愤地大声嚷起来：“这位太太是个什么官，连女皇都拥抱我，她为什么不吻我？”幸亏这话是用

^① 玛丽—泰雷兹（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曾做过女皇和匈牙利王后。——译者

德语讲的，否则，他就很有可能到巴士底狱去尝尝味道。或者，他今天可能不是以“乐圣”的身份，而是以拉杜德^①的难友身份闻名于世了。因为那位爱记仇的侯爵夫人曾为了一件远比这要小得多的事，便把拉杜德送进了巴士底狱。

对上面这些事我不想多说，吸引我的还是博韦公寓，因为访问这些旧石废瓦，并了解它们在历史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切，实在是一件兴味无穷的事。的确，这座公寓的门面装璜已非昔日的旧貌，而居住在里面的某些旧主人由于热衷于追求时髦，可能在第一帝国时，就把过时的老样子给予改造了。但这幢房子的布局并没有改变。那么，莫扎特住在里边的哪一套房间呢？他父亲曾提到过，他们全家人非常舒服地住过的“一个房间”，那么，是三楼上面朝大街的六个房间中的一间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小沃尔弗冈的手，那只有魔法的手，就会经常放在那个非常豪华而漂亮的楼梯扶手上上上下下了，这个楼梯就在门廊的左手，连同上面的图案和圆雕，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或者有可能他们是住在第二层的某一个房间里。据当时的一些记载说，这个房间“不和其它房间相连，它位于左侧，靠近院子的深处”，有一个廊道和“一个有假山和鸟栏的空中花园”相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位总爱炫耀当地的要人如何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的莫扎特的乃父，为什么不在他的信中提上一笔关于这个空中花园，天上的岩洞和山上的鸟栏的事呢？这样岂不使他在他的萨尔茨堡同乡的心目中身价更高吗？据此，我们可以认定，莫扎特是住在三楼，那些朝街的窗户里，有一个

^① 让·亨利·拉杜德（1725—1805），他是法国冒险主义者，因反对蓬巴杜尔夫人，曾分别被关进巴士底监狱、万森监狱等四个监狱，先后在狱中关押了三十五年，数次越狱均未成功，后被释放。——译者

就是他的房间。奇怪的是，竟没有一个人想到在他居住的老屋的墙壁上挂一块纪念性的匾额。如果有这样一个标记，大家便很容易回忆起，就在这间屋子里，这个小天才曾写出过两部钢琴奏鸣曲（一个是D大调，一个是G大调）。据音乐评论家讲，这两部乐曲“在法国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中非常受欢迎”。一块匾额，便应该是这些老屋的一枚荣誉勋章，这枚勋章应该列入下一批颁发的日程之内，这是我向巴黎市政当局提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

莫扎特全家在博韦公寓住了五个月，随后便去伦敦，自伦敦返回后，只在巴黎住了六个星期便离开了法国。十二年后，莫扎特又回到巴黎。这次只是莫扎特自己和他母亲二人来的，他母亲是一位正直的家庭主妇，其时已经年逾五十了。她年轻时，也并不见得漂亮，但她却纯朴，温和，聪慧并且十分随和。母子双双从曼海姆来到法国，并于1778年3月23日到达巴黎。路上走了九天，旅费高得吓人——花去四个路易！他们就住在克罗瓦桑大街对面的克罗一舍奈大街上的《埃蒙四兄弟》旅馆。克罗一舍奈大街即今天的桑蒂埃大街。这家旅馆正对着克罗瓦桑大街，很显然，这条街是十九世纪修建的。在这个旅馆里很可能什么可纪念的东西也没有留下。他和他的老母住在这里，除了他那十二支钢琴变奏曲《啊，妈妈听我说！》之外，他还写了一支他所有的奏鸣曲中最大众化的一支——A大调奏鸣曲，这一作品，包括它的最后一个乐章小快板《在土耳其》，可能是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都是演奏得最多的一首。

关于莫扎特在巴黎的生活情况，我们从他和他留在萨尔茨堡的父亲频繁的通信中了解了很多。这些信都写得很长，多年来一直在这个城市的莫扎特纪念馆里小心翼翼地保存

着，从来没有任何人搞到过可靠的抄件。直到1914年才得以全文发表，但仍然是德文原文。在这之前，我们得到的只是些片段的、质量很差的译文。莫扎特的字写得非常之糟糕，文笔也十分粗糙，字体也非常奇特。亨利·居尔宗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准确的译本，在这个译本中，音乐家所有的灵感和新奇的念头都翻译出来了。这些新鲜念头表明了二十二岁的莫扎特思想上的自发性和多变性。做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再没有人比我们这位出色的同胞亨利·居尔宗更合适的了。这个译本向我们展示出这个天才音乐家的内心世界，使我们对他在逆境中奋斗的勇气，在困难时的乐观精神，乃至临终前还保持着的诙谐、活泼的性格赞叹不已。

再没有比这本书更动人心弦的了。只要对音乐研究不持偏见的人们，都能从每一页中满足自己对音乐历史的好奇心。对巴黎来说，它又是一个新的篇章，将进一步充实巴黎的历史，而这一页又是何等光荣的篇章啊！从这座城市诞生的第一天起，假如你坐上一驾破马车在街上跑跑，你会发现，那街道是何等泥泞！在这个城市里，就是最庄重、严肃的人对此所表现的又是何等的麻木不仁！对它又有多少至今已完全从人们记忆中消失了的溢美之词！莫扎特曾对波拿巴公爵夫人进行过一次拜访，这次拜访留下的印象，比他受到上面提到过的蔑视更加深刻。其时大家正在等待着他，这位公主在一间十分寒冷的客厅里特别殷勤地接待了他，并邀请他演奏钢琴。他冻得直哆嗦，便提出能到一个暖和点的房间里去，以便起码使他冻僵了的手指能够舒展开来。公爵夫人回答说：“啊，是的先生，您说得很对。”说完她又重新坐在一张大案桌旁边。案桌周围有好几个人坐在那里作画，她自己说完也便开始画了起来。莫扎特就这样等在那里，全身

都要冻僵了，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头颅都成了冰块一般。他就这样哆嗦了一个小时，也没有一个人同他讲话，就好象谁也没发现他似的。为了摆脱这一难堪的局面，他便开始演奏起来……那架钢琴讨厌极了，非常之不顺手，他继续往下弹，决心弹给屋里的摆设听，因为那些作画的活人们谁也没停下手里的工作，就象没有人演奏一样。后来他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了，一个曲子只演奏了一半，便在中途停了下来，几乎就在这同时，爆发了一片狂热的呼声：“真是妙不可言！简直无法思议！真了不起！实在令人吃惊！”他只好匆匆告辞逃了出来，同时答应他们，等……等钢琴好用一些时再来。

下面这一有趣的一笔，颇能显示出莫扎特的性格：他写了一部交响乐（即D大调交响乐）准备在宗教音乐会开幕式上演出，开始排练了，他从来没听到过如此草率，如此拙劣和如此糟糕的演奏。因时间紧迫也无法再排练了。到公演的那天（可以说，那是巴黎即席演奏的盛会）演出效果竟非常之好，获得巨大的成功。莫扎特高兴异常，马上跑到王家宫殿，要了一杯冰镇饮料，开始做起祷告来，因为“他曾许下心愿，如果演出成功，他就向上帝祷告”。但他也有烦恼的时候，同年6月18日，他回到克罗一舍奈大街的家里，当时他母亲微感不适，19日，她说，头有点疼，20日她竟打起寒颤来，随即便发高烧，接着便腹泻。莫扎特想请位大夫来，但她母亲反对，她根本就不相信法国医生。再说，病情也不十分严重，据这位音乐家说，“在这里，对所有的外国人来说，腹泻是常事，他们只要水喝多了就腹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才到这儿来时也闹过一次。从那以后，我就不单纯喝水了，每次都往杯里掺点酒，又因为我不能总这样不喝‘纯水’，后来我就往里边放点冰块，用这种办法，每天晚

上临睡前，我总要喝上它满满的两杯。……”

一位庸医给其母用药，结果却愈泻愈烈。他便不敢离开母亲一步，当然也不能出去找德国医生。幸而，有人替他找到了一位，这是位年事很高的德国医生。他于6月24日来替患者看病，检查过后，让莫扎特“把大黄研成细末和上酒”给病人吃。莫扎特吃惊地说：“酒不是发热的吗？”话刚一脱口，在场的人（不用说，邻居家的那些老大妈们一定在场，还有公寓里的人）马上便异口同声地反对说：“什么？你说什么？酒才不发热呢，它只能增强药性，水才是发热的呢……”29日，这位德国医生又来了，他什么措施也没采取，只是简单地说：“我怕她过不去今天晚上，请你们找人替她做做忏悔吧。”不知所措的莫扎特匆忙地跑出去找德国神甫（应该说，莫扎特全家都是非常德国化的，在莫扎特的信中，每一页上都流露出那些莱茵河彼岸的人们对法国的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对法国人的性格乃至兴趣爱好等所具有的那种传统的蔑视情绪）。莫扎特气喘吁吁地往回跑，直到栅栏外边才停下来，进屋后，他对母亲说，他凑巧碰上了一位非常喜欢听他钢琴演奏的本国教士，他答应当天晚上就来。对这件事，莫扎特在信中说：“她对此一点也没感到吃惊，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我看她似乎好了一些，也便没有多说别的。”

他这凄凉的叙述便到此为止，并说明，下一封信再谈。但这封信是否真是他写的，以及这封信的原件现在何处，我不得而知。莫扎特太太是7月2日到3日的夜间去世的，当时已经完全处于昏迷状态，她儿子守候在旁边，王家卫队轻骑兵的一个号手帮助料理的后事。但是否举行了宗教仪式以及安葬的情况如何，通信中均未提及。但这个空白也并不是不可填补的，只要翻阅一下圣一奥斯塔什的教区记录簿便可以查

出，如果没有死亡证书（这也并非无处可寻）起码也能搜集到一些较为可靠的关于殡葬仪式的详情。一个有决心有毅力的莫扎特研究者，应该进行这一调查工作。

老母仙逝以后，莫扎特便离开了克罗一舍奈大街的那家旅馆，应埃皮奈太太的盛情邀请，便搬到她那里去住，其时她正和格里姆住在肖塞—安丁大街，但他并不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当他第一次到巴黎时，这个格里姆（也是一个德国人，而且还是个真正的德国人！）便把他当成一棵摇钱树，向巴黎社交界广为推荐，可到了现在，他又反过来大讲莫扎特的坏话。这个普鲁士人为炫耀自己多知多懂，有一天，他便向他的前被保护人莫扎特说，他在巴黎把时光都浪费掉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干出什么成绩来的，因此便直截了当地说：“你不必到处乱跑了！”于是他使用几乎强迫的手段把这个未来的《唐璜》作者打发回国了。可怜的莫扎特当时手头只有一点点旅费，还是借的。没办法，只好在斯特拉斯堡又停了下来，在这里举行了三次餐厅音乐会。第一次音乐会他只得了三个路易；第二次也不怎么成功；到了第三次，“演奏会的餐厅里只预备了二十四个人的座位，而这二十四座位上只坐了三个听众。”收入自然是可怜而又可怜，扣除了其它费用，莫扎特净得一个路易……。

40. 喜剧大师博马舍的两处住宅

梅纳尔小姐美貌绝伦。她原先是一位穿街走巷的卖花女

郎，每当她当街叫卖时，所到之处，那些纨绔子弟便和她眉目传情并对她甜言蜜语，这使她飘飘然又昏昏然，从此便想入非非。她于是便买了一本语法书，请了老师，开始学写字，学朗读，学音乐，学跳舞，还学了好些其它的本事，便居然登上了意大利喜剧院的大舞台，1770年6月演出路易丝的《逃兵》竟获得极大的成功。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肖尔纳公爵对她的首次登台演出很感兴趣，并对她本人大加垂青，认定她有光辉的前程，于是便请来克罗兹替她画像，并宣称自己是“她的保护人”。这样，我们这位演员便和这位贵族老爷幸福美满地共同生活了四年，他对她十分钟情，而她呢，可是对他有点儿害怕。因为肖尔纳公爵身躯粗大，体格健壮，在全巴黎属第一名，只要他稍微动一动那只强有力的大手，这位娇小玲珑的少女就有可能被他扼死。为耐心地维持着对他的这种小心谨慎的爱情，她便把自己的沙龙向文艺界知名人士开放，她有幸接待的文人学士都是当时的二流人物，如马蒙泰尔、塞代纳或吕埃尔之流。有一天晚上，公爵为她带来了一位名叫卡隆·博马舍的先生。此人原是个钟表商，俗气逼人，他曾两次异想天开地忽然想“当一名剧作家”，并曾写过两个十分蹩脚的剧本，一个名叫《欧仁妮》，于1767年2月上演，另一个叫《两个朋友》，三年后曾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过。格里姆（此人是一位行家）在这两次演出过程中宣称，卡隆·博马舍先生“根本没有写戏的才能，也看不到一点剧作家的气质，他根本不懂得如何写剧本，对戏剧也一窍不通。”至于读他的剧本，则“味同嚼蜡，只看见人物进进出出，不知道为什么上场也不知是怎么下场的”。这位卡隆·博马舍先生就这样被宣判并被证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庸才，并把这一切公诸报端。博马舍尽管文学上没有才华，

但却在另一方面有非凡的本领，即特别善讨女人的欢心。他庸俗，粗鲁，工于谄媚，极善应变且厚颜无耻。他谈到自己的著作时，简直把自己说成是个戏剧大师，他甚至吹嘘说，就在他的皮包里已经装了一部准备哄动巴黎的喜剧剧本。剧中的女主角是个天真的少女，这个角色完全可以为我们这位幸运的喜剧女演员带来荣誉，而他自己则正打算邀请她来担任这一角色。听到这些，梅纳尔小姐似乎看到自己已经成了法兰西大剧院的明星，于是便一下子投入博马舍的怀抱，并毫不掩饰地说，他就是她心中的上帝。这位善于吹牛的作者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个机会。胖公爵肖尔纳很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已经戴上了这顶绿头巾。不知为什么，一来二去竟被这位公爵知道了此事（也许是那位不贞的女演员自己承认了或者是公爵自己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什么信物了吧）。据正史记载，1773年2月11日，有人看见他从卧室里跳了出来，手持利刃，气势汹汹地朝当时博马舍的住处孔代大街跑去，决心要杀死这个卑鄙的家伙。他来到后便敲他情敌的房门，有人把门打开，他便冲了进去……这时他才发现，每逢当月中旬的星期二，博马舍先生都以王室猎区总管的身份住在卢浮宫里，他花钱买了这个官衔，在位已经十年了。他治下的百姓便是巴黎南郊的那些农民，他的职务权限便是抓获在“御用猎区”非法狩猎和捕鱼的人。如今在蒙特鲁热和舍瓦兹勒鲁阿之间，连一只兔子也看不见了，而当时那里却是野物生殖繁衍的地方。

在博马舍的大部分传记中，对他曾当过法官一事，都绝口不谈（或几乎是绝口不谈），而对他的喜欢惹事生非，拈花问柳等风流韵事却津津乐道，以致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直到

现在都一直为人们所忽视。但这位《费加罗》^①的创造者却一直坚持不懈地从事着这一工作。他为法国王室当了二十六年法官，然而保存在王室猎区总管的档案室里关于他这一部分资料却一直未引起研究人员的注意。1789年11月11日，查理·瓦莱斯却在国家档案馆里发现了它们。关于这方面事物的登记，判决书的原本以及各类文件，足足有九十八册之多。这些东西都由博马舍经手漆封或至少有他参加经办的。这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发现！瓦莱斯先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摘抄，把它的内容压缩成一册。这一翔实的资料向我们展现的《理发师》^②的作者的情况，完全出于人们的意料，它证明，此人是一个好法官，工作兢兢业业，对穷人很怜恤，对孤苦无靠者很宽容。但为什么又有人说，他在大革命以前对违禁狩猎的人又进行那么残酷的迫害呢？据外间传播的那些悲惨故事说，他抓住一个在王家狩猎场给野兽下套子或打了一只狐狸的乡下人，就吊起来用荆条抽，或者被罚去作苦工。如果说，原先曾使用过这些刑罚的话，那么，在路易十六治下，也大大地减轻了。通过1773年2月11日的那次审判便可得到证明。那天，当那位胖公爵气喘吁吁跑到孔代街来找博马舍拚命时，他正在卢浮宫开庭审判，地点就是卢浮宫的二楼，现在我们举行卡兹遗画展览的那间房子里。对这次庭审，瓦莱斯曾做过详尽的叙述。当这位主审官刚刚就座，那位气势汹汹的情敌便一阵风似地冲到庭上，并向他提出严厉的质问，同时要求他立即出去以见个高下。博马舍当时镇定自若，并提醒他冷静一些，同时还正告他，对一个正在执行公务的法官施以任何形

① 指《费加罗的婚礼》——译者

② 指《塞维尔的理发师》——译者

式的污辱，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公爵竭力控制自己，在法庭外边来回踱着大步，不时地停下来询问办事员“是否还要审很长时间”。一点不错，庭审肯定要开很长时间，因为第一，这是一次特别审讯；第二，我们这位主审官并不是傻瓜，他可根本没有任何想缩短审讯时间的打算。被告一个个地相继到庭听候裁决。让·巴伊被指控把他的羊群放到蒙巴纳斯禁区去吃草，他被宣布无罪释放；两个克拉马尔淘气的小孩，用石头打死了一只野兔，每人罚款三十个苏；贝尔纳·沃特莱非法钓鱼，缺席判决，罚款六个里弗尔。随后又裁决了一件特别案件：有人未经允许，擅自开了一个驯马场；接着又十分认真地审阅了一份烧瓦工呈递的申请书，申请使用蒙特鲁热地区的沙子和胶土，这一申请得到批准。另外还有三件类似的申请案，又费去了好多时间，最后庭审终于结束，博马舍抬起头来，用眼睛寻找他那位冤家对头，但是，此人已经踪影皆无。原来，他在这个挤满了下等人的大厅里，气愤得喘不出气，便到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去了。他站在大厅门口亨利三世的大台阶下，等待着他的仇人，现在这个地方是供前来参观的人放手杖和雨伞的地方。两人见面后，公爵十分激动，他大喊大叫，一定要见个你死我活，博马舍接受了他的挑战，但当时他腰间只佩着一把装饰用的短剑，经协商决定，一起到图尔·迪潘侯爵家里，请他做这次决斗的裁决人。于是俩人便坐上博马舍漂亮的四轮马车一同出发了。俩人正在车上争吵不休的时候，车子便到了侯爵家里，但这位爵爷适逢不在，等了一会，博马舍建议，先到孔代街他自己家里去。来到孔代街，二人还是争吵不休，就这样一直吵了四个小时。后来这位胖公爵又宣布，他不想决斗了，他认为，和一个普通人，和一个曾干过钟表匠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卡隆决斗，有失他的身份。这位平民感到很意外，他对对方这种观点报以一种十分轻蔑的嘲笑表情（他是富于表情的），这使公爵气上加气，他怒不可遏地“想把这个侮辱他的人的心挖出来吃掉”，便一下子扑到博马舍身上，二人便撕打起来。身材魁梧的胖公爵拳重脚沉，博马舍满脸是血，衣服也被撕成碎片。就在这紧要的关头，他的对手突然停下来，不打了。这是为了什么呢？原来这位胖兄肚子空虚，他饿了，要求吃点东西再打。博马舍命人临时给他安排了一顿饭，二人坐在餐桌旁边还在互相威胁着对方并且都讲着粗言秽语。当这位贵族老爷填饱肚子以后，他那双老拳便又雨点一般落在他的东道主身上。最后，警察局长闻讯赶到，把事情的原委记录在案，并拉开了这两位战士。

孔泰街上的这所房子一直还保留着。它是这幕滑稽可笑的闹剧的见证人。年代的变迁给它留下的变化不算太大。阳台的铁栏杆上仍然留着代表“皮埃尔·奥古斯坦·卡隆”的三个大字字母P·A·C。这片住宅如今已成为《法兰西信使报》的编辑部和它属下各部门的办公室。里边还可以发现原先那种老式的布局：宽大的，可以进车辆的门洞，带马厩的院子，二楼上还有大大小小的会客室。带壁厨的那个宽大的房间可能就是当年写《塞维尔的理发师》的工作间。一间有侧翼的厨房，旁边是一个有漂亮的铁扶手的暗梯。每扇门上都可以见到制做得十分精致的门锁，当初这位《费加罗》的制造者曾用手扭动过它们，或者在那架细木镶边的大镜子里曾映出过他的尊容……博马舍自1761年到1773年这一时期，曾先后和他的三位夫人和五位姐姐住在这里。因为打了那场轰动一时的官司，他便被从这座房子里撵了出来，搬到维埃耶·唐普尔大街去住，尽管当时他已破了产，但仍以一年六

千法郎的价钱租了一套本区最豪华的公寓。这套公寓就是对老巴黎很关心的人都知道的“荷兰大使旅馆”。实际上，从来也没有一位荷兰大使在那里住过，只不过那些荷兰大使们在那里请了一名神甫并开了一个新耶稣教堂，以为当时在巴黎受迫害的新教徒提供一个做礼拜的场所。

博马舍在维埃耶—唐普尔大街上的这栋房子非常漂亮，应该给它挂上一块匾，上面写着《费加罗的婚礼》曾在此写就。后来这里便成了一个商店，又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最近一位有远见的学人买下了这栋房子，他将使它恢复原来富丽堂皇的面貌。再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修葺，它就可以完全恢复十七世纪的模样。那原是建筑师科达尔为参议员阿梅洛·比索伊设计的住宅。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典雅的大院里的全部浮雕，还可以看到那些大厅的细木护板和天花板上维安·路易·布罗尼画的女神和爱情故事的群画和其它一些装饰。为迎接博马舍胜利归来，1784年4月27日晚上，那两扇庄严、富丽的雕花大门洞开，当时他沉醉在巨大的喜悦之中，那正是他的《婚礼》首次演出取得巨大成功的那天。当时居丹家族弟兄们中有一位是博马舍的秘书，当时他给讽刺歌谣的作者科雷的信中说，这栋房子有一个暗门，“我将住在维埃耶—唐普尔大街上的一个夹层楼房里，这个夹层就在大门洞的上边，在门洞底下有一个小楼梯，专通这个夹层楼，如果你想来看我，可以不必和门房打招呼。为什么要搞这个秘密地方呢？因为博马舍不但忙于查阅资料和写作，同时他还要接待各种人士……所以他就显得特别忙，这时，他的工作由我来做，我可以非常安静地在这里干这些事，其它剧本也同样如此，当闭门谢客的时间到了，我也没有事情了，我们就一起结束各自的工作。”我曾去找过这个暗门，但是

一无所得。而这个无赖，竟在信中暗示，他自己是《理发师》和《婚礼》的不具名的作者，真可称厚颜无耻并且捣鬼有术。但我仍对没能找到通往夹层的这个暗门感到遗憾。

那么梅纳尔小姐和肖尔纳公爵的这桩公案到底怎么了呢？这位大吵大闹的公爵，由于人们对他那种可笑的做法议论纷纷而十分恼火，便在贵族法庭告下了博马舍，法庭认为他做事于礼不合，是错误的，便对两人同时实行监禁。一个的罪名是大吵大闹引起公愤，另一个的罪名则是唐突了一位公爵兼贵族院议员。梅纳尔小姐被送进一个女修道院，一位勇敢的教士承担起使她回心向善的使命——这是一桩难见成效的任务，不久他便放弃了这一工作。肖尔纳公爵被关了几天便大发雷霆，表示如果放了他，他便离开法国，但有个条件，就是在他没有到达外国之前，当局不要让博马舍见到梅纳尔小姐。他于是便出走了，并且很久没有回来。他首先去埃及，后来又到了英国。博马舍在狱里监禁了两个月，似乎他对那位天真美丽的女郎的钟情，也只是短短的一瞬间而已，因为她并没有扮演《理发师》中的罗西纳。但她却在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中成了一个明星，又因她是这一纠纷中的主角，从而使她在水性杨花的女人中颇负盛名。

41. 二十一次搬迁

在凡尔赛的尚蒂埃大街十七号，在一堵高墙上开了一扇小门，门旁边刻有如下字样：“1789年制宪会议在此召

开……”^①亦即是说，由法国人民自己选出的第一个代表大会的会址，便在这堵墙的后面。

我想，如果指出上面题文的不确，绝不应该被认为对当时那个伟大的历史时代缺乏敬意。因为如果你要是只听信在那个伟大时代中的关于某些事情的谣传，从而认为这扇小门就是当时代表大会的入口，在这扇门前，那些第三等级的代表冻得哆哆嗦嗦，手擎雨伞，焦急地等待着第一和第二等级的高贵同僚贵族和僧侣们同意他们进入会场，如果你相信这就是那扇门的话，那你可就被引入歧途了。诚然，他们就是从这扇小门进去的，但为给会议大厅造一个前厅，就在这条街面上还有一座高阁，它在这扇小门的前边，而这座高阁却早已毁掉了，以致可供我们回忆的，当年曾是我们的第一个众议院的那座出名的建筑，如今已荡然无存。另有一个门出入，即如今的巴黎大道二十二号。现在那里已经成了一座兵营，但其建筑仍保留着原来的面目。我这样讲，起码到1914年是如此，因为自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看到过它。我希望凡尔赛的考古学家们，对这些破旧而神圣的古老建筑悉心保护，而不要再使其受到损坏^②。

是的，这的确是些破旧的房子，一个不怎么对称的院子，一栋只有两层的楼房，第二层又非常低矮，它坐落在院子深处的左侧，既不壮观也不精巧。但如果你在这些现在已住上士兵的各个房间里走一趟的话，你还能找到原代表大会各领导机构的办公室，僧侣代表和贵族代表的会议厅，国王专用的套房，甚至还可以找到在每次开会前，为祈求上帝对立法工作的恩典而做弥撒的大厅。院子正面建筑的后边，是

①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称国民公会。——译者

② 作者原注：本文写于1919年。

一个花园，一直延伸到尚蒂埃大街。花园的尽头，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扇小门。在这个花园的旧址上，巴黎建筑师用了六周的时间，便建起一座大型而美观的会议大厅。1789年5月5日，王国三级会议便在这里召开。

这是个徒讲表面的建筑，尽管其装璜非常之漂亮，但其质量却非常之差，很不坚固。当基座建成以后，大家都不敢把国王宝座上的漂亮华盖向天花板上装，因为这个华盖重一千五百九十七里弗尔^①。尽管如此，还是冒险装上了，但却因此使王后提心吊胆，她一坐在这顶绣有金色百合花的华丽的紫色天鹅绒大帐幕下边，便浑身发抖。人们日以继夜地赶建起来的这座木制宫殿，粉刷得鲜艳异常，以及其帷幔和窗帘彩色之绚丽，得到众人一致的赞扬。再加上当时最著名雕刻家的努力，它被装扮得更加富丽堂皇。当与会的代表们齐聚在这个皇家的高阁之下时，那景象真可称得上蔚为大观：一边是贵族代表，头上一律饰着纯白翎毛，身披金光闪闪的锦缎大氅，肩挎宽大的蓝色或红色的皱纹绶带，腰佩长剑，下穿带扣的军裤，再配以丝绸长袜，真是气派极了。另一边，是僧侣代表，一色的大红或绛紫长袍，在最后边，靠边站的，是第三等级的平民代表，清一色的黑礼服，短披风，就和喜剧中演仆人穿的那种服色差不多，头戴三角小帽，不插白翎也没有装饰。在这些人中间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的，便是这次大典的司仪德勒兹—布雷泽侯爵。一位同时代的人怀着惊讶的心情描写道：“他身材高大，衣着讲究，大衣上佩的金银宝石闪闪发光，手上戴满了钻石戒指，头上是插着各色羽毛的峨冠大帽。”很遗憾，这一礼仪很快便被废止了。毫无疑问，从这些代表的个人来说，他们什么也没

^① 一里弗尔约为五百克，大致合一市斤。——译者

有得到，既没有建立什么丰功伟绩，也没从会议的无休止的辩论中得到什么好处，但他们的这种集会，却使他们得到了一种尊严，再加上他们穿的那身非常体面而庄严的礼服，就更加使别人绝不会产生误解，以为他们是一群互相抢主顾的拍卖商人，在某一个拍卖行的大厅里为讨价还价而争得面红耳赤。

第三等级的代表是遵守时间的典范。早晨八点钟开始，他们便在尚蒂埃大街的大门口排队等着开门，在前厅里，他们一个个要象军队里的士兵一样经过点名；然后再被领到一个漂亮的大厅里，在那里，他们规规矩矩地等着，直到贵族和僧侣们俯就前来和他们见面。这个贵族和僧侣可就散漫得多了。有时他们来的人少得可怜，致使会议开起来毫无生气。很显然，他们对这些资产阶级不满，并且意在挫伤他们的热情。但这些小人物对于动不动就影响他们正常工作的做法十分不满，拒绝接受，于是他们便一起来到凡尔赛宫找工作干，他们不愿意留在议会里无所事事。而6月20日早晨，当他们来到尚蒂埃大街时，发现大门关得严严的，并且得知，因大厅要进行某些修缮而会议停开，这时他们感到十分尴尬。由于这些模范代表不愿白白浪费他们的工作时间，便决心另找一个地方，以便不受限制地讨论制定宪法事宜。因而，三级代表会议开幕以来还不到六个星期，国民代表会议便面临搬迁的局面：这是第一次。

1789年6月20日，第三等级的那些老实人跑遍了凡尔赛，以便找一个合适的地址，因为他们有六百人之多，而且又因为大多数人来自外地，对凡尔赛相当陌生。当然，属于皇家财产的那些大官邸里，有许多宽敞的大厅，他们完全可以在那里开会，但这些官邸的大门，都不是为他们而开。于

是他们便找到了老凡尔赛城靠近皇宫的雷科莱修道院。这个修道院漂亮的大门至今还在，就在圣一于连大街的对面。当议长巴伊前往交涉的时候，代表们便站在门外等候。终于有人前来接待他们，请他们进去坐坐了。但也许是修道士们怕向这些“着了魔的人”提供一个栖身之地会得罪宫廷吧，也许因为从他们交谈伊始，那些争吵之声便使修道士们难以忍受吧，总之，只过了几分钟，主人便告诉这些先生们，请他们到外边去吵。于是他们便又来到马路上。这时有人建议，到附近的网球场去，他们马上便集中在网球场上。这个网球场在老城的一个狭窄的小胡同里，只有一个大棚子，三面用铁丝网围起来，只有一面开着，可说是“网开一面”。这个网球场开张已有一个世纪了，有人说，那还是路易十四在医生建议下，在这里打网球的地方。1789年，它已属于一位名叫拉塔伊的人，他便把这个长约三十二米，宽约十二米，高十米的球场租给了这几百名“网球爱好者”。

在这里发生的事，已经是众所周知了。这些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就在这里举行了著名的宣誓仪式，确切地说，革命就在这样的场面中开始了。达维特的一幅名画^①使得当时这一场面家喻户晓。但这位伟大的画家并没有把画面的重点放在写实方面，如果他的画相当真实地把当地的背景也画下来，那么，不但当时的场面有点滑稽，就是在场的每个人物的姿态也太过滑稽了。临时会议可以想象得出，是相当混乱，并且肯定是吵吵嚷嚷的，但却称得上因陋就简。据当时的人介绍，会议不但开得特别之长，也使人感到特别之累。当然，会议是上午就开始了，但却一直持续到下午六点。此外，网球场上自然没有座位，代表们便始终在那里站着，结果，两

^① 指达维特画的《球厅宣誓》，——译者

脚便不得不一刻也不停地伸出去再缩回来以轮换休息。据说，有人给议长巴伊拿来一把靠背椅，但他却拒绝使用。他站在由两个水桶支起来的一块木板上宣读经每位代表签过字的誓词。这份宝贵的手抄件，现保存在国家档案馆的展览室里。

这份文件是那个有历史意义的一天留下来的最珍贵的文物。开会的会场，时至今日，已没有什么可以引起人们回忆的特征了。因为自1790年起，它已升格，列为国家级文物，并且外面还挂上了一块牌子。但十二年后，便没有人再理会它了。网球场也已属画家格罗所有，他在这里完成了他的两幅名画：《瘟疫》和《阿布基尔》^①。在王朝复辟时期，那块牌子就被翻过来“面壁而泣”了，会议厅也被改造成装璜商店，1830年，牌子又被“录用”。奥拉斯—凡尔纳把网球场改为自己的画室，在这里画了《斯马拉和康斯坦丁》。1848年，这里又恢复了往昔的荣誉，但为时不长。第二帝国时期，它又租给一个网球场主，这个大棚子便又恢复了它最初的功能。但当时网球运动已不时髦，前来打球的人寥寥无几。直到1889年，这个著名的场地才又改成展览馆。我们那些好心的筹备者真可以说是好事做得也太多了。当然，在展览馆里那个为使观众不致被球打着而修建的看廊依然还在，而且也已存在了很久，尽管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其余的呢？搞那么多的巨幅壁画，那么多的说明文字，那么多的半身雕像，再加上那么多的橱窗，有必要吗？不错，这是个展览馆，应该搞得和其它展览馆一样，但要想使参观者深受感染，那么，他们在这里看到的，应该是那些已没有了框子的

^① 这两幅画的全名分别是《雅法的瘟疫》和《阿布基尔的战斗》。——译者

门窗，经人踩踏过的比赛场地，和为使球员看清球路而粗糙地涂黑了的墙壁。即使那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只要地上那些碎石子，那几栋蛀迹斑斑的梁柱还在，它们也便是无声的历史见证人，足以雄辩地、令人信服地向我们陈述往昔的一切。

6月21日是星期日。第三等级的各位先生去教堂做礼拜，然后休息。但是22日清晨，忠于自己誓词的代表们还想到网球场去开会。这一次却碰了钉子，场地已经全天租出去了。他们便又遍跑全城，这次是在圣一路易教会里找到一个又低又矮的小教堂，这个小教堂至今仍保持着原样，位置在这个教会的大门左侧。当时凡尔赛人把这个小教堂叫“停尸房”。因为凡是王宫里死的人，尸体都停放在这里。当时王室规矩，尸体是不准放在皇宫内院的，哪怕是一小时也不行。“停尸房”并没有另行布置，而且地方也非常之窄。使人惊奇的是，这些各地来的六百名代表，居然竟能全部挤在里边。幸而在开会这天，来了一大批僧侣阶级的代表参加他们的会议，实在挤不下了，国民代表大会便改在教会大厅里举行，至此，会议的会址才找到了一个宽敞的所在。第二天，6月23日，大会终于胜利地返回国王游乐宫的漂亮大厅里，代表们现在才总算放下心来，打算专心致志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了。

三个半月以后，又不得不离开这座漂亮的会议大厅而迁往巴黎。这一次搬迁可以说是绝了后路。因为十月骚乱把国王逼出凡尔赛宫，被群众押往巴黎，他们是随国王搬迁的。在首都到哪里去寻找一个足以容纳一千一百名代表的会议地点呢？更何况，还要有为全体人员一起做弥撒的地方，再加上秘书、抄写员和工杂人员，这些人对会议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便临时找地方，跑卢浮宫，跑《圣母升天》教

堂，跑卢森堡宫……但这些地方也已人满为患。看来必须把工作人员安置在骑术大厅了。这个骑术大厅位于杜伊勒丽宫花园边上与弗扬修道院和卡普辛修道院毗邻。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些真心实意想干一番事业的代表们，又不甘于白白地等待着，于是他们便利用上巴黎圣母院。大主教允许他们在圣公教官的一个大厅里开会。他们在这里工作了十九天。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对此也是十分注目的)，在这样一个短时间内，大会议决取消了神职人员的财产。还必须指出，这位大主教为会议准备的大厅，当时布置得相当匆忙，以致在10月26日，旁听席上有一大排座位竟然倒了，木架、砖瓦和旁听的群众一起都落在代表们身上。其中有一位名叫维阿尔的，被扶起来时，伤势已经十分严重。11月9日，大家毫不惋惜地离开了这个使人担心的地方，正式搬进杜伊勒丽宫的骑术大厅：代表大会诞生了刚刚七个月，便恰好搬了七次家。

现在骑术大厅已经看不出什么往昔的痕迹了。只在里维利街杜伊勒丽宫花园的门柱上还有一块牌子可以提醒人们，国民公会、制宪会议和立法会议曾在这里召开过大会。路易十六便是在这个大厅里被宣判死刑的。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幅画准确地把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大厅的全貌如实地画下来。描写它的文字倒是有这样几句，那就请大家据此想象一下吧：这个大厅异常低矮但又出奇的长，有两列六排座的靠背软椅，外面罩以绿套，四周便是阶梯形的排座，在往纵深走向的中间部分，一边是围着栏杆的演讲台，对面是主席的桌子和大靠背椅。一个宽大的独脚圆桌，占据着中间的主要地位，会议的秘书们便围桌而坐，形成个半圆形，是为会议做记录。再往上，更高一层，有一个很窄的廊道，廊道上的

楼厅都挂着绿色幔布，这些楼厅是保留席位。在廊道的两头，每排梯形排座的后面和另外两边对称的，便是旁听席，环形的阶梯一直通到最上面和最后面。大厅的中央有一条狭窄的“小道”向外伸出，中间被两个笨重的大瓷器给挡住去路，这两件东西冬天当火炉，夏天便是通风设备。

在这个巨型大厅里，从这一头向那一头看，几乎看不清人的面孔，说话也几乎听不见。在这里开会，冬天如进冰窖，夏天如入火炉，而且空气的气味也十分难闻。如果赶上夜间开会，便几乎能达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整个大厅中有四个吊灯，上面插着类似举行宗教仪式时用的大蜡烛。出于卫生考虑，庶务人员不时地走来走去在通道的地板上洒些香醋。自从把骑术大厅变成大会的会址以后，人们曾几次对这个不理想的大厅进行了改造。其中有一次，结果非常有意思。按原来开会的习惯，是代表们根据自己的意思挑选座位，或在主席台的左边，或者在右边。1792年初，为了改善大厅的音质条件，便把主席台的讲坛移到演讲台的位置，演讲台则调到主席台的位置。这么一来，整个左、右便颠倒了。这一变动，对代表们的讨论和报告产生了十分混乱的影响，竟使他们左右不分了。于是渐渐地，“左”、“右”这些词，便由更加生动别致的“山岳”、“平原”、“沼泽”来代替了①。

为了不使尊敬的代表在“骑术大厅”这样差的条件下开会，1793年5月9日，国民公会便搬到新建的一座豪华建筑物里。这里的一切都宽大而舒适。有宽大的衣帽间，漂亮的长廊，通风良好的前厅，会议大厅的布局 and 装璜超过以前任何一个会议厅。主席台用贵重的木材做成，上方还布置了许多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战旗。大会主席的巨型靠背椅是罗马式

① 后来便形成了“山岳派”、“平原派”和“沼泽派”的区别。——译者

的，罩以名贵的丝绸椅套。四面墙壁的裙基，一律是彩色斑驳的岩石的色调，墙上雕着古代名人像。绿色的巨幅帷幔镶着红边，绣着花环，用带着粗大流苏的丝绳向两边挂起来……这个富丽堂皇的大厅，在恐怖时期^①经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壮烈场面，它经历过热月的政变，牧月的起义，葡月的炮火……在这里，丹东曾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在这里，“理性女神”曾受到全民代表的热烈欢呼^②；在这里，罗伯斯庇尔被赶下主席台；也是在这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名叫波拿巴的人第一次在主席台上被宣布为“官方教练员”并由速记员们记录在案……

大家都知道，国民公会后来被元老院和五百人院所代替。五百人院后又搬到协和广场大桥对面的原孔代的官邸。这幢房子当时已被公共工程部的中央学校所占据。五百人院只能暂时备用，等待会议大厅建成以后才能再次搬迁。由于当时法国财政拮据，五百人院不得不等待到两年以后再搬，在这段时间里，从果月18日起，不得不在奥德翁剧院里开了几次会，直到1798年1月21日才搬进新建的大厅。那一天，在新建筑物周围装饰上各种花环，开会时并鸣放了礼炮。代表们第一件事，便是在院子里庄严地栽上了一棵象征自由的小橡树。完成了这一重要工作后，他们才进入会议大厅。旁听席上是军乐队，他们演奏的是《暴政消亡》——我猜想可能是《马赛曲》。会议厅的布置真可使人叹为观止。一位同时代

①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从1793年5月到1794年7月这一段时期。——译者

② 当时有一种所谓“离弃基督教运动”，一种特殊的“理性教”开始传播。1793年11月16日晚，群众把由一位女演员扮演的“理性女神”抬到国民公会，她受到代表们热烈的欢呼。——译者

的人描写说：“装饰这个立法圣地的各种艺术品，象征自由的小天使，全部是用埃及和希腊最漂亮的大理石雕塑而成。”但到了第二年，这个“立法圣地”竟空无一人了！五百人院被邀请在圣一克鲁宫的柑橘园开会，他们从大门里进去，却从通道的窗户里爬了出来离开会场。这一次仓促的搬迁（那一天正是雾月18日）是国民代表大会的第十一次搬迁。它随着第一帝国的出现，这个大会也在波旁宫复活了。因为在十八世纪，巴黎人都把孔代官邸称做波旁宫。奇怪得很，这个古老的名字，经受了历代革命的冲击，竟未受任何影响，这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现象。1805年，在其前边又修建了一座华丽的圆柱大厅，并砌上了大台阶，这就使得协和广场大桥的景色更加壮观。雄据在正面顶墙上的三角楣，一开始是雕刻的“皇帝①向立法院献奥斯特尔利茨大会战②中缴获的战旗”。但在1816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必须改变这些浮雕的内容，它于是便被“宪法和正义保护着科学、艺术和工业”的大型浮雕所代替，随后它又被“法兰西号召大会努力完成立法工作以为国争光”的浮雕取而代之。这一歌功颂德的图案，目的是在人民的思想上为他们的代表树立起一个高大的形象。不幸的是，对这个高高在上的浮雕，从来没见过有一个过路者抬起头来看上它一眼。

廊柱工程质量是第一流的。至今仍然很牢固，但五百人院的会议大厅，经过二十几年的使用，已经岌岌可危了。为使代表们尊贵的脑袋免遭横祸，重新修建是十分必要的。修

① 指拿破仑。——译者

② 奥斯特尔利茨，即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拉夫科夫城。奥斯特尔利茨大会战是一场大血战。七万俄军损失了两万一千人，一万五千奥军，损失了六千人，七万三千法军，损失了九千人。最后以法军的胜利告终。这是拿破仑戎马生涯中一次最辉煌的胜利。——译者

建工程1828年开始，1832年完工。在等待完工的时间里，临时在议长的花园里用木板搭了一个简易会议厅，在这五年当中，议会便在这里办公。就在这个木板大厅里，路易-菲力普宣誓登基。1832年，国民代表们便又回到加固了的波旁宫。1848年又搞了一次搬迁，在波旁宫的院子里另建一座更为宽大的会议大厅，它被乔治·桑称为“糊墙纸大厅”，此事见于正史。这个大木棚子是代表们争吵起哄之地，也是几次著名的会议召开之所。例如，5月15日选举第一任议长和随后的政变……不久又发生了一次既出于代表们的意料又不甘心情愿的搬迁。大家都知道，大多数的国民代表，其中也有些共和党和保皇党人，于1851年12月2日住进……住进了马札斯监狱。立法会议的代表们随着第二帝国的成立，又回到了金碧辉煌的大理石大厅。这一次应该是最最后一次搬迁了吧？事实并非如此，1871年它又迁往波尔多，会址便设在波尔多的“大戏院”。随后，又回到它诞生时的摇篮——凡尔赛。会址设在一百年前玛丽·安托瓦内特^①结婚时盖的一座剧院里，地点就在王宫内。不久，它便把这个地址让给元老院，自己则搬到王宫的另一处地方，等待另一所豪华的大厅的建成……但建成后，它只用了两年，于1878年又回到波旁宫，又回到查理十世的建筑家们为它建造的大厅里。

计算是准确的，整整搬了二十一次。在一百三十年中，平均每六年便搬迁一次。

这个波旁宫，有着如此丰富而纷繁的历史。当我们走进时，第一眼就能看见1805年就立起来的两座雕像，它们座落在大台阶的最上头。这两座雕像便是密涅瓦和忒弥斯，她

^①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奥地利公主，法国王后。——译者

们分别是智慧和正义的化身。进入大厅后，首先进入眼帘的便是主席台。这个主席台是五百人院时的旧物，它从1798年以来便听到多少个慷慨激昂的演说，又看到过多少个挥舞着老拳打斗的场面。这个令人望而起敬的台子，上面刻有浮雕，含义是“掌管历史的缪司女神，用她的刻刀，在神灵的面前正在雕刻着信息女神准备好向公众发布的信息。这就向人民的代言人发出了警告，即他们的工作，必将会受到子孙后代的检验和评判……”。

一位督政府时期的作家，就是用上面这种含蓄的措词对这个雕刻的寓意做了说明。我们的代表们是否经常地认真思考过这一有象征意义的忠告？并且是否认真地想过，怎样才能不辜负这位不具名的艺术家——这个公式化的象征图案的作者的良好愿望呢？

42. 在丹东家里

巴黎老城留下来的建筑中，有一个叫罗昂的大院。和这个大院相通的有一个胡同叫科麦斯。这两个地方，喜欢研究历史的人是很熟悉的，但这种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是不会把类似这些路面破损、高低不平的阴暗小胡同当成巴黎市的斑点来看的。这些小胡同分散穿插在破旧的、修了又修的那些老房子中间。这些老房子至今仍然留在那儿似乎专门是为了向那些矗立在它们周围的漂亮的、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建筑物提抗议似

的。我也非常理解，今天的青年一代对这些大部分没有什么建筑特色的老房子不会怀有一丝的好感。这些老古董的价值，其一，在于其破旧，其二，便是它们有各种有趣的“身世”。然而，当你对往昔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失去兴趣时，尽管这些往事是那么生动，你也会很快便感到厌倦。今天，还有谁愿意利用工余饭后的时间，跑到这些老而且窄的街道上来缅怀往事，又有谁还想到这里来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古人发泄一番思古之幽情呢？只有科麦斯胡同里的这个大院，只有这块“绿洲”倒还有比较丰富的“果实”足资我们“采摘”和回忆。首先是普罗科普咖啡馆，它还完好无缺，并且不久前还颇负盛名，它堪称巴黎咖啡馆的鼻祖。它对面的一座大门楼，就是法兰西喜剧院的旧址，如今这条街仍然以此命名。这个老法兰西喜剧院也曾有过它光荣的历史和繁华的过去。但自那时以后，几经变迁，从它的某些格局看，仍然可以看出一点点往昔的模样。这个地方，格罗子爵和奥拉斯一凡尔纳曾用以做他们的画室。中间有一栋前面有弗特里埃的画的房子，曾经是马拉的公寓。在大革命以前，这里还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时，法布尔·艾格朗丁就住在它的隔壁。还有一个漂亮而性格开朗的人也在这儿住过，此人叫布律纳，曾当过几天印刷厂厂主，他便是后来的法兰西元帅。再弯过圣一日尔曼大道的拐角，在肉店大街上，还有几幢老房子，便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公会议员勒让德尔开的肉店。就在科麦斯大院的那个狭窄的小巷子里，那些店铺虽然是在路易十六时才开设的，但对那些喜欢怀古的人们来说，只要在我们的奥斯曼大道或者是法耶特大街上走一趟，便足以引起他们的万千遐想：现在被一个锁匠住着的原来的老店铺，还留有一个奥古斯特时代的尖塔，由于被周围炉灶冒出

的烟薰得已经漆黑了。另一个店铺在大革命时期是地下印刷厂，在这里印了第一批革命小册子。还有一个店铺原是一个阅览室，在大革命以后，吉隆丹·布里索^①的遗孀在这里把她亡夫的藏书以两个苏的价格向外出租。在所有的亡灵中，其佼佼者应首推丹东。他自从和咖啡店老板夏庞蒂埃的女儿，他所钟爱的布里埃尔结婚以后，便一直住在这里。

丹东的住宅如今已不在了。五十多年前，圣一日尔曼大道的修建便把科麦斯大院给占了四分之一。这个大院向前延伸，到尽头再向右拐，一直到一块空地上。这里现在还有两座雕像，一座是丹东的，另一座是布罗卡的。丹东的房子原先就在这块空地上，外墙一边朝着大院一边朝着医护学校大街，它和一幢至今仍在的老房子正好面对面。这幢老房子大约也将被判处死刑。

1792年8月9日，住在法兰西大剧院广场（如今的奥德翁广场）附近的卡米耶和吕西尔夫妇吃过晚饭，便来到他们的朋友丹东家里来拜访。当时丹东太太心情十分不好，怀里抱着他们的老大安托万，当时才两岁；他们还有个老二，名叫乔治，放在伊斯尔—亚当抚养。卡米耶和丹东谈论着国家大事，丹东早就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十分急迫，他说：“你感到这种山雨欲来的形势了吗？”就在那天晚上，山雨便来到了，并且其势汹汹。它把什么冲垮了呢？是革命还是国王的宝座？丹东太太哭了，她怀里的孩子对此毫不理解。吕西尔·德穆兰象疯了一样，纵声狂笑，女主人责备她说：“一个女人，这样笑合适吗？”吕西尔回答说：“这说明我可能马

^① 他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右派领袖。这一派反对处死路易十六，主张审判马拉。其中的大部分人，包括布里索本人，在1793年10月31日被杀头。
——译者

上就要大哭！”在落日余辉里，丹东太太和吕西尔把夏庞蒂埃老太太送回家去，今天她在女婿这儿吃的晚饭。天气十分晴和，走过了几座教堂，她们来到法兰西大剧院（今天的奥德翁剧院）的尖塔边，便坐在紧靠咖啡馆（即伏尔泰咖啡馆）旁边的剧院广场上，这个地方人特别之多，一群群的“长裤汉”^①一边走一边高喊着“民族万岁”的口号。随后便是骑兵，接着便是一大群人走了过来。吕西尔有点害怕，便说：“咱们快走吧！”夏庞蒂埃太太便和她们分了手，吕西尔和卡布里埃尔又回到科麦斯大院。这时，丹东家里已经来了许多人，丹东在他的寝室里很随便地接待他们，大家进进出出，有来的，也有走的。卡米耶身上背着枪，吕西尔这时便哭了起来，他安慰并鼓励她，同时向她保证，不离开丹东的家。但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忙着准备战斗。惊慌失措的吕西尔，可怜巴巴地一个人躲在朝街的那间黑屋子里，街道上静悄悄的。她因紧张、害怕，显得疲惫不堪，便在一张床旁边坐下来，有时候似乎进入半睡眠状态，但是时间对她来说，过得真是太慢了！她觉得已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其实才半夜。丹东睡觉去了，但仍然有人来找过他好几次，看他的表情，一点也显不出“急迫万分”的样子。过了不多一会，他决定也去市政厅。

附近的科尔德里埃修道院的钟声突然响起来了，吕西尔一个人泪人般地跪伏在窗台下，听着这催人赴难的钟声。丹东回来了，当时忙于指挥战斗，根本无暇它顾。经常有人来向他报告情况，一会儿，他又出去了。好象市民们正在向杜伊勒丽宫冲击，听到这些，吕西尔差不多要昏厥过去，这时

^① 又叫“无套裤汉”，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对广大革命群众流行的称呼。——译者

卡米耶也回来了，他躺在自己太太的肩上便进入梦乡。天大亮了，这时，四面八方钟声大震。丹东太太吓呆了，她总觉得马上就会有人来向她报告她丈夫死去的消息，她说：“不行，我不能再呆在这儿了！”吕西尔答应和她一起到自己的家里去，于是两位太太和卡米耶便又来到法兰西剧院大街。德穆兰家就住在大剧院左边最后一栋房子里（即如今的奥德翁大街二十二号）的中二楼上边的那一层，窗户朝着克雷比荣大街和孔代大街。吕西尔在她的客厅里架起一张帆布床，让丹东太太躺在上面。卡米耶睡了大约有一到两个小时便起来了，并向他的太太发誓，绝不轻易冒险，说完便走了。外边的钟声一直在响着！……将近上午十一点，两位女友在自己家里“准备午饭”，突然响起了炮声。丹东太太马上便昏过去了，而且浑身直打哆嗦。吕西尔忙着救护她，她的女仆雅奈特一点也帮不上忙。丹东太太“象一头软弱的羔羊一样”呻吟着。大街上喊声，哭声，乱成一片，人们一边跑一边喊：“拿起武器来呀！”丹东太太终于恢复了知觉，她又要回自己家里去，吕西尔太太便陪她一起回去。当来到科麦斯大院时，她们发现所有的门窗都关上了。她们一边敲门一边喊，以便让邻人能听出是她们的声音，但没有一个人来开门。她们想走隔壁的那家面包店，也吃了闭门羹。最后，好不容易总算进来了，已经到了下午一点钟。卡米耶也回来了，他说，人民已经大获全胜！但是，这能保险吗？

以后的两天，人们是在怀疑和担惊受怕中度过的。怎么能够设想，一个曾有一千年历史的最强大的专制政权，只经过一次冲击便可以使它垮掉呢？这个政权已处于恐惧之中，但它却没有真正地死去。卡米耶和吕西尔不敢再住在法兰西剧院大街，他们在朋友家里暂时躲一躲。终于在12日

传来了消息：丹东就任司法部长，他便和夫人一起搬进了旺多姆广场上的司法部大楼，同时把法布尔·艾格朗丁和卡米耶·德穆兰一起带去。吕西尔因此便住进了曾经属于莫普家族和拉穆瓦尼翁家族的豪华府第。现在是她在这里接待友人，宴请宾客了。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变化又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但这种生活可惜是太短暂了。这些情切切意绵绵的年轻人是如此热爱生活，当你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时，你又会发现他们是那么坦率，真挚，极富同情心，然而，当你看到他们在政治舞台上表现得毫不妥协，态度生硬，报复心强，酷嗜政权，并且看到他们为和对手决斗竟把法兰西的命运当成赌注来干时，又使你感到害怕，从而要对这些人做出一个公允的评价又该是多么困难！

还是回到我们这部“野史”所涉及的微不足道的人物居住考这个题目上来吧。应该承认，我从未到奥德翁大街通往布西街的十字路口那一带去走过，因而对成为我国编年史上金字招牌的这些可怜的逝者们楚楚动人的面孔也谈不上什么回忆可言。在吕西尔的故事中，被推上舞台的四个主要人物，两年以后无一幸存者。第一个逝去的，便是丹东太太，她因情绪过于激动，总被可怕的幻觉所折磨，又由于对这种斗争生涯的厌倦，当然也由于整天生活在动荡、恐惧之中，她便首先谢绝人世。不久便是丹东和卡米耶·德穆兰，随之又轮到吕西尔，他们相继走上断头台。这些人先是被监禁在卢森堡宫，后由法庭的马车把他们拉到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马车经由孔代大街、旧喜剧大街和王太子大街前往附属监狱。在这条路线上，有一幢楼房，该楼的四层上，有那么几扇窗户，当他们一见到这几扇窗户时，卡米耶眼里便充满泪水，而吕西尔那双哭得红红的双眼则久久地盯住它们，默

默地告别他们夫妻曾在那里朝夕相处并且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的那个安乐窝。再往前不远，在旧喜剧大街的对面，在一个门廊上可以看见几个斑驳破旧的金色大字：科麦斯大院。这几个字是原来就有的吗？可能是的，那么就可以肯定这个门廊和附近的那个长长的阳台是当时已被抓获并被送往死亡之路的丹东的目光所属。其时他正在当街被押送着愤然长啸，当他看到这一标志着他往昔幸福的几个大字时，也许会肝胆俱裂吧。

43. 在杜伊勒丽宫漫步

这是有文化的知识者在夏天进行的一种消暑游戏。其办法是，先在头脑里选择巴黎的某一个地方为目标，然后一边在那里散步一边想象着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当然这些事件要经过合适选择。这样，便是最熟悉的地方，也会发现有引人入胜的新意在内。这一尝试的地点便选在杜伊勒丽宫，回忆的事件发生的时间是1794年6月10日，或者用革命语言说，是共和历二年牧月20日。众所周知，那一天有许多人在宫内集合起来准备庆祝圣体瞻礼节。

在大革命时期，宫中花园里的树木可没有如今那么婀娜多姿。如果你看过德比古的画以及科尚的某些画幅的话，就会知道，在他们笔下，这里全是葱葱郁郁的参天大树，简直连日光都透不进去。事实也似乎正是如此。因为据公安委员会在花月25日提出的园林美化规划中称，“为使园林空气流

通，将在树林浓密处开辟几条通道”云云。如今却可以说是阳光透疏枝，清气宜人。据见过当时情况的人说，现在除了在林荫大路两头有很少的几棵栗树是当时留下的以外，已经一无所有。

还是回到牧月20日来。自早晨八点钟开始，巴黎各界派出的代表团便浩浩荡荡地直奔“国家花园”（这是当时给杜伊勒丽宫起的新名）而来。沿路经过的大街都用树枝装饰起来，这和从前过圣体瞻礼节时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路上设了许多标竿，每个标竿上写着一个字母，按着这些标竿的指示，代表团便可进入花园。女士们经建议，一律身穿白色的长裙，扎着三色腰带，这时已经三五成群地围聚在池塘旁边大树下面的平台上，男人们尽量穿上黑色大礼服，占据了平台的另一边。在庭园的主林荫大道的两旁有四十八个排的士兵在那里列队，这些年轻的士兵列成一个个的方队，方队每边由十二个人组成，方队中间是军旗或国旗。林荫大道的中间是用牛拉的“自由女神之车”，这辆车一个月以前便停在那儿了，上面蒙着一块油漆防雨布。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辆，那是给盲人准备的。

如今，在小树林里还能见到有两小块平行的长形草坪，每个草坪的南部有三尊雕像和一个白色大理石的环形大长凳。这些环形大长凳是牧月20日为美化环境刚刚设置的，还是相当新奇的玩艺儿，曾被达维特收进他的画面。这些大理石长凳设在那里显得有点古色古香，大家把这种座位称作“六角坛”，并且说它们很象“古希腊哲学家经常喜欢坐在上面高谈阔论的那种座位”。林荫路下紧靠着王宫的池塘边上，立起了一个象征性的装璜，是临时扎成的群像：“面目狰狞的‘无神论’这个恶魔”，正被“野心”，“自私”和

“不和”三个女神所包围。正面的题词是：“此乃外国的唯一希望。”池塘的后面，便是杜伊勒丽宫长长的灰色宫墙，上面装饰着鲜花和悬挂着彩旗。和它相联的是一座巨大的木制彩台，足有一层楼那么高，两边搭有带栏杆的台阶，上面是乐队和身穿白色长裙、头戴玫瑰花环的女歌剧清唱演员。再远的地方，向杜伊勒丽宫的宫顶上看，有一个十分古怪的东西，高高地架在古老的卢浮宫的屋顶上，使人猜不出是什么玩艺儿。那是一个类似十字架的东西，十字架的两臂上又有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向外伸着。在当时的巴黎，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名堂，而这件东西名字也非常古怪，叫“发报机”。有人说，不久以后，将用这件东西向部队发出信号，这就引起了一些聪明人的挤眉弄眼，暗中嘲笑：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当时天气较热，而又不得不在这里，因为庆祝会要到中午才能开始。男人们尚可打熬得住，可那些太太小姐们就颇吃了点苦头。在《布让骑士回忆录》中，有一段不太为人注意的记载，是一位太太的叙述，那一天刚好她是这里的“值班”，她和她的女伴们在一位军官的带领下排练仪式。这位军官手握寒光闪闪的利剑，配着军鼓的节奏，昂首阔步地走在前边，她们跟在后边，不断地按照节奏调整自己的步子。她们在树下经过一小时的操练，笔直地站着，便有点受不了，许多人都坐在地上。但那位军官跑了过来，并命令她们都站起来，其中一位太太说：“公民，请允许我们到那边的长凳上去休息一会儿吧；我们向您保证，在仪式开始之前一定回来。”军官回答说：“女公民，这办不到，你们不能擅离自己的岗位。”说完便粗暴地走开了。故事接着说：“我们努力坚持着，但我害怕地想，在这火一般的太阳底下，

我们要伴着战鼓一直走到“战神广场”，可我可怜的母亲，看她目前这种疲劳程度，已不能再走这么长的路程了，我一边叹气一边想：‘不行，我永远也不可能走到那里去了，’我非常担心，看到母亲的脸色已变得苍白了，我便小声对她说：‘咱们逃走吧，你看，马上就要轮换指挥官了，咱们应该赶在新指挥官来检查之前跑出去。’于是我们便决定逃跑，我们小心翼翼地站在女伴们队伍的边上向外溜。当时我们建议蒂埃丽母女也照我们的办法干，她们拒绝了。只要我们这个和陆相处的团体不是所有的人都跑光，她们母女就要和留下的人共存亡，她们就有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书中对这次盛会有大量的描述，但对这个花园却所谈甚少。罗伯斯庇尔在木头搭的高台上演说，声音小到前排观众几乎都听不见。那个“无神论的恶魔”群像被点燃了，在它行将倒塌时，还要在灰烬中立起一座“智慧女神”的雕像。但它们却燃烧得不旺，那些涂着油彩的牛大肠制成的薄膜冒着一股股难闻的黑烟。这时成千上万条喉咙便唱起卡泰尔作的漂亮的颂歌来：“真理的源泉……。”尽管在开会前夕，所有音乐学院的教师，一些作曲家，如贝尔东、德佐基埃、克鲁采等，以及所有的音乐教员，都被动员到巴黎街头，站在凳子上对群众反复教唱这首歌，但现在仍然唱得结结巴巴，很不熟练。最后，“自由女神之车”出发了，于是广大的人群也开始向“革命广场”开进。

“国家花园”的这一部分改变很小，你只要围着那大池塘走一圈就会发现，当时的布局几乎和现在完全一样。那些仿古的雕花依然存在，平台上的飞马照旧雄踞在上，它们都目睹了曾在他们前面通过的那驾老牛拉的“自由女神之车”，目睹了态度生硬，举止拘谨，手持麦穗和玫瑰花的罗伯斯庇

尔，目睹了尾随在主席后面的那些衣冠楚楚，性格倔强的国民公会全体议员，还有普通平民，还有军队，还有怀抱婴儿的母亲，还有年迈苍苍的老者，还有——特别是还有达维特，他是大会的组织者，正忙得不可开交，跑前跑后，忙左忙右，全身大汗，满脸通红，他歪着嘴，飞快地向前走着，后面跟着的，是他的几个年轻的儿子。他一边分开人群，一边高声喊着：“给国民公会的委员们让开些路！”好奇的人群便让出一条路。这位艺术家忙得团团转，从这一个团体跑到另一个组织，往来照料，一边用手挥舞着他那顶插着三色大翎毛的帽子，一边催促这一队快点，又招呼那一队慢点以保持队伍之间的距离。……

平台上站满了好奇的人和不愿随队伍到“战神广场”去的人。这些平台今天看来依然如故，那时候“柑桔园”和网球场还没有修建，那片地段当时栽着小树，有几个地方至今仍保持着原貌。为庆祝圣体瞻礼节，把花园入口加宽了，“一直扩展到信息女神雕像的柱座下边”。根据原来的设计方案，要把那个大池塘改建成一个游泳池以供人们洗冷水浴，位置就在水池边上的那个大平台下边，但这一方案没能实现。毫无疑问这是圣一朱斯特^①的主意，他在国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由公安委员会制定的美化园林方案，规模宏大，它包括现在已经有的两个喷水池，此外还要建两个画廊，一个建在香榭丽舍宫的大门口，另一个建在桥头。此外，还要建一个凯旋门以把两个加布里埃尔高阁联接起来。

至此，我们可就不知不觉地走出了这个花园，而我们这一追忆往昔的漫步也便就此停住。

^① 圣一朱斯特（1767—1794），是当时公安委员会委员，罗伯斯庇尔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之一，于1794年和罗伯斯庇尔一起被处死。——译者

44. 云雀园的英国修女

(圣一马赛尔郊区记事)

一个宗教团体，竟能在大恐怖时期保存下来而未能烟消火灭，这种现象即使不是唯一的话，也应该是个例外，至少，这事发生在巴黎就更加显得特别了。这个宗教团体就在巴黎的圣一马赛尔郊区，这里是个动荡不安，经常闹事的地段，又是狂热的“无套裤汉”聚居之所。

在这里有一个英国本笃会修女院，建于1664年。当时从康布雷来了两位虔诚的英国修女，身边只带了一个杂使修女，三个人便定居在比埃弗尔河和戈贝兰地毯厂附近的云雀园。从此，这里教徒的数量便多起来了。她们主要目的便是坚持皈依英国新教而祈祷。其经济来源大部分靠施主的布施，但数目很少，因为该修女院地处郊区，几乎与世隔绝，因而乐善好施之士多有不知道有这么个修女院的。但她们经过一百年的节衣缩食，克勤克俭，竟修起了一片相当可观的建筑：一座禅院，一个诊所和一个小教堂。这一工程所付开支相当之大，以致使得这个宗教团体从此便大伤元气，有时不得不在主日讲道时，向本教区的教会请求资助。到1774年左右，她们几乎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这些英国修女们便自谋生路，生产一种薄荷糖和薄荷酒出卖。产品很快便得到好评，但其结果仍然不怎么理想，甚至到了大革命前夕，她们修道院的境况竟成了全巴黎市最惨的一个。

1789年7月14日，圣一马赛尔郊区骚乱迭起，久已卧病在床，并且身体极度虚弱的修道院院长克莱尔·邦夫人，从她卧室的窗户望出去，仅在她修道院周围，就有七处大火。邻居们警告她说，闹事的暴徒们已经决定把这个地方造成一片火海，因此请她还是关紧大门，小心谨慎为好。果然，第二天便有一群面目凶恶的汉子，来到修道院门口要求进入。她们只好顺从地打开大门。这是一伙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但可以肯定并非正规人员。由于前天晚上的胜利而得意忘形，高声喊着要把所有的人都杀掉，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喊着要酒，要面包。待这帮人酒足饭饱之后，竟若无其事、心平气和地走了。

这个英国教团当时有十六名正式修女，六名杂使修女。在以后的两年当中，还比较平静，没发生什么大事。克莱尔·邦夫人归天以后，接替院长职务的，是泰雷兹—约瑟夫·约翰逊。这位夫人严守教规，精力充沛并且性格倔强。在巴黎拥护《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主教任职那天，她被告知，其修道院要敲钟，尽管面对威胁，她仍然拒绝执行。不久，有人企图劝诱她只接受由新上任的那位主教批准的神甫在她的小教堂里做弥撒。她坚决地宣称，她只承认大主教朱涅是她的上司，此外她谁也不知道，而大主教朱涅当时已被废黜并被流放了。又过了不久，曾宣誓遵守《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圣一马赛尔教堂的神甫雅克，仍然前来向她提出要求，即接受本堂区的宗教仪式在她的修道院举行，约翰逊夫人断然拒绝了。但鉴于那一天是圣体瞻礼节，她只同意在她修道院外边的墙上装饰一些树枝，除此以外，她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让步，而对这个修道院的强制要求，也便这样不了了之。这位倔强的修道院长便乘此机会，重新把修道院的小教堂对外开

放，这又引起了天主教徒们成群结队地前来抗议。

但接着，不幸的日子又到了。这些英国妇女断了经济来源，可以想象得出，她们自制的薄荷片和薄荷酒已经大大地不吃香了。修女们便起意解散这个团体，各奔东西、自找出路，因为当时许许多多的修道院都是走的这条道路。当时有一个伊普莱斯修道院愿意接纳她们。但完全可以不必如此，为什么这么早就沉不住气了呢？1792年9月，勇敢的弗雷斯奈修道院院长，不顾重蹈戈贝兰地毯厂的布道牧师覆辙。他刚刚在阿贝依被杀死，罪名是他的女佣人揭发他把修道院的银器藏在比埃尔河底下。这对约翰逊院长是一个警告。为避免出现这种麻烦事，她请来一位珠宝商，除圣餐杯、圣体盒、圣体供台和一些祭祀时必不可少的祭器外，把修道院所有的银器统统卖给这位商人。在几个月的期间内，这些修女便靠这点收入过活。日子过得相当艰苦，因为她们一个苏一个苏积累起来的资本已全部被没收。原先她们把这笔钱存放在“城里”，每年可获利七千八百九十五个里弗尔。尽管这样，她们并没有打算缩减对外施舍的开支，许多食不果腹的人，经常跑到窗户下边来喊：“把她们吊在路灯竿上！”^①对这些人，她们便偷偷地供给他们每天的饭食。

为了糊口，每个修女都参加了劳动。但却从没有人对外边前来讨布施的人不闻不问。世界就在她们这所安静的房子周围塌陷了。这些虔诚的修女们连眼皮也不抬一下，继续做她们的针黹，并且每天都按自己的教规做功，恳求上帝保佑其皈依英国新教。这些品质，无论从基督教的温顺观点看，

^① 这是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群众要求把贵族吊在路灯竿上处死的口头语，当时非常时髦。但在这里，则暗示出是一些人带有威胁味道的乞求。——译者

还是从英国人的沉着忍耐方面看，都称得上模范。

1793年10月9日，扣留所有在法的英国人和临时查封其财产的规定，期限已满。解除令公布了，但约翰逊院长仍然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如果说她内心里是感到忐忑不安的话，那她也是丝毫不形于色。对修道院的检查不断发生，她听之任之，也不提什么抗议。有一次，检查人员在她这里拿走了所有的文字资料——一小捆药典药方和一些用英文写的祈祷词。另一次，三百人闯进她的修道院，从地下室搜查到顶楼，检查她是否给拒不参加宣誓的教士^①提供了庇护所。第三次搜查是在夜里两点钟，把所有的东西一律查封，并检查了修女们的住室，搜查直到清晨五点才结束。这一天女修士们照常诵晨经，就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此后又进行了一次搜查，接着她们便接到起诉通知，随后便被监禁起来……。只不过监狱就是她们自己的修道院，不同的是这样可以以在押人员的身份，每月能享受到十八个里弗尔的个人生活费用。这一条件是优越的，它大大改善了从前的那种清贫生活。此外，丝毫没有改变她们日常的经院生活的秩序。此外还派了一个老头做她们的看守。这个老头很有礼貌并乐于助人。他住在接待室里。不久，每天给他三个里弗尔的用度，他便由一个看守实际上变成了她们最有用、最勤快的看门人了。

但也有令人焦虑不安的时候。1793年11月，一群“无套裤汉”又闯了进来，把全部祭祀品，珍贵的圣物，十字架，各种图像，各种装饰品，一古脑地都给没收了去。甚至有一个轻薄家伙竟穿上女院长的衣服，手里拿着院长的权杖，在

^① 当时所有的教士都要被迫参加宣誓忠于《教士的公民组织法》。——译者

教务会议厅上模仿着唱赞美圣母维尼的歌。这些委员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只发现了一个小教堂里制做的一些纸花，他们说：“国家什么都要。”便拿走了。这些修女们的衣袋里已经囊空如洗，就是诊疗所的衣柜里有几件衬衣，也都贴上了国家封条。第十次搜查时，连缝衣时插针用的线团也给撕开，看看里边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把茶筒里的茶也倒出来，看看底下是否藏着什么。就连布道牧师马洛尔从英国带来的一顶头疼时戴的红色便帽，也成了向分区委员会写的大量报告的内容之一。就因为这一具有象征性的小红帽，便被认定是从事反革命阴谋的一个确凿证据而几乎把整个修道院人员送上断头台。

由于巴黎所有的监狱都装满了犯人，这个英国女修道院也便承担起监狱的职能。卧室正式改成了牢房，许多嫌疑犯都监禁在这里。其中很有些是知名人士，除了十几名议员外，还有圣—阿马朗特家族的女眷们，女演员格朗梅松，银行家若吉，米拉波的遗孀，参议员戴普雷梅尼，女星相家科尔迪埃，女公民吕伊纳，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革命法庭的传呼是不吉祥的，它常常是把这里的犯人叫空而一去不返……对此，约翰逊院长毫无惧色，镇定自若。在这种不断有人出去也有人进来的混乱之中，她的修女们对她绝对服从，她们一如既往地做日课，因为祈祷皈依英国新教就是一条戒律，甚至小教堂里，正祭台上的灯火日夜通明。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794年7月16日，这一天云雀园的修女们被引渡到万森监狱，把她们禁在主牢房的最高一层。约过了十天左右，罗伯斯庇尔被处死，恐怖时期宣告结束。尽管如此，这些英国修女却一直到了1795年3月才获得自由，她们便从加莱启程返回英国定居，但她们这一宗教团体仍然

保持着。

她们在巴黎的修道院至今仍在，地址就在今天的制革厂大街二十八号。这座简朴的修道院的历史编修者加斯东神甫发现了这座老修道院的庭院，它四周是带拱顶的回廊，除了在顶上又加了一层外，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现在是几户工人家庭住在里边。如果不算上已彻底改建过的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那么，无疑这个地方和卡莫斯修道院便是恐怖时期巴黎留存下来的最后一座监狱。

45. 卢浮宫的房客

十七世纪初期，当亨利四世把卢浮宫的长廊建成以后，他应该想一想，这个一千五百法尺^①长的长廊，他的先人们梦寐以求并一直被认为无法实现的工程，他到底用它做什么用。严格地讲，它哪里也不通，既不和卢浮宫相通也不和杜伊勒丽宫相连，但它却被看做是连接两宫的廊道。说实话，它作为赛纳河上的一个装点，倒是非常壮观的。此外，它还没有最后完工，雕刻装饰只完成了它总长度的一半，那一半还处在毛坯状态……这种半完工的局面一直继续到拿破仑三世当政时期。

亨利四世很明白，他自己是永远也不会到这个长得没有头的长廊里来居住的，而且，如果整个长廊的各个房间不一

^① 法国古代的长度单位，相当于三百二十五毫米，约合中国一尺左右。
——译者

一打通的话，也休想布置成套房。于是这位老好人便把最高的一层留下做为自己的“通道”，其余的便下了诏令，把地下室、第一层、第一第二层之间的夹层和整个的第二层，全部赐给参加长廊的设计、施工和参加雕刻的艺术家们，让这些人在里边，从此也便解除了他们交纳房租的烦恼。他并且还规定，这些艺术家们可以终身常住在王宫里，他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发挥其天才和施展其本领，并有权随意招收徒弟传授技艺，这些徒弟可以在王国范围内任何地方开业谋生”。

于是卢浮宫便成了一个小社会。但这个社会的布局却不伦不类。当时那里还有菲力普·奥古斯特时期建立的建筑，始建于弗朗索瓦一世，亨利二世继续建了一些，后来又时建时停。这座宏伟的宫殿在当时便已被认为是“君主政体的首饰匣”，并命中注定，只有到君主政体覆灭以后才能完工。因为亨利四世晏驾以后，他后来的继承人对卢浮宫的建设只凭自己心血来潮、一时高兴，有时在这里建一座亭台，在那边修一座楼阁，根本不讲布局也不管是否和原来的建筑物协调，常常是某一工程刚一完工，便要进行修改和调整。如果说，历代国王对卢浮宫愈来愈不感兴趣，而对圣一日尔曼或者凡尔赛更加偏爱的话，那么这些艺术家、画家、金银器商人、地毯商人、建筑师、雕塑家、作家、诗人乃至新闻记者们可不是这样，他们无代价地住在里边，并对国王的这一规定给予高度评价。这些人正如俗语所说，你给他一尺，他会拿你一丈。尽管如此，只要历代国王在卢浮宫还保留着一个住处，这些荣邀恩宠的房客们就还能比较规矩地在亨利四世赐给他们的这个长廊下层安静地生活而不敢惹事生非。另外，这些人的生活也还是严肃的，也很勤恳，至少我们能够

回忆起来的，有建筑师勒沃，高级细木工布尔，以及报界前辈，我们第一位著名的大师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等人是如此。但自从王室搬出这座宫殿以后，就很有一批人借口要作画或者要作雕塑，便擅自搬进大房子里，并且人也就住在里边了。而当他们得到允许，可以在宫殿里使用一个或两个厅室进行工作时，这些人竟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方式把它们改造成住房，并且居然也大兴土木，粉刷砌抹，把壁炉的烟道和楼梯间的厚墙都给凿开，给房子“再加上一层”，他们便这样努力把自己的住房安排得尽可能舒适。

这些特权人物，一部分人非常善于美化环境，他们竟能把内宫的四方庭院里四周的廊柱上面的顶盖改造成为阳台；另一部分人则把雄伟壮观的廊柱大厅隔成几段当自己的工作间。画家瓦特莱在这方面的本事远远超过别人，他运来大量的土石，堆在卢浮宫的最高处，然后在上面栽上树，竟为自己造了一座空中花园。所有的地方都住满了，但艺术家们仍然大批涌来。后来者便占据了通向四方庭院的四个带拱顶的狭廊，并把它们上下隔成几层，这就变成一座楼房了，这样，宫庭内院也就被瓜分了。不久这里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居民点。这些“入侵者”中手段最高强的，甚至还运来了虎皮石为自己建了新房，而造房的一切费用都是“用国王的钱”，其手法之高明可想而知。仅这一栋房子，其造价便值十万埃居^①。到处都是取暖火炉的烟囱管，到处都是厕所里引出来的粪便沟，到处都是烧饭的烟筒。这些砖砌的烟筒，做饭时冒着黑烟，高高地伸出屋顶，与让·古戎的精美雕塑并排而立，似乎在有意和它们争雄斗胜。到处都是鸡窝、马棚、洗衣池，

^① 法国古代钱币名，种类很多，价值也不一致，有的五法郎为一个埃居。
——译者

并且到处都晒满了衣物。卢浮宫简直就是一家接待八方来客的客栈，一个住家密集得“几乎放不下一张桌子，安不下一把椅子”的大杂院。

画家奥利维埃·梅尔松的父亲藏有一位艺术家的回忆录，这位艺术家在路易十六和大革命时代就住在亨利四世的长廊底层。据他回忆，在卢浮宫里的日子，既有法伦斯泰尔式的^①欢乐，又有同志式的平等！每一个住房一律平等，都分有一个朝向码头的窗户，而且每户都在长廊下边分到一间地下室。此外，每个房客还有经自己动手改建的，可供自己任意支配的上下三层的房间。这些房间从一号编到二十六号，房门一律都开在同一个廊道上。这个长度就是整个长廊的长度。长廊的廊道则专供宫廷里的孩子们在那里玩耍、娱乐。在紧靠着阿波隆长廊的那一头，当你走进这个长廊时，劈头相遇的，便是这些房子的头几间。其中在第二号房间里住的，便是被大家称作“小老头弗拉戈纳尔”^②的。他长得滚圆、肥胖，却矫健异常，永远那么机灵，永远那么乐观。他就是这里所有住户的闹钟，他挨家挨户地跑来串去，把时间全花费在闲逛上。他肥胖的身躯裹着一件灰色旧外套，这件外套既没有领钩，也没有兜盖，也没有扣子，他可以随便摸起个什么来就当腰带，比如说，一根绳头甚或是一条抹布等。弗拉戈纳尔太太长得呆头呆脑，平庸粗俗。但她画起细密工笔画来，却相当有天才。她的小姑吉拉尔小姐和他们住在一起，这位小姐却娇小玲珑，俏丽异常。在三号住的，是雕刻家穆西，他是接替他的叔父大皮加尔住进来的。四号自

^① “法伦斯泰尔式”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幻想要建立的一种社会基层组织。——译者

^② 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1732—1806），法国画家兼雕塑家。——译者

1668年以来，就由西尔韦斯特家住着，他们是雕刻世家，他本人并一直兼任法兰西儿童绘画教师。画家勒尼奥住在六号。她的夫人主持着一个“专为女士服务”的画室，后来在恐怖时期，她收了细木匠迪普莱的女儿作学生，有人说，这位女学生是“罗伯斯庇尔的未婚妻”。七号原由水粉画家拉图尔居住，后来改由让·巴蒂斯特·依沙贝及其夫人和孩子们来居住。这套房子是卢浮宫最漂亮的房子之一，依沙贝把它布置得非常豪华，并挂上许多珍贵的名画。雕刻家帕茹住在九号，后来住在这儿的是于贝尔·罗伯特夫妇。罗伯特太太非常善良并助人为乐，每年由每位房客付给她六个里弗尔的工钱，她便替大家管理这长廊上的公共灯火照明和负责公共安全。在她之前，这一职务由夏尔丹太太承担。

过了圣一托马边门（现在的让·古戎门）就是科斯泰·瓦莱埃尔夫人的住房。她是风俗画家，王家学会会员。再往前走，便是韦尔内一家，开始时由约瑟夫·韦尔内居住，随后便由卡尔·韦尔内接替，并在这里生下了奥拉斯·韦尔内^②。再向前就是拉格勒内一家^③。再向里走，便是画家格勒兹家，其时他已是垂暮之年，但仍然精心打扮以掩饰无情的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这时正和他的两个女儿过着节衣缩食的清贫生活。他的两位傻千金多嘴多舌，看起来既老又丑，吵起架来尖酸刻薄，长廊里每天都回荡着两姊妹吵架的声音。长廊的尽头还有一家，住的是王室老供货人，名叫古诺，他活到九十高龄在这里去世。他儿子弗朗索瓦路易。

① 让·巴蒂斯特·依沙贝（1767—1855），法国细密肖像画家，他先后做过吉拉尔丹、克鲁多、都蒙和达维特的学生。——译者

② 以上三人是祖孙三代，都是当时知名的画家。——译者

③ 他家出了兄弟两个画家，世称拉格勒内老大（哥哥）和拉格勒内老二（弟弟），——译者

便顶起了他的门户，他是画家兼雕刻家，此人思想阴暗，性格古怪，并有些粗暴。他便是夏尔·古诺^①的父亲。

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整个法国，而又特别光顾了这个小天地，其中一些人特别狂热，另一些人却破了产，但却没有任何人被赶出卢浮宫。风暴刚一过去，这里的各种业务活动便又复活了，大家的情绪也随之活跃起来。旧法兰西垮掉了，但旧法兰西的这些艺术家们却安然无恙，继续住在从前国王们住的宫殿里，依旧按亨利四世的老规矩办事。在他们的头顶上，长廊已变成了一堆废墟——这是于贝尔·罗伯特，以其别出心裁的想象，为卢浮宫的内廊所画的巨幅画幅，这是他的游戏之作，题目便是《长廊的废墟》。不幸的是，画面上的情景不久便成了事实：窗上的玻璃已经不翼而飞，蝙蝠已经在尼古拉·普桑的巨画后面做了窝。但却没有一个人打算搬出去，这里已经成了他们“终身”的领地，尽管当时条令十分刻苛，却无法剥夺这些艺术家们在这里的居住权。真是有趣得很，那位使整个法兰西都拜倒在他的脚下，并只用了五年时间便取得了路易十六一生都没有取得的权威的那位科西嘉人^②，那位由于他反复无常的性格和独断专行的做法，使得任何人都不敢对他的尊严稍有冒犯的人，于1802年下令，立即撤出“他的”卢浮宫，一刻也不准拖延，因为他要准备重建卢浮宫。出人意料的是，这些艺术家们却纹丝不动，安若泰山。出奇的事情便出现了：这位曾经随心所欲地摆布过欧洲，只须他一纸诏令便可轻而易举地把所有的国王都赶下宝座的人，在自己的家里竟然指挥失灵。颇有

^① 夏尔·古诺（1818—1893），他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译者

^② 指拿破仑。——译者

那么一段时间，他对此视而不见，好象忘却了一般。有时候（不是经常）他也不是不想做一个象亨利四世那样的随和的国君，但当他把长廊修复，并把得来的珍宝放在里面以后，他就向这些艺术家动手了。那是1806年5月的一天晚上，他在奥尔蒂大街上经过，当时这些艺术家住宅的大门都向北朝街打开着，他看见每个房间生炉子的烟筒都伸到窗子外边，住在各个楼层的女人们有的正在做饭，有的正在热洗衣水，他便对陪同他的迪罗克说：“这些可恶的东西，这样搞岂不把我缴获的战利品全给烧光了吗！”第二天搬迁令便下达了，几天的功夫，所有的住户便全部搬出。

如今，这个长廊的下层，一部分作了版画出售部，另一部分由几个行政管理单位所占用。如果我们能保留着这个宫殿的庄严外表不使其失却原来的面貌岂不是更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国家引以自豪的一大批最光荣的艺术家们曾在这里居住过，即此一桩也便很值得我们给它立上几块匾牌以资纪念了。如果在匾牌上写着这样的说明文字：“这里曾是弗拉格纳尔的画室”，“于贝尔·罗伯特曾居住在本室”，此外还有夏尔丹，还有格勒兹、拉图尔，皮加爾和韦尔内等。这样的文字，我想是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的。既然大家都清楚明白地了解每个房间的准确地点，而在这些房间里又出现过那么多美好的事物，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象给卢浮宫的游客们写一个感人的前言那样，在他们曾居住过的房间墙壁上刻上曾被拿破仑称之为“这些可恶的东西”的名字呢？更何况，每个展出大厅里又都充满了他们的作品。

46. 爱丽舍宫的舞会

1797年间，租住成套房间并不贵。在这一年，有一个名叫霍文的人和他的妻子让娜·维奥莱特通过签订一项为期九年的租约，每年付一万八千里弗尔的租金住进了爱丽舍宫。一万八千里弗尔！这个数目今天只能在—一个不怎么样的地方租上一套有一间客厅，—间餐厅和三、四间卧室的套房。何况当时霍文夫妇所付的租金似乎是纸币，因此，他们住进这所在巴黎屈指可数的富丽堂皇的宅邸实际上和白住相差无几。

其实，这座宫殿那时是前贵族·巴蒂丽德·奥尔良公主的财产，她是波旁王朝的一位前公爵夫人。这个可怜的女人由于刚出监狱等着钱用，督政府才把这所于恐怖时期被查封的宫殿归还给她。为了不致于饿死，她只好将它忍痛出租。因为无处安身，她便留下了其中的一套房间，并且在契约中写明自己保有在花园里散步和从大门出入的权利。不过这种好处她并没有能享受多久。由于六个月之后又发生了果月十八日的政变，公爵夫人又成了嫌疑分子并遭到宪兵逮捕，被押往西班牙边境，十七年之后她才得以重归故里。

霍文做了一桩便宜买卖。他既用不着再与房东打交道，因此自然也就无须再为交房租而烦神了。他们夫妻二人只有一个名叫利埃维纳的女儿（她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非常苦恼），所以三个人住在里面当然是非常宽绰而且阔气，因为被放逐的公爵夫人的房屋里全部家具也由他们继承了下

来。然而象他们这样地位的小市民们，这样一些装饰对他们又有什么用处呢？霍文一家在这里反而感到烦闷得很。试想，这个原是由蓬巴杜尔王妃居住，后来又成了大金融家博戎的公寓的满是豪华的厅、室的宫殿，里面到处都挂着或摆着诗神缪司和各种半裸体女神的画像或古希腊、罗马的风流人物的雕像，如今，在这宫殿的一角里，却禁锢着一个小市民，他每天都在这些高堂华屋里踌躇，该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霍文太太躺在那个半圆形的小卧室里的由装饰着鲜花的四棵棕榈树掩映着的贵妃床上休息；欧文先生在那四壁镶着刻有玫瑰花束的磨砂玻璃的浴室里抽着烟斗；而他们的女儿利埃维纳则在俄耳浦斯^①和俄泰尔佩^②大理石塑像的注视下正在音乐厅里演练音阶。除此而外，对他们来说还有更为严重的麻烦：这里的厨房大得出奇，而且又离住室非常之远，到厨房去一次几乎等于做一次旅行，而且，至少得开二十道房门。马厩占据了宫殿的整个一侧，可现在里边都空空荡荡，人们从那里走过时就象在一座改装成的教堂里一样脚步声四处回荡。花园里，那些高大的树木、榭树下的林荫道、大理石桌椅、草坪、池塘以及特里亚浓式^③的房舍都显得有点凄凉、有如一个被遗弃的花园。要想使它热闹起来、恢复生机，就必须游人如织，可霍文一家却从不接待任何宾客。

大概正是这种强烈的孤独感使霍文先生才打主意利用自己租约的权利招徕公众，以便让这座堂皇的宫殿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实现这样一项计划并不困难，只要贴出一张“本处舞

① 希腊神话中善弹竖琴的男歌手。——译者

② 希腊神话中的音乐女神。——译者

③ 分大特里亚浓和小特里亚浓，都是凡尔赛宫的花园的宫殿，其建筑式样别具一格。——译者

厅开放”的广告就行了。当时在巴黎虽然拥有一千八百家跳舞厅，但仍然容纳不下这座大城市中不可胜数的泰尔普西科尔^①的崇拜者。非常希望有那么一天能有个智慧过人的心理学家为我们解开这谜，即：在巨大的社会危机之后，当一个民族经历了可怕的劫难、丧失了成千上万的儿女时，为什么幸存者为排遣他们的悲伤情怀总是沉溺于瓜德利尔和双拍舞之中，并且是无日无夜地跳个不停？就这样，霍文把爱丽舍宫改成了公共舞厅。可以肯定顾客是不会少的，确实，前来跳舞的，人如潮涌。为了更加吸引来宾，不致使他们很快离开，舞会的主持人又挖空心思在节目内容上来了个花样翻新：开幕的那天，升起了一只大气球，气球上的乘客是一只绵羊，升上天空之后，绵羊借助降落伞返回地面。至于这个可怜的动物是否经过训练以及它怎样才能完成这一壮举，却没有人过问。

一家当时的报纸详细披露了在前蓬巴杜尔王妃住过的这所宫殿中这位精明的房客所进行的这些改革的内容。当夜幕降临之后，灯火通明的大厅便变成了咖啡厅和舞厅；著名的冷饮商加尔希也在这里摆设了经营点；博戎的图书馆成了阅览室。在面向花园的平台前摆开了四排座椅，都是在跳完快步舞、劈啪舞和方阵舞之后女宾们休息的地方。花园里设有游艺场，还为那些喜欢在草地上跳“跳跃舞”的人专门在草地上精心布置了一座满目青翠的跳舞场。而那些爱好水上角力的人则能在喷水室里尽情玩耍，对他们来说所冒的最大风险不过是弄湿双脚。入夜，小树林彩灯竞放，焰火也随着腾空而起。

^① 指希腊神话中的女舞神。——译者

尽管这里可供消遣的活动内容十分丰富，人们还是很快就感到厌倦了。因为它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毕竟还是在于人们想来看看这座贵族宅邸：这里留下了对蓬巴杜尔王妃的回忆，也充满着关于富翁博戎的传说。同时入门券的价格也似嫌太贵了些。售价为三个里弗尔（当然是用硬币），这就使许多人在这笔过大的数字前颇显得犹豫了。霍文还在不断绞尽脑汁翻新他的活动内容，他不放过任何一种新的尝试，他甚至竟请来了一位大使，这倒成了绝妙的宣传广告。因为自从法国大革命得罪了整个欧洲以来，欧洲列强的代表几乎全很少露面。恰好就在这时，土耳其的苏丹王向法国督政府派来了一名外交官，他的到任成了轰动巴黎的一大新闻。这是个土耳其人，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人！他的名字是艾赛德·阿里·艾方迪。象所有的穆斯林一样，留着棕色的胡子和长着一双温柔的大眼睛，一顶有凹凸花纹的小帽子外面缠上一块头巾，身穿一件有白鼬皮饰带的长袍，脚穿一双红色的摩洛哥山羊皮靴。他所引起的反响实在是异乎寻常的。人们争相观看，一夜之间，所有的妇女都换成了东方服饰：头上戴起奥托曼便帽，身上穿着土耳其王宫姬妾们的宽大的长裙，同时佩戴起新月形的首饰^①。霍文把这位“信士们的长官”^②纳入他舞会内容之中，一天晚上，他来到了爱丽舍宫。入门券的价格当时虽然高达五法郎，可谁也不认为太高，买票的人几乎挤破了售票口；同样大使阁下就坐的花园的平台上也挤得水泄不通，他的周围坐满了漂亮的女士，使得这位土耳其人眼花缭乱。他按土耳其习惯端坐在那里，吸着一支长烟斗，慢慢地摇动着一把扇子。紧挨着他身旁坐的，便是那位大

① 新月是土耳其国徽，伊斯兰教的象征。

② 伊斯兰教徒对哈里发的尊称。

名鼎鼎的女公民塔里安^①。她勇敢地吞吸着这位大人物吐出的烟雾，而这位外交官也正在贪婪地盯着这位美貌绝伦的巴黎女人。很明显，这位风流的东方人除了用眼睛之外多么想用别的方式来表达对她的赞赏，遗憾的是他对我们的语言几乎一句不懂，使他不能如愿以偿。只是在经过一番明显的苦思冥想之后才好不容易地想出了两个法语字眼，于是便向这位女邻座转过身去，用十分多情的，但又是非常高的声音迸出一句温柔的颂语：“公众的美人！”对这句令人丧气的话，她听了并没有任何抱怨，而在场的每个男人，尤其是那些妇女，谁也没有因为这天晚上花了五个法郎而感到遗憾。

不过象这样意外的收获并非常有。尽管霍文千方百计地想吸引人们前来光顾，比如在这里召开统计学报告会、航天学报告会，技术交流会，商务讨论会，语法学和音韵学讨论会、音乐会、艺术和工业品展览等等，都无济于事，爱丽舍宫不久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此外，当局也在吹毛求疵地对活动项目百般挑剔。有谁议论过督政府的腐败无能吗？从来没有。恰恰相反，法兰西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循规蹈矩、关心社会风化的政府。其明证便是，当霍文宣布要在1798年5月3日放出一个大气球，将由驾驶员加尔纳兰携带一名妇女上天的消息后，政府便以两名异性当众腾空有失礼仪有碍风化为由，命令禁止……。总之，霍文的事业在日趋没落；在债主们蜂涌而来的情况下，这位主持人完全束手无策，只好自认失败，然而，却是他女儿救了他。利埃维纳是一个有头脑、讲实际的女子。他先用十六万一千法郎买下了

① 她是国民公会议员让-朗贝尔·塔里安的夫人，让-朗贝尔·塔里安是吉伦特派的政敌，曾赞助过热月9日的内阁危机，因此塔里安夫人也有个外号叫“热月圣母”，在督政府时期，她使希腊服装在法国特别时髦。——译者

爱丽舍宫，然后把这些厅堂和花园的经营权转让给了一位专搞招牌的老商人埃，他因和马丹维尔合作写出了不朽的幻梦剧《绵羊脚》而出了名。然后利埃维纳又在宫殿两侧和弗布尔—圣—奥诺雷大街上开设了几间小店铺，并把它们分别租给了一个肉店老板，一个食品杂货商，一个店主，一个烤肉店主和一个服饰品商人……。在沿着马里涅大街，利埃维纳又搭起了一些棚子，出售些饮料和烟草。最后她又把这座宫殿本身改成了三十来套平民住室，租金自三百至一千法郎不等。在享受这些待遇的房客中有黎塞留的遗孀，一位1789年的遗老尚斯奈茨和一位曾参加过七年战争^①的名叫维尼的老头，他是有志于成为一名伟大诗人的孩子^②的父亲。

督政府时期这座宫殿的衰败程度可能是其历史上最出人意料的一页，但它也有着其他方面的经历，其中有光荣的历程也有悲惨的遭遇。因为正是在这里的一套房间里拿破仑于滑铁卢战役之后精神上从此一蹶不振；在另一间客厅里贝利公爵和夫人于1820年2月13日晚曾心情愉快地双双离开了它，而过了十二小时，在一个剧院的包厢里在自己丈夫遭到暗杀之后，在他死前见了他最后一面，公爵夫人便孤身一人返回这里；在它的厨房里，里比埃和霍文的继承人、糕点冷饮商韦洛尼曾制作过奶油圆球蛋糕；路易·波拿巴也曾在这里指挥过十二月二日的政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黎这座大建筑物的基石的确充满着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回忆，你只要问及它们就可以让一连串形形色色的幽灵重现眼前，其中哪怕是最微不足道和最不易被人注意的一个事实都能够当

① 指路易十五时期法奥联军与英普联军于1756—1763年间进行的欧洲战争。——译者

② 指作家维尼。——译者

一部小说的英雄，或者能成为我们编年史的重要内容。

47. 维克多·雨果的婚事

为什么不可以象对已故的人一样，也对已被拆毁的老房屋作一篇祭文呢？这些房子也曾“活着”过。为庆祝它们的诞生，也曾在它们身上披红挂绿。那高大的脚手架不就是它们的摇篮吗？它们经历过多少事变，在它们的庇盖下，曾发生过多少曲折、离奇的故事和演出过多少哀怨动人的戏剧。但它们又终不免于破败、衰老，最后还是逃不掉被遗弃的命运，新的一代人便离它们而去。某一天早上，当路人在它的面前匆匆而过时，突然发现一张简短的通告：“本房屋作建材出售。”这便是它的死亡判决书。于是便有人前来在这个老屋的周围圈上木板栅栏——这就是它的棺木。接着便是一卡车一卡车地把它拆下的破砖烂瓦运到一个神秘的墓地去。

有那么一个公寓已经被这么肢解了好几年了。这幢公寓就在塞纳河的左岸，它有资格享受一级安葬礼。这倒并不是因为它曾作过漂亮的伯爵夫人维鲁的住宅——这一段时期是它的青年时代，每天有人在这里吃夜宵，每天都有盛大的集会，它的主人们视锦衣如敝屣，视黄金作粪土；也不是因为它在十八世纪接待过图卢兹—洛特雷克^①一家和来自撒丁岛^②上的使节；同样也不是因为不久前这里还是军事法庭。

① 图卢兹—洛特雷克（1864—1901），法国画家。——译者

② 属意大利版图。——译者

它可以成为审判庭上可怕的裁决场面的见证人，其中有马莱的诉讼案，阿尔芒·夏多勃里昂的案件，还有许多著名的案件……在拆除它的过程中，你的双眼便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那些已把地板和天花板拆除的房间里，墙壁上只留下些长长的、弯弯曲曲的黑色“血管”——那是已拆除的壁炉的烟道。在这些壁炉前边，从前有多少人拥炉而坐啊。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物统统被忘却并且消失了。但有两个孩子却至今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们曾相亲相爱地住在这里，至今大家仍在谈论他们，因为其中的一个才华横溢，名满全球，另一个则成了他终生的伴侣。

在1819到1820年的冬天，几乎每天晚上，军事法庭大厦的门房都能看见有一位青年男子在他母亲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大院，然后便沿着右边的台阶上去。母亲看起来正直大方，手提一只小包，身穿紫红色美利奴羊毛长裙，肩披一方黄色带棕榈叶的开司米披肩。这两人便是雨果夫人和她的儿子维克多，是到他们的朋友富歇家里来作客的。富歇先生曾当过军事法庭的书记官，以后被任命为陆军部兵役局局长，但他仍特准在图卢兹公寓三楼保留了一套住房。这套房间天花板很低，有一个带铁扶手的回形楼梯直通楼上，这很有些象兵营里的那种楼梯。整个建筑物，包括用石灰水刷得粉白的光秃秃的墙壁，再加上警卫部队和院子里戒备森严的各条道路，总之，整个这片建筑就象一个小行政区。

富歇太太在她的卧室里接待客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有一个放床的小夹墙。雨果太太在壁炉旁边的一个角上，找了一张扶手椅坐下，既不拿下披肩，也不摘掉帽子，

便打开提包取出活计，坐在那里打起毛线来。富歇先生自从波旁家族回来以后，便不在陆军部里过夜了。因为当帝国大骚乱时，他不得不留在那里。现在他便坐在壁炉的另一边，在他旁边放上一个小凳子，上面放着鼻烟盒和一支蜡烛。在他和雨果太太之间，便是富歇太太和她的女儿，她们正围着一个圆桌做针线。维克多·雨果和保尔·富歇^①便在他们之间插了空，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半圆圈。

他们当中有一位后来曾把这个亲切的聚会画了一张素描，大家一致认为画得很逼真。当时每人都静悄悄地坐在那里，十分安静。男主人的身体状况欠佳，由于长时期熬夜，精神有些恍惚，坐着不太动也不太爱开口，甚至也没有人向他打听那些日子里发生的新闻。别人对他的照料也使他感到厌烦，任何对他的关心都会惹他生一顿气。他对自己居然会生病，觉得是个耻辱，他在角落里看着书，似乎被大家忘却了。为了让他保持安静，富歇太太很少讲话，再说，她生来就比较沉静，一向寡言少语。两个年轻人已经养成习惯，如果别人不问他们什么，一向不主动讲话。雨果太太不时地停下手里的活计，看看壁炉里烧得劈劈啪啪的木柴，打开她的鼻烟壶。她和富歇先生一样，喜欢吸鼻烟。她把自己的鼻烟壶递到她老朋友面前说：

“富歇先生，你想来一撮鼻烟吸吸吗？”

富歇先生只回答了一个“好”字，也许回答的是个“不”字，总之，这已是他们的习惯，平时见面也只有一句：“你好”，如果是晚上，便再加上一个字：“晚上好”。那天晚

^① 这里说的维克多·雨果即前文说的“维克多”，即后来的大作家雨果。这段事发生在1819到1820年间，其时雨果年仅十七到十八岁。保尔·富歇并不是前文讲的当局长的那位富歇，而是他的儿子，当时年仅九到十岁。——译者

上，他们一共就说了那两句话。

夏天，富歇全家便到伊西去度假。这个避暑胜地却特别叫维克多恼火。尽管他含蓄地说，去伊西“并不比去军事法庭远多少，过了沃吉拉尔村就到，就只有这么一小段路”，但却因此不能每天都去富歇先生家了。只有天气好时雨果太太才带着自己两个儿子欧仁和维克多前去看望他们，顺便在路上为他们买几筐水果。当他们来到富歇家里以后，主人便在餐桌上多摆三副餐具。待黄金季节过去以后，每天晚上沉默不语的晚会便重新在榭尔什——米迪大街的公寓里重新开幕。这样的聚会直到1820年的头几个星期还每天都举行。维克多对此十分高兴，由于他对此表现得太过明显，便被父母查觉了，于是他们便开始研究儿子高兴的原因。没过多久便发现，他喜欢到富歇家聚会，其兴趣不是看壁炉里劈劈啪啪地燃烧的木柴，也不是对于一动不动地在椅子上坐上两小时有特别的爱好。大家一句话不讲对他是无所谓的，他对富歇的目不离书，对女眷们专心于手里的活计也很为满意，因为这时他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毫无顾忌地用眼睛瞧着阿戴尔·富歇小姐。不得不承认，阿戴尔小姐对此并不生气……他们俩人的年龄加起来才刚刚三十岁，现在就让他们结婚未免荒唐。维克多自己是身无分文的，而阿戴尔小姐也同样穷得可怜，双方家长终于下了决心：“把他们分开！”从此两家便不再互相访问了。

这种可以说是古朴的风俗，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古老的，宁静的，又是小心谨慎的时代，而这，和我们今天的时代又是那么不同。在一本书中可以找到对他们俩人的有关记载，这本书，我想今天不会有人再去读它了，它距今已有六十余年，书名是《一个生活的目击者谈维克多·雨果》。这

位目击者是谁？是阿戴尔还是维克多本人？毫无疑问，本书是合著的，唯其如此，才使这本书显得珍贵了。1821年雨果太太和她的两个儿子一起住在梅吉埃尔大街（老三阿贝尔住在别处），她于同年6月27日在那里去世，丧葬事宜是在圣一苏尔皮斯教堂办理的，遗体停在圣母像前，两天以后入土，葬在蒙巴尔那斯公墓。那天，维克多非常伤心，万分难过的维克多，当天晚上一个人在公墓外边的墙下徘徊，其时公墓大门已经关闭。一个寻求某种希望的冲动，使他向榭尔什一米迪大街的方向走去。当时已是十一点多钟，他估计军事法庭的人们已经入睡并已熄了灯。但出乎意料的是大门却洞开着，每个窗户都灯火通明。他犹豫了一下，随即跑步走进大院，登上楼梯直接来到三楼（他认识那个房间）便向一个类似气窗的地方走去。那里的灯光从上边照着大客厅，可以看清屋里的一切……。原来，6月29日是富歇先生的生日，这天便组织了一个家庭舞会。维克多独自躲在黑暗的角落里，聚精会神地看着舞厅的窗户；他被大家的欢乐情绪所感染，不久，他便发现了自己寻找的对象：她身穿白色长裙，头插鲜花，正在面带微笑地翩翩起舞。

第二天富歇小姐正在军事法庭大院里散步，她看见维克多来了。他这时候到来，再加上那苍白的脸色，使她马上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不幸。她立刻跑过去问：“出什么事了吗？”“我母亲去世了，昨天我们已把她安葬。”“我那个时候还在跳舞！”他发现她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双方都哭了，这就是他们的订婚仪式。

但他们仍然天各一方。阿戴尔被送到德勒，维克多马上就查出了她的去向。他身上分文没有，只是手里拿着一根木棍，便沿着他的所爱的足迹追了下去。要想摆脱一个求爱者

的跟踪，那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因为他“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个灵敏的嗅觉，特别是有一副不怕累不怕磨的铁脚板”。他们便又双双回到榭尔什一米迪大街。这位年轻的诗人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并且刚刚得到国王赏赐的一千法郎的补助金，这就是他的经济支柱，当时便决定，马上结婚。宗教仪式完毕之后，便在军事法庭摆起婚礼宴席。富歇太太的餐厅太小了，餐桌便摆在庭审大厅，把那个曾在上面宣读过无数死刑判决书的审判官席用一张活动屏风给挡住。席间，欧仁·雨果讲话颠三倒四，不知所云，使他旁边的客人大为吃惊。饭后有一位友人便把他送回德拉贡街的住处，自从他母亲死后，两兄弟便住在这里。第二天，人们到他屋里去看他，只见屋里灯火辉煌，就象过节一样，欧仁疯狂地叫喊着，正挥舞着长剑对着卧室的墙壁猛烈地劈刺。他疯了。当时和这弟兄俩关系非常密切的诗人加斯帕尔·德蓬写的一个剧本中，很明显地影射了这一悲剧性的插曲。在对话中，当有人向剧中的“欧仁”讲话时，诗人是这样写的——

爱神和诗神都抛弃了你，
绝望和妒火便从你心头升起。
尽管你内心不想如此，
仍禁不住憎恨那位战败你的情敌。

于是你便及时采取了措施——
你，已不再是你，也不再是别人的兄弟。
到天国里去找该隐吧①——

① 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他专心致力于农耕，而他的弟弟阿贝尔则向往着田园诗式的牧人生活，后来由于上帝偏爱阿贝尔，他便愤怒而把他弟弟杀了。——译者

你俩才是名副其实的难兄难弟。

十五年以后，这位不幸的欧仁死在夏朗东的家里（维克多结婚后第二天就把他软禁在那里了），这时维克多·雨果曾写过悼诗，其中有些，可能也不无弦外之音——

啊！请你不要有丝毫遗憾，
这片宽阔的高地，
已足够你长眠……

在这幢房子拆毁之前，那些想来这个曾有着凄恻哀怨的爱情故事和粗鲁可怕的历史悲剧的圣地瞻仰一番的人们，还能看得到它1820年时的原貌，还能看到直通富歇房间的铁扶手楼梯，还能看到冬夜聚会的那个带小夹墙的大卧室，还能看见那个大家默默无语地围坐在旁边的大壁炉。这个壁炉是用白色大理石砌就，上有蔷薇花图案，颇具帝国风格。在这里，甚至人们还带着某种自鸣得意的想象力指出，当维克多·雨果把他母亲埋葬以后的那天晚上，是站在哪一个风窗下偷看打扮得花枝招展面带微笑的阿戴尔的，哪一个大厅是雨果举行婚礼时的宴会大厅。而就在这个大厅里，肝肠寸断的欧仁疯了，那原因便是因为爱和妒。但，是否真是如此呢？

48. 外交大臣塔列兰

在从卢浮宫直通协和广场的里沃利大街上，当这一片包括著名的大拱廊的建筑落成以后，以其新颖别致，曾博得大家一致交口称赞。但自从规定除塔列兰住过的那幢房子以外，其它房屋一律拆除以后，这种称赞便寂无声息了。塔列兰的公寓座落在圣一弗洛朗坦大街的拐角处，现在依然保持着一个世纪以前的原貌。这座宏伟的建筑和它那座庄严的前门就在这条街上。它的建筑风格与当时建筑家们所喜欢的那种流行式样迥然不同。塔列兰的豪华公寓能幸免于难而被保留下来，是因为它在我国历史上曾起过魔术般的作用吗？还是因为它那庄严的外表与它周围的漂亮建筑物相存并立而毫不逊色呢？我说不清楚。但我总怀疑，每天在它的阳台下走过的行人，一百万个当中，恐怕没有一个会对这古老的石墙后面曾经发生过的许多伟大事件会有什么眷恋之情。就在这幢大房子里，我国的命运曾轻易地被拿来当赌注。甚至一些强有力的外国君主也到这里来向这位善于应变的外交家咨询意见，征求看法，探测动向和谋求赞助。而他的远见卓识，他过人的才智和他口是心非的权术，也堪称他们的指路人和导师。这便引起了他的邻居，杜伊勒丽宫的主人们的恐惧，因为他一转动魔棒，就能把一个帝国，比如拿破仑帝国，给搞得踪影皆无（事实已经做出过证明），然后便从他的百宝囊中再拿出一个编制齐全的大帝国来。

有那么一段时间，每当有行人沿着这幢外表庄严的宫殿墙边走时几乎都要划十字，由此可见这幢房子主人的高超“魔术”在群众中影响之深。那些每天都要走进这座带廊柱的大门向这位显贵承奉的人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到他那里去时不感到某种程度的胆怯或局促不安。这里的一切都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每道门都能一声不响地自己打开，然后等客人进入再自己关上，就象有什么魔法一样，似乎早已知道了有客人要来，而仆人们也似早已明白客人的来意一般，因为他们禀报过主人再回来喊着来访者的名字替主人邀进时，都能根据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情况而用不同的口气。你一走上那个豪华的楼梯，便觉得有一股神秘的气氛。楼梯口两边各有一座石狮子，这是力量的象征。大厅里挂满了名画、雕像，以及光彩夺目的金丝窗帘。各种大型的会客厅在二层，里面的布置装璜，在全欧洲都是第一流的。私人住房在中二楼，有四个房间，第一间是书房，然后便是一个客厅，中间摆一张大桌子，周围是宽大的靠背椅，再向里走便是卧室，里面摆着华贵的大床，上面铺着柔软光滑的床单，最后一间是洗澡间，通过敞开的房门可以看见里面摆满了各种盆盂，大小瓶子，各式水桶，各种化妆用的盒子，各类美发油，各色香粉，各种发蜡，各种香料，各类染发剂等。这个老家伙就用这些东西想使自己返老还童，甚至以其耄耋之年还在千方百计取悦于妇人。他就象一个毛头小伙子那样爱上了库尔兹姆^①的一位正是豆蔻年华的美丽公主，把她搞到手时，这位公主才十七岁。为了装点门面，让他的一个侄

^① 库尔兹姆当时是个公国，位于现在苏联的拉脱维亚境内，从前这里住的是丹麦和瑞典的移民，后来德国人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势力，最后这个公国便归附于俄国。——译者

子先娶了她，这件事，当事人三方彼此心照不宣，这两个年轻人实际上很少见面，这样也便在表面上维持了人伦道德。于是塔列兰便金屋藏娇，他自己的房间就成了他“侄媳”的住房。她的公开身份是迪诺公爵夫人，这就是后来在正史上以这个身份出现的那位工于媚人的，野心勃勃的前奥顿主教^①的情妇。

他在世时，甚至在他死去若干年后，关于他住的这幢房子仍然是传奇式的，关于其布置是如何的富丽堂皇，其家具是如何的奢华，其装璜是如何的精美，其外观是如何的高大，其气派是如何的庄严等等，议论纷纷，谄媚之辞不绝于耳，并且持续了很久，以致到后来竟把它传说成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比这里更为讲究的排场，比这里更为适合的外交场所，和比这里更为热情好客的东道主。总之，圣一弗洛朗坦大街上的这座公寓，给欧洲各国王室树立了榜样。

如此的盛誉肯定是有点名不副实的。继雷米扎的记叙之后，莫莱伯爵的《回忆录》向我们提供了详尽的、妙趣横生的情节。他对这位政界泰斗体貌的描写也绝少溢美之词，并且在那些著名招待会的画面上颇增添了有煞风景的几笔。莫莱是该府的熟人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亲密的熟人之一，他应该了解得比较准确，并且其描写也十分生动。他对塔列兰的描绘有如一幅铜版画，他用强烈的腐蚀液，以高出常人的手法，用最粗犷的刀工，雕出了此人狰狞的嘴脸。他的回忆是尖酸刻薄的，但却使人觉得真实可信。灰暗苍白的面孔上，肌肉干瘪而松弛，一双傲慢的眼睛黯然无光，那一张嘴，“这张嘴可能是举世无双的”，它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纵欲过度，饫甘餍肥和倨傲轻蔑。当他的身躯向前移动

① 塔列兰曾在奥顿当过主教。——译者

时。每其说是靠着那两条畸形的腿，倒不如说在身后拖着它们。这两条腿似乎支撑不住他的躯体，这时，你好象看见了童话中半人半鬼的怪物在向前爬行。在他身上“贵族的气派，妇人的度量，教士的伪善和猫似的贪嘴，兼而有之”。……关于他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品德，莫莱的画像也不更加容情：“他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固定的道德，没有深厚的教养；塔列兰几乎不和人争论，因为他从不对一种意见表示可否，他的头脑和他畸形的双腿一样，任医生怎么检查也不得要领。别人的意见对于他，就象一粒种子丢在烂泥坑里，种是种下去了，却永远不会发芽生长。在他身上，邪恶的念头，严重地扼杀了作为一个人的本性，因此他的信条很简单：与人为善便是恶，作恶多端便是善，而他更喜欢后者。高尚，仁慈，体贴，博爱这些词，他都了解并且使用得十分得体，但却从来不知道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对这个形象的描绘，作者以无情的笔调引人入胜地继续下去。他引用了米拉博当时已经使用过的对塔列兰的评价，当时塔列兰还是个主教，文章说：“为了金钱，他可能会出卖灵魂，并可能还会振振有词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不对吗，用一堆垃圾换来了一堆金条，这事谁不干呢？……”

现在，莫莱的叙述表过之后，我们还是到这位大人物的家里来看看吧。年代是在1815年，当时他正在外交大臣任上。这一访问是值得的。时间已近中午，塔列兰已经起了床。这时他便踱进客厅，他的侄媳迪诺公爵夫人，还有一些高贵的太太们都在那里等他。他一个一个地接受了她们的亲吻。在场的还有他的外科医生和两三名仆人，还有几位熟悉的客人，这些人在他还没起床时便赶到了。他从头到脚都裹在锦缎里，上身穿一件灰塔夫绸的棉衣，头上顶着好几顶睡

帽。这时他便慢慢腾腾地来到一面大镜子前边仔细而认真地打量着自己那张睡眠惺松的苍白面孔，然后便开始梳洗打扮。一个仆人给他端来满满的一盆水，这位大臣便把整个面部浸在盆子里。这时他猛地吸一口长气，于是一大股水便叫他吸进鼻孔，接着便如狮吼虎啸般地从嘴里喷了出来。这种制造人工瀑布的把戏反复不断地玩了足足一刻多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办公室里已经挤满了人。有爵位的命妇，大使、国务秘书、文化人、金融家、学者等一个个地被引进来了，而他似乎并没有觉察到这些人的到来。依据惯例，是用不着向他问候早安或者首先同他谈话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等半个小时以后他才用一个手势，或者一个阴沉的字眼，而通常是一边转身一边示意给来访者，表示他已经看见他们了。洗完了鼻孔，下一步工作便是洗脚，他神色自若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丝毫也没有故作忸怩之态，便亮出了他那双已经变了形的脚，这种变形已经影响到他的双腿了。趁他双脚泡在水里的功夫，便有人前来替他梳发。在进行这一道工序时，他便说些笑话，讲点趣闻以为自己解闷。等那双畸形的爪子擦干以后，便站起来让人给穿衣服。这时他便开始走来走去的忙着换衬衣，并且就在女人面前换短裤，甚至连身子都不背过去。仆人们把一件件名贵的衣服，一件件背心递上去任其挑选，专门有一个仆人跟在他后边干这件工作。这位老爷穿上一只袖子，比来比去，再用眼睛看看周围的观众，同时一边处理公务，在文件上签字……这是他一天中最忙也是最辛苦的时候。

半夜，大家又来到他在圣一弗洛朗坦大街的公寓，所有大厅的门都敞开了，最重要的达官显贵云集于此，静静地等待着塔列兰，因为他还没到。不是被“老相识”中的某一位

妇人给绊住了，就是一局牌尚未结束，这些人尽管心急如火，但还要耐心等待。他们当中有吕伊纳公爵夫人，韦林童公爵，梅特涅亲王，全体外交使团，以及身份很高的外宾和高级军官。他一般在清晨两点左右才肯露面，这时他便拖着畸形的双腿，用手扶着家具来回走着和这一位谈谈再和另一位谈谈，并顺手向牌桌上扔几枚金币或者向某一位漂亮的太太讲几句奉承话。他使用这样的方式，以十分优美的话，处理着重要的外交问题。清晨四点，他离开大厅，公寓里外人也都陆续走尽，大门也便关上了。同样一套程序第二天再重新开始。

平心而论，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也确乎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因为稍有不周，他们便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把你的形象描绘得比较粗糙。莫莱在写塔列兰的回忆录时便是这样做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这些对往事的回顾，对那些喜欢稗官野史的读者是一种美好的享受，而使一位古人重新复活并在纸上栩栩如生，其价值远胜过十大卷歌功颂德的辩护书。比如，在读过塔列兰所有的外交通信以后，我们对他仍然了解得并不多，因为在那里边我们看不到他在华丽外衣掩盖下的那双残肢，也看不到他在客厅里被一群奉承拍马者所包围，更不会知道，他已经在垂老之年，形容枯槁，面目丑陋，还在麻木不仁地热恋着年龄刚刚二十一岁的漂亮侄媳。他带她一起参加维也纳会议^①，对他这位迷人的女顾问取得的成就非常自豪。是的，她的成功是无可争辩的，特别表现在会议期间，她爱上了一位年轻而潇洒的贵族。这位贵族对

^① 指1814年9月到1815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各战胜国会议。主要目的是要在欧洲各国恢复革命前的秩序，恢复各国旧王朝，重新分割欧洲和殖民地。
——译者

她表现的热情把她从这位老头子的爱情中夺了过来，因而她把平时给他的温情减到最低限度。她对后来的年轻贵族非常钟情，因而使得她那位被满腔妒火折磨得快要发狂的叔父很快便把她带回巴黎。但她又逃了出来，并重返维也纳。这使塔列兰心事重重，六神无主，忧心忡忡甚至手忙脚乱，觉得已经到了世界末日。但表面上他仍然摆起架子，装得神气十足。莫莱把这一切都描写得淋漓尽致，唯独没有向我们透露这位幸运的情场得胜的英雄的名字，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欧洲各国命运的主宰者的情人给夺走了。这件事曾引起各外交使团的讪笑。那位侄媳后来又回来了，如果她不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的话，至少也是屈服于压力。于是圣一弗洛朗坦大街公寓里的招待会上又回荡着他们放肆的欢声笑语。

我们相信，塔列兰是有才能的。其明证便是，他不但在这一桃色事件的冲击之下重新振作起来，而且五年之后，这一对叔父和侄媳结成的传奇式的夫妻，又主持了法国驻伦敦的大使馆，并在这个素以最懂得羞耻和最不能容人而著称于世的英国社会上顺利地为自己打开了局面。

49. 国王路易—菲力普的纳伊宫

在纳伊的索赛大道和阿尔让松大道交汇的拐角上，有一幢长长的矮房，正面有一排拱形窗洞，房子两边各有一个三角楣和一个由两个柱子支着的廊房，这就是上一个世纪时曾

誉满欧洲的宽大的王家宫殿遗留下来的唯一遗迹。但现在却早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以致大部分纳伊的居民竟不知道从前这里曾有过这么一座宫殿。

这一片宽阔的地域正是巴黎的门户，它从蒙索起，一边扩展到库贝瓦，另一边伸向阿尼埃尔。在这一辽阔的地带，有森林，有岛屿，有牧场，有农庄，有耕地，有果园，有荒地，有葡萄园，也有牧歌式的田园景色。这里的王家宫殿，包括它的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群在内，就其规模而论，可以和凡尔赛宫媲美。1816年当路易一非力普还是奥尔良的公爵时，便以非常便宜的价钱买下了这块土地，当时纳伊宫还只不过是一个不太大的别墅。自十八世纪它建成以后，曾多次转手，先后属于阿尔让松伯爵，圣一弗瓦，塔列兰，米拉和波利娜·波拿巴。但到了我们这位伟大的建筑家，开明的君主手里，他便忍不住想动手扩建这幢漂亮的建筑。于是便把宫殿的外部加长并修了长廊，盖了侧殿，添了温室，又造了一所小教堂，一座剧场，建了车房，盖了马厩，还建了宽大的御膳房。又在塞纳河上建了几座桥梁以连接大碗岛上的公园，还修建了一座狄安娜月神祠，一座室内马木场，还造了风车、水车，开办了养蚕场……甚至还修了一个试炮场，在那里试放铁球炮，并把维利埃小山岗辟为靶场。后来在他整个当政时期，每当国事之余，便到这个按他自己的口味建立起来的小王国里来休息或者带领全家到这里来度周日。

如果就其规模而论，把纳伊比作凡尔赛的话，那么，它便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凡尔赛。在这里，王家宫廷的气派一扫而空。这位国王经常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和圣一日尔曼大道从杜伊勒丽宫徒步到纳伊来，这种事已经是屡见不鲜了。有时候，就是下着大雨，你也能看见他一个人手擎着他那把著名

的传奇式的雨伞^①，满脚满腿沾满了泥泞走在这条路上。如果是全家到纳伊来，那么，国王，王后，几位年轻的王子和公主们便挤在一辆摆着长条凳的大车上或者是挤在一辆有流苏车篷的大游览车上，就象保罗·考克^②笔下的那些小业主们一样，经常坐着这种车到下莫东的餐馆里去吃水手鱼^③，或者到普雷一圣一日尔威去吃冷冻烤乳牛肉。

这位国王不拘礼节的行事，使巴黎人忧喜掺半。这种行动使他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成分比使他们感动的成份更多，因为这种行事在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就在当时，除国王外，当政的权贵们在顺民面前所表现的仍然是奢侈、挥霍。众人站在一旁看在眼里的仍然是帝国的豪华、排场，仍然是前呼后拥的车马侍从，仍然是威风凛凛的马队，在蔽天的尘土中在人群里横冲直撞，仍然是寒光闪闪的马刀在人们的头顶上飞舞。在复辟时期，人们曾见到过宫廷里华丽的马车，在卫队的拥护下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飞奔，也看到过路易十八庞大的车驾，或者查理十世的车队在举行完加冕礼后，在鼓乐声中返回他们的宫殿。甚至在共和时代，国民公会的议员们在公众场合露面时（尽管显得那么刚毅和严肃）仍然头戴翎毛大帽，肩披宽大的绶带，打扮得怪里怪气，看得人眼花缭乱。那么这位好好国王，今天却挽起裤管，在泥泞中艰难地跋涉，不仅令人感到惊讶，而且未免有点滑稽。

但这在他本人倒并非是为了拢络民心或者有什么政治上

① 路易一菲力普当了国王以后，仍然常常腋下挟着一把雨伞随便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当时住在巴黎的海涅曾于1831年12月写道：“自从他最后一次戴着圆呢帽，挟着雨伞在巴黎城里散步……到现在已经为时很久了……。”——译者

② 保罗·考克（1793—1871），法国作家，在他的通俗笑剧和小说中，经常对资产阶级、小业主们进行嘲笑和讽刺。——译者

③ 一种加酒和洋葱烹调的鱼。——译者

的企图，这实在是他的一种爱好。他在纳伊行宫里的生活方式，按照他的一位儿子的说法是，“一切都从容不迫”。从他办公室的窗户可以看到行宫外面的大路，他手边放着一个小型望远镜，这样，老远便可看见前来谒见的是谁，因此他便可以从容不迫地吩咐内侍，是接见还是挡驾。在餐桌上，他替全家人切烤肉，并根据每个人的口味给大家布菜。如果他在花园里纳凉，便掏出衣袋里随身携带的小刀修剪枝条。他的太太，即王后陛下，也并不比他更讲究排场。晚上她坐在罩灯下编织毛线，几位公主和她的小姑陪着她围桌而坐。桌子上有几个编了号码的抽屉，每个抽屉里放着自己该做的活计。国王便坐在一把转椅上读泰晤士报，这是他唯一喜欢的一份报纸。这时候，他们大家便都把自己是这个王国里最显贵的人物这一沉重的枷锁卸在一边，并且觉得自己似乎又回到了那种无忧无虑的当顺民的时代。然而，令人摆脱不了的梦魇却时时袭来：一天晚上，路易一菲力普读着报纸便睡着了，其他人有的在做活，有的在看书，都默默地干着自己的事以免影响父亲的休息。突然间便听到“咣”的一声响！……是有人前来谋杀国王吗？路易一菲力普醒了，王后和公主们把国王围起来，用自己的身子把他护住，以免发生意外，一边忙乱着一边派人了解情况。调查的结果是，什么事也没有，原来是放在墙角的一支很重的铁头手杖滑倒在镶木地板上，它倒下来时发出的声响使大家虚惊一场。……

对于年青的王子们说，纳伊就是个天堂。遇上好天，东方一发白他们便拉上姐妹们到河边去，不论是小伙子还是姑娘，他们都是游泳能手。来到河边，脱了衣服便跳进河里，一直游到阿尼埃尔，然后便象一群兴高采烈的划船运动员一样，沿着河岸的陡坡往回走。功课之余，一般是在大花园里

玩耍。他们在园子里吵闹嘻笑，爬墙上树，到地里去刨马铃薯^①，折果树枝，用竿子打核桃。七月份，每当晚饭之后，他们便成群结队地去纳伊的露天游艺场，和当地洗衣姑娘们一起荡秋千。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想起自己的身份和要讲什么礼仪，也几乎没有什么警卫人员。有一天，国王的长子，法定的王储，从鲁埃依回来，经过塞纳河旁边的单孔桥时，他看到外边的栅栏门关上了，为不绕道走大街，竟冒着扎破脖子的危险，从栅栏上翻了过来。当妈妈的遇到这种情况便责备他们几句，以免他们闹出事来。她对一切都十分谨慎小心，对什么事都担心，这几乎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她非常清楚，不幸的事随时都会发生，而且，她觉得，这种不幸肯定有一天会到来的！

这些可怜的人，希望能躲在这个家庭式的纳伊宫里，尽可能地摆脱繁重的国事以避免这种不幸的袭击，但不幸的事还是无情地接踵而至：首先是一系列的谋杀事件，国王却奇迹般地免遭于难。他几乎每次正式出巡，都有刺客象猎人打野兽般地向他开枪。其次便是1839年玛丽公主的夭折，当时她年仅二十六岁，她是这位不幸的王后最温顺、最有才华和最心爱的女孩。三年后，他们又经受了一次最严酷的打击：那位曾是王国希望的长子，在离开巴黎时因去向他的母后告别，不幸从车上摔下马路而死于非命。当时王后在纳伊教堂里死死地抓住他的棺木放声大哭，悲痛异常，凡是听到声音的人，总忘不了这一令人心碎的场面。最后便发生了最大的悲剧，革命爆发了，接着便是仓惶地出走，流放……与此同时，纳伊宫也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了。它被狂乱分子糟蹋得面目全非，抢劫、焚烧，破坏，把它搞得破烂不堪。里面的艺

^① 在当时，马铃薯是法国刚引进的一个新品种，尚属十分新奇。——译者

术珍品，名画，名贵的家具，能对这个家庭引起回忆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被搞得一塌糊涂。曾在那里度过其幸福童年的一位亲王，五十年后来到此地想寻找出一点点往昔生活的痕迹，结果是徒劳。他此行唯一的收获，是发现了一幅莱奥波德·罗贝尔的残画。该画原来挂在纳伊宫的弹子房里，它被仔细地修补以后现保存在瑞士的诺夏太尔博物馆，总算没有沦落。

在地球上已经消失了的纳伊宫，如果没有勒鲁一塞斯布隆先生的工作，没有他耐心的整理和渊博的学识，今天，它很可能被人们彻底忘掉了，但勒鲁一塞斯布隆先生承担起为这座已经化为乌有的旧宫殿作史的重任。因为他对纳伊的哪怕一小块砖瓦都很熟悉，他在这座城市的一条街上发现了一座建筑物，该建筑物宏伟的布局很使他吃惊。他发现这种风格很有方丹^①的特色。因为此人在七月王朝时期曾发表过一篇关于这座宫殿建筑的专题论文。于是勒鲁一塞斯布隆便走了进去。这是一座修道院，它的大门在阿尔让松大道二十五号，其位置恰好是在原来老王宫的同一线路上。我们这位探索者一走进接待室，他马上便认出了这是路易一菲力普的工作室，在这里，这位国王可以借助于小型望远镜发现栅栏外边前来谒见的臣子。随后他又查看了为给阿代拉伊德夫人^②建造住房而在米拉的艺术长廊的旧址上建造的那些房间。并在花园里发现了一张石头圆桌，夏天，国王便有时和他妹妹在这张桌子上玩玩牌……。

为寻找这些幸福年代（两个混乱时期的间隙）的见证

① 皮埃尔—弗朗索瓦—勒奥纳尔·方丹（1762—1853）法国建筑家。曾参加过卢浮宫的修葺工作，卡鲁塞尔的凯旋门便是他设计并负责建筑的。——译者

② 阿代拉伊德·奥尔良（1777—1847），路易一菲力普的妹妹。——译者

人，还要到德勒去，他进入静悄悄的埋葬尸体的地下室，在那里有他们的大理石坟墓。几位王子的坟墓都集中在王家墓地，分别散落在他们双亲坟墓的周围，他们是爱尔特，奥马尔，儒安维尔，内穆尔私玛丽，他们自由自在的童年曾给这个昙花一现的纳伊增添了许多青春的活力。这种安排，如同生前全家围聚在小客厅里聚会一般，只有国王一个人站在他的坟墓上，在他脚下俯伏着的是王后，她伸着双臂，似乎还在保护着国王，使其免受命运之神的打击。

50. 地下隧道

没有听到一句悼词，它便悄然而逝了，于是这个被堵塞的、烟雾弥漫的阴暗隧道，便在谩骂和嘲笑声中销声匿迹。但它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我们的先辈对待新鲜的事物是有着真挚的热情的，而今天我们这些麻木有余而敏感不足的人，对这些却以冷漠和傲慢的态度对待。比如格勒奈尔已经不冒水的自流井，圣一日尔曼大街的露天市场，圣一米歇尔的清泉水和那座艺术之桥等，在它们刚刚出现时，曾引起了普遍的赞扬，但待到后来，这些赞扬便无声无息了。这便也是巴蒂尼奥尔地下隧道的命运。

1835年7月颁布了一条法令，允许敢于冒险的商人修建一条从巴黎到派克的铁路。这条铁路从玛德莱娜广场开始，跨过塞纳河，直到阿尼埃尔郊区。当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公众的反映首先是惊异。工程师们怎么可能让他们的机器开

上蒙索的那个大山坡呢？难道他们竟然要把这个美丽的小山村和那些秀气的小房子给铲平吗？不久他们便得知，火车要“从地底下”通过，于是便引起了一片嘲笑声。把蒙索的山岗给挖通，并载着基督教徒们到里边去旅行，以让他们欣赏地下景色……这未免有点过于捉弄人了吧。因此，凡是神志清醒的人都持怀疑态度。普遍的看法则是，不可能有任何土方工程的承包人会冒失到在这个以沙土堆成的小山上开出一条地下通道，因为那些沙子会不可避免地塌下来把他们埋葬。当时实施这样的工程确实十分新鲜，以致看起来是难以实现的。

然而大家却看到一队队的工人在各路线上同时开工，一边平整克里希大平原，一边在塞纳河上搭起一座座木桥，一边又在阿尼埃尔和夏图之间建造火车站，甚至竟然动工打眼。真地开凿起令人无法相信的隧道来了，这时人们才感到事情并非瞎说。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竟象童话一般，一切，或者说差不多一切，都完工了。这时铁路修建者们在一致的抗议声中，不得不暂时放弃向玛德莱娜广场铺路的计划，工程便在欧洲广场打住，而在与其毗邻的旧蒂沃里地段新辟了一条线路。在欧洲广场的高地上，一大群看热闹的人睁大了惊异的眼睛看着这个异乎寻常的新鲜玩艺儿。在一条路上铺上两根巨大的铁条，并把它们摆成两条平行的直线，在它前面百十多米远的地方是令人莫测高深的地下隧道，它张着两只巨口，这条路便被这两只巨口给吞了进去。当时大家注意的中心便是这条隧道。大家把进到里面去，看成一件吓人的事。经过一番思考和评论，大家得出来的结论大致是这样的：“我可是一辈子也不会到这里边去。”

当时流行着的各式各样的猜测、议论，对工程的实施十

分不利。比如有些聪明人解释说，在这个低矮的山洞里，空气的阻力大到使载重量巨大的列车也难以克服，不管在前边拉它们的那辆车力量有多大，却无法解决。再说，冒出来的烟也散不出去，这就很快地导致旅客被窒息而死。当然，少数人也有可能逃出这种种危险而幸免于难。一位著名的学者对他的同胞们受到这种危险的威胁而深感不安，自信挺身而出揭露这些投机商人的愚昧无知以保护自己的同胞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他便以拯救科学的名义宣布，“隧道里的温度是八雷奥米尔度^①，而刚刚人们还处在四十度到五十度之间。”（作者原注：原文如此。）他接着说：“因此我声明，进入这个隧道必须要承受一个由热到冷的变化，这就使那些原是汗流浹背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得肺炎、胸膜炎、卡他性炎症等……”啊呀，原来如此！那么，从里面生还的人真可以称得上死里逃生。

1837年8月底，铁路建成，隧道打通，桥梁完工，车站的开放也已准备就绪，剩下的就是挑选通车典礼的第一批旅客了。铁路行政部门的主管官员们，为安定那些胆小怕事的人的情绪，颇费了一些周折，竟取得王后玛丽—阿梅丽的同意，当这次首次通车的第一批旅客。至于当时在位的国王路易—菲力普，他的大臣们认为，以一国君主之尊，不应该去冒这种危险，因而绝对阻止他去乘火车，于是就使得这位国王特别担心，8月24日那天，他如坐针毡心急如焚地等待着这次试车的结果。他的爱妻和他几位勇敢的女儿，都表现出一种值得赞扬的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充当了这次试车的旅客，因为公主们对她们的母后单独参加这次危险的活动

^① 雷奥米尔（1683—1757），法国物理学家，他于1730年造出一个酒精温度计，刻度范围从零度到八十度，世称雷奥米尔度。——译者

十分不放心，也便随同参加。这一行动被誉为英雄行为，一位记者在试车后的第三天，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说：“王后是登上这种‘空气车’的第一位女性。”很明显，他是被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当时还规定，国家的最高层人物也必须履行这项可怕的义务。

第二天便轮到王公大臣们试车了，其中有大法官和其他一些国家重臣。车站上聚集了一大群看热闹的闲人。这些大臣们却也态度安详，神色自若。为了振作精神，国民自卫军的乐队也坐在车上，并且在整个行程中都在不停地吹吹打打。尽管如此，每当列车一靠站，秩序还是一片混乱，原因是“联起来的铁链条行驶时发出来的讨厌的声音”，以及列车在开行的路上，工作人员吹的那种凄厉尖叫的号声使大家特别不舒服，特别是黑暗的隧道对他们威胁特别大，车站上唯一的景色就是这个不停地向外冒黑烟的隧道。但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当王后和公主们离开两个小时以后，这些“完好如初”的王公大臣们便见得活跃起来了，起码表面上看来如此，他们总算已经从窒息的，沉闷的空气和卡他炎症中解脱出来。因此，自26日开始，一些大胆的人，便自愿花钱买票来尝试这种滋味了，他们决心冒各种危险来完成这一伟大的壮举。不久，铁路便成了一种非常时髦的交通工具。甚至在家庭主妇中竞相比赛，以能在她家就餐者的名单中找到一位从圣一日尔曼乘火车来的客人为荣。吉拉尔丹夫人在她的《快报》专栏上，非常漂亮地描写了巴黎人对这一精巧的玩艺儿迷恋的情况。在餐桌上，当天前往冒险的人便成了英雄。他忙着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想了解一下，他此行的印象如何。而他也不待别人请求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他是如何登上一节小巧漂亮的轿车，如何完全随

自己的意愿找座位，其座垫又是如何之舒适，他又是如何在车辆行进时倾听那隆隆的声音，随后，就听得“噗嗤”一声，车子就到了圣一日尔曼了。他还说，在行车路上看见了几个梁柱，但是否真的，他不敢断言。

“那么，隧道是怎么回事？”

“啊呀，我的上帝！隧道嘛……里边特别黑，整整有半分钟的功夫，你眼前完全是一片漆黑……”

“可怕！这太可怕了！”

“啊不！完全相反！这是一次美妙的旅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当你到达派克时，会使你产生一种深深的忧虑，你会觉得顷刻之间你便离开了你的家人和朋友们如此之远，因此就想匆匆忙忙地往回赶。除了这种沉重感以外，可以说是其乐无穷。”

看着餐桌上所有的客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位勇敢的探险家滔滔不绝的叙述，不禁使人觉得他很有些随心所欲地给这件事“添枝加叶”。例如他说：“坐在这种车的车顶上旅行，真是一件惬意的事！如果下起雨来，你连打开雨伞都来不及……”难道说火车管理人员在列车开行的过程中，会让旅客们到车厢顶上去坐着吗？

另外，这第一批铁路乘客们的讲述之所以搞得混乱不堪，主要是因为缺乏词汇，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他们的见闻。就是吉拉尔丹夫人，也未尝不是如此。她勇敢地承担起描写这一显贵们也被强迫参加试车的这一乘车旅行的壮丽场面。她为我们写的报导并非绝对清楚明白，因为她同样缺少我们今天已经约定俗成的专业术语。试看——

“我们清晨五点便到了伦敦街。等车的人群等在外边，车站尚未开门，我们也等在车站前边。终于车站大门开了，

我们便进到里面一个类似走廊的通道上，上面搭着绿色的棚顶。只有一个办公室，各种等级的乘客都混在一起买票。票价有两法郎五十苏的，有一法郎五十苏的，也有一法郎的。我们很吃力地挤到办公室门口，里面便给了我们三张黄色小纸片，于是我们便得以进入一间哥特式的大厅里，墙上挂满了画。在这里，乘客就可以分路了，花三十个苏的向右走，花二十个苏的向左走，而后还是等，当时才六点十分，而开车的时间是七点钟，耐心地等吧！这时突然听到了一种车辆行驶的声音，这是从圣一日尔曼发出的车到了。大家便争先恐后地向窗户跑去，但外边的院子里却空无一人。火车停了下来，待车门一开，就在这一瞬间，便见有大批的旅客熙熙攘攘地从车子里涌了出来，这时院子里便突然间挤满了人群。这种场面实实在在难以描写，但你如果冷眼旁观，却觉得十分可笑。现在该轮到我们的了，我们便走到院子里来，并登上了其中的一辆轿车，但要等车上的旅客都上满了才能开，大约有六百人左右的样子，但也有一个人说，有一千一百人左右，我看这个人毫无疑问是有点紧张的。终于号子声响了，我们感到有一点轻微的震动，这样便出发了……车子的速度快得怕人，但却没有一个人对这种快速行驶感到恐惧。”这位可爱的专栏作家，引用了在出发时别人给她的导游手册上的一句话：“瓦雷里安山也扭过头来俯身而望，目送着这轰鸣的风暴疾驶而过，……”是的，这轰鸣的风暴，它便是开往圣一日尔曼的火车！

所谓“院子”，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月台”，所谓“轿车”，就是一节车厢，而“黄色纸片”就是火车票了，而他们所说的“号子”，便是车长的喇叭……。对这条隧道，却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它，可能是我们这位女旅客对它的

印象不佳，也可能是巴黎人对这个黑色的怪物已经习惯了。因为他们已不再对它望而生畏，所以自然也就变得十分冷漠。这一看法的变化表明了，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条巴蒂尼奥尔的地下隧道，是怎样从开始时备受赞扬，甚至被认为可以“使古罗马人自愧不如”的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而到后来竟沦落为倍受歧视的无用之物，甚而至于到了被控为“巴黎的耻辱”的境地。假如这些被拆路工人的翻斗车装得满满地运往瓦石场去的这些薰黑的石头有知，并能开口讲话的话，同样，如果为欢迎玛丽—泰雷兹而在萨尔兹堡建立起来的凯旋门的那些石块也能讲话的话，那么它们会对我们发表一篇雄辩的、具有说服力的训词，以责备我们对待荣誉的虚荣心和那种见异思迁，朝三暮四的性格。